

目 录

乌克兰问题

- 3 封帅 /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 42 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 / 论乌克兰问题
- 60 葛汉文 丁艳凤 / 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演进、政治诉求与极端发展
- 76 杨友孙 / 乌克兰宪法变革下的政体困局：评估与展望
- 104 孙超 / 分离的国际化及其演进——对南奥塞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情势比较

欧亚主义

- 136 林精华 / 从欧洲化到苏维埃化的跨欧亚帝国治理：关于欧亚主义的论述
- 187 张海鹰 / 20世纪20年代俄国侨民界对欧亚主义的批评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4 年 6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4 年第 3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Фэн Шуай

Рождение трагедии: дилемма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судьба Крыма..... (3)

Никола Трубецкой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Украине..... (42)

Гэ Ханьвэнь, Дин Яньфэн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и развитие экстремизма..... (60)

Ян Юсунь

Дилемма формы правления в Украин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оценка и прогноз..... (76)

Сунь Ча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отделения и её эволюция—Сравнение ситуаций отделения Южной Осет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й Украины..... (104)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Управление транс-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ей от европеизации до советизации: о евразийстве..... (136)

Чжан Хайин

Критика русской диаспорой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в 20 гг. 20 в..... (187)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4 年第 3 期 (双月刊)

Contents

Feng Shuai

The Birth of Tragedy: the Dilemma of Identity and the Destiny of Crimea... (3)

Nikolai Trubetskoi

On the Ukraine Issue..... (42)

Ge Hanwen, Ding Yanfeng

Ukraine Nationalism: Historical Evolution, Political Claims and Its Radicalization (60)

Yang Yousun

Regime Dilemma under Ukraine Constitution Changes: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 (76)

Sun Cha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eparation and Its Evolution: Comparison of Separation in South Ossetia and Eastern Ukraine (104)

Lin Jinghua

The Cross-Europe-Asia Empire Governance from Europeanization to Sovietization: Discussion on Eurasianism (136)

Zhang Haiying

Russian Emigrants' Criticism against Eurasianism in 1920s (187)

乌克兰问题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封 帅*

【内容提要】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

*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

【关键词】 身份认同 克里米亚 集体记忆 历史叙事 符号

【中图分类号】 D73/77 (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4)03-0041-(39)

绪 论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重新翻开2014年3月的史册时，他们很可能仍然会对克里米亚事件的突然发生感到震惊。在短短几天之内，一个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尚属平静的地区，迅速改变了自己宣誓效忠的对象，完成了领土主权的变更。诚然，这种变更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外部力量的干涉，但克里米亚居民压倒性的投票结果和相对平静的社会局势仍然昭示出一个客观事实，即克里米亚地方政权和大部分居民对于自我政治身份的变更持支持和肯定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们一直都期待着这种身份变更的到来。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尽管身处乌克兰国境之内，但克里米亚并没有认同自己的乌克兰身份。

身份 (Identity) 是一个无处不在、却又因为所涉及的内容过于庞杂而无法获得很好解释的概念。身份的核心意义，是对“自我”和“他人”的区分，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对于“自我”特征的确证，来明确自身的群体性归属认

知。^①身份的内容是多层次的，人或者群体都会拥有不同属性的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身份并非人或群体内生的因素。任何个体和群体身份都是被他人和自我共同建构出来的映象，因而是可以被同化和改变的。彼得·卡赞斯坦认为，“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形成并改变着自我的本性与特征的形象。”^②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说得更加清楚，国家和民族都是基于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所建构出来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③。“身份认同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但是，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④总之，身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⑤，而且身份所带来的问题弥散于世界的每个角落。

在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面临着身份认同流散的挑战，但在原苏联空间内，这种身份认同困境展现得尤为明显。苏联解体以后，原苏联空间内的所有国家都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里开始了复杂而全面的转型进程。前苏联国家所面临的转型进程是异常困难的，他们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同时完成国家重建、民族重建和市场重建的全过程。在经济上，他们需要完成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新的轨道，并且努力融入国际市场；在政治上，他们必须根据本国需要，建立现代政治体系，尽可能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方面，他们需要重新整合国内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资源，构建新的民族符号与历史叙事，形成新的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同时完成三个方面的转型，是极难的任务。原苏联空间中复杂的民族结构和不成熟的国家建构，在转型所引起的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常常会诱发身份认同的混乱，从而导致地区形势动荡甚至国家间的冲突。类似的认同困境问题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

① Kay Deaux, “Re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19, No.4, p.12.

②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9.

③ [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④ Amartya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London: Penguin, 2007, p.1.

⑤ Amartya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London: Penguin, 2007, p.xi.

⑥ Claus Offe, *Varieties of Transition: The East European and East Ger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7.

阿塞拜疆、车臣—达吉斯坦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一再上演，直到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亚半岛达到顶峰。

尽管乌克兰危机仍在继续，但对于克里米亚地区来说，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已经退场，关于其身份认同的争论也已经告一段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读，对于乌克兰来说，克里米亚事件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主权和地缘政治的悲剧。而对于欧亚问题的研究者来说，克里米亚事件的突然发生也是对传统理论方法和基本结论的巨大冲击。

事实上，由于从1996年后克里米亚地区局势一直保持平静，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渐渐淡出了乌克兰研究中热门议题的名单。而且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西方研究者普遍将其视为原苏联空间内处理身份认同的成功案例而加以推崇，并且将乌克兰处理90年代初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经验作为多民族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建构民主政治体制的重要经验。

虽然在2011年以后，一些围绕着克里米亚半岛身份认同的微观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克里米亚地区身份认同的风险有所注意，但对于其可能造成的影响仍然估计不足。^①相对而言，由于历史和民族的联系，俄罗斯学者对于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加关注，而且对于其危险的估计也更加充分。尤其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国内二元对立加剧的情况下，俄国学者越来越多地重视克里米亚身份认同建构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也为后来克里米亚事件中俄罗斯的政策选择作了理论准备。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克里米亚身份认同的议题几乎没有任何关注，在克里米亚事件爆发之前，对于克里米亚半岛有价值的研究全部集中于历史研究领域，仅有部分乌克兰研究的文章对于克里米亚认同问题稍有涉及，尚未出现

①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克里米亚身份认同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Gwendolyn Sasse,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Serhy Yekelchu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aroslaw Janczak (ed.), *De-Bordering, Re-Bordering and Symbols on the European Boundaries*, Berlin: Logos, 2011; Jakob Hedenskog, *Crimea after the Georgian Crisis*, Stockholm: Totalforsvarets forskningsinstitut, 2008; Taras Kuzio, *Ukraine-Crimea-Russia: Triangle of Conflict*, Stuttgart: Ibidem, 2007; Dmitri Trenin, *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5.

专门的研究成果。^{①②}

本文以克里米亚身份认同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苏联时期的历史渊源出发，分析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出现的主要根源，并且从国家身份、地区身份和民族身份三个层次分析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区域内身份认同构建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层次身份认同建构的差异对地区政治结构所产生的微妙影响。最后，结合20世纪90年代初期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妥协过程，解读身份认同对克里米亚未来发展的影响，以期为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内生性视角的解读。

混乱与错位：苏联帝国的遗产

①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对于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Лантух Н. А.: Об островн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крымск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е крымца», с. 257-268, Симферополь «СОНАТ», 2012 г.; Н.В. Багров: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рыма – фактор рыно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Культура народов Причерноморья», 2011 г., № 200, С. 139-141; Яковлев А.Н.: Тип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онфликтующих сторон в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конфликт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рыма,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Тавриче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В.И. Вернад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я. Том 23 (62). 2010 г. № 1. С.185-196; Островская И.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рым: Вопрос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Вестник СевГТУ.-Севастополь: Издво. СевНТУ, 2011, С.165-169; Амеличев Г. Н.: Спелеоресурс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Крыма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основ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егиона, 2012 г., Харьков, Украина; Глухова А. В., Черникова Г.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попытк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Вестник ВГУ.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социология», 2011 г., № 1, с. 5-13; Анто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Гриценко: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й градиент: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в соседних районах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Культура и 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Том 1, № 2, 2012 г., с.126-140. 本文俄文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崔珩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②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于克里米亚身份认同的成果较少，且多为乌克兰研究的附属成果，相关的研究内容可参见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杨恕、朱倍德：“后苏联时期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第23—41页；张弘：“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6期，第1—9页；冯绍雷：“乌克兰危机的人文透视——读《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有感”，《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1期；张昕、冯绍雷：“乌克兰危机的理论透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杨成：“克里米亚的历史宿命”，《环球》，2014年第6期；徐菁菁：“克里米亚：‘黑海门户’的历史与现实”，《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3月18日。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看，克里米亚半岛都是欧洲最为典型的“边缘之地”。蒙古人、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王朝、俄罗斯帝国先后控制过这个横亘于南欧腹地、扼黑海要冲的小小半岛。草原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在此汇聚并不断拉锯。

当然，对于克里米亚半岛来说，对其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俄罗斯人。自1783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凭借沙俄帝国强大的实力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俄国人便始终控制着这片土地。虽历经多次战乱和国家兴替，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有效管辖始终没有改变。^①

如果我们的观察更深入一步，就会更加清晰地发现，今日克里米亚的一切——无论是民族构成、语言文化、经济结构乃至地名路标，都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苏联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产物。在漫长的苏联时代，克里姆林宫根据自己的理念塑造了一个新的克里米亚。但由于不同时期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和理念截然不同，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和目标迥异，最终造成了克里米亚内部文化认知的混乱甚至撕裂。在国家解体、转型时代开始以后，这些潜在的矛盾和分歧迅速凸显，最终形成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是苏联帝国留给这个黑海半岛的历史遗产。

（一）1944：种族迁徙与民族结构的变迁

在苏联时期，克里米亚的认同建构的第一次重大变迁发生在1944年。在苏联红军收复克里米亚之后，斯大林决定以种族迁徙的方式来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Tatars）问题。

作为15—18世纪克里米亚的主人，鞑靼人对于俄罗斯帝国的吞并始终保持着敌意。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其本质上都是吞并他们的俄国人。自然，在1941年，纳粹德国占领克里米亚以后，部分鞑靼人组织将其作为实现自治的希望，积极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并且组织了总数约2000人的六个鞑靼营，并在德国人的指挥下参与对苏作战。

其实，参加苏联红军的鞑靼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很多鞑靼士兵为苏联

^① 关于克里米亚的相关历史进程参见 Dominic Lieven, *Empires and Russia*, London: John Murray, 2000;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3rd edi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aul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ress, 2008.

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在苏联红军收复克里米亚以后，斯大林于1944年4月和5月先后签署了苏联国防委员会5859号和5943号决议，以“与德国占领军”合作为名，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逐出克里米亚半岛，迁往位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在1944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将近20万，占半岛总人口的20%左右。在几天之内，共有180,014名鞑靼人被迁出克里米亚，整个半岛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鞑靼人。6月2日，又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5984号决议，以同样的罪名将克里米亚的3万多名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迁往西伯利亚，并且于1945年6月撤销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①

将鞑靼人迁出克里米亚半岛，是1944—1945年期间苏联对于少数民族实行强迫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鞑靼人离开克里米亚以后，土地全部留给了迅速增加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之外，在迁徙完成之后，苏联还通过撤销自治共和国和彻底修改地理名称及历史教科书等方式，将鞑靼人在克里米亚的痕迹全部抹掉。可以说，从1944年开始，除了“克里米亚”一词以外，在整个半岛上几乎再也找不到鞑靼人的影子了。^②

表1 克里米亚人口和民族构成的变化

	1897	1921	1939	1979	1989	2001
俄罗斯人	274,724 (45.3%)	370,888 (51.5%)	558,481 (49.6%)	1,460,980 (68.4%)	1,629,542 (67.0%)	1,180,400 (58.5%)
乌克兰人			154,123 (13.7%)	547,336 (25.6%)	625,919 (25.8%)	492,200 (24.4%)
鞑靼人	186,212 (34.1%)	184,568 (25.9%)	218,879 (19.4%)	5,422 (0.3%)	38,365 (1.6%)	243,400 (12.1%)

资料来源：Gwendolyn Sasse,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Appendix 1.

① 初祥：“苏联斯大林时期强制迁移少数民族及其后果”，《世界民族》，1998年第3期，第40页。

② “克里米亚”一词源于鞑靼语“Qirim”，原意为“要塞”、“堡垒”，而主要城市名称，如“塞瓦斯托波尔”、“辛菲罗波尔”等都源于俄语词汇。

如表1所示，在1944年以后，直到鞑靼人回归运动兴起之前，整个克里米亚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苏联用最野蛮的方式“解决”了克里米亚的少数民族问题，半岛彻底成为了一个与苏联内地人口构成几乎完全一致的一般性省份。这种俄罗斯族人口的结构优势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对于其未来的地区身份认同的建构同样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二）1954：行政结构的变迁与经济、文化结构的延续

1954年，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克里米亚的认同建构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化，这一次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行政体制方面。

为了纪念俄罗斯与乌克兰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Treaty of Pereiaslav）^①签署300周年，赫鲁晓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议，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管辖，以彰显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恒久的友谊”。

很多观察者都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突发奇想，抑或是对于他一直视为权力根基的乌克兰的一种拉拢和示好行动。的确，这一幕有趣的“赠礼”行动的宣传目的确实大于实际意义。但从赫鲁晓夫的角度来说，克里米亚这份礼物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这场“赠礼”行动的目的，是希望将克里米亚塑造成为苏联时代基辅和莫斯科之间友谊的新政治符号。毕竟，原本作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统一的政治符号《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就其本质而言，仅仅是乌克兰哥萨克领袖因为冲突的需要而向沙皇宣誓效忠的权宜之计，而沙皇也仅仅是以此作为吞并乌克兰的合法性借口。尽管在后来的沙俄和苏联历史上对这一协议的意义和影响不断神化，但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俄罗斯帝国控制乌克兰的合法性问题。即使在苏联时期，基辅对于莫斯科的不满也不时表现出来。作为长期在乌克兰担任领导职务的赫鲁晓夫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迫切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任期内，利用某种新的符号和纽带，重

①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由乌克兰哥萨克领袖赫梅利尼茨基与俄罗斯沙皇于1654年1月签署的合作协议。赫梅利尼茨基向沙皇宣誓效忠，而沙皇则对其提供支持和帮助。事实上，赫梅利尼茨基并没有认为这份协议是承认沙皇对乌克兰的管辖权，而哥萨克领袖与波兰、鞑靼汗国在不同时期都签署过类似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在沙俄和苏联时期都被俄罗斯视为其占有乌克兰的合法性基础。参见：Paul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ress, 2008; Goffrey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7.

新书写俄罗斯大哥与乌克兰小兄弟亲密友谊的神话，而克里米亚正是他所选择的那个最鲜明的符号。

既然是作为宣传和构建神话的工具，也就意味着除了在地图上的标记之外，并不需要对克里米亚的治理模式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1954年之后，克里米亚并未因为行政区划的调整而发生明显的经济或文化上的改变。由于克里米亚的主要经济支柱是驻军（带来的收入）、军事工业和旅游业，基本上属于莫斯科直接管理，克里米亚地方政治精英也习惯于向莫斯科直接汇报，无需经过基辅。而在人口结构和文化方面，在1954年之后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在苏联体制下，并没有出现任何乌克兰化的进程，俄罗斯族仍然在克里米亚占据主体民族的地位。（参见表1）

赫鲁晓夫的计划改变了克里米亚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却没有同时改变其经济、人口和文化结构。可以说，赫鲁晓夫只是需要一个作为政治符号的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仅仅是在名义上归属乌克兰，实际上仍维持着特殊的中央直属地位。对于克里米亚来说，这次改变，并未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且由于在苏联行政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当地政府也并未真正将基辅看作自己的上级领导，对于乌克兰其他地区，甚至还存在俯视的心态。而在乌克兰人看来，克里米亚是一个很难插手的区域，更像是乌克兰空间中的“国中之国”，二者之间身份认同的差异不仅没有减少，甚至可能还因为此次“赠礼”行动进一步拉大了。当然，在苏联严格的等级政治体系内，这些都仅仅是地方层面的潜在问题，而克里米亚的行政归属的变化也仅仅是克里姆林宫的一场宏大的政治宣传，克里米亚也变成了强化苏联身份认同的政治符号。然而，在1954年，谁也不会想到苏联未来的命运，赫鲁晓夫也不可能预料到他的这次“赠礼”最终将会导致克里米亚离开俄罗斯的版图，原本仅仅是地方层面上的可控问题最终会演变为地区甚至国家层面的身份认同危机。

（三）1991：自治共和国的成立与分离主义运动的根源

1991年6月，在苏联风雨飘摇的最后日子里，戈尔巴乔夫批准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建立。作为苏联政治体系中最后一个自治共和国（ASSR），克里米亚的认同结构发生了第三次变化，这场发生在苏联最后时刻的行政体

制变革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它的发生也为随后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改革时期。而由于鞑靼人回归运动的出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感受到了来自基辅和鞑靼的双重压力，克里米亚的民族主义和自治运动也逐渐兴起。

与苏联末期主要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截然不同，克里米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是反对苏联体系，而是针对基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而发展起来的。到1990—1991年间，传统的苏联体系已经注定无法维持，戈尔巴乔夫正在努力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政治授权，以便重新签署新的联盟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克里米亚民族运动的目标，是通过自治运动恢复自己曾经拥有的自治共和国地位，进而成为与乌克兰平等的加盟共和国，一同签署新的联盟条约。最终，在克里米亚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克里米亚在1991年1月21日就建立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问题举行了公投。公投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投票率高达81.4%，而支持率创纪录地达到了93.3%。^①

戈尔巴乔夫也对克里米亚的自治运动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由于乌克兰对于新的联盟条约能否顺利签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乌克兰本身又是苏联内部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戈尔巴乔夫迫切希望能够利用克里米亚的自治公投，将其作为迫使乌克兰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的一张底牌。戈尔巴乔夫本人很快对克里米亚的公投表示支持。作为回报，克里米亚当局也表达了对于新的联盟条约的支持。当然，乌克兰对于公投颇多非难，更反对克里米亚自治。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自然成为乌、克之间的仲裁者。最终，苏联最高苏维埃于6月批准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成立，但在行政序列中仍然隶属于乌克兰。这是苏联时期成立的最后一个自治共和国，也是唯一一个因为全民公投而成立的自治共和国。此时，距离苏联的解体已经不足6个月。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政治手段并没有挽救苏联的命运，但是

^① 关于1991年克里米亚公投的结果参见《克里米亚真理报》的相关报道：*Krymskaia Pravda*, 22 January, 1991, 1.

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一举动极大地刺激了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克里米亚原本还存在一些模糊之处的地方身份认同迅速得到了加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成立后，距离获得独立主权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和地区领导人拥有了独立的地方立法和行政权限，分离主义运动也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政治资源。在“8·19”事件以后，苏联的崩溃已经无法挽回，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则公开发表国家主权声明，彻底开启了后苏联时期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大幕。

（四）治理思路的混乱与身份归属的错位

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的首要根源，是50年来苏联对克里米亚的管制政策。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期的苏联对于克里米亚的治理思路不仅是不统一的，而且可以说是矛盾的，甚至是混乱的。不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根据当时的需要一再改变克里米亚的角色定位和治理目标，最终造成了整个地区的自我定位和民族归属出现错位，并在后苏联时代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局。

斯大林时期的克里米亚政策可以被概括为“去特殊化”政策。斯大林利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机会，运用野蛮的手段，以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克里米亚民族、语言和文化结构的调整，使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完成了“俄罗斯化”的进程。他的最终目的，是将克里米亚由一个特殊的民族自治共和国改变为苏联国内最普通的行政区域，彻底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在斯大林手中，鞑靼人失去了家园，在迁徙途中伤亡惨重。这当然是应当谴责的恶劣行为，但从政策目标上看，克里米亚确实完成了由“特殊”到“普通”的过程，成为俄罗斯和苏联的普通行政区域。如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赫鲁晓夫时期的克里米亚政策可以被称为“符号化”政策。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认同，强化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关系的纽带，赫鲁晓夫再次赋予克里米亚以全新的政治符号的意义，将其作为见证俄乌友谊的“礼物”。根据赫鲁晓夫的设计，克里米亚只是一个在苏联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所形成的神话或者符号，因此，在行政归属调整之后，并没有进行经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任何调整。于是，克里米亚成了一个行政上归属于乌克兰，但经济、文化

乃至人民心态上仍跟随俄罗斯的特殊实体。表面上看，赫鲁晓夫只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调整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政治宣传，有益无害。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已经悄悄改变了斯大林时代克里米亚的“去特殊化”政策，反而使克里米亚再次成为一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很“特殊”的单位。至于这种对于斯大林政策的背离是无意使然还是有意为之已经无从考察，但这次行政区划的改变确实成为了日后克里米亚问题的起点。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领导人所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已经是一个面临着分崩离析风险的国家，他的主要活动就在于应对此起彼伏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浪潮，尽可能地维持联盟的存在。此时，他已无力考虑克里米亚的长远发展问题。为了安抚民族主义情绪，他支持鞑靼人回归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寻求自治共和国地位的时候，他将其自治运动和公投作为可用的一项政治工具，以平衡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尽可能维持联盟的存在。在政治博弈中，这也算一步好棋。但当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重新成立时，苏联的克里米亚政策已经彻底背离了斯大林的政策方向，走上了“再特殊化”的道路。

在身份认同的构建上，在很多时候，纠正了一个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在未来造成一个更大的错误。在那些存在身份认同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任何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结构的改变，都有可能造成人群归属的变化，冲击原本就相当脆弱的群体身份认同。苏联时期的克里米亚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治理思路的混乱和政策的反复，使得原本已经逐渐消解（尽管使用极其粗暴的方式）的身份认同问题，因为地区经济、人口、语言和文化结构与行政归属的错位而再次凸显，并且伴随着国家形势的动荡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为严重的身份认同困境，并在多年以后酿成了更加严重的领土和主权危机。90年代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苏联帝国给这个黑海半岛留下的遗产。

认同的路径差异：俄罗斯身份的再次强化

当苏联解体的命运最终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克里米亚半岛也被置于

一个异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在苏联体系中，克里米亚仍然隶属于乌克兰，因此在后苏联时代，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基辅对于克里米亚半岛拥有主权，克里米亚应该成为新生的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随着苏联末期克里米亚自治运动的兴起，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克里米亚获得了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并且正在争取凭借新的联盟条约在苏联空间中获得与乌克兰平等的地位。但随着新联盟条约的失败和“8·19”事件的发生，苏联突然瓦解，原本试图通过加强与莫斯科的联系制衡基辅，从而获得更高独立地位的克里米亚在一夜之间成了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则已经成了另一个国家。

作为苏联内部对苏联的国家认同感最强烈的地区之一，在苏联身份消失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克里米亚地区的身份认同都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通过进一步的互动和建构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从理论上说，地区的身份认同根源于该地居民特定的集体记忆。根据社会学理论，集体记忆并不是真实的个体记忆的总和，而是由多年来形成的以共同语言所描述的关于历史叙事、政治和文化符号，乃至因为政治原因而人为建构的神话所组成的社会建构的内容。

“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所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①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解读，纪念碑、纪念日等特定符号的描述，乃至对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的有意夸张，都使得在一定空间和一定范围的人群中建立了共同的记忆和认知，在这些人群分享了共有的观念之后，会形成特殊的认知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特定的认同价值和集体身份，这便是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

当然，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克里米亚人来说，他们对于身份认同的理解不可能如理论一般清晰，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也不可能留出如此宽裕的时间等待集体记忆的形成，大多数的时候，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所主导的政治性行动会人为加快身份的构建，这也就意味着克里米亚地方政府、乌克兰政府和

^①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Colophon Books, 1950, p.48. 本句的翻译转引自本书中译本导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0页。

俄罗斯政府都可能对新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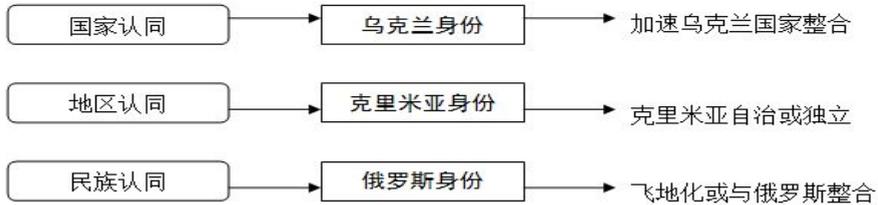


图1 克里米亚身份认同的路径差异

如图1所示，在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不得不开始其新的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此时共有三条新的身份建构的路径摆在他们面前：

其一，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构建自身的乌克兰身份。即完全接受作为主权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的政治地位，与基辅合作，并且在基辅的主导下逐渐在克里米亚推进乌克兰的国家认同，进一步融入乌克兰，实现统一的乌克兰国家的整合。

其二，建立新的地区认同，构建独立的克里米亚身份。这种路径选择强调克里米亚是一个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组成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辛菲罗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地方政权的主导下强化克里米亚自身独特的身份认知，以争取更大的自治权，甚至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克里米亚主权国家。

其三，利用已有的民族认同，重拾俄罗斯民族身份。选择这种路径意味着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人将利用其在地区人口和语言结构中的优势，重新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并且推进与俄罗斯在多个领域的整合，加强经贸联系和人员往来，在经济领域重返卢布经济圈，在思想文化领域重回俄语文化圈，更加倾向于将自我视为俄罗斯文明在乌克兰的飞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向基辅争取更大的自治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成了摆在克里米亚人面前的难题。但不管怎样，最终能够影响其身份选择路径的仍然是语言、历史和符号这些能够促使

集体记忆形成的因素，也正是这些要素最终决定了后苏联时代克里米亚的身份。

（一）共同的语言载体

语言是历史和记忆的载体，共同语言的形成和巩固是所有身份认知形成的基础条件。在1944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成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主人，即使在80年代鞑靼回归运动兴起之后，克里米亚的主体民族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如表1所示，在1989年，俄罗斯人占到了克里米亚总人口的67%，乌克兰人为25.8%，鞑靼人仅有不足4万，占1.6%。^①更重要的是，在苏联时期，克里米亚地方经济是在俄罗斯体系内建立起来的，且由于其战略地位重要，当地工矿企业大多为苏联中央各部委直属，与莫斯科的联系远多于基辅。在1954年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以后，其经济结构并未发生任何改变，经济规律的作用使得克里米亚成为乌克兰境内的特殊语言区。

根据1989年的统计，在克里米亚，不仅俄罗斯人全都使用俄语，而且有47.4%的乌克兰人也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俄语，也就是说，整个克里米亚90%以上的居民都将俄语视作主要使用的地方语言，即使是后来逐渐回归的鞑靼人，也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以俄语交流。^②这种趋势一直到现在仍没有改变。如图2所示，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塞瓦斯托波尔超过90%的居民以俄语为主要交流工具，克里米亚其他地区的俄语人口也高达77.0%，大大超过了58.5%的俄罗斯族人口比例。（2001年各民族人口比例见表1）在2001年，在克里米亚仍有59.5%的乌克兰人和11.4%的鞑靼人以俄语作为主要的生活和工作语言。

因此，虽然克里米亚地区归属于乌克兰，但毫无疑问属于俄语地区，该地区的历史记忆和神话只能够以俄语传播才能够为绝大部分居民所知晓，这几乎决定了未来地区身份认知的主要方向。

① 1989年的数据转引自：Yevoutoukh, Dynamics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Crimea, in Maria Drohobycky (ed.), *Crimea: Dynamic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1995, p.73.

② Gwendolyn Sasse,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p.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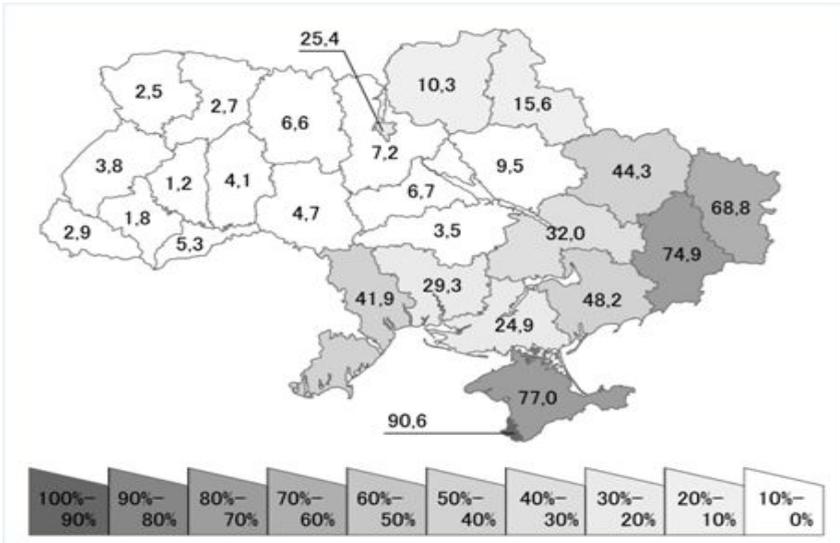


图2 乌克兰国内俄语人口的地区分布比例（2001年人口普查数据）

资料来源：“About number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of Kyiv on the results of Census 2001”,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Retrieved, 8 January 2014. http://2001.ukrcensus.gov.ua/results/general/language/city_kyiv/

（二）历史叙事的重构

历史叙事是让今天的人们联结过去与未来的一把钥匙，也是构建集体记忆、描绘民族与国家身份最有力的武器，可以让共同生活在特定空间中的人们确定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坐标。对于那些身处后苏联时期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历史的重构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强调自己对于现有领土的控制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从而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背书，进而将自己的独立描述为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对于大部分苏联加盟共和国而言，否定苏联的历史，强调苏联政权对本民族的压迫，重新美化1917年以前的民族历史是最为方便的选择。乌克兰在历史重构方面很大程度上也选择了这一方式，并且在基辅的官方叙事中努力强调基辅罗斯与克里米亚的历史性联系，希望赋予1954年的“赠礼”更多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对于克里米亚来说，这种太过牵强的历史联系很难成为克里米亚历史叙事的主体。更重要的是，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根深

蒂固，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无法将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对立起来，甚至连克里米亚与苏联的关系都很难按照基辅所希望的方式进行解释。

以俄语进行叙述的克里米亚历史从18世纪开始。在178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完成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征服之后，为了强调占领克里米亚的合法性，俄国史学家就已经开始强调克里米亚是古罗斯时代斯拉夫人和后来的俄罗斯人的传统领地。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鞑靼人就已经成为克里米亚历史叙事中的反面角色，他们被描述为来自东方的外来侵略者，在他们占领克里米亚期间，不仅四处侵占斯拉夫人的领地，将斯拉夫人作为奴隶进行贩卖，而且为奥斯曼帝国效命。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俄罗斯帝国对于克里米亚的占领就成为了斯拉夫人反抗外族压迫的过程。

随后一百多年里，克里米亚的历史便与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克里米亚半岛重要的战略地位，围绕着塞瓦斯托波尔发生的战争又迅速成为俄罗斯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叙事。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尽管最后以俄军失败而告终，但这场惨烈的战役随着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朽之作《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传播，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①此外，由于克里米亚优美的海滨环境，从19世纪开始就是俄罗斯贵族的度假胜地，要塞与美景使得克里米亚很快成了沙皇的掌上明珠，得到了莫斯科无限的关注和照拂。

苏联建立以后，克里米亚的特殊地位并未发生任何变动，关于克里米亚的历史叙事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②，甚至连克里米亚所经历的历史故事也又一次重演。二战期间，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再次遭遇更加强大的纳粹德国的围攻，苏联红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守塞瓦斯托波尔长达250天，使得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成为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战结束后，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的另一城市刻赤（Kerch）先后被授予“英雄城市”的称号。克里米亚的故事又一次成为苏

① 参见[俄]列夫·托尔斯泰：《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吴岩译，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

② 除了在苏联建立初期，为了强调新政权的合法性，曾一度强调俄罗斯帝国对鞑靼人的民族压迫，但在斯大林民族大迁徙之后，便更加彻底地将鞑靼人从克里米亚的历史叙事中抹去了。

联历史叙事中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伟大精神的彰显。而在二战末期，关于构建战后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小城雅尔塔举行，又为克里米亚的光荣历史添上了重要的一笔。当然，黑海沿岸也是苏联领导人所喜爱的度假胜地。有趣的是，“8·19”事件发生时，戈尔巴乔夫正是被软禁在克里米亚弗洛斯特镇（Foros）的别墅中。当然，在苏联时期的历史叙述中，鞑靼人仍然是勾结纳粹德国、背叛祖国的少数民族，这也是在为斯大林的民族迁徙政策提供解释。

由于种种原因，在克里米亚人的历史记忆中，他们并未经历过类似乌克兰所经历的大饥荒或者大清洗运动，而且因为特殊的军事价值和旅游观光价值，克里米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平均收入在苏联时期一直高于乌克兰其他地区。他们对于苏联的记忆与其他乌克兰地区存在不小的差别，对于苏联的认同明显高于乌克兰其他地区，这也影响了后苏联时期克里米亚地区的历史叙事的重构。

克里米亚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造就了克里米亚特殊的历史进程。在苏联解体后的克里米亚历史叙事的重构过程中，无法赋予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这些在克里米亚历史中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和境遇的人群以合理的身份和地位，历史重构的过程面临着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一，无法解决乌克兰的缺位问题。在克里米亚的历史叙事中，无论在任何位置，都很难找到乌克兰与克里米亚的内在联系，也无法从历史演进中解释乌克兰对于拥有克里米亚领土主权的必然性和逻辑性。尽管基辅罗斯是斯拉夫文化的源头，但在这一时期，克里米亚并不在斯拉夫人所控制的范围之内。在与俄罗斯发生联系之前，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在希腊人、哥特人、匈奴人、蒙古人手中不停地传递。如果说鞑靼人还可以将自己与克里米亚的联系延伸至此，那么乌克兰人无论如何都是克里米亚的后来者。甚至可以说，从历史建构的角度来看，除了1954年赫鲁晓夫的“赠礼”行为之外，根本无法找到乌克兰与克里米亚的历史纽带。

第二，无法解决鞑靼人的位置问题。从沙俄帝国到苏联时期，整个克里米亚的历史叙事逻辑都是斯拉夫人反抗鞑靼人和其他一切外来侵略的过程，而鞑靼人在所有的历史叙事中都是与俄罗斯人或整个斯拉夫人敌对的。除了

在苏联末期有所转变之外，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对于鞑靼人的认知都是负面的。如果要重构克里米亚的历史叙事，将鞑靼人变为历史叙事中的正面角色，那么斯拉夫人来到克里米亚的行为就将变成对鞑靼人历史领土的侵占，而鞑靼人则成为反对沙俄和苏联侵略的正面形象，这根本不可能被克里米亚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克里米亚主人的鞑靼人的历史定位问题就构成了克里米亚历史叙事重构过程中的另一个难题。

第三，无法处理苏联的历史坐标问题。对于大部分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将自己的独立作为反抗苏联压迫的必然结果是最为常规的历史重构方式。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强调政权的合法性，亦可将自我与苏联成立前的民族国家联系起来，构成新的国家身份。但对于克里米亚这样的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对于克里米亚来说，情况更加复杂。如果否定苏联时期，就无法解释当前克里米亚俄罗斯人作为地区主体民族的合理性。如果否定了苏联，也就否定了其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中英雄城市的地位，并让雅尔塔的光芒黯然失色。最重要的是，即使否定了苏联时期，他们仍然能将沙皇俄国作为自己光荣历史的主要篇章，俄罗斯主体性仍然没有改变。而对于乌克兰来说，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的唯一历史原因便是1954年赫鲁晓夫的“赠礼”行为。如果不承认苏联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那就无法解释占有克里米亚的历史合法性。此外，由于乌克兰在历史上缺乏独立国家的历史，其目前的领土范围（尤其是西部领土）是苏联通过二战获得的，否定苏联历史，也无法解释其领土主权的合法性。

克里米亚历史叙事的重构过程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逻辑困境。由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历史中的缺失，使得基辅很难将克里米亚纳入乌克兰民族的叙事之中。由于鞑靼人在过去历史叙事中与俄罗斯人的长期对立，在当前克里米亚民族结构和语言结构中，很难获得他们自己所期望的地位。在多民族国家和地区，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解读存在差异本是自然之理，但由于克里米亚得以书写历史辉煌的一页，大多是沙俄帝国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建构一部没有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历史。因此，无论是独立后的乌克兰中央政府还是回归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都无法改变以俄语为基础的克里米亚历史叙事中的俄罗斯内核。至今，以俄罗斯民族保卫家园的历史

叙事逻辑仍然是克里米亚人集体记忆的核心。

（三）符号的创造与保留

符号的建立是影响身份认同建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城市、街道的名称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建筑，从高耸的纪念碑到特定的节日，从伟大的英雄传说到对特定历史事件意义的界定和夸大，无不影响着特定人群的心理状态，以各种直接介入日常生活的方式影响着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形成。

地理名称是最重要的认同符号之一，政治权力的变化从地理名称的修改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控制克里米亚之前，包括“克里米亚”一词在内，整个半岛上的地名都是以鞑靼语命名的。而在俄国人到来之后，除了保留了“克里米亚”之外，所有重要城市的名称都被换为俄语名字，而且这些名字并不是将鞑靼语翻译过来，而是对所有的城市重新命名。许多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历史名城名称都源于此时。例如鞑靼原名为“Aqmescit”的小城变为辛菲罗波尔，而鞑靼名为“Aqyar”的港口则成为“胜利之城”塞瓦斯托波尔。当然，这一轮名称的变化仅停留在主要城市，对于小镇、村落等还保留着过去的名字。1944年大迁徙之后，斯大林对克里米亚地名进行了彻底的“去鞑靼化”改造，将整个地区的1400多个地名全部改为苏联式的名字，鞑靼名称彻底消失。苏联解体之后，与很多前苏联国家和地区不同，克里米亚的地名基本维持了苏联时期的名称。鞑靼人曾提出将名称改回鞑靼语，但在俄罗斯人占多数的议会中难以获得支持。而由于克里米亚各地名与乌克兰历史缺乏联系，因此，更不可能接受乌克兰式的命名。于是，直到今天，克里米亚半岛还保留着“近卫军村”、“苏维埃茨基”等典型的苏联名称。塞瓦斯托波尔市的行政区划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如图3所示，塞瓦斯托波尔市内仍然保留着加加林区、列宁区这样典型的苏联名称，而其他如纳西莫夫区、巴拉克拉瓦区和因克尔曼，则是为了纪念沙俄帝国时期发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著名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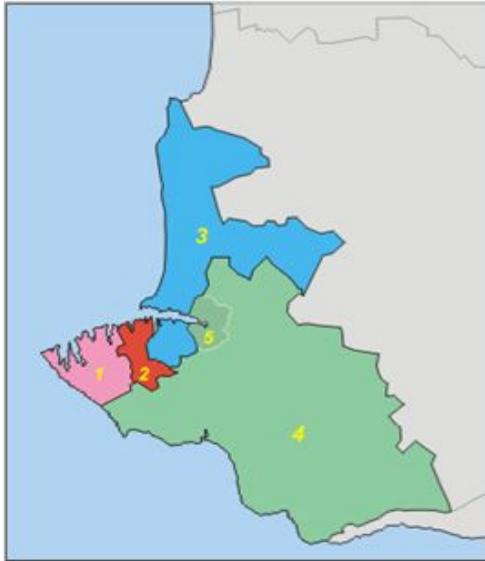


图3 塞瓦斯托波尔行政区划示意图

图例：1、加加林区；2、列宁区；3、纳西莫夫区；4、巴拉克拉瓦区；5、因克尔曼
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Sevastopol>

除了地理名称之外，其他有形和无形的符号也在随时提醒着克里米亚人的自我身份。与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家摧毁苏联时期的历史纪念碑和苏联领袖雕像的行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克里米亚半岛，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纪念碑仍然分布于半岛各地，对于俄罗斯历史的追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地方政府层面，仍然使用很多带有俄罗斯意义的政治符号，这些在克里米亚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符号组成了其身份认同的强硬内核。

克里米亚半岛的核心塞瓦斯托波尔和辛菲罗波尔的城市建筑与政治徽记对于这种俄罗斯身份的认同体现得最为明显：

作为克里米亚半岛最著名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的辉煌的记忆。即使在2014年公投入俄之前，塞瓦斯托波尔也一直以各种方式重复着自己的俄罗斯历史名城的记忆。



图4 塞瓦斯托波尔的象征：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

克里米亚战争是塞瓦斯托波尔历史上最辉煌的记忆之一，也是克里米亚不屈不挠的城市精神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塞瓦斯托波尔人一直引以为豪。如图4所示，耸立于黑海岸边的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一直是塞瓦斯托波尔的象征，也一直提醒着人们这座伟大城市的辉煌历史和俄罗斯身份。



图5 塞瓦斯托波尔城徽

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市徽章则更加明确地彰显着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如图5所示，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徽中，蓝白两色象征着大海，强调自己港口城市的身份。在徽章左侧是城市的地标建筑——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而在城徽的右侧，仍然是苏联时期的金星勋章图案。

为了表彰在二战中塞瓦斯托波尔军民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1945年5月1日，塞瓦斯托波尔与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敖德萨一起被命名为“英雄城市”，并被允许在城市徽章中加入金星勋章图案——对于苏联城市来说，这是至高的荣耀。在苏联解体后，很多原苏联城市都对自己的城徽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苏联的印记，但塞瓦斯托波尔人仍然异常珍视他们“英雄城市”的称号，始终在城徽中保留着苏联的符号，闪耀的金星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认同宣示。

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塞瓦斯托波尔基本上没有对城市内的沙俄帝国和苏联的纪念碑等象征性符号作任何迁移，相反，他们还在通过新建纪念碑等方式不断强化自己与俄罗斯历史的联系。2008年，为了纪念塞瓦斯托波尔建城225周年，在市议会的推动下，在城市内建造了一座新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雕像。为了这座雕像的建设，塞瓦斯托波尔议会与基辅任命的市长还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政治博弈，最终基辅也无力改变议会建立雕像的计划。类似这样的事件反映出的是基辅和克里米亚对于政治符号和身份认同的重视，但是最后的结局也反映出基辅对于克里米亚当地身份认同建构的无能为力。^①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克里米亚其他地区。例如，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至今仍然保留着列宁的雕像和苏联时期的很多纪念碑（如图6所示）。而且作为克里米亚地区的行政中心，辛菲罗波尔的城市旗帜和徽章并没有使用乌克兰传统的黄蓝两色，而是继续沿用代表俄罗斯身份的红白蓝三色（如图7所示）。这些符号的存在，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含义。

^① 关于这场围绕着叶卡捷琳娜二世雕像的小型风波及其背后的乌克兰与克里米亚的关系，参见 Felix Münch, “New Symbols of the Old Empire: Re-Bordering through Historical remembrance on the Crimean Peninsula”, in Jaroslaw Janczak (ed.), *De-Bordering, Re-Bordering and Symbols on the European Boundaries*, Berlin: Logos, 2011, pp.97-114.



图6 辛菲罗波尔的列宁雕像



图7 辛菲罗波尔的城市旗帜

除此之外，与克里米亚地区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诗歌等也可以被视为能够影响身份认同的符号。事实上，在克里米亚写成或者以克里米亚为背景的著名文学和艺术作品不胜枚举。历史上的很多著名文学家都曾与克里米亚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的作品也为克里米亚人所熟悉，构成了克里米亚人集

体记忆的重要内容。列夫·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都曾在克里米亚生活游历，并且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生动地描写了克里米亚战争时俄罗斯军民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是塞瓦斯托波尔伟大城市精神的集中描述。1820年，普希金在前往高加索途中经过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的友人家中住了三个星期。他自己将这三个星期描述为自己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并且留下了长诗《巴赫奇萨赖的泪泉》和《克里米亚的海岸》等著名作品。^①在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之后，白银时代的文化精英也对克里米亚地方文化记忆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马克西米里安·沃洛申（Максимили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олошин）是在克里米亚文化中留下最深印记的作家。他生于基辅，但从孩提时代便在克里米亚渡过，后来在莫斯科成为著名诗人。1916年，他又回到儿时生活的克里米亚东南部海岸，并且最终在克里米亚去世并被葬在那里。他是克里米亚文化的标志。他不仅创作了如《绿色的黄昏》、《水手》等著名诗作，而且他的住所还成了白银时代诗人群体在克里米亚聚会的沙龙。茨维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等都由于沃洛申而来到克里米亚，并且成为克里米亚文化符号的一部分。^②但是，即使在文化符号方面，仍然充满了俄罗斯的印记。毕竟，在俄罗斯帝国时期，无论生于何处，所有的作家和诗人都需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舞台上获得掌声，才能够成为具有声望和影响力的作者，而他们的所有作品也都是用俄语写成的。所以，能够被当代克里米亚人作为社会生活的符号记住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身上，都必然会有另一重身份——俄罗斯作家。

（四）原苏联空间内“顽固”的俄罗斯记忆

苏联解体对于克里米亚来说意味着对于原有身份认同的彻底颠覆。虽然从理论上说，在克里米亚面前存在着三条平行的身份建构路径，但是，在实

^① 参见[俄]普希金：《克里米亚的海岸》，刘季星，李鸿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关于沃洛申、古米廖夫和茨维塔耶娃的相关介绍参见[俄]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下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14—216页、第260—264页、第270—271页。他们全部出现在俄国文学史中，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了克里米亚地区文学艺术符号的俄罗斯属性。

际的身份建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克里米亚半岛这个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中，这三种身份建构方式的发展前景显然是非常不平衡的。

首先，乌克兰中央政府既没有足够的资源，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克里米亚建立起乌克兰的国家认同，无法在克里米亚建构乌克兰身份。如前文所述，即使作为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克里米亚仍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俄语文化区。凭借在地区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构成，俄语始终处于该地区共同语言的地位，并且承载着构建新的身份认同的基本任务。在俄语的克里米亚历史叙事中，沙俄帝国和苏联是克里米亚一切辉煌历史的根源，鞑靼人是所有历史事件中的反派，而乌克兰人则是历史中缺失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克里米亚人无法接受强行将乌克兰的符号和记忆加入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中来。而新独立的乌克兰既缺乏足够力量克服克里米亚内部的抵制，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的行为引发俄罗斯等外部因素的干涉，所以无法利用国家权力在克里米亚地区建构新的乌克兰身份认同。最终，国家认同的路径在2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难以推进。

其次，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同样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建立起完全独立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国家之外的实体性认同。克里米亚并不具有独立和完整的地区经济结构。从苏联时期开始，其经济就主要依靠黑海舰队驻军的收入、军工产业和旅游业来支持，而这些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俄罗斯既是军港的承租方，又是军工产品的主要购买方。而且，克里米亚半岛也并非资源丰富的地区，粮食和资源主要依靠乌克兰供给。所以，克里米亚地方政权也并不是一个拥有强势行动能力的政治实体，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无法摆脱乌克兰中央政权和内部鞑靼人的牵制，更无法摆脱乌克兰之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的资源中，也并不存在真正属于克里米亚的历史和符号。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克里米亚既没有自己的语言，在鞑靼汗国之后，也没有形成独立国家的历史，更没有办法彻底理顺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结构。在乌克兰民族国家中，克里米亚地区确实是特殊的，但如果将克里米亚放在广义的原苏联空间中，它又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俄罗斯人占主体、多民族共存的领土空间，并不具有构建实体性身份认同的特殊性。它可以在乌克兰内部寻求自治，但成为独立政治实体的条

件并不成熟，这也注定了它无法形成以独立的克里米亚为标签的地区身份认同。

最后，在族群分布结构极其复杂的原苏联空间里，重新强化俄罗斯民族的身份认同，是克里米亚地区占主体的俄罗斯人最合理的选择——几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无论从语言文化、历史认知、还是象征符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当前克里米亚最具优势的身份认同资源，而且原苏联空间复杂的族群分布结构也给了克里米亚重建俄罗斯身份认同的行动空间。一般来说，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占国家内部绝对多数的主体族群会通过中央权力努力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大的族群会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努力削减小族群较为强烈的自我认同，从而减少其共同行动争取权利的可能性。但由于原苏联空间是由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解体而形成的，很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地区迁移活动最终演进了与历史自然形成的族群分布完全不同的空间结构。如图8所示，以乌克兰区域为例，在克里米亚空间内，俄罗斯人相对乌克兰人和鞑靼人是地区的主体民族，但放大到乌克兰空间中，乌克兰人又成了主体民族，而俄罗斯人则成了少数。如果再放大到原苏联空间，俄罗斯人又变成了多数族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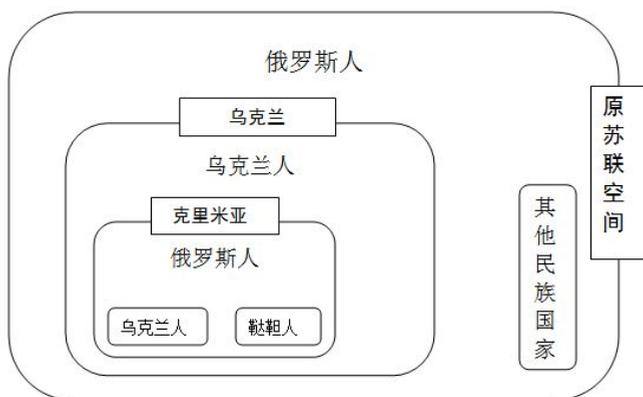


图8 原苏联空间里复杂的族群分布关系

在这种时空分布的态势下，如果乌克兰的国家建构较为成功，中央政府

拥有足够的力量，当然可以排除俄罗斯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在乌克兰空间内以国家认同逐渐同化克里米亚的地区和民族身份。同样，如果克里米亚地方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也可以建立以地区为核心的实体性身份认同，最终走向高度自治或独立。但是，无论是乌克兰政府还是克里米亚政权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来实现身份建构的目标。那么，对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来说，唯一可行的方案便是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人身份，并且通过加强与乌克兰之外的原苏联空间里的俄罗斯国家和族群的认同与联系，平衡乌克兰中央政府和地区内部鞑鞑人的双重压力。

事实上，对于克里米亚，尤其是克里米亚地区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来说，加强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是他们最容易接受，也最有利于保持地区主体民族地位、保证地区稳定的自然选择。无论从共同语言、历史叙事、符号认知，乃至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神话式建构等各个维度来分析，在克里米亚空间内，以乌克兰身份为目标的国家认同是缺失的，而以独立的克里米亚身份为目标的地区认同又是脆弱的，他们唯一的选择，便是回归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在克里米亚空间内，也只有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集体记忆是最为“顽固”的，它完整地构成了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现在的所有历史叙事，甚至可以说，2014年克里米亚主权地位的实质性变化很可能也将会在未来成为神话最新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民族认同最终的指向便是克里米亚主体族群的俄罗斯身份。

悲剧的前奏：1994年的克里米亚分离运动

苏联解体后20多年的身份认同的困境终于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集中爆发。在各种外部因素的刺激和鼓励下，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兴起，并最终改变了原苏联区域的政治地理空间。但这并不是克里米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兴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克里米亚就已经历过分离主义运动的考验，虽然在各方力量的协调下，初次的分离主义运动

以妥协而告终，但它所承载的很多目标和符号最终都被2014年新的分离主义运动继承下来，于是，这场发生在20多年前的政治运动就成了因为身份认同而引发的克里米亚地缘政治悲剧的前奏曲。

当苏联解体的时刻到来之时，刚刚诞生几个月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不得不马上面对因为严重的经济困境和自身政治地位重构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由于克里米亚的经济体系基本上依赖统一的苏联计划经济体系，所以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陷入了困境，地方民众收入水平从原本高于其他几乎所有乌克兰地区迅速滑落到乌克兰平均水平之下。同时，在1991年6月，克里米亚刚刚通过公民投票，成为苏联最后一个获得批准的自治共和国，并且还在进一步谋求签署新的同盟条约，从而获得新联盟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但由于苏联的解体，克里米亚的官方政治地位变成了新生的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而在克里米亚占多数的俄罗斯人则成了乌克兰境内的少数民族。因为苏联身份认同的消失，克里米亚也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下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探索。

从80年代末苏联体系出现危机开始，在克里米亚社会中就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可以继续留在乌克兰，但需要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利；而另一种则认为克里米亚应该离开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或重新加入俄罗斯。这两种观点的支持者就形成了苏联解体时克里米亚地区同时存在的两股政治力量。

前者的代表是由米科拉·巴格罗夫（Микола Васильович Багров）所领导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巴格罗夫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克里米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也是苏联解体前后克里米亚地区最高的政治领导人。巴格罗夫的政治立场比较复杂，在整体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的克里米亚地区，是一个略偏向于改革派的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和克拉夫丘克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他的支持者集中了克里米亚上层的主要政治精英，争取在乌克兰国家内部最大限度地维护克里米亚的自治地位是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

后者的代表则是尤里·梅什科夫（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шков）。他本人是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但却不是巴格罗夫的支持者。从1990年起，他就成了克里米亚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支持者

是克里米亚俄罗斯人中的激进团体，他们于1991年组建了政治组织共和国运动（Republican Movement），其所寻求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克里米亚国家或者重新加入俄罗斯。

在80年代末，两派政治势力并没有很清晰的界限，而且这一时期他们所争取的目标基本相同，即首先通过公投使克里米亚获得自治共和国地位。这一目标最终在1991年6月成为现实。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应该如何“安置”克里米亚，成了一个对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都很棘手的问题。由于基辅过于强硬的政策，最终引发了克里米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1991年底—1994年初，巴格罗夫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一直主导着克里米亚政局，并且利用各种条件与以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为首乌克兰中央政府就如何落实克里米亚的自治地位进行了复杂的博弈。但乌克兰中央政府的立场异常强硬。1992年4月，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地位的法案，法案非常清晰地强调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内部的自治区域”，但在克里米亚的自治权利方面，则非常含糊地表示，克里米亚有权决定其“能力范围以内的事务”。^①克里米亚民族主义者认为这种态度是乌克兰政府试图否定其自治权的表现，并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为了避免激进派的运动脱离自己的掌握，并且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向基辅施压，巴格罗夫对于最高拉达的决议进行了强硬的回击。1992年5月5日，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克里米亚独立，并于次日通过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即《1992年宪法》。在1992年宪法中，克里米亚共和国几乎拥有了包括军事权和外交权在内的一切主权国家所享有的权力，并且要求通过双边协定或条约的方式处理与乌克兰的关系。可以说，这部“宪法”完全体现了以共和国运动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团体的所有要求，自然无法被乌克兰政府所接受。^②

当然，作为温和派的巴格罗夫并不是真的试图使克里米亚获得主权地

① 关于乌克兰最高拉达对于克里米亚地位的态度，参见《乌克兰真理报》的相关报道：*Pravda Unrainy*, 25 April, 1992.

② 对于克里米亚《1992年宪法》的相关介绍参见 Gwendolyn Sasse,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pp.146-147.

位。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克里米亚的民族主义团体的力量，以这种方式向乌克兰中央政府施压，希望其能够改变4月22日法案所体现的强硬立场。然而，此举进一步激怒了乌克兰当局，乌克兰最高拉达随即通过决议，认定《1992年宪法》存在大量非法内容，要求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在一周之内修改，并且再次强硬表态，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必须以4月22日法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否则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格罗夫退缩了，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撤回了自己的提议，并且按照最高拉达的要求对宪法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这一举动获得了克拉夫丘克的肯定，但是却输掉了他自己的政治资本。

巴格罗夫的软弱，使得很多原本支持他的政治组织转而支持梅什科夫和共和国运动，而1992年宪法的通过和放弃也让整个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对于未来可能的乌克兰化感到警惕甚至恐惧。于是，原本分散的亲俄政党和政治活动家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克里米亚分离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政治联盟——俄罗斯集团（Russia Bloc），梅什科夫也自然成了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最有力量的领袖。

在1993年，乌克兰最高拉达同意在克里米亚设立总统职位，这实际上是克拉夫丘克为了让巴格罗夫拥有更大权限而量身定做的职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1994年的克里米亚总统选举却成了分离主义运动的起点。1994年1月，克里米亚总统投票开始，在首轮投票中，梅什科夫得票率为38.50%，而巴格罗夫的得票率为17.55%，位列前两位。而在第二轮投票中，梅什科夫以72.92%对23.35%的巨大优势获胜。^①梅什科夫的得票率与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口比率高度重合，他的当选实际上是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对于分离主义的认可。在随后的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选举中，俄罗斯集团也以巨大优势获胜，分离主义政治势力接管了克里米亚政权，自上而下的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全面启动。

从1994年初开始，克里米亚与乌克兰中央政府之间就进入了全面对抗的状态。在政治方面，梅什科夫当选伊始，他就与克拉夫丘克就克里米亚总统权限展开了激烈争执。梅什科夫尽一切可能要扩大自己在克里米亚的权限，

^① 克里米亚 1994 年两轮总统选举的结果参见《克里米亚真理报》的相关报道：*Krymskaia Pravda*, 19 January, 1994, 1; *Krymskaia Pravda*, 1 February, 1994, 1.

甚至要求拥有独立的外交权，对于半岛的军事设施也有意染指。虽然公投的提议因为乌克兰的全力反对而搁浅，但是他仍然以“民意调查”的名义组织了针对《1992年宪法》的民意测验。结果，支持恢复《1992年宪法》的意见占了明显优势。^①1994年5月20日，由俄罗斯集团控制的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决定恢复《1992年宪法》，并且号召克里米亚抵制乌克兰议会选举。在经济方面，他任命俄罗斯经济学家叶甫根尼·萨布洛夫（Evgeni Sabulov）担任克里米亚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努力加强与莫斯科的经济联系，尝试与俄罗斯建立自由贸易区，甚至制定了成为独联体内部离岸经济区的计划。同时，也试图在克里米亚开始激进的经济改革并模仿俄罗斯启动私有化进程。可以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梅什科夫对乌克兰的统一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达到极盛时期。

但此时的国际形势对于野心勃勃的梅什科夫非常不利。1993年“十月事件”的发生，使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最主要支持者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在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失败^②，而叶利钦对于克里米亚独立运动并没有明确的表态。进入1994年以后，车臣危机逐步升级，军事冲突几乎一触即发，这牵扯了俄罗斯的大量精力，使其不可能对乌克兰国内的地区分离主义运动表示支持。

克里米亚内部的很多因素也对梅什科夫非常不利。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起步太晚，缺乏明确的理论纲领和实践准备，对于分离运动应如何推进并无清晰的路线图。俄罗斯集团内部结构非常混乱，很多党派都是为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内部缺乏整合，对于梅什科夫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也缺乏共识。加上梅什科夫本人缺乏政治经验，在政治基础并不巩固的情况下随意提出一系列过于宏大的改革计划，而且不顾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的严重问题，仍然要模仿俄罗斯模式推进全面的私有化，更是直接导致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人的反对。

① 克里米亚 1994 年关于《1992 年宪法》的民意测验结果参见 *Krymskaia Pravda*, 13 March, 1994, 1. 对于这一时期克里米亚人的复杂心态还可参见: Paul Pirie,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48, No.7, 1996, p.1097.

② Roman Solchanyk, *The Politics of State Building: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6, No.1, 1994, p.54.

到1994年下半年，梅什科夫的分离主义政策就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由于乌克兰中央政府的坚决反对，加上缺乏莫斯科的支持，梅什科夫不得不撤回了恢复《1992年宪法》的要求。在经济上，激进的私有化计划激起了其政治盟友的反对，在俄罗斯集团占压倒性优势的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否决了梅什科夫的私有化动议，并迫使总理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梅什科夫并没有选择维持执政联盟的团结，而是孤注一掷，解散议会，制定新宪法，并提出在1995年对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作为对梅什科夫的反击，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权力。到1994年底，梅什科夫本人的支持率降到了5%以下，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政治基础。^①

1994年7月，来自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作为来自东部亲俄地区的代表当选乌克兰总统，他也获得了大部分克里米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支持。于是，克里米亚问题的主动权转到了乌中央政府手中。

库奇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梅什科夫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的矛盾，联合克里米亚议会集中对付梅什科夫。1995年3月，乌克兰最高拉达宣布撤销克里米亚总统职位，并同时废除《1992年宪法》，同时全力支持亲基辅的政治人物担任克里米亚政府总理。为了应对克里米亚可能出现的反弹，库奇马甚至做好了军事冲突的准备。但此时梅什科夫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资本，叶利钦也因为与乌克兰关于核武器和黑海舰队的谈判正进入关键时刻而放弃了对梅什科夫哪怕是口头上的支持。最终，梅什科夫在1995年7月被迫离职，并流亡俄罗斯，俄罗斯集团也分裂成多个党派，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了。

1996年，乌克兰新宪法获得通过。针对克里米亚地区强烈的俄罗斯身份认同和潜在的分离主义倾向，在乌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妥协。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名称得以维持，成为单一制乌克兰国家中唯一的自治共和国，但自治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削弱。克里米亚议会权限受到很大限制，乌克兰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而且将克里米亚的历史和文化中心塞瓦斯托波尔设为特别市，归属中央政府直辖。1996年宪法的通过

^① Gwendolyn Sasse,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p.171.

标志着1994年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标志的第一次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的结束。最终，乌克兰中央政府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总的来说，1994年的分离主义运动只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虽然在运动之初通过公投和选举等方式进行了政治动员，也得到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人的广泛支持，但运动基本上被局限为精英层面的政治斗争，没有像原苏联空间内很多地区那样出现街头运动或武装冲突。整个运动缺乏政治纲领，没有成熟的政治领袖，无法解决地区发展问题，也没有获得国际支持，最终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

但即便如此，这场失败的运动仍然对于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留下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首先，1991-1995年，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和地区特殊性的宣传，使得俄罗斯身份认同在苏联身份刚刚消失、自我身份认同处于严重混乱状态的克里米亚地区得到了强化，给乌克兰中央政府未来建立国家身份认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其次，独立运动形成了很多特殊的记忆和符号，其中赋予克里米亚独立主权地位的《1992年宪法》成为了克里米亚未来寻求独立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政治符号，也成为能够唤醒克里米亚民族情绪的集体记忆。而且在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中，诉诸公投成为地方政府获取政治资源的主要方式，也为下一次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借鉴。^①

最后，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克里米亚地方政府的权力，但其主要目标仍然是避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为此，在单一制国家体系中特别设置了独立的自治共和国，这种特殊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克里米亚原本就非常强烈的“他者”认同，而对于乌克兰国家认同如何在地区层面上推进则并没有明确的设计。在乌克兰中央政权较为稳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尚不严重，但在2004年“颜色革命”之后，中央政府由于内部冲突不断导致控制能力不断下降，长期的经济困境也使得乌克兰国家认同缺

① 在2014年3月的克里米亚事件中，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再次采取了公投的方式寻求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同时在公投中，恢复《1992年宪法》再次成为公投中的选项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1992年宪法》在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

乏足够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存在严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分裂的情况下，乌克兰连自身的身份认同建构都无法解决，又如何可能在克里米亚推进国家身份认同？乌克兰国家身份认同的长期缺位，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不断强化，都为未来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再次出现埋下了伏笔。

尾声：身份认同决定命运？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经写道：“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①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克里米亚1991至2014年的历史。

2014年，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转而支持克里米亚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而乌克兰中央政府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对抗中失去对边缘地区控制力的情况下，分离主义运动卷土重来。当公投和《1992年宪法》等90年代分离主义运动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符号再次出现在克里米亚人的政治生活中时，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核心的身份认同迅速转变为对分离主义运动的强烈支持。于是，在96.77%的民众支持率^②和莫斯科的军事保护下，克里米亚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完成了实际的领土主权变更，成为苏联解体20多年后原苏联空间内第一个重新回归俄罗斯的俄罗斯人聚居区，也是后苏联空间里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次领土变化。

平心而论，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内部文化认同存在巨大差异、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转型国家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的应对和处理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在没有发生冲突的前提下，遏制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蔓延，通过政治手段成功瓦解了民族主义政党和分离主义的力量，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护了克里米亚地区的政治稳定。然而，这种成功毕竟是有限的，虽然解决了地区分离的问题，但也无力更进一步，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在现有的民族结构和语言空间中，乌克兰在经济和文化上缺

① [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4页。

② 关于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的结果参见：<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3-17/5959999.shtml>

乏足够的吸引力，无法取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人集体记忆中的位置，而乌克兰中央政府的相对虚弱也使得其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人口和地区经济结构。尤其是在2004年“颜色革命”以后，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之间更大的认同危机凸显之后，基辅已经无暇顾及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问题。结果恰恰是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为了引发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

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既是一次特殊的政治事件，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说它特殊，是因为克里米亚拥有地理和人文空间中的特殊身份，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离不开原苏联空间特殊的族群分布结构所形成的宏观背景。如果没有原苏联空间内特殊族群分布的影响（参见图8），克里米亚问题不会如此复杂，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引发俄罗斯的干预。对于俄罗斯来说，对克里米亚事件的干预在国家层面的确有明显的政治和战略考量。但如果从其国内的民族或族群层面来看，又可以解释为是对原苏联空间中俄罗斯族群的援助。这使得俄罗斯的干涉行为在其国内具有很强的政治合法性，也使得其干预行为得到了克里米亚地区主体民族的普遍接受和欢迎。如果不是原苏联空间中的特殊族群关系，俄罗斯必定无法如此轻易地实现克里米亚主权地位的变更，也无法轻易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说它具有普遍意义，是因为无论如何解释，克里米亚事件仍然是转型国家中地区身份认同困境所引发的政治悲剧。诚然，身份认同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体系中的命运。即使是存在一定的身份认同混乱问题，如果中央政府强大而有力，加上正确的地区政策选择，一般是能够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的。这也是克里米亚在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多年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但是，如果身份认同的困境不能够完全解决，不能够使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群建立明确的国家身份认同，那么以地区身份或民族身份为号召的分离主义思潮就始终在地区存在。一旦中央政府的力量削弱，或者国际环境出现变化，就可能最终形成新的分离主义运动。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确实具有其特殊性，但是身份认同问题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所有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明显地区差异的多民族国家来说，都具有普遍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

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

【Abstract】The issue of identity is a common challenge for various former Soviet countries and areas in transition, of which the dilemma of Crimea's identity is one of the most far-reaching issue with the greatest influences internationally. The issue of Crimea's identity derives from the Soviet Union's policy.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then to Gorbachev, the leaders of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different eras took conflicting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Crimea's identity, which led to the "dislocation" of the identity and dilemma of Crimea. During the post-Soviet period, Crimea had three possibl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construct its identity, namely, first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struct its Ukraine identity; second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ident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its identity as an independent area; and third to promote its national identity so as to return to its Russian identity. However, as to the practice for its identity construction, because Russian is the common language in Crimea, the Ukrainian absence and Tartar's opposing role makes it hard to rebuild a new national and united regional identity through Russian historical narratives. Meanwhile, due to Russification for several centuries, the entire symbolic system of the peninsula had become completely Russified, including geographical names, city statue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ymbols have been marked with a distinctive Russian label.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with complicated national and ethnical construction, Ukrainian central government has no enough power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external pressure from Kiev and the internal pressure from Tatars, Crimeans decided to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their Russian identity. They inherited the symbols Soviet Union given and discovered its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Russian Empire to strengthen their Russian identity. In this case, in the 1990s, the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movements appeared in Crimea. Especially in 1994, the separatism movements reached a climax. President Leonid Kuchma, with sophisticated political skills and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disintegrated the separatism movement without serious conflict. Nevertheless, he fail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Ukrainian identity in Crimea. Finally, the dilemma of identity became the trigger of Crimean Crisis in March 2014. The tragedy of Crimea proved again that the issues of identity can't completely determine the destiny of states or regions, but if one country or region can't get rid of the long-term dilemma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it will always be the potential threat to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dentity, Crimea,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ical Narratives, Symbols

【 Аннотация 】 Вопрос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 это сложный вопрос, с которым пришлось столкнуться всем странам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а дилемма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Крым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глубоких и имеющих самый больш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резонанс вопросом. Вопрос крым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зародился в советские времена,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Хрущёва и затем до Горбачёва, советские лидеры разных эпох проводили различную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рыма, наличие очевидны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в политике различных эпох привело к появлению явления «дислокации» крым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после развала СССР Крым столкнулся с дилемм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У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ыма есть три возможных пути построен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а именно, содействие укреплен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украин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одействие углублению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Крыма как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региона; а также углуб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к России. Однако на практике, в силу того, что общепринятым языком Крыма является русский, отсутствие упоминания об Украине и отрицательная роль татар в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х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й воссозда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еди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в связи с русификацией в течение многих веков вся система символов Крым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полностью русифицирована, будь т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названия, городские скульптур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мволы, а также культурные явления, на всём этом явные печати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ложного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рупп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украи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озглавлят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рым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днако жители Крыма, чтобы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ть внешнее давле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ева и внутреннее давле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татар,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и укреплять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значально занимавш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русских, унаследовали все символы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ставленные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а также вернулись 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м времён имперской России, укрепляя свою российск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остоянного укреп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90 гг. XX в. в Крыму появилось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основе которого лежал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1994 г.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достигло своего апогея. Занимавший в то время пост президента Л. Кучма с помощью умел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иёмов и благодаря наличию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е допустив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ому движению, однако ему так и не удалос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украин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 Крым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в марте 2014 г. дилемма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дала импульс событиям в Крыму. События в Крыму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вопрос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е может полностью определить судьбу страны или региона, однако если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рана или регион не может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преодолеть проблему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то эт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й угрозой на пути буду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нной страны или регион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рым,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памя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символ

(责任编辑 阎德学)

论乌克兰问题*

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

【内容提要】乌克兰文化与俄国文化是同一个俄罗斯文化的不同版本。乌克兰加入俄国版图后,俄国文化的这两个版本如何融合为一的问题就一直是一个未能彻底解决好的问题。除了寻找文化之根的那个层面之外,任何文化都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即对精神峰巅的仰望。乌克兰文化的建立,就应该定位于不是与全俄文化去竞争,而是捐弃前嫌,对全俄文化进行补充和丰富。欧亚主义号召全体俄罗斯人——无论是大俄罗斯人,还是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都要为把文化当作民族的自我意识来弘扬这一理想而挺身而出。

【关键词】乌克兰 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 文化融合 欧亚主义

【中图分类号】D73/77(51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3-0042-(20)

彼得改革构成了俄罗斯文化史两个时代的明显分界线。乍一看,彼得时期传统出现了严重断裂,似乎是俄国文化以彼得改革为标志,前后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任何联系。但这样的印象通常是错误的:在某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初看上去是有这类严重断裂之处,但仔细观察后在很大程度上却能发现,这一断裂不甚分明,两个时代间的联系只是肉眼第一眼不易发现而已。彼得改革前,较之于彼得改革后,文化间的关系就是这么一幅图景。众所周知,

* 原文刊登于1927年出版于巴黎的《欧亚主义学报》第5辑。

** 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1890-1938),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布拉格语言学派创始人之一,十月革命后移居维也纳,是欧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俄罗斯文化史家经常指出，彼得改革之后和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文化是整整一系列链条，这些现象也使他们断言，彼得之前文化的某些特定潮流已经为彼得改革作了前期铺垫。倘若将史学家们已经指出的连接彼得改革前后之文化的全部线索来一番回溯，那么就会呈现出可以这样描述的一番图景：如果在“俄国文化”这一名称下指的只是其大俄罗斯这一脉的话，才能谈论剧烈而全面的传统断裂；彼得时期西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的文化没有出现传统断裂，那是因为乌克兰文化在彼得之前就已经开始渗透入莫斯科，在那里孕育了一些亲和它的某些潮流，顺着这一思路就可以认为，彼得的文化改革在大俄罗斯也已经有了铺垫。

在15、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西罗斯文化和莫斯科罗斯文化的发展之路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在17世纪后半叶的时候，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已经非常深刻，但同时，全俄罗斯的统一和拜占庭文化传承的共同性这一鲜活意识挥之不去，又使人们不能把这两种文化当作彼此完全割裂的文化，促使人们将它们视为是同一个俄罗斯文化的不同版本（呈现为不同的变种）。乌克兰加入俄国版图后，俄国文化的这两个版本如何融合为一的问题自然就提出来。而且，在问题一经提出的时候，无论是对大俄罗斯^①，还是对小俄罗斯^②，其方式都有损于民族自尊：因为人们所考虑的，与其说是俄国文化两个版本的融合，还不如说是想废除其中一个已“毁坏”的版本，是要把另外一个当作唯一“正确”且是真正的版本保存下来。乌克兰人认为，俄国文化的莫斯科版本之所以被毁坏，那是因为莫斯科人没有教养。他们责备莫斯科人缺少学校，并在后者面前因提出开办中学教育事业而居功自傲。而莫斯科人则认为，俄国文化的乌克兰版本被玷污，那是由于受到了拉丁—波兰异端邪说的影响。而一些有智慧的人认为，在这种论争中，各执一词的正反方都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他们心想的是，大俄罗斯人早就该开办教育，乌克兰人必须摆脱那些从波兰人那里舶来的很多特征。但是，智慧者毕竟甚少，无论是乌克兰方，还是俄罗斯方，其中大部分人的立场都

① 大俄罗斯，亦称大罗斯，19世纪中叶起俄国文献中对俄罗斯流行的称呼——译者注。

② 小俄罗斯，17世纪中期开始，沙皇俄国的官方文书以及俄国历史资料中对乌克兰的称呼——译者注。

是互不相让，不可调和。因此，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就要归结为，俄国文化的两个版本中应该整体上接受哪一个，而对哪一个全盘拒绝。这个问题应该由政府做出决定，也就是说，最终要由沙皇来定夺。政府站到了乌克兰的立场上，——从政治观点上看这是完全正确的：大俄罗斯人的不满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是局限于纯粹是地方式的反抗；如果要是乌克兰人不满，局势就会复杂化，甚至使乌克兰与俄国实现统一都不可能。但是，在站到乌克兰人那一方的时候，莫斯科政府在承认俄国文化的乌克兰版本的正确性这一方面仅仅是迈开了前几步。事实上，这是最负责任的前几步——即修改礼拜仪式用书（用乌克兰版本替代莫斯科版本）和尼康的整个改革。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彻底的统一，而且大俄罗斯的风尚被乌克兰气息替代了。但是，在文化和生活的其他领域，彼得之前还没有进行统一：在乌克兰，到处充斥的真正的西俄罗斯文化版本，它没有任何大俄罗斯的成分。而在大俄罗斯——都是莫斯科文化和西俄罗斯文化的混合物，而且，西俄罗斯因素在渗透到大俄罗斯文化的过程中，一些高层次代表（当时的西欧派）已经走得很远，而其他人（当时的莫斯科民族主义者）则相反，他们尽力所做的就是保持大俄罗斯传统的纯洁性。

彼得大帝提出了使俄国文化欧洲化的目的。很明显，适合完成这一任务的，只能是俄国文化的西俄罗斯、乌克兰版本，它已经吸收了欧洲文化（波兰版的欧洲文化）的某些因素，并表现出将来会沿这一方向继续进化的态势。相反，俄国文化的大俄罗斯版本，因为其强化对西方的排斥和对自足的热衷，不仅不适合于彼得的目的，甚至直接妨碍这类目的的实现。因此，彼得尽力根除和消除俄国文化的大俄罗斯版本，并且把作为继续发展起点的乌克兰版本当作唯一的俄国文化版本。

因此，在彼得时期，旧的大俄罗斯、莫斯科文化死亡了。从彼得时代起，在俄国活跃并发展起来的文化，不是莫斯科的文化，而是**基辅的、乌克兰的**那一脉文化的有机而直接的延续。这种现象在文化的所有领域都可见到。就以文学为例吧，无论是在莫斯科罗斯，还是西部罗斯，文学、宗教和学术领域的文献所使用的**标准规范语**都是教会斯拉夫语。但在17世纪之前，无论是在词典编纂方面，还是在句法学和修辞学方面，基辅和莫斯科的教会斯拉

夫语的这一版本并不完全一致。早在尼康^①时代，教会斯拉夫语的基辅版本，在祈祷书方面就已经排斥了莫斯科版本。到后来，用基辅这个版本挤压莫斯科版本的现象也常常表现在其他文献中。因此，在彼得时期和彼得之后，作为斯拉夫—俄国标准语之基础的基辅版本语言就成了教会斯拉夫语。在莫斯科罗斯存有丰富的诗学（做诗法）传统，但这一传统主要还是口传为主，书面的诗学作品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还为数不多。但是，根据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如《关于痛苦—灾祸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Горе-Злочастьи»）^②，关于这一诗学传统有哪些特点，我们便可以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其语言是地道的纯大俄罗斯语，稍微带有教会斯拉夫语的要素，语言也充盈着某种传统诗学的烙印；写诗不再注重音节单位和抑扬顿挫，而是立足于大俄罗斯民歌的传唱法所崇尚的那些原则。与此同时，在西罗斯形成了另一种纯书卷语诗学传统，以附着波兰诗学传统为荣，所以就恪守音节韵律和韵脚的使用。过去，在西罗斯写这种格律诗的时候，既使用西罗斯俄国社会上层作为口语和公务语言来使用的俄语（准确地说是白俄罗斯—波兰语的）的土话，也使用教会斯拉夫语。在彼得之前，这种西俄罗斯的做诗法（使用的当然是教会斯拉夫语，也就是当时通用的俄罗斯标准规范语）已经渗透到大俄罗斯：著名的案例就有西梅翁·波洛茨基^③的诗歌创作。在莫斯科，甚至出现了这类诗歌的一批模仿者：列举一下著名的西利维斯特尔·梅德韦杰夫^④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彼得时代开始，老旧的大俄罗斯式的俄国诗歌已经彻底地隐退到了“民间”；对于文化意义上的社会上层而言，此后就只有用教会斯拉夫语书写的起源于西俄罗斯的格律诗方法的诗学传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了。

① 尼康（Никон，1629—1680），原名尼基塔·米诺夫，1652年起为莫斯科和全俄牧首。他在任时，按照沙皇阿·米哈伊洛维奇的建议，加快了对教会书籍的校对，引起教派分裂。牧首本人很快就允许人们既可以用老书籍，也可以用新书籍来进行祈祷，但沙皇没有同意。由于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和末世论情结被驱除出莫斯科。

② 俄国17世纪的诗歌—寓言体中篇小说，是介于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之间的传统形成的。

③ 西梅翁·波洛茨基（Симеон Полоцкий，1629—1680），17世纪莫斯科的伟大作家，参与制定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的组建方案，大诗人，用“罗蒙诺索夫改革”之后被废除的音节体诗从事诗歌创作。

④ 西利维斯特尔·梅德韦杰夫（Сильвестр Медведев，1641—1691），俄国宗教活动家和作家，扎伊科诺斯帕斯修道院学校的创办者。

散文叙事文学既在莫斯科也在西罗斯依然存在。但是，在西俄罗斯，波兰的影响具有压倒性优势，它容不得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创作自行发展，因此叙事文学几乎全部都是翻译作品；而在莫斯科罗斯，自己独立的散文叙事传统则薪火相传，在17世纪还开始变得特别意气风发，给人以将来还可望进一步成功发展的希望（比方说比较一下《萨瓦·格鲁德采恩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Савве Грудцыне»）^①。与此同时，也就是在整个17世纪期间，西俄罗斯的翻译叙事作品潮水般涌入莫斯科罗斯。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叙事文学追循的正是西俄罗斯的翻译小说传统：原生的莫斯科传统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发展就消亡了。**口头演说艺术**在莫斯科罗斯想必也是存在的：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作品风格，纵然乍看起来没有多少艺术性，但其特有的韵味就是演讲的效应，它首先看重的就是传教士的古老的口传传统，而这一传统与西罗斯被教会学校和莫季良神学院所灌输的那种繁琐的经院派的滔滔不绝的传统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特征。在彼得之前的很早时期，莫斯科对乌克兰传教士传统就耳熟能详。恰好是在彼得时期，许多著名的乌克兰演说者，如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②和斯杰凡·亚沃尔斯基^③，又彻底夯实了这一传统。彼得之后的所有俄罗斯演说术，无论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都如出一辙地源自于这种乌克兰传统，而不是莫斯科传统，因为莫斯科传统最终彻底消亡了，除了选自阿瓦库姆的分裂派作品的一些索引之外，没有为自己留下可资证明的其他证据。最终，**戏剧文学**只是存在于彼得之前时代的西罗斯。在莫斯科罗斯，没有其独特的戏剧文学传统：在大庭广众面前的演出非常少，即便演出，大多也是乌克兰作者们的戏剧作品（如西梅翁·波洛茨基）。彼得改革之后，俄罗斯戏剧文学在起源上继承的正是乌克兰学派的戏剧流派。因此，我们看到，在彼

① 《萨瓦·格鲁德采恩故事》，17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学杰作。很多研究者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创建俄国第一部小说的经验。小说叙述的中心是生存的两个维度的寓言。

②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Феофан Прокопович，1681-1736），彼得一世最亲近的工作人员之一，彼得改革的思想家，基辅神学校长，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大主教、正教院副院长。诗人、神学和政治论文的作者。沙皇皇权无边界思想的发起人，这一权力废除了世袭的原则，导致了阿列克谢王子的死亡。

③ 斯杰凡·亚沃尔斯基（Стефан Яворский，1658-1722），彼得一世时代的宗教活动家（曾领导过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的工作）、作家，颂扬著作《信仰之石》的作者，因反对新教教派的影响而受到迫害。

得改革之后的各个方面，俄国文学是西俄罗斯、乌克兰文学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延续。

在其他艺术形态中我们观察到的也是这样的图景：在音乐领域，无论是声乐（主要是教堂音乐）还是器乐，情况都是如此；在绘画领域，大俄罗斯传统只是在旧礼仪派那里继续焕发生命的活力，而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圣像画、肖像画艺术全部都是西俄罗斯传统孕育出来的；在教会建筑领域，也就是那种唯一的建筑样式，在这种建筑中“俄罗斯风格”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重。但是，这种对西俄罗斯传统的追随是以排斥莫斯科传统为招数的，它不仅在艺术的各种门类中呈现出来，而且也表现在彼得改革之后精神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既然俄罗斯神学的西俄罗斯版本早在尼康时代就被视为唯一正确的版本，莫季良神学院^①也成了全俄高级神学教育的发源地，大部分俄国主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一神学院培养出来的，那么，对待宗教的态度以及教会和神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就自然而然地应该以西俄罗斯传统为正宗才是。在彼得改革之后，俄罗斯教育、神学方法和教学师资的传统也是西俄罗斯的。最终，很有代表性的是，如何看待彼得改革之后的时代所吸收消化的古老的大俄罗斯文化，这一观点就其起源而言就是西俄罗斯式的：关于彼得改革之前的莫斯科罗斯文化就习惯于（可以说，现在也习惯于这么做）接受并表述 17 世纪乌克兰那些所谓的学者们所阐述的观点……

二

因此，在 17—18 世纪之交，**大俄罗斯精神文化的乌克兰化**出现了。俄国文化的西俄罗斯版本和莫斯科版本之界限，以莫斯科版本被扫除的方式得以消除，俄国文化进而才**合二为一**。

彼得之后这种统一的俄国文化，就其来源而言就是西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而俄国的国家特性在起源上又是大俄罗斯的，因此，文化中心也应该是从乌克兰转移到大俄罗斯。由此，所导致的最后结局是，这种文化成了既不

^①莫季良神学院（Могилянська Академія），1632 年由乌克兰著名的神学文化活动家彼得·莫基拉创建的神学学校。

是独特的大俄罗斯文化，也不是特殊的乌克兰文化，而是一种**全俄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后来之所以得以持续发展，正是因为其从局部性和地方性转化成为了具有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全局性和全民性文化。俄国文化的西俄罗斯版本渐渐形成的那个时代，恰逢乌克兰还是波兰的一个省，而波兰从文化方面而言也只能是罗曼—日耳曼欧洲的一个外省（并且是一个偏僻的外省）。但自彼得一世开始，俄国文化的这一西俄罗斯版本，在占据了统一的全俄文化的地位之后，对俄国而言也就变成了**首都文化**。在此之前，俄国就一直开始雄心勃勃地要成为“欧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乌克兰文化似乎从偏僻的县城迁到了首都。为了与此相一致，乌克兰文化就不得不彻底改变迄今为止明显的外省样貌。它所奋斗的目标就是尽力挣脱自身特有的全部波兰特征，代之以本然的罗曼—日耳曼文化因素（德国的、法国的等等）。因此，乌克兰化就不期然地成了欧化的桥梁。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化的语言基础发生着变化。此前，在西部罗斯，与书面的教会斯拉夫标准语同时存在的还有上层社会当作日常用语和公用语言的特殊的俄罗斯—波兰土话。但是此后，在俄国文化的乌克兰版本成了全俄文化之后，象征着波兰枷锁和土气的这一俄罗斯—波兰行话自然就不可能继续存在。占据大俄罗斯主流位置、在莫斯科公文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大俄罗斯实用口语，深受俄罗斯—波兰行话的深刻影响，——但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并把俄罗斯—波兰行话挤了出去，还成为上流社会的唯一实用口语。不仅在大俄罗斯是这样，在乌克兰亦然。在这种语言和不断发挥作用的教会斯拉夫标准语之间，在相互渗透的过程中磨合成了一种紧密的关系：上流社会的俄罗斯人的口语强劲地“教会斯拉夫语化”，教会斯拉夫标准语则强劲地“俄罗斯化”，结果双方在现代俄语中走到了一起，实现了重合，俄语也就既是全体有教养的俄国人的标准语，也是他们的日常实用口语，这就是俄罗斯文化的语言基础。

因此，大俄罗斯文化的乌克兰化和乌克兰文化的全俄罗斯化，就自然而然地彻底导致这种文化摒弃了其独特的乌克兰外省特征。全俄文化也不可能获得大俄罗斯的独特性，那是因为上文提及的独特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延续性被干净彻底地消除了，只是保持了莫斯科官方公文用语的延续性。因此，彼得之后的全部彼得堡文化之全俄特征就来源于此。

但是，对全俄之抽象性的强调实际上又导致了对具体的俄罗斯性的排斥，也就是造成了民族的自我否定，而这种自我否定自然会引起健康的民族情感起而反对自己。

这种形势，即便是为了俄国能够伟大，但所有独特的俄罗斯性实际上却被摧残和清除，那要不产生反对自己的抗议才是怪事呢。因此，俄国社会出现致力于确立俄罗斯民族独特性和呈现俄罗斯民族面貌的潮流和思潮，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但是，因为这些潮流正是在反对全俄文化的抽象性方面用力甚勤，并力求以具体性取代之，他们就必然会接受某种特定的地方特征：任何试图给俄国文化赋予更具体的民族面貌的意图，在实际运作中就必定是从具体的俄国民族个性化中选择其一——要么是大俄罗斯、要么是小俄罗斯抑或白俄罗斯，因为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而“公共俄罗斯人”（общеруссы）只是一个抽象概念的结果。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潮流是顺着有利于具体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方向呈现出的两条河道并行流淌，流经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这两条河道泾渭分明地平行流淌，蔚为壮观，这种并行的景观在全部所提及的潮流中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在18世纪末以来的文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系列在语言和风格上明显百姓化的作品；这些作品形成了两个绝对平行的演化路数——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在这两条路数上一开始呈现出的讽刺模拟—幽默的那一派——在大俄罗斯有瓦·迈科夫^①的《叶利谢伊，或被激怒的巴克科斯》（Богатырь Елисей）、在小俄罗斯有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②的《艾涅伊达》（Энеида）。后来被以注重民歌风格的浪漫—感伤思潮所取代——在大俄罗斯的代表是阿·科利佐夫^③，在小俄罗斯的代表则是塔拉斯·舍甫琴科（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1814~1861），这一潮流在19世纪中叶

① 瓦·迈科夫（Василий Майков，1728-1778），18世纪俄国诗人，著有讽刺幽默长诗《叶丽塞，或被激怒的巴克科斯》、《玩龙波勃勒牌戏的人》、《劝喻寓言》等——译者注。

② 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Иван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1769-1838），乌克兰作家，著有《艾涅伊达》。

③ 阿·科利佐夫（Алексей Кольцов，1809-1842），俄国著名诗人，他的创作接近民歌的诗学风格。

发展成为“公民悲伤”^①（这是欧洲的“世界悲伤”之俄国版的独特退化）和暴露性思潮。对彼得之前的遥远古风的浪漫主义理想化，无论在文学、历史学，还是考古学中都得到了表现。浪漫主义理想化同样是由于对具体的民族风格的需求而产生的，这在大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条河道中既同时又平行地显示出来。这同样适用于讨论民粹派和不同形式的“到民间去”运动。任何一位民粹派，因其把自己的意识定位于现实且具体的“人民”意识，他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会渐渐既成为“自夸家园的人”，也会成为一位狂热的斗士，他要么为独特的大俄罗斯民间特征或日常生活样貌而奋不顾身，要么为独特的乌克兰民间特征或日常生活样貌而不屈不挠。

因此，在圣—彼得堡时代，尽管对具体的民族风尚的爱慕带有地方主义的做派或者趋之若鹜的就是俄国部族的某一个确定的个性化民族（大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等等），但这种现象本身却是全俄罗斯的，因为这种现象的渊源本身就带有全俄罗斯的风尚。对俄国而言，在彼得之后的时期，俄国文化上层就明显脱离了养育自己的具体的人民基础，同时，这种断裂又造成了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那种莫名的疏远感，以及民众对与知识分子再度联合的向往。因此，文化改革问题，或者新文化大厦的建造问题，以及新文化大厦的上层应该是从民间基础上有机地建设而成，就成了一个摆在全俄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摆在俄罗斯各族群面前的问题，既是大俄罗斯族群的问题，也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群的问题。

三

上面我们论述了俄国文化改革的问题，与此相关便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一新改革的文化应该是全俄的，或者说全俄文化压根儿就不应该存在，而应当对俄罗斯族群的每个个体化变种创建若干新的经过改革的文化？

^① “公民悲伤”（гражданская скорбь），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文学思潮“世界悲伤”的俄国版本，特鲁别茨柯依认为这是欧洲文学思潮的退化。“公民悲伤”派主要集中在反映人民和俄国社会生活的悲剧方面，在俄国以科利佐夫为代表，在乌克兰以塔拉斯·舍甫琴科为代表——译者注。

这个问题最尖锐不过地提到了乌克兰人面前。这个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起来，那是因为政治因素和考虑搅和了进来，而且问题通常又和这样的一个问题掺杂在一起，即乌克兰该不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成为俄联邦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抑或是成为俄国的一个自治部分？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下，政治与文化问题之关联完全是不必要的。我们知道，存在着一种完整的德国文化，虽然德意志各族群并未统一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另一方面，印度人有自己完全独特的文化，尽管印度人早就失去了国家的独立性。因此，关于乌克兰和全俄文化的问题，在对其进行考量的时候，就可以也应该把这作为与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和国家—法律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无关的问题来看待。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在彼得之后，全俄文化具有一些严重的缺点，这些缺点引起了在具体的民族方向上对文化进行改革的欲望。乌克兰文化的某些分离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一个劲地要把事情说成这么一个样子，那就是迄今为止在俄国存在的那种文化似乎完全不是全俄性的，而只是大俄罗斯的，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彼得之后的全俄文化之所以开始创建，那是大俄罗斯精神层面上的乌克兰化在驱动，这种全俄文化只是和彼得改革之前的西俄罗斯、乌克兰文化相融合，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而与古老的大俄罗斯文化没有联系，大俄罗斯文化的传统在 17 世纪末已突然中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即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并肩奋斗，不仅积极地参与了全俄文化的创立，也积极推动了其发展。并且，不是在乌克兰人否定自己属于乌克兰族群的情况下，而是相反，是在确立这种乌克兰归属的情况下进行的：绝不能把果戈理从俄罗斯文学中剔除出去，绝不能把尼·科斯托马洛夫^①从俄罗斯史学中剔除出去，也不能把亚·波捷波尼亚^②从俄罗斯语言文学中排除去，等等。一句话，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文化是全俄性的，全俄文化对乌克兰人而言不是异国他乡的陌生文化，

① 尼·科斯特马洛夫（Николай Костомаров，1817-1885），俄罗斯和乌克兰历史学家、作家、民族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② 亚·波捷波尼亚（Александр Погребня，1817-1885），斯拉夫语文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在文学、民间文学、民族学、普通语言学、语音学、斯拉夫语言语法学领域均很有建树。

而是自己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因此，倘若这种文化被某些乌克兰人理解为并非完全是自己的，倘若把这种文化与乌克兰普通民众的精神和日常生活方式相比较而明显显露出上层文化与民众基础之间不协调，那么就会看到，这种现象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大俄罗斯也是存在的。因此，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那并不是因为文化似乎是大俄罗斯的，而完全是另有其他诸多原因。

当然，每种文化都应该包涵两个方面的特性：一方面是面向具体的特定族群的民众基础，另一方面是仰望巅峰的精神和思想生活。为了文化能够永葆青春和持久健康，那首先必须要使这两方面的特性保持有机的联系，其次，要让每一特性切实履行其使命，也就是说，渴望寻找民众根基的那一特性要适应这个具体的民众基础的个性特征，而仰望精神巅峰的那一特性，其发展要符合这个民族的精华和卓越代表的精神需求。

在彼得时期之后的全俄文化中，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或者说文化的“层次”，其发展是不一致的。渴望寻找民众根基的那个“底层”很不适应具体的俄罗斯族群的民族特征，因此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结果是，出身“民间”的人即使是投身于文化，那也只有完全地（或者最好的情形也是几乎完全）失去个性，压抑自己，并且放弃这个人民固有的一些特征。相反，仰望高级的精神和思想生活的全俄文化的“上层”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怎么说，都充分满足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乌克兰大地上用一种新创建的专门的、此前与全俄没有任何关联的乌克兰文化替代全俄文化，那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乌克兰居民必须“选择”这种或那种文化。倘若新的乌克兰文化成功地使其下层适应具体的民族基础，那么底层的民间毫无疑问地就要选择这种新的乌克兰文化。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在过去，这种全俄文化在渴望寻找民众根基方面没有很好的作为，完全未能适应人民所独有的个性化特征。但是，要让不仅是民间下层选择这种新乌克兰文化，而且让训练有素的上层（即更有素养的知识分子）也选择这种新乌克兰文化，那就要求这个文化的上层要比过去的全俄文化在更大的程度上符合乌克兰饱学之士的高级精神需求。不然的话，绝大多数乌克兰知识分子（从文化创造的视角来看，这是高素质、有专

业能力、最有价值的群体)将会追随全俄文化,而独立的乌克兰文化由于没有民众中最有价值的这一部分人群的合作,注定是要衰败和死亡的。

公正地对一些几率作一下衡量的话,我们就渐渐可以得出一个推断,即乌克兰的新文化能够有多大的几率去出色地解决文化大厦下层适应民间根基的任务,同样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新文化也能充分地解决另一个任务——创建(文化大厦)的新上层,使其比过去的全俄文化的同样的上层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知识分子的高级精神需求。在满足最高精神需求方面,新乌克兰文化如果想与全俄文化竞争,是没有力量的。首先,它没有全俄文化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传统:植根于这种文化传统,并以此传统为基石,从事创造高级精神价值的那些骄子们将会游刃有余,即使是在一张白纸上创建全新的文化价值他们也会得心应手。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选择高级的创造者。对创造高级文化价值而言,这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为了成功发展文化的这一层面,就必须提高这种文化赖以发展的那个民族整体的基数总量:这种文化的体现者人数愈多,在同等其他条件下,孕育于这种文化之中的天才人物的绝对数量就越多,而天才人物的数量越多,那么首先,文化的“上层”发展得就越有成效,其次,百舸争流的竞争就越激烈;竞争则会提升文化建设本身的质量。因此,甚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伟大民族之统一的文化的“上层”永远要比这个民族中那些工作起来是单枪匹马、且彼此间相互不协作的那部分成员所制造出来的文化,从质量上看会更完美、数量上则更丰沛。这个民族的每一位代表,只要他胸襟坦荡,就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充分自由选择条件下,很自然地就会选择这个统一民族的文化(在我们的环境中就是选择全俄文化)。因此,如果选择乌克兰文化,那这个人肯定要么是以特定的方式抱有偏见,要么就是他的选择自由受到了限制。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以上所有的论述,既适用于高级文化价值的创造者,也适用于消费者即这种文化价值的体现者。究其本质而言,高等文化价值的任何一位创造者,只要他确实是才华横溢且意识到自己的张力,那他所追求的目标肯定是让自己的创造成果能流传开来,并尽可能得到更多的真正行家的青睐;而这类位居文化价值高端的每位真正行家(消费者),反过来又渴望享用更多的创造者所创造的产品;这种情形意味着双方

都对扩大领域感兴趣，而不是去压缩这种文化的空间。压缩这种文化空间的鬼胎一方面只能是来自那些为了保存自己而反对竞争的蠢才或者那些平庸的制作者（真正的天才是不怕竞争的），另一方面是出自那些狭隘又狂热的沙文主义式的井底之蛙，他们还不配为了高等文化价值而真正地珍藏文化瑰宝，他们能够珍藏某种文化创造产品，那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裹挟到了文化的这种地方变种的框框里。这些人通常主要会选择反对全俄文化，而完全助推独立的乌克兰文化。他们是这种新文化的主要追随者和领导者，并在这种文化上打上自己的印记，——烙上这一系列印记，即庸俗不堪的虚荣心、表面奢华、平庸、刻板、愚昧，除此之外，怀疑一切的情绪弥漫不散、对竞争永远是胆战心惊。这些人，他们当然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人们或完全取消在全俄文化与自主的乌克兰文化之间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即使达到这一地步，他们还会觉得不过瘾：他们还要唆使全体乌克兰人对所有的俄罗斯风格燃起剧烈如火焰般的仇恨，并且无所不及地动用教育、出版、文学、艺术等全部手段去把控这种仇恨，哪怕是以撒谎、诽谤、弃绝自己过去的历史、践踏自己祖国的圣地为代价都在所不惜。因为，倘若乌克兰人不憎恨所有的俄罗斯风格，那么，一旦选择的关键时刻到来，就会发生有利于赞成全俄文化的选择。但是，不难明白，只是乌克兰文化是在所描述的条件中创立的，隔手的文化本身就有自己的短板。乌克兰文化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政治手段，并且是糟糕的、怀恨在心的一沙文主义的、好斗一招摇过市的政治。这种文化的主要助推器，不是文化瑰宝的真正创造者，而是狂躁的发烧友、被异端邪说缠得走火入了魔的政客。因此，这种文化中的一切——无论是科学和文学还是艺术与哲学，都不会秉承其内在价值，而只可能充斥着偏见和扭捏。这会让平庸的蠢才大行其道，他们由于依附于充满着偏见的俗套而捞取廉价的桂冠，同时又牵制那些不能忍受这些俗套的狭隘框框的束缚的真正有才华者的自由言说。然而，重要的是，这种文化是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却是可以认真地怀疑一下的。那些真正的天才，工作完全不是为了某些附属的政治目的，而只是听凭非理性的内心火焰的驱动，只有他们在诸多文化瑰宝中能够充分体现民族个性之魂。这样的天才倘若遭遇可恶的沙文主义环境，那他们就不会有施展才华之地。对政客们来说，他们急于要做的主要就限于一点——尽

可能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乌克兰文化，反正什么都可以，就是只要不像俄国文化就行。这势必要导致狂热的**模仿**工作盛行：较之于重起炉灶去创造，还不如顺手从国外拿现成的（只是不要从俄国就好），一拿到手就匆忙为文化瑰宝琢磨一些乌克兰名称便作罢！其结果是，在这种条件下速成的“乌克兰文化”，不可能有机地表达乌克兰民族文化的个性化本质，也与民族联盟中的那些跑龙套的各种“青涩民众”匆匆创建的“文化”区别甚少。在这种文化中，对某些个案的、随机选择的、基本上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无关紧要的因素强调到了蛊惑人心的程度，实际上还会与否定这种生活方式中最深刻的根基的现象相结合。而机械地横移和愚蠢地照搬欧洲文明的“最新发明”，则会与难以容忍的褊狭的破烂货和文化愚昧的特征比邻而居。所有这些——就是由于内心精神空虚，又用傲慢的自吹自擂、花里胡哨的广告、以及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等振聋发聩的言辞等为自己遮羞……一句话，这就是可怜的代用品，而不是文化，是一种可笑的、笨拙的模仿……

倘若乌克兰文化意欲**替代**全俄文化，如果乌克兰文化走上了与全俄文化**竞争**之路，等待着乌克兰文化的正是这些难堪的前景。在这种情形下，对每个有文化的乌克兰人而言，他就必然要解决一个问题，他是要成为俄国人**还是**乌克兰人。从乌克兰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这种状况就会在挑选文化工作者时对其不利。如何在乌克兰文化和全俄文化之间进行**两难选择**（非此即彼），乌克兰人注定会使其未来文化陷入我们上文所勾勒的诱人状态之中。这种状况对乌克兰人实际上是不利的。为了对乌克兰的悲催未来防患于未然，乌克兰文化的建立就应该定位于不是和全俄文化去竞争，而是以身作则对全俄文化进行补充，换句话说，**乌克兰文化应该成为全俄文化中的有个性的“这一个”**。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寻求民间根基的文化大厦的“底层”应该重建。在这个大厦“底层”的建设中，乌克兰文化自然完全能够、也应该展现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我们也指出，在这个包含着高端文化价值的上层，乌克兰文化无力与全俄文化展开竞争。因此，全俄文化和乌克兰文化界域的某些自然分界线在这里就初具轮廓。当然，彼此之间的这种分界线在上述内容中还没有彻底地深究到底，因为，除了我们提及的文化大厦“底层”和“上层”

之外，文化应该还有一些“中间层”和过渡层，但是，不管怎么说，区分的原则本身的样貌已经显现。

四

这些原则和这样的理由应该成为区分全俄罗斯的和白俄罗斯的、大俄罗斯的其他区域的文化界域的基础。的确，如上所述，文化大厦底层没有镶嵌到具体的民众根基里，这是彼得之后俄国文化到处都存在的现象。在未来，我们面临的任務就是改正这种不足，让俄国文化寻找文化之根的那个层面与俄国人民的具体的民族个性和谐起来，换句话说，使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民众，充分保证“来自民众的人”持续不断地投身于文化建设。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就是，由于文化要在寻找文化之根的那个层面适应俄罗斯人民的**具体**个性特征，这种工作的全部领域就应该加大在区域和族群方面的区分力度：的确，“公共俄罗斯人”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具体来说，存在着大俄罗斯人（有自己的不同族群——北方大俄罗斯人、南方大俄罗斯人、沿海俄罗斯人、伏尔加河流域居民、西伯利亚人、哥萨克人等）、白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乌克兰人（也有自己的不同族群），并且底层文化在每个维度都应该适应俄国人民的各个特定族群（适应俄国民族个性化的具体区域的独特性）。因此，未来俄罗斯文化理应按单个的边疆或者州来加大对区域的外部细化，此前那些抽象的毫无个性的千篇一律一旦淡出，张扬各地鲜明地方色彩的美妙景观就必定会出现。

但是，如果把发展这些地方各族群的地方色彩看成是文化工作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那就是错上加错了。不应该忘记，除了寻找文化之根的那个层面之外，任何文化都应该还有另外的层面，即对精神巅峰的仰望。一种文化的这一方面一旦发展很不足，那是不幸的。如果是这样，那民族文化的上层就不得不借用外来文化的瑰宝来满足自己的高级精神需求，而不是自己家园的文化！因此，在提炼和发展寻找文化之根的那个层面的同时，还应该花大力气切实有力地抓紧上层文化瑰宝领域的工作。正如上文所述，倘若构建俄国文化大厦“底层”的工作就其实质而言，要求对俄罗斯族群和区域进行

区分，那么，构建俄国文化的“上层”，就其本质而言，则又要求俄国的全部族群通力合作。在建设文化大厦“底层”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强制让文化配合具体族群的基础，这种藩篱导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程度越高，那在构建文化“上层”时，这些篱笆的人为性、多余性和危害性也就会达到相应的程度。文化“上层”的这一层面本身就要求有最大限度的广阔领域。而竖起地方保护的壁垒和对这些广阔领域的任何束缚，都会被文化瑰宝的创造者和这些文化瑰宝的消费者感觉到是不必要的干扰。在这个文化领域，要竖起地方保护壁垒的就只有那些害怕竞争的平庸之辈，还有狂躁的极端的地方沙文主义者。但是，倘若为了讨好这些平庸作者、智力不全的文化价值鉴赏者而把地方保护的壁垒不仅竖在文化大厦的底层，也在文化大厦的上层大加认可，那么在国家的一些具体地方就会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在这种犹如死水一滩般停滞的氛围中，盛气凌人的洋洋自得甚嚣尘上，所有真正有才华的人和精神上充满生命力的人就会被迫弃绝外省逃亡首都，其结果是在地方就不会有建造文化大厦基层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文化工作者。

总之，俄国文化发生区域和族群之分化，这种现象绝不应该延伸到文化大厦上层，蔓延到文化价值的高端。在未来俄国文化的“上层”，族群的、区域的藩篱就不应该存在。文化的“上层”之所以被称为上层，那是因为它有别于“底层”。因为在底层，区域和族群的篱笆要竖得结实，并且要有鲜明的标记。这两个“层级”之间的明显分界线当然不应该存在，一级应该是逐渐而悄悄地演进到另一级，不然的话，文化就不会有**统一完整的体系**，即不会有真正地道意义上的文化。因此，在文化大厦底层，那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壁垒会随着其不断上升而越来越逐渐远离民间基础，其壁垒也就变得模糊起来。而在文化大厦的最顶层，这些壁垒也就根本觉察不到。重要的是，要使文化大厦的顶层和底部之间持续互动，让再度创造出的顶层的价值以身作则来引导底层的价值创造走向细致化和个性化。相反，要使俄国区域个性化的文化创造，在彼此汇集归纳的过程中，能够担当起中和那些独具特色的地方特征的任务，同时又强调共性，以自己来确定上层文化工作的精神。地方壁垒的作用、形式和规模，应该受文化大厦上下层之间的经常性互动的这些要求来制约，这些壁垒应该保障文化地方色彩沿着正确的方向个性化，但

绝不应该妨碍文化大厦上下层的相互配合。显然，要准确地定出这些规则是不可能的：在某一个个案的问题中，这一地方壁垒可能会是高的，而在另一个个案中则会降低，重要的只是对这些壁垒的意义要思考到位，而不要把它们变成目的本身。

尽管俄国文化在下层发生了区域和族群的分化，但为了让俄国文化终究保持一个统一的系统，就必须要有有一个主要条件，即无论是俄国文化大厦统一的顶层，还是底层的所有带有地方色彩的不同变种，其基础都应该是立足于同一个建设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东正教信仰。这一原则对俄国人民的每个族群都同样具体亲和力，这一原则已经沁入民众心灵的深处，同时，这一原则也有资格成为高层价值的基础，这些上层的价值是为全俄文化巅峰的那些训练有素的人所设计的。正是这一原则曾经有一度成了整个俄国文化极其重要的神经中枢，并且正因为这一神经中枢的智慧，俄国文化的西部俄罗斯和莫斯科的个性化呈现才能够再度携手统一起来。后来，彼得大帝之后最显著的特征是盲目地迷恋世俗化、无神论、缺乏良知、崇尚反基督的欧洲文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并摧毁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顶层，这份先人托付给我们的俄罗斯生活基础却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来弥补。因为弃绝了东正教基础的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渗透进了人民群众，所以这种思想情绪又在这些民众中让精神的绝对空虚得以发酵。但是，无论是普通大众的杰出人才，还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们对这种精神空虚心存担忧却无能为力。因此，宗教探索这一经常采用的极为吊诡的形式，就是整个彼得大帝之后全体俄罗斯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当然，在俄国文化本质上与宗教没有互缘关系的时候，当国家又使教会屈从于自己的时候，教会是置身于文化之外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置身于全俄高级文化主流之外），这样，这些宗教探索就不可能找到愉悦自己的地方。因此，宗教探索者们都是各自为政，只是其中的一些人在摸索期间不经意地“发现”了东正教。现在，我们正在经历共产主义的统治时代，无宗教（所以也就是反宗教）文化的精神空虚已经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个时代之后，毫无疑问就会出现强烈的反应。未来的俄罗斯文化应该充盈着理想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意识。东正教不仅应该渗透进民间的日常生活，而且要融入

俄罗斯文化大厦的各个部分，直到这座大厦的最高层。只有到那时，每位个体的俄罗斯人才会在俄罗斯文化中完全得到慰藉，让自己精神最深处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俄罗斯文化哪怕其表面上还带有区域化和族群化的色彩，才能够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系统。

五

目前，我们正热衷于俄罗斯文化的地域性区分。尤其是在乌克兰，完全追求文化分离主义简直是已经占了上风，目的就是要以此不给人们说他们搞政治分裂主义的口实，进而把大批训练有素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从文化工作的决定性岗位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因为大批来自加利西亚^①的知识分子涌了出来。几个世纪以来，加利西亚知识分子的民族自我意识既被他们所遵从的天主教精神所扭曲，又受波兰的奴役，再加上他们所处的那种粗俗的民族分离主义式的好斗（准确地说是语言上的）的环境，好斗过去一直也是奥匈帝国很擅长的拿手好戏。一旦涉及到乌克兰居民，那乌克兰居民的某些阶层，他们所同情的与其说是推动乌克兰化的那些具体形式，还不如说是要让这场运动从表面上看要从莫斯科、从共产主义的莫斯科分裂出来。这样一来，乌克兰的文化分离主义所吸取的营养正是来自居民中那些抱有反共产主义情绪（按苏维埃的术语即“小资产阶级的”）的人。这一潮流本身在逻辑上与文化分离主义完全不相干，比方说，在旧制度下，正好相反，这些情绪还是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与这一切具有连带关系的还有现在的状况，那就是，在文化“上层”的创造中，全俄统一的精神能够喊出自己的最强音而且，也应该得到表现，但全俄统一的精神现在遭遇到了困难和人为的限制，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政治统治不允许其他人去创建文化价值，与此同时，自己本身也不善于创造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发达的精神需求的高级价值。然而，主要的是，对乌克兰化的迷恋当然是因为创新的魅力很诱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

^① 加利西亚（Галиция）：部分西乌克兰和部分波兰地区的历史名称，现在乌克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还包括波兰热舒夫全省及克拉科夫省的大部分——参见《苏联大百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86页，译者注。

些曾长期被挤压得进入地下的“乌克兰狂”突然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无论以前怎么样，现在在这个领域毫无疑问暴露出许多丑陋的地方。乌克兰化逐渐变成某种目的本身。所引发的后遗症，是对民族的力量不但没有精打细算，而且还无的放矢地挥霍无度。在未来，生活会当仁不让地进行矫正，并且对乌克兰运动中由文化分离主义的那些狂躁发烧友所带入的滑稽怪诞因素进行清除。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所造成和正在造成的诸多怪胎必然要招致灭亡并会被遗忘，但创建与大俄罗斯文化不吻合的独特的乌克兰文化，其合理性本身已经不值得否定了。民族自我意识的正确发展轨迹将为这种文化的未来创造者既指明文化的自然边界，也指明其真正的本质和真正的任务，那就是成为**全俄罗斯文化的独特的乌克兰个性化体现**。只有在那个时候，乌克兰的文化工作就能拥有这么一种特质，受这一特质的熏陶，乌克兰人民中那些真正优秀的代表才能如鱼得水地参与文化建设，况且，他们不是因为恐惧，而是良知的驱动。

一旦扎根于乌克兰以及欧亚—俄罗斯其他地区人民生活的基础的不是对利己主义本能的纵容和对生物特性的赤裸裸的自我肯定，而是**把文化**当作个人的又当作民族的**自我意识**来弘扬，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来到。欧亚主义号召全体俄罗斯人——无论是大俄罗斯人，还是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都要为这一理想挺身而出。

（林精华 译 李俊升 校）

【Abstract】 Ukrainian culture and Russian culture ar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me culture. Since Ukraine joined Russian territory, how to integrate these two versions has been an issue unsolved completely. In addition to finding the cultural roots, any culture should have another aspect, namely, looking up to the spiritual peak. As for Ukrainian culture, it should be targeted to become reconciled supplementing Russian culture instead of competing with Russian culture. Eurasianism calls for all Russians, no matter great Russians or

Belorussians or Ukrainians, to struggle aiming at the ideal of culture as a nation's self-consciousness.

【 Key Words 】 Ukraine, Great Rus, Small Russia, Cultural Integration, Eurasian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Культура Украины и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 это различные варианты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После вхожд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в состав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как соединить эти два варианта культуры в один, стал самым трудно разрешимым вопросом. Кроме поиска истока культуры, кажд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акже должна обращать своё внимания на пики духов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процессе своего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не должна конкурировать с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а должна заключить с ней мир и дополнять русскую культуру.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призывает ко всем русским—русским, белорусам, украинцам,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ультуру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и бесстрашно бороться за развитие данного идеал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Украина,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я, малая Россия, культурное слияни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责任编辑 常喆)

乌克兰民族主义： 历史演进、政治诉求与极端发展*

葛汉文 丁艳凤**

【内容提要】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及运动具有久远的历史根源。独立建国后，为实现巩固民族国家、强化政治认同的目标，乌克兰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家在国内治理方面推行了若干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在当前的乌克兰政治变局中，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发挥了重大影响。总的来看，冷战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诉求，在实践层面上与乌国内社会现状严重脱节，加剧了各族群、各地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乌国内局势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乌克兰 民族主义 国内治理

【中图分类号】D73/77 (51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3-0062-(16)

在社会学、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界，有关“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理论，历来存在诸多范式彼此有别、机理相互矛盾的阐述。但自18世纪晚期以来，民族主义理论及运动，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政治实践，无疑是对世界历史进程影响最为巨大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力量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里，民族主义的两次勃兴，不仅从根本上结束了16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的全球殖民统治，而且它所昭示的若干规范性原则（如国际行为体主要由现代民族国家所组成），也近乎彻底地改变了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和基本

* 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章的错漏之处由笔者承担。

** 葛汉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丁艳凤，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讲师。

构成。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和意识形态大争斗的基本终结，一度被超级强国全球争霸掩盖的民族主义思潮及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又告兴起。在这场国际政治大变局当中，与民族国家数量第四次大增生互为因果，当今的民族主义由于其对国际安全形势及部分国家国内政局的重大影响，再度引发了世人的普遍关注。

作为一个虽具有久远的民族文化遗产，但在历史上却几乎从未真正独立过的民族，民族主义是潜伏于乌克兰民族集体记忆深处的一条经久的精神线索；而其思想与运动的数次兴衰起伏，在乌克兰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在刚刚赢得独立的新乌克兰国家中，民族主义由于其在“建构国家意识、维系民族精神”中的重要意义，更是得到很多乌克兰政治人物和普通乌克兰民众的重新认识与高度评价。民族主义也由此成为影响独立后的乌克兰国内政治生态演进、乃至对外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变量，格外值得引起重视。

一、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及历史演进

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初期。从那时起，受到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思潮影响的一大批乌克兰知识精英，就力图从文化、历史、语言和地理的角度，通过对乌克兰民族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的论证，来唤醒长久处于异族统辖下的乌克兰人的“民族精神”，并为乌克兰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提供理论和舆论基础。1798 年，乌克兰现代文学之父和民族语言先驱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Ivan Kotlyarevsky），第一个使用现代乌克兰语创作文学作品，开历史之先河。而在 19 世纪乌克兰最著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的笔下，乌克兰人不再是“小俄罗斯人”或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分支，相反，它拥有自身独特的种族、文化和历史属性，“那些共用乌克兰语的人民，都是乌克兰民族家庭的一份子”。^①

^① Ihor Stebelsky, “Putting Ukraine on the Map: the Contribution of Stepan Rudnytskyi to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National Papers*, 2011, Vol.39, No.4, p.589.

进入 20 世纪前后，乌克兰杰出的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赫鲁什维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斯捷潘·鲁德涅斯基（Stepan Rudnytsky）、尤里·利帕（Yuri Lypa），和米哈伊洛·德拉霍曼诺夫（Mykhailo Drahomanov）等人，在论证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证明：中世纪基辅罗斯的赫赫武功，17 世纪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i）领导的反抗波兰—立陶宛邦联的斗争，伊万·马泽帕（Ivan Mazepa）领导的反抗沙俄暴政的人民大起义，这些都是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也是乌克兰民族有权寻求民族自由进而建立独立国家的直接证据。在他们充满情感的描述下，乌克兰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早自它与邻近的摩尔多瓦、匈牙利、波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民族相分离时，就已经在黑海北部宽广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定居。这里为周边的黑海、喀尔巴阡山脉、高加索山脉南部、波兰的沼泽和森林地带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单独成片，且具有独特内聚力的地理区域，构成了乌克兰人世代繁衍生息的民族家园。^①与历史上曾先后统治乌克兰的波兰、俄罗斯帝国相比，乌克兰民族家园具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属性：“黑海在物质和精神上通过自北向南的天然水系，将乌克兰的领土连接了起来。它连同流向黑海的诸多河流，是乌克兰民族古老的、便捷的高速公路，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的中枢神经’”。正是借助这个巨大水系所构成的网络，“在乌克兰大地上，最终形成了单一的习俗、语言和宗教。”^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乌克兰长期以来处于俄罗斯帝国或波兰的统治之下，但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发展，为其争取独立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自然与历史证据。

尽管上述乌克兰民族主义鼓动者的反复论说，对于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了强大的影响，但乌克兰追求民族独立与独立建国的历史过程，却历尽艰难。俄罗斯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崩溃，使得乌克兰政治文化精英得以利用有利时机，于 1918 年 1 月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这个

^① Oleksandr Saltovsky, “The Geopolitical Component of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Thought: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Oleksandr Derhachov, ed., *Ukrainian Statehoo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Kyiv: Political Thought Publishing Ltd., 1996, p.83.

^② Ibid, p.84.

被称为“拉达”的乌克兰自治政府，其领袖是历史学家赫鲁什维斯基，一度被列宁领导的苏俄政权所承认。但在邓尼金的白军、红军、德军和协约国干涉军等内外多重威胁下，近现代以来乌克兰第一次试图实现民族独立的努力很快便告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部分民族主义者在苏德大战中再次看到了实现独立建国的希望。他们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组建了人数最多时达8万之众的“乌克兰解放军”，追随德军对苏联作战，甚至还帮助德军捕杀犹太人。但其要求乌克兰独立建国的诉求，没有得到德国的积极支持。战后，苏联严厉镇压了这些一度逢迎纳粹作恶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近20万人被流放，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也随之遭遇重大挫折。

二战后，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及其后政治氛围的缓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条，此时又争取到了不少同情者，一些民族主义组织也纷纷复活。在20世纪50年代末，来自利沃夫的“乌克兰工农同盟”组织，提出“组织全体乌克兰人民起来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的口号。1965年，主要由乌克兰知识分子和共青团员组成的“60年代集团”，号召乌克兰人捍卫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实现乌克兰民族的独立自主。此外，在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现了“乌克兰青年同盟”、“乌克兰民族阵线”、“乌克兰解放最高委员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将“民族解放和成立一个独立的、主权的乌克兰”，作为行动纲领。^①尽管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长期受到苏联当局的压制，但这些带有鲜明政治诉求的思想和活动，仍然能够在高压的政治生态下保持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延续，甚至还能不时得到部分苏共、乌共领导人以及部分乌克兰民众，特别是西乌克兰民众的有限支持。这均为日后乌克兰实现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目标提供了精神和组织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持续发酵，以民族主义为主要代表之一的各种“非社会主义”政治思潮，开始在苏东各国内部蠢蠢欲动。在苏东局势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下，不少乌克兰知识分子在对苏联政府部分政策措施表达不满和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将

^① 张建华：“苏联解体的理论和法律依据”，《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6期，第46页。

其政治诉求升级为恢复乌克兰民族文化、语言和历史，乃至从苏联分离从而建立独立国家。1990年1月22日，为纪念1919年东、西乌克兰的短暂统一建国，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Ukrainian Popular Movement for Restructuring，简称 Rukh，即“鲁赫”），效法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苏联加盟共和国，发动了约50万人参加的抗议活动。这标志着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在当代乌克兰的再度兴起。

在筹划建构一个新的乌克兰国家时，乌新一代民族主义者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未来独立的乌克兰将是一个“乌克兰人的国家”，还是在政治概念上更为宽泛的“乌克兰人民的国家”？^①对这个异常敏感问题的不同回答，在乌克兰独立前后，出现了两种在信仰、立场上彼此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民族主义政治派别。

一个是持激进立场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这部分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继承了二战时期出现在乌克兰的那种带有强烈种族排他色彩的民族主义论调。在拒绝反思其先辈与纳粹德国合作、对包括乌克兰人民在内的苏联人民犯下罪行的历史的同时，他们以建立一个“乌克兰人的乌克兰”为口号，将立即实现乌克兰国家独立和建设一个“纯洁的乌克兰”作为政治诉求。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论调，在历经苏联政府数次严厉打击后仍然没有消散。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形势异常动荡的乌克兰（特别是在对俄罗斯的统治长期心怀怨恨的西乌克兰），再度争取到了不少的支持者。

第二个则是那些仅以争取国家独立为主要目标的乌克兰政治派别。大体上讲，包括“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部分对独立持同情态度的乌共党员，“甚至是在全民公决中对独立投赞成票的乌克兰人，都可以被视为是该类民族主义者中的一员”。^②与采取极端立场的乌民族主义分子不同，这部分政治势力充分意识到了乌克兰国家性（statehood）的长期缺失所导致的东、西乌克兰在地区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独立后确立乌克兰的国家建构和国家认同之艰难。作为一个在乌独立前后拥有巨大影响、在其纲领中将民族

^①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7.

^② Taras Kuzio, “Nationalism in Ukraine: towards a New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2, Vol.7, No.2, p.141.

主义与民主、自由等“普世权利”都囊括其中的中右政治派别，“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宣称，“从历史、种族、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上看，乌克兰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同质的社会。鉴于多民族社会的事实，必须将乌克兰视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实现国家独立乃至建设一个新乌克兰国家的过程中，“必须团结在乌克兰领土上居住的所有居民，不论其社会地位、宗教属性、种族根源，甚至是民族文化意识如何”。^①在此类相对温和的民族主义政治动员下，在1990年10月至1991年8月间，乌克兰广泛兴起了一个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社会运动。在1991年12月1日的全民公决中，91%的民众支持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建国。

二、独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

以1991年发表国家独立宣言为标志，乌克兰结束了337年和俄罗斯结盟、并事实上接受后者统治的历史，首度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独立。在此情势下，如何巩固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进而寻求未来发展，已经成为摆在乌克兰政治—知识精英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②但脱胎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远非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文化实体，而仅仅是一幅由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鞑靼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拼接而成的“百衲布”。乌国内各族群聚居地，在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认同上，存在着几乎恒久的巨大裂痕。这使得独立伊始的乌克兰，不仅面临着从苏联模式向新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还必须要建立现代国家组织形式和民族国家认同。^③在这个过程中，与很多其他的新独立国家一样，民族主义很快便从一种主要以争取民族国家独立为目标的革命理论，转化为一个维系乌克兰国家政治认同、稳定国内社会，乃至巩固自身权力的有

①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8.

② John O'Loughlin, "Geopolitical Visions of Central Europe", in M. Pagnini, V. Kolossov and M. Antonsich, eds., *Europe Betwee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Vol. II*, Rome: Societa Geografica Italiana, 2001, p.608.

③ 张宏：“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6期，第2页。

力工具。^①

在独立后乌克兰国内政治势力不断变动重组过程中，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化为多种类型，一种是位于政治光谱最右端的“种族民族主义者”(Ethnic nationalist)或“极端民族主义者”(Extreme nationalist)，包括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俄罗斯族极端民族主义者；二是“东斯拉夫民族主义者”(Eastern Slavic nationalism)，包括乌克兰共产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以及部分“中间派”政治势力，如地区党(Party of Regions)等；还有就是包括大多数中、右翼政党在内的“国家民族主义者”(State nationalist)。^②特别是后者，自1991年以来在乌国内政局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外政策上，此类“国家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国际政治中坚决维护乌克兰国家利益、在与俄罗斯保持“正常”国家关系同时，加强与西方、特别是欧盟的紧密联系；在对内治理方面，此类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政治诉求，在于从历史、语言和文化等各个角度采取多种措施，牢固塑造起全民对于乌克兰国家的政治认同。从乌克兰独立20多年的历史来看，这些观点得到了包括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前总统库奇马、特别是前总统尤先科在内乌克兰许多立法和行政机构重要成员不同程度的支持。^③

本着这种逻辑，对乌克兰历史、特别是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很快成为重塑乌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在很多持修正主义立场的乌克兰当代历史学者的描述下，俄罗斯帝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对乌克兰长达三百余年的统治，成为一个俄罗斯为达到牢牢控制乌克兰，在社会模式、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等方面抹杀乌民族独特性的历史过程。如，彼得大帝在乌克兰全面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强行改造乌社会结构；俄罗斯帝国长期禁止乌克兰语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强制乌克兰人抛弃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传统；苏

① Mikhail Molchanov, "Book Reviews: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9, Vol.22, No.6, p.1084.

② Taras Kuzio, "Nationalism in Ukraine: Towards a New Framework," *Politics*, Vol.20, No.2, 2000, p.84; Taras Kuzio, "Nationalism, Identity and Civil Society in Ukraine: Understanding the Orange Revolu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3, No.1, p.291.

③ Taras Kuzio, "Nationalism in Ukraine: Towards a New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p.154.

联在继承俄帝国在乌克兰的权力地位的同时，也一并继承了对乌民族的压制和同化政策：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起，苏联不仅依靠政治高压，在文化和科学领域严厉打击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甚至还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强调乌克兰民族和文化独特性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历史论述，刻意突出俄乌两民族历史进程的殊异，以及乌克兰民族长久以来受到的严酷压迫和被迫进行的英勇反抗，力图藉此激发起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长期统治的敌意甚至仇恨，进而构建乌克兰民众对乌克兰民族和国家的政治认同。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当代很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乌克兰政治人物、学者及很多乌历史教科书都认定，1932 年至 1933 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是苏联政府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行为。^①在此基础上，2003 年时任乌总统的库奇马签署法令，将每年 11 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定为“饥荒纪念日”。2006 年，乌克兰议会更是通过决议，认定“乌克兰大饥荒”为一种由苏联政府刻意为之的、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行为。又如，尽管苏联乃至后来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一向将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治家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视为与纳粹合作的民族叛徒和恐怖分子，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苏联民众犯下了血腥罪行，但乌克兰当代部分民族主义者，还是力图将班杰拉塑造成为一名勇于反抗苏共统治、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英雄。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尤先科在 2010 年卸任前，排除异议，授予班杰拉“乌克兰民族英雄”称号。此举在乌克兰国内，特别是在乌东、南部俄罗斯裔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引发了巨大争论。^②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个别敏感历史事件格外偏激的诠释，一方面唤起了乌克兰人民悲情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激化了乌克兰国内社会，特别是东、西乌克兰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

规范语言文化问题，也是独立后乌民族主义势力着力构建乌克兰国家政治认同的努力之一。几乎所有的政治学研究者一般均同意：在民族主义运动

① Karina Korostelina, “Shaping Unpredictable Past: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y Education in Ukraine,”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13, No. 1, 2011, p.9.

② Volodymyr Kulyk, “The Media, History and Identity: Competing Narratives of the Past in the Ukrainian Popular Press,”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13, No. 3, 2011, p.293.

当中，“‘民族的印刷语言’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①从历史上看，乌克兰人民在使用本民族语言方面，的确存在不公正现象。在俄罗斯帝国长期的统治时间里，乌克兰语一般都被视为乡下人使用的语言，或者干脆就是一种俄语方言。在苏联时期，乌克兰语的使用，仍然受到官方有意无意的忽视。据统计，独立前的1987年，在乌克兰学校中，使用俄语教学的约占72%，而使用乌克兰语教学的只占16%。^②为纠正这种不公平待遇，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在1989年制定了语言法，规定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政府提供条件保证俄语和其他语言的使用。^③

独立后，乌克兰语在新乌克兰国家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很快就受到乌中-右翼民族主义政治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在他们看来，独立后乌克兰国内语言和文化多元化态势、特别是东、南部大批乌克兰公民仍习惯讲俄语、亲近俄罗斯文化的事实，使得乌克兰看上去仍是一个有待于从外国（主要是俄罗斯）“文化占领”下“解放”的国家。^④正是从这种逻辑出发，在乌当代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支持下，乌克兰政府很快便从法律上规定乌克兰语为国家法定语言，并开始积极推进乌克兰语在政府部门、武装力量、大众传媒等国家公共生活领域的使用，试图以此消除俄语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强势影响。特别是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以民族主义和反俄立场闻名的尤先科总统更是着力推行激进和强硬的语言政策，规定在政府行政公文、法律诉讼中只能使用乌克兰语，并在教育、大众传媒、政府公文事务等诸多领域对俄语的使用施加严格限制，试图以这种方式在乌国内社会中奠定乌克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主导性地位，推动塑造包括俄裔族群在内的全体乌克兰民众对乌克兰国家的政治认同。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语言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演进的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② Tatiana Zhurzhenko, “‘Languag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A. Bove, ed., *Questionable Returns*, Vienna: IWM Junior Visiting Fellows Conferences, 2002, p.9.

③ 张宏：“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第2页。

④ Taras Kuzio, “Nationalism in Ukraine: towards a New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p.136.

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形成有其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背景。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实现主权独立目标之后，通过积极发展民族语言维护民族特征、捍卫民族尊严的努力，是应该被尊重 and 理解的。^①但由于语言文化问题的复杂性，期望在短期内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强制推行国家主体语言，以期实现国家语言文化“齐一”的做法，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而部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关于“只有通过保护乌克兰语才能抵制俄罗斯文化渗透，防止再度成为俄罗斯‘文化殖民地’”的看法，显然过于危言耸听。在这情况下，新世纪以来乌克兰政府在强行推广使用乌克兰语方面的做法，特别是乌政府在公共政策、教育和大众传媒方面对使用俄语所附加的各种限制，一开始就受到乌中部、东部和南部讲俄语居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鼓吹者力图通过强制推行语言文化政策，以加速消除乌克兰各族群社会文化差异的做法，事实上并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扩大了族群之间的认同差距，加剧了乌各对立政策派别之间，以及东、西部民众间的彼此不信任，极大地损害了在乌克兰社会构建同一的国家政治认同的努力。

总的来看，尽管乌克兰当代“国家民族主义者”敏感地意识到，独立之后乌克兰民众在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上，依旧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混乱，但他们显然低估了新兴民族国家在塑造国内社会政治认同上所面临的一系列长时段、深层次挑战，而其在强化乌克兰国家政治认同方面显然过于莽撞激进的方案举措，不仅无益于乌克兰国家的巩固，更无法消弭乌克兰国内东西部地区以及国内各族群间日趋严重的互不信任和离心倾向。而那些热衷于用民族主义口号争取特定民众支持，以巩固其权力地位的乌克兰政治人物，在处理历史、语言和文化等敏感问题上的过激言行和出尔反尔，甚至还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争议议题和地区对立，这就格外强化了乌克兰国家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冲突与疑惧，严重阻碍了乌克兰国家的发展进程。^②

① 侯昌丽：“试析乌克兰语言政策的去俄罗斯化”，《西伯利亚研究》，2012年第3期，第47页。

② Stephen Shuman, “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Nationhood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6, Vol.39, No.2, pp.247-248.

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泛滥及恶果

自 1991 年独立以来，乌克兰国家政局始终动荡不宁。同其他独联体国家一样，乌克兰起初仿效三权分立、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实行相对激进的政治转型。但由于社会经济转型乏力、政坛腐败严重，加上政治内斗不断，使乌克兰陷入了无休止的动荡纷争之中。特别是 2004 年的“橙色革命”以来，在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忙于争权夺利、乌克兰政局长期不稳的同时，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却处于困顿局面，地区差距不断拉大，民众生活日益艰困，族群间对立情绪愈发严重。与这种情况相伴随的，则是部分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特别是乌克兰族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恶性发展。此类“种族民族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者”，大多以仇外排外和种族歧视而著称，鼓吹建立一个由乌克兰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乌克兰，即“乌克兰人的乌克兰”。特别是在尤先科执政时期，包括“乌克兰国民大会”、“乌克兰国家独立联盟”等在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大行其道，仇恨外国人及本国其他非乌克兰族裔等情况，在乌克兰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愈发严重。

在当前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当中，“全乌克兰自由联盟”（Svoboda）可谓其中的“翘楚”。这是一个以极端反共、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闻名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其前身是 1991 年成立的“乌克兰社会民族党”（Social National Party of Ukraine）。该党一向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毫不妥协的对抗者”，要求必须在经济、文化和语言等方面推行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确保乌克兰族在乌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从而真正建立一个“乌克兰人的乌克兰”。^①有学者将该组织定性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也有不少人直接将其视为“新法西斯主义在乌克兰的复活”。^②值得注意的是，与法西斯主义当年的发展极端类似，在乌克兰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和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该党通过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迅速坐大。在 1998 年乌克兰议会选举中，该党与“乌克兰国家独立政治运动”联手也仅争取到

① Андрій Ілленко, Націоналізм і псевдонаціоналізм, 24 грудня 2009, <http://www.svoboda.org.ua/dopysy/dopysy/013214/>

② “In Ukraine, nationalists gain influence and scrutiny”,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3/18/us-ukraine-crisis-farright-insight-idUSBREA2H0K620140318>

0.16%的选票；但在 2012 年的乌议会选举中，该党竟一举获得了 10%选民的支持，赢得了 37 个席位。^①

这些主要来自乌克兰中西部的政治势力，一般都具有极其鲜明的反俄色彩。尽管乌克兰著名民族主义组织“讲乌克兰语者联盟”领导人沃洛德米尔·比利斯科伊（Volodymyr Biletskiy）曾在乌克兰东部最主要的俄罗斯族聚居区顿涅茨克表示，虽然在历史上俄罗斯给乌克兰带来了许多痛苦的回忆，而乌克兰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中欧国家”，但他仍然希望乌克兰与俄罗斯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应当将乌克兰之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作用，视为加拿大之于美国一样。”^②但乌克兰大多数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还是将俄罗斯视为乌克兰生存发展的天然大敌。“全乌克兰自由联盟”主席、乌当前重要政治人物奥列格·季亚尼博科（Oleh Tyahnybok）在 2004 年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就一再煽动乌克兰民众必须警惕俄罗斯对乌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乌克兰人民必须起来反抗目前控制乌克兰的‘俄罗斯-犹太人黑帮’”。^③正是以此为借口，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往往特别“敏感而恐惧”地关注部分乌政府领导人加强与俄罗斯关系的政策，认为这是“勾结外敌”损害乌克兰国家主权之举，其目的在于使乌克兰变成下一个“事事均需经过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结果必将导致乌丧失独立地位，进而使“极权主义国家卷土重来”。^④这正是此类政治势力极力鼓吹乌克兰必须尽快加入欧盟和西方阵营，从而使得“原本就属于西方”^⑤的乌克兰彻底摆脱俄罗斯影响的主要理由。

当前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当前欧洲各国极右翼势力之间存在

① “Svoboda: The rise of Ukraine’s ultra-nationalists”, 26 Dec 2012,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0824693>

② John O’Loughlin, “Geopolitical Visions of Central Europe”, in M. Pagnini, V. Kolossov and M. Antonsich, eds., *Europe Betwee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Vol. II*, p.620.

③ John Ryan, “The Media’s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on Ukraine: ‘There are no Neo-Nazis in the Interim Government,’” 03 Apr 2014, <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medias-disinformation-campaign-pm-ukraine-there-are-no-neo-nazis-in-the-interim-government/5376530>

④ Taras Kuzo, “Slavophiles versus Westernizer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 in Ukraine”, in Kurt R. Spillmann, Andreas Wenger and Derek Müller, ed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Independent Ukrain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p.68.

⑤ Olesia Oleshko, “In Search of Ukraine’s Identity”, *The New Presence*, 2009, Vol.12, No.3, p.30.

密切联系。“全乌克兰自由联盟”是欧洲极右翼党派联盟“欧洲民族运动联盟”（Alliance of European National Movements）的观察员，这个党派联系包括当前欧洲其他诸多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e）、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匈牙利的纳粹政党“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等。^①而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也如同希腊新纳粹组织“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一样，用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甚至是种族主义思想，以骗取那些在国内社会矛盾加剧、经济极端困顿情况下失意民众的支持。

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在乌当前的政治剧变中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普遍被认为具有亲俄倾向的亚努科维奇总统宣布乌克兰政府将暂停与欧盟签署联合国协定的谈判后，乌反对派于2013年11月21日在首都基辅联合展开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引发军警与民众的激烈冲突。在这场政治大变局中，包括前总理季莫申科领导的“全乌克兰祖国联盟”（祖国党）、前职业拳手维塔利·克利钦科（Vitaly Klitschko）领导的“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UDAR）及“全乌克兰自由联盟”等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右翼政党均参与其中。特别是“全乌克兰自由联盟”、“乌克兰人民自卫组织”（Ukrainian National Self-Defence）、“右翼军（Right Sector）”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更是积极组织对政府心怀不满的民众上街抗议，其非法拥有的准军事组织武装分子一直都是武力对抗政府军警的主力。^②在2014年2月22日亚努科维奇被议会罢免职务并流亡后，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在乌临时政府的21个内阁席位当中，仅“全乌克兰自由联盟”一党便占据了包括副总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在内的7个重要席位，权势大张。^③在此影响下，亚努科维奇去职仅一天后，根据临时政府法令，乌克兰语正式成为乌“唯一的”法定语言。3月5日，乌克兰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为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杰拉鸣冤叫屈，称其在纽伦堡审

① Tash Shifrin, “Ukraine: the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fascists,” 18 Feb 2014, <http://www.dreamdeferred.org.uk/2014/02/ukraine-the-protest-movement-and-the-fascists/>

② Ibid.

③ John Ryan, “The Media’s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on Ukraine: ‘There are no Neo-Nazis in the Interim Government,’” 03 Apr 2014, <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medias-disinformation-campaign-pm-ukraine-there-are-no-neo-nazis-in-the-interim-government/5376530>

判中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不仅如此，时常还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袭击犹太人、公开纪念二战期间乌克兰与纳粹合作者的报道。^①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引起了乌东部及南部俄语地区民众的极度反感和强烈不满，加剧了乌东部及南部部分地区意图脱离乌克兰加入俄联邦的离心倾向，导致乌克兰局势进一步恶化。

针对乌克兰政治剧变前后异常活跃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当前执掌乌克兰权力的，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恐俄派和反犹主义者”。俄外长拉夫罗夫也批评道，乌克兰的新领导层正在系统地侵犯乌境内俄罗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局势正走向利用独裁、有时近乎恐怖主义的手段，来镇压乌克兰一些地区的异见。”^②一些西方学者同样对乌克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急剧增长感到担忧。美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斯鲁列维奇（Andrew Srulevitch）指出，尽管“全乌克兰自由联盟”主席季亚尼博科极力否认与新纳粹之间的联系，并且该党在基辅大示威过程中有意约束了其有关犹太人的种族主义言辞，但从该党历来的纲领及其禁止无神论者、前共产党员和非乌克兰族人成为其党员看，它确实是一个具有‘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宗旨的政党。^③英国《卫报》资深评论员瑟姆斯·米尔恩（Seumas Milne）与学者塔什·希夫林（Tash Shifrin），也均将该组织视为“新法西斯分子”，认为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在当前的乌政治剧变中遵循着“传统的选举和准军事组织街头战斗并行的双轨策略”，正在取得节节胜利。^④

在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演进的过程当中，一个独特且矛盾的现象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跨国层次（transnational level）上“一体化”（integration）

① Sabina Zawadzki, Mark Hosenball and Stephen Grey, “In Ukraine, nationalists gain influence and scrutiny”, 18 March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3/18/ukraine-crisis-farright-insight-idUSBREA2H0K620140318>

② “Russia’s Putin condemns Ukraine’s new authorities, says opened way for ‘neo-Nazis’”, 18 Mar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3/18/ukraine-crisis-putin-coup-idUSL6N0MF2O620140318>

③ Sabina Zawadzki, Mark Hosenball and Stephen Grey, “In Ukraine, nationalists gain influence and scrutiny”, 18 Mar 2014.

④ Tash Shifrin, “Ukraine: the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fascists”, 18 Feb 2014, <http://www.dreamdeferred.org.uk/2014/02/ukraine-the-protest-movement-and-the-fascists/>

趋向日益显著的同时，次国家层次（subnational level）上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趋势也同样明显。^①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极端化演变，及其所导致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效应，典型地体现出了这种分裂化倾向。一方面，乌民族主义者提出加强与西方（主要是欧盟）融合，以确保乌克兰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张，完全是因为感受到并向往超国家经济体的蓬勃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便利。但另一方面，乌民族主义者在加强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等方面所推进的若干政策，却极大地诱发了乌国内各族群、各地区间矛盾的激化，急剧推进了乌国内社会的分裂化趋势。特别是随着乌克兰国内政局的恶性发展，乌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家所构筑的一整套具有系统历史论据、政治与文化理由的理性化观念，在当下诸多力图藉此转移社会矛盾、换取大众支持和巩固自身权力地位的极端主义政客和野心家的鼓吹下，成了几个足以激发大众爱憎、明显与时代潮流相悖的简单化意识形态信条，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在陷入重重危机的乌克兰引发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在此情况下，如何在尊重历史与现实前提下，正确、合理、稳妥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如何及早消除可能激化民族矛盾和社会分裂的诸多隐患，如何更好地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扩散危害，从而成功实现巩固民族国家的目标，不仅对当前乌克兰的政治—知识精英和广大民众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同时也应当是那些已经成功实现国家独立的多民族主权国家的人民必须认真考虑与应对的重要问题。

【 Abstract 】 The Ukraine nationalism thought and campaigns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history. After its independence in 1991, many nationalist policies in domestic governance, drafted by some Ukrainian nationalist politicians, have been implemented. As for current chaos in Ukraine, the extreme nationalist political forc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On the general, the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laims of Ukraine nationalism is seriously disconnected from the

^① 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文化上的趋同倾向以及超国家国际体制范围的拓展和效用的深化等；碎片化趋势体现为国内民族、宗教或地区冲突加剧，多民族国家解体等。参见时殷弘：“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的类型及伦理道德思考”，《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第28-29页。

domestic status quo of Ukraine in practice, intensifying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regions, which is quite unfavorable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Ukraine society.

【 Key Words 】 Ukraine Nationalism, Ukraine Nationalism Evolution, Domestic Governance

【 Аннотация 】 У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и движ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глубок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с целью укрепл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часть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 настроенных политиков Украины стала во внутр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продвиг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меры с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окраской.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Украине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оказывают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лы.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развити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на практике утратили связь с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ой в Украине, усилил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группами и регионами, что весьма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о для стаби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эволюция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нутр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краин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乌克兰宪法变革下的政体困局：评估与展望*

杨友孙**

【内容提要】从1991年正式独立至今，伴随着宪法的不断变化，乌克兰政体也出现过多次反复。其根源一方面在于宪法未能体现总统、总理、议会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另一方面在于乌克兰国内亲俄、亲欧力量的分裂，使得任何一部宪法都没有稳定的民意根基。分析乌克兰不同宪法框架下的不同政体存在的问题，尤其是2014年2月乌克兰重新恢复2004宪法框架下的总理总统制的理论及现实问题，有利于深入认识乌克兰国内冲突的制度因素，以及合理地展望乌克兰宪法和政体变革的趋势。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宪法 乌克兰政体

【中图分类号】D73/77 (51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3-0078-(28)

2014年2月21日，在经过三个月的骚乱之后，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一项法案，决定恢复2004年版本的乌克兰宪法，以取代2010年10月再度生效的1996年宪法。乌克兰宪法似乎陷入了几年一轮回的怪圈。乌克兰宪法变革的实质，是其政体的不断反复。多年来，它一直未找到能够将乌克兰带向民主与稳定的适当政体。乌克兰宪法及其政体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变革历程，它的

*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来自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国立金融学院（Dnipropetrovsk State Financial Academy）、现为波兰罗兹大学经济学与社会学学院留学生 Anastasiia Zhyvotun 和 Anastasiia Babenko 的巨大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杨友孙，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波兰罗兹大学国际问题与政治学学院访问学者。

未来命运又将如何？这是乌克兰政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值得外界观察和研究的重要问题。^①

一、半总统制：中东欧国家的历史选择

在过去20年里，半总统制政体，或者说混合制政体——政府由议会组建，又有一个民选的有任期的总统^②——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据罗伯特·埃尔吉（Robert Elgie）统计，到20世纪末，世界上至少有55个半总统制国家。^③也有学者估计，在21世纪初，这类国家占了所有三权分立国家的25%左右。^④

半总统制政体在上世纪90年代急剧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和中东欧地区在民主转型后，其中的很多国家选择了半总统制，如波兰、斯洛伐克、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等。^⑤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为什么选择半总统制，而不是总统制

① 1996年6月28日，乌克兰最高拉达（Verkhovna Rada，即乌克兰议会）通过了独立以来的第一部宪法。2004年12月8日，在橙色革命之际，最高拉达通过了旨在削弱总统权力的宪法。2010年10月1日，乌克兰宪法法院裁决2004年宪法无效，恢复1996年宪法的效力。2014年2月22日，乌克兰议会否定1996年宪法，重归2004年宪法。乌克兰的两部宪法都是半总统制宪法，但1996年宪法规定的政体为总统议会制，2004年宪法规定的政体为议会总理总统制（议会总统制）。

② 半总统制的经典定义是1980年莫瑞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三标准论：一个民选的有任期的总统；总统有相当大的权力（quite considerable powers）；一个对议会负责而不受总统控制的总理。但该定义的第二点颇受争议，因为“相当大的权力”不好界定和理解。1999年罗伯特·埃尔吉（Robert Elgie）将这个经典定义中的第二条删除，使半总统制标准大大降低，半总统制国家大幅增加。参见 Maurice Duverger,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80, Vol.8, Issue 2, pp.165–187; R. Elgie, “The polit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 R. Elgie (Ed.),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21. 对于“半总统制”，国内外学术界均无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多数学者认为，埃尔吉的定义避开了“相当大的权力”这个棘手问题而更加适用。参见 Petra Schleiter, Edward Morgan-Jones, “Who’s in Charge? Presidents, Assemblies, and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Semi-presidential Cabine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0, Vol.43, No.11, pp.1415–1441.

③ R. Elgie, “The Polit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④ José A. Cheibub, Svitlana Chemykh, “Co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Performance in Semi-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Vol.9, No.3, pp.269–303.

⑤ 部分国家后来有所变动，如，2000年摩尔多瓦转变为议会制。

或议会制？首先被排除的是总统制。总统制被认为存在着体制僵化、零和选举和双重合法性等内在弊端。^①并且由于总统权力过大，新兴民主国家有演变为专制的可能性，这不符合当时民主化浪潮的政治语境。而在议会制和半总统制之间，为什么选择半总统制而不是议会制？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罗伯特·埃尔吉指出，这些国家选择半总统制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况或原因。第一种情况是出于“民主象征”（democratic credentials）的考虑。即，保留“纯象征性”的民选总统，以加强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质。第二种情况是“治理的需要”（reasons of governability）。在一些国家，议会制失败后，为了避免议会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弱点，就引进了半总统制。第三种情况是权力分享的制度安排（power-sharing arrangement）。实行半总统制，是希望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实现权力平衡。^②乌克兰选择半总统制，是与历史延续、民主象征和权力制衡和当时的大气候等因素有关的。日本学者松里公孝认为，选择半总统制，有历史延续性、战略—管理功能分离、限制总统权力过大、防止议会选举总统的弊端、保留民选总统更加民主以及符合民众参与政治的愿望等六方面原因。^③同时，他还指出，该地区不同国家选择半总

① 体制僵化（rigidity）主要是指民选总统在其任职期间，即使他执政出现很多问题，一般也不会因此而下台。零和选举（zero-sum elections）是指在总统竞选中针锋相对的侯选者以“赢者通吃”上台（即使他只获得51%的选票而上台，但却获得了总统的所有权力）。双重合法性（dual legitimacy）是指总统和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样容易发生双头冲突，而议会不能对民选的总统以不信任投票而使其离职，这将促使总统在冲突中采取强硬而不是妥协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参见 J. Linz,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0, Vol.1, No.1, pp.51-69.

② Robert Elgie, “A Fresh Look at Semipresidentialism, Variations on a them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5, Vol.16, No.3, pp.98-112.

③ 具体来说：（1）半总统制和共产党中央与政府之间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之间，存在相似性；（2）戴高乐主义者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很容易被理解和应用；（3）即使宪法赋予议会任命总理的权力，但由于议会选举结果往往并非自动产生多数派，在此情况下，总统就会拥有足够干预总理产生和内阁形成的机会（立陶宛和后橙色革命时期的乌克兰）；（4）在由选民直选总统体制向议会选举总统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对议会选举产生总统所设的条件往往会增多（比如，不是简单多数，而是3/5的通过方式），而这通常会致总统长时间的空缺（1990年代的斯洛伐克和2009年以来的摩尔多瓦）；（5）民选总统看起来更加民主，且更能顺应选民影响国家政治的愿望；（6）最后，半总统制国家政客们的“演技”，使得他们国家的政治能够“娱乐”那些不愿放弃进入“半总统制剧场”门票的民众。参见松里公孝：“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第48页。

统制的原因是有所差别的。^①波兰、立陶宛和斯洛伐克，这些国家之所以选择半总统制，主要是他们更希望有一个强力的总统来平衡议会的多数政治，同时也希望政治精英之间互相制约。^②前苏联国家选择半总统制度，是因为半总统制中的总统与内阁的分工，和苏联时期共产党与政府的分工，有类似之处——分别承担国家的战略功能和管理功能，因而具有历史延续性。^③

但实际上，前苏联地区国家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中亚国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最初都选择了总统制；前苏联地区其他国家，多数则基本上采取了半总统制。中亚几国的总统制，由于总统过度集权而不断受到国内各方面力量的冲击。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就在 2010 年放弃总统制而实行议会制。而乌克兰则不仅由于宪法本身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也由于国内长期存在着“亲俄”、“亲欧”势力的较量，^④从而使其宪法和政体出现过多次反复。

半总统制国家的一个著名制度性难题，就是总统和总理之间的矛盾。总统为选民直接选举，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和事实上的权威性。而总理为总统和议会双重选择，由于总统和议会议员都是民选的，因此总理具有双重的间接合法性。两个合法性的权威同时出现在行政系统，就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在半总统制的两个基本分类——总统议会制和总理总统制国家之中都无

① Kimitaka Matsuzato, “Differing Dynam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cross Euro/Eurasian Borders: Ukraine, Lithuania, Poland, Moldova, and Armenia”,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06, Vol.14, Issue 3, pp.317-345.

② Kimitaka Matsuzato, Liutaurus Gudžinskis, “An Eternally Unfinished Parliamentary Regime? Semipresidentialism as a Prism to View Lithuanian Politics”, *Acta Slavica Iaponica*, 2006, Tomus 23, pp.146-170.

③ 该观点最早来自著名的政治学家迪维尔热，参见 Maurice Duverger, *Les 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3, p.115. 转引自 Kimitaka Matsuzato, “Differing Dynam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cross Euro/Eurasian Borders: Ukraine, Lithuania, Poland, Moldova, and Armenia”.

④ 在 1991—2013 年期间，乌克兰国内一直存在着以东部和南部为基础的“亲俄派”，和以西部和中部为基础的“亲欧派”之间的较量。例如 2005 年乌克兰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那年针对“是否同意加入欧盟和北约”搞全民公决，46%的人会同意，54%的人会反对，参见 Валерій Хмелько. Ставлення громадян України до її вступу до Євросоюзу і НАТО та їхні оцінки своєї обізнаності стосовно цих організацій// Соціологія: теорія, методи, маркетинг. 2006. №.1.

法避免。^①在总统议会制国家，总统可以提名任命总理，并能单方面解雇总理；总统可以通过威胁解雇总理而迫使后者屈服，但总理未必总是屈服。这就使行政内部发生了矛盾，结果可能导致总统撤换总理。在总理—总统制国家，只有议会才能罢免总理，所以总理只要得到议会多数支持，他就不会因为对抗总统而下台，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了总统与总理对抗的可能性。^②

不幸的是，学者们对总统制、总统议会制和总理总统制的负面评价，每每在乌克兰成为事实。乌克兰政体在独立之初，可以说是一种不成熟的总统制。自1996年宪法制定后，乌克兰转变为总统议会制。而在2004年宪法生效（2006年）后，转变为总理总统制。此后在2010年、2014年，又分别出现了两次反复。^③我们将重点分析在乌克兰不同宪法下的政体，存在着什么问题。

① 总统议会制和议会总统制是国内对乌克兰政体所采用的名称。但议会总统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总理总统制。至于半总统制如何细分为次级制度类型，西方学者有不同看法。迪维尔热将半总统制区分为“表面上的”（apparent）半总统制和“实际上的”（effective）半总统制；斯卡奇（Skach）将半总统制划分为三类：（1）联合多数政府（总统和总理都属于议会多数党派）；（2）分裂多数政府（总理属于议会多数党派，总统则不属于）；（3）分裂少数政府（总理和总统都不属于议会多数党派）。舒戈特（Shugart）将半总统制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总理总统制（premier-presidential system，总统和总理分权，总理受议会控制）；总统议会制（president-parliamentary system，总统和议会分权，总理受总统控制）。埃尔吉根据总统在政治中的地位，将半总统制分为三种类型：（1）“高度总统化”（highly“presidentialized”）的半总统制；（2）仪式性总统（ceremonial presidents）的半总统制；（3）总统总理分权的半总统制。参见 M. Duverger, “Le concept de régime semi-présidentiel”, in Duverger (ed.), *Les régimes semi-présidentie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6, pp.7-17; Cindy Skach, *Borrowing Constitutional Designs: Constitutional Law in Weimar Germany and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Introduction, pp.1-12; Matthew S.Shugart, “Semi-Presidential Systems: The dual Executive and Mixed Authority Patterns”, *French Politics*, 2005, Vol.3, No.3, pp.323-351。笔者认为，舒戈特的划分方法比较科学，也符合我国对乌克兰政治体制的理解，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这种分类方法。

② G. Sartori,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2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pp.153-154.

③ 托马斯·塞德柳斯（Thomas Sedelius）2010年指出，乌克兰在1991—2006期间为总统议会制，而2006年宪法修改后为总理总统制。这种说法粗略来看也不算错，但不够准确。因为在1991—1996期间，乌克兰没有正式宪法，其政体也未定型，但从当时的“宪法草案”及其权力运作来看，它属于总统制而不是总统议会制。Thomas Sedelius, Joakim Ekman, “Intra-executive Conflict and Cabinet Instability: Effect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0, Vol.45, No.4, pp.505-530.

二、乌克兰1992年宪法草案框架下的总统制政体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Supreme Soviet of the Ukrainian)通过“乌克兰独立法案”,宣告乌克兰独立。1991年12月1日,凭借长期在前苏联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从政资历,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以61.6%的得票率、领先第二名38.3%的压倒优势,在乌大选中当选为乌克兰第一任总统。^①同日举行的全民公决赞同乌克兰独立。

1992年3月,乌克兰最高拉达(即乌克兰议会)出台乌克兰宪法草案。该宪法草案在1992年7月、1993年10月经过细微的修改,^②但由于国内各方分歧很大,始终未能正式通过。

1992年宪法草案是一部很不成熟的总统制宪法,带有浓厚的苏联时代色彩。不仅因为其长度远远超过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新宪法;而且,在其231个条文中,有大约50条,基本是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78年宪法照抄而来。^③该宪法条文,还“充斥着政策声明而非创建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及权力”。^④从确立的政体来看,其总统制具有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特征。第一,政府高度集权。尽管宪法规定取消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宣布实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第10条),但宪法更多地论述政府“权

① “Kravchuk elected president of Ukraine”, *The Ukrainian Weekly*, 8 December 1991.

② 1992年7月的改动,主要是将1992年3月确定的议会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同时将任命法官的部分权力从总统转移至议会;1993年10月的修改,进一步增加了议会对法官的任命权。修改虽小,但从这三个宪法草案来看,乌克兰也认识到权力过度集中于总统的弊端而试图削弱总统权力,只是没有实质性变革。由于宪法改动较小,本文仍称“1992年宪法草案”,或将三个草案统称为“宪法草案”。乌克兰1992—1993期间的宪法草案原文,有乌克兰文版本而未发现英文版本,乌克兰文版本参见 <http://zakon4.rada.gov.ua/laws/show/2525-12/page>。对其介绍可以参见 David Lempert,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Continuity Under the Banner of Change: With a Model Constitution for Authoritarian to Democratic Transitions”,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1993, No.2; Keenan H. Hohol, “The draft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an overview”,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 Studies*, January, 1994; Bohdan A. Futey,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A Legal Perspective”,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1994, No.4.

③ David Lempert,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Continuity Under the Banner of Change: With a Model Constitution for Authoritarian to Democratic Transitions”.

④ Gregory H. Stanton,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 Constitu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1992, No.1.

力”，而非人民“权利”。其中“国家权力”部分就包含了110个条款，而涉及到“公民权力”的和“公民权利”的却只有少数几个条款。国家成立了各种机构控制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部门。代替克格勃而新成立的“国家安全部”（the State Security Service）拥有重大权力，继续对公民进行秘密监控，人民权利受到很大限制。^①第二，总统“专政”。总统不仅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国家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同时还掌握着至高无上的行政权以及和议会分享立法等权力。具体来说，总统具有的重要权力包括：掌控武装部队和国家安全部，任命及罢免总理，组建内阁，发布行政命令，可以在经济领域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总统令，任命全国所有的法官和检察长，任命中央政府重要官员和地方政府领导人。总之，总统在权力制衡中处于核心地位。^②这么大的权力，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权力，并且几乎不受到制衡与约束。这种总统“专政”将导致“独裁制度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建立起来……在几个小时之内，所有的政治对手都将遭到逮捕，并受到总统任命的检察长和法官的审判”。^③

虽然该宪法草案最终未能通过，但它的存在对国家机构的运行，尤其是总统权力的运作发挥了参照物的作用。尽管克拉夫丘克在担任总统期间为人谨慎、内敛、精明，但由于宪法肯定了“超级总统”的存在，以及克拉夫丘克本人长期的集权作风，使总统几乎掌握了全部的行政权。总理实际上变成其助手和秘书式的角色，而碎片化的议会无法对此进行实质性的制衡。^④克拉夫丘克在他的任期内，任命了四个总理并撤换了三个。其中一个被他撤换

① David Lempert,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② Kataryna Wolczuk, *The Moulding of Ukraine: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CEU Press, Budapest, 2001, p.113.

③ David Lempert,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Ukraine...”在分析乌克兰宪法条文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总统的权力过大，参见 Kataryna Wolczuk, *The Moulding of Ukraine: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p.113; Bohdan A. Futey,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A Legal Perspective”.

④ 乌克兰和中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在冷战结束后，议会出现了“碎片化”倾向。尽管新选举法规定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是获得全部选票的5%以上（2011年以前曾实行过3%的门槛），但议会内部常常至少有5-6个政党，有时多达10个以上。一般需要两个以上政党联合才能形成议会多数，或叫执政联盟、执政多数。由执政联盟推选总理，而这种执政联盟又常常不稳定。“碎片化”的议会削弱了议会制衡总统的能力。

的总理，就是不久后成为乌克兰第二任总统的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库奇马就任总理之后准备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他曾经请求总统和议会给予他领导的内阁颁布行政命令的权力，同时掌管国家银行、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国家私有化基金会等机构。但遭到总统的断然拒绝，克拉夫丘克无法接受自己任命的总理来逼迫自己交出重要权力。库奇马就任总理不到一年，因无法施展手脚，以“改革速度太慢”为由辞职。^①最终这位具有雄心壮志的总理和乌克兰其他总理一样，给人以“虎头蛇尾”之感。

三、乌克兰1996年宪法框架下的总统议会制政体

1994年库奇马（Kuchma）当选总统之时，宪法尚未确立，他抓紧机会通过法律途径扩大其权力。上台之初他就出台一项法令，禁止政府在没有总统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制定任何经济政策。该法令还扩大了总统的任命权。虽然在任命总理时，总统需要征得议会的同意，但他可以单独任命其他内阁成员，以及中央国家机构中所有的部长和副部长，这使他能够撤换2/3的副部长以上的官员。他经常绕过总理，直接指挥其任命的部长和副部长，这使总理成了次要的角色。^②为了进一步在事实上控制政府，他还扩充了总统班子的权力，使其扮演行政机构决策的监督者角色。

在他执政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扩权行动，是推动“国家与地方政府权力法案”（以下简称“权力法案”）的通过。^③该法案赋予总统诸多权力：总统可以组建内阁；总统可以组建司法机构、任命宪法法院一半法官；任命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主席和任命全国所有法官；任命乌克兰国家银行行长、地方行政机构地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

“权力法案”在议会遇到了空前的阻力。议会经讨论，出台了一个稍加

① “Profile: Leonid Kuchma”, BBC, 29 October 1999.

② Charles Wise, Trevor Brown,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999, Vol.32, No.1, pp.23-44.

③ 全称为“国家与地方政府权力法案”（On state power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该法案于1994年11月公布，1995年6月8日正式出台。法案将作为宪法出台前的临时法，同时也是未来宪法的依据。

修改的新权力法案版本。但议会在 1995 年 5 月 30 日二读投票时，该版本未能获得超过 2/3 的“宪法多数”。为了给议会施加压力，次日，库奇马发布一个法令，要求就人民对总统和议会的信任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议会当时威望不高，全民公决必将是总统获胜，从而使立法机关进一步失去对行政政策的影响。^①1995 年 6 月 8 日，议会只得通过“权力法案”，同时出台了一个宪法协议（Constitutional Accord）。宪法协议在基本满足了库奇马要求的基础上，也给议会保留了一些次要权力，包括任命总检察长、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院长、国家银行行长等。同时，宪法协议强调，这只是在新宪法出台之前临时有效，而新宪法应在一年内出台。^②

1996 年 3 月，宪法草案在 1995 年 6 月“权力法案”的基础上脱胎而出。由于起草宪法的宪法委员会成员基本都是由库奇马任命的，因此宪法草案保留了“权力法案”赋予总统的所有权力。议会多数议员反对继续维持一个“超级总统”的存在，但库奇马在议会一读和二读前，均威胁要举行全民公决表决宪法草案，使议会不得不让步。经过细微修改后，在 6 月 28 号通过了宪法草案。其修改的内容，主要是不同意成立两院制；不给予总统在议会不同意其提名的总理时解散议会的权力，但保留了总统解散议会的一种情况：若议会在一个月内未召集会议，可解散议会。库奇马并不满足于此，继续对议会施压。最后，双方在宪法之外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总统不能实质性地享有解散议会的权力，但他可以对行政事务（尤其是人事任免）单独作出决定，而不需要与议会和总理协商。^③1996 年宪法实际上确立的是半总统制中的总统议会制。与 1992 年宪法草案相比，总统权力虽然有所削弱，但仍然十分巨大。埃尔吉将 1996 年宪法之下的乌克兰政体，称为“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highly “presidentialized” semipresidential systems）。^④总统权力的扩

① Charles Wise, Trevor Brown,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Ukraine”, p.33.

② 关于“权力法案”和“宪法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出台始末，参见 Rejn Avovič Müllerson, Malgosia Fitzmaurice, Mads Tønnesson Andenæs(ed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8, pp.44-48.

③ Kimitaka Matsuzato, “Semipresidentialism in Ukraine: Institutional Centralism in Rampant Clan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Vol.13, No.1, pp.51-52.

④ Robert Elgie, “A Fresh Look at Semipresidentialism, Variations on a them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5, Vol.16, No.3, pp.98-112.

大是以议会，尤其是以总理权力的缩小为代价的。库奇马时期，他往往让总理成为人民不满的替罪羊，不停地更换总理。^①在他十年执政期间，共出现7位“短命”总理。总理一旦与总统发生冲突，最终总是被迫辞职。他不仅将行政大权独揽，还压制媒体自由，打击政治对手，并被指涉嫌谋杀《乌克兰真理报》著名反对派记者贡加泽。2005年1月，这个曾经的政治强人，在众叛亲离中以悲情的角色离开了总统宝座。1996年宪法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在橙色革命之际，代替1996年宪法的新宪法，于2004年12月8日正式出台，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

2010年2月就任总统的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指责2004年对宪法的修改，造成了“权力失衡与严重的权力危机”，^②并力图修改2004年宪法。但修宪必须获得2/3“宪法多数”的支持，这使亚努科维奇一直未能如愿。于是他绕开议会，走宪法法院的途径。他一边通过其心腹，宪法法院法官卢卡什（Olena Lukash），在法院吹风，指出2004年宪法“只是政治协议，它违反了宪法程序”。^③同时，亚努科维奇积极控制宪法法院，撤消了两个可能反对他的法官的职务。^④2010年10月1日，经宪法法院18名法官表决，认定2004年修宪违宪，恢复1996年宪法，使1996年宪法进入第二个生效周期。然而就在这之前的两年间，宪法法院还认为2004年宪法是乌克兰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⑤不少反对派认为，恢复1996年宪法，意味着乌克兰重新回到独裁时代。^⑥但反对派不足以形成否决宪法法院裁决所需要的2/3多数。

① E.g. A. Wilson, “Ukraine”, in Elgie,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p.265.

② “State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Viktor Yanukovich”, June 28, 2010, <http://www.president.gov.ua/news/17506.html>.

③ “U Yanukovycha ziznalys, sho Regiony porushyly Konstytutsiyu”, *Ukrainskaya Pravda*, September 23, 2010. 转引自 Serhiy Kudelia, “If Tomorrow Comes: Power Balance and Time Horizons in Ukrain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3, Vol.21, No.2.

④ Mustafa Nayem, “Sudebna nenasytnist na sluzhbi Vitkora Yanukovycha”, *Ukrainskaya Pravda*, September 14, 2010. 转引自 Serhiy Kudelia, “If Tomorrow Comes ...”

⑤ “Opinion on the Constitutional Situation in Ukraine”, Adopted by the Venice Commission, December 17-18, 2010.

⑥ “Update: Return to 1996 Constitution strengthens president, raises legal questions”, *Kyiv Post*, October 1, 2010.

四、乌克兰 2004 年宪法框架下的总理总统制

2004年10月，乌克兰发生了总统竞选舞弊丑闻，地区党候选人亚努科维奇被指通过舞弊手段，击败了“我们的乌克兰”候选人尤先科赢得选举。2004年11月22日，对选举结果不满的人们聚集在基辅独立广场，举行大规模的抗议、静坐、大罢工。其他城市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抗议事件，橙色革命爆发。2004年12月初，修改宪法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12月8日，议会以402票（总议员数为450人）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新宪法。2006年1月，新宪法生效，乌克兰政体也随之转变为总理总统制。总统议会制和总理总统制的实质区别在于，总理由总统任命还是由议会任命。从这点来看，乌克兰2004宪法的确实实现了政体的变革，因为总理的任命权和罢免权已经由总统转移到了议会。同时，对总统负责的总理（及内阁），也转变为主要向议会负责。相对于1996宪法，2004宪法规定的总统、议会、总理（内阁）三方权力的变化参见下表：

权力方	1996年宪法权力	2004年宪法权力（变化）
总统	提名、（经议会同意）任命总理及罢免总理；确定是否接受总理辞呈；经总理提名任免内阁成员及其他重要官员；撤销内阁决议；在议会一个月未召开全体会议的情况下可解散议会。	经议会建议提名总理（不再享有罢免总理权力）；任命内阁中的外长和国防部长；有三种解散议会的情况。 ^①
议会	总统提名总理（内阁）及其他重要官员，需要经过议会同意；可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决议迫使内阁倒台。	总统按照议会建议提名总理，再由议会任命；总统提名内阁中的外长和国防部长，经过议会同意后再任命；通过对内阁不信任决议而迫使内阁倒台；确定是否接受总理及其他内阁成员的辞呈。
总理（内阁）	内阁为最高行政组织；提名内阁成员及其他重要官员，经总统同意后任命。	内阁为最高行政权力机构 ^② ；提名除外长和国防部长外的内阁成员；任命和罢免中央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包括各部部长、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主席，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领导人等。

① 根据2004年宪法第90条，总统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解散议会：（1）议会在一个月内无法组建执政多数时；（2）在内阁辞职后60天内无法组建新的内阁时；（3）在30天内议会未召开全体会议的情况下。这三个情况使总统权力，尤其是其在宪法框架内的威望，大大提高。

② 关于内阁地位，1996年宪法（第113条）的措辞（英译）为：the highest body in the system of bodies of executive power；2004年宪法（第113条）的措辞（英译）为：the highest authority within the system of executive power。

在1996年宪法之下，总统处于权力中心，议会次之，总理再次之。达沃·博班(Davor Boban)将三者关系称为“等级型”关系。在2004年宪法之下，总统权力有所削弱，而议会及总理权力明显扩大，三者虽然权力不完全平等，但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制衡与分权的特征。因此，达沃·博班将三者关系称为“交易型”关系，尽管议会和总理之间还是“等级型”关系。^①

然而，如果只看三者之间制衡关系的变化，还难以客观、全面地理解1996年宪法和2004年宪法背景下的权力运作。达沃·博班对2004宪法下的总理总统制的看法明显过于乐观了。如果从整部宪法来看，总统仍然保持了巨大的权力，总统不仅能继续驾驭议会和总理，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驾驭司法。因为总统权限除了在对总理及内阁的任免权上有所变化外，其他方面只是作了微小的改动。在很多方面，甚至完全没有改变。问题的核心——总统权力过大——仍然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总统保持了以下方面的重要权力：（1）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任免乌克兰武装部队高层官员（第106条第100款）；（2）可以就修改宪法和表决公共提案举行全民公决（第106条第89款）；（3）具有重大任命权：任命内阁中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第106条93款，第114条），在国会同意后任免总检察长（第106条第94款）；任免乌克兰国家银行委员会一半官员（第106条第95款），任免乌克兰全国电视广播委员会一半官员（第106条第96款），任免宪法法院1/3的法官（第106条第105款）；（4）驳回议会通过的法案（议会要再次通过必须达到2/3）（第106条，第113款）；（5）内阁需要向总统和议会双头负责（第113条），行政决议需要总统签署（第106条），总统还可以发布行政命令（第113条）；（6）召开特别议会会议的权力（第83条）；（7）总统享有立法倡议权（第93条）；（8）2004年宪法规定了三种总统解散议会的情况

^① Davor Boban, “‘Minimalist’ concept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re Ukraine and Slovenia semi-presidential states?”, *Politička misao*, 2007, Vol.XLIV, No.5, pp.155-177.

(106条91款、第90条第51、52、53款)；^① (9) 总统有权就宪法修改问题和公共提案通过问题发起全民公决；(10) 可以驳回议会议案，最终达到否决的效果。^②

这些权力，比起多数总理总统制国家，如芬兰、波兰，要大得多，主要是任免权大，同时保留了发起全民公决和否决议会法案等重要权力。^③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04年宪法还存在另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比1996年宪法更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是总统解散议会的可能性增加了。2004年宪法将1996年宪法总统解散议会的情况，从1种增加为3种。表面上看起来，这3种情况似乎都是总统在某种情况下例行公事而解散议会。实际上，却使总统的权威大大增加。而且，总统还可能有意通过某些途径或权谋，促使解散议会的某种情况出现，从而解散议会。而乌克兰议会和总理又是绑定的，议会解散，必然导致由议会执政多数推举的内阁倒台，总理下台。在2007年和2008年，尤先科曾经

① 1996年宪法规定总统可以在一种情况下解散议会(第90条)：当议会在一个月内未召集全体会议时，总统可以解散议会。2004年宪法又增加了两种总统解散议会的情况(第90条)：(1) 当议会无法形成联合执政多数，总统可以解散议会；(2) 当内阁辞职后，新内阁无法在60天内组建时，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总统解散议会的限制条件未变：解散前总统必须和议长、副议长以及议会各党团主席商议。经过特殊的提前选举选出的议会，总统在一年内不得解散；在某届议会最后6个月内，或者总统任职的最后6个月内，总统不能解散议会。笔者认为，总统解散议会的情况的增加，虽然并没有实质上增加总统多少权力，但却大大增加了总统的权威。

② 乌克兰2004年宪法规定(第94条)，总统可以将议会提交给总统签字的法案返回议会重新考虑，议会如果以2/3的多数再次通过该法案，则总统必须签署；如未能以2/3多数通过，则法案失效。

③ 波兰总统也可以发起全民公决，但必须经过议会多数同意(波兰宪法第125条第223款)。而乌克兰总统不需要通过议会同意。芬兰则只有议会才能发起全民公决(芬兰宪法第53条)。芬兰宪法规定，芬兰总统如果拒绝签署议会通过的法案，则该法案将重回议会，议会重新考虑后，即使不进行修改，也可以通过该法案而不再需要总统批准(芬兰宪法第77条)。波兰总统可驳回议会通过的法案，但议会如果以3/5的多数再次通过，总统必须签署(波兰宪法第122条第217款)。

两次使用过这个手段，迫使亚努科维奇内阁倒台及季莫申科内阁屈服。^①

第二是 2004 年宪法新引进了所谓的“强制条款”（Imperative Mandate，第 81 条）。^②该条款规定，禁止议员在议会投票时“逃离”本党，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绑定条款”。议会议员只能以一个党团的整体态度一致投票。该条款限制着议会党团之间的自由合作，任何党派在议会中都难以吸引更多议员以巩固、扩大自身的力量。当内阁倒台时，议会几乎不大可能在一个月內寻找到新的执政联盟，这样很可能让总统抓住机会解散议会。其结果必然是议会的羸弱，以及议会党派中少数几个党派领导人作用的凸显。

第三，1996 年宪法，总理只需要对总统单头负责，而在 2004 年宪法之下，总理虽然主要受议会任免和监督，但却要同时对总统和议会双重负责（第 113 条）。^③此外，1996 年宪法规定，内阁行动受乌克兰宪法、法律和总统法案的指导。而 2004 年宪法规定，内阁行动受乌克兰宪法、法律和总统命令及议会决议的指导（第 113 条）。^④

① 2007 年，尤先科以议会执政多数违反宪法为由解散议会，明显超出了 2004 年宪法规定的总统可以解散议会的三种情况，因而受到质疑。后来此事移交宪法法院裁决，但尤先科为了使宪法法院的裁决对自己有利，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突击解除 3 名宪法法院法官职务，使宪法法院不再裁决。最终使总理亚努科维奇决定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亚努科维奇内阁倒台。2008 年，尤先科虽然未找到解散议会的合法理由，但他却利用他所在的党“我们的乌克兰”的影响力，宣布该党退出与总理季莫申科组成的所谓“橙色革命”执政联盟，使“季莫申科集团”在议会无法形成多数而面临内阁倒台的危机。最终由于经济危机而渡过了政治危机，但季莫申科此后极力避免与总统发生冲突。

② 2010 年 10 月 5 日，乌克兰取消了该条款。但 2014 年恢复 2004 年宪法后，该条款将再度生效。

③ 此项规定在 1996 年宪法第 113 条的英文文本中表述为：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of Ukraine is responsible to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and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and accountable to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within the limits envisaged in Articles 85 and 87 of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2004 年宪法第 113 条英文表达为：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of Ukraine is responsible to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and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as well as under the control of and accountable to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within the limits provided for by this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④ 此项规定在 1996 年宪法第 113 条的英文文本中表述为：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of Ukraine is guided in its activity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Ukraine and by the acts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2004 年宪法第 113 条英文表达为：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of Ukraine is guided in its activity by this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Ukraine and also by decrees made by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and resolutions made by of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Ukraine.

第四，同时，尽管任命和罢免总理的权力从总统移交给了议会，但并不因此断定总统在任命和罢免总理及内阁时没有任何权力；^①在行政系统内部，由于总统和总理没有明确的分权，^②使得总统总是能利用自身的优势迫使总理下台或屈服。

这些新变化，使2004年宪法下的总统权力和总统、议会、内阁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此外，总理的“上司”模糊，总统总理权力分界模糊。这些都使2004年宪法可能带来的问题，变得难以预测。乌克兰政治学院院长邦德仁科（Bondarenko）教授指出，2004年宪法的采用，会将乌克兰国家带入到混乱局势之中，因为它包含着大量的法理冲突，它不可能运行良好。它不完善，必须改革。^③

① 对于总理的任命，2004年宪法第114条规定的程序是，议会提出总理人选建议，然后总统正式提出总理人选，再由议会任命。至于总统能否在该过程中实行否决权，宪法并未明确。实际上，总统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无所作为，尤其是对于一个强势的总统而言。例如，当2006年3月议会执政联盟向总统尤先科提出亚努科维奇为总理建议人选时，尤先科并不支持。他借机要求议会领导人与他共同签署“国家统一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National Unity），以亚努科维奇阵营同意融入欧盟和北约作为条件，换取尤先科支持亚努科维奇就任总理。尽管这是尤先科在无奈之下的一个妥协（Steven Lee Myers, “Ukraine Leader Forms Alliance With Rival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2006），但笔者认为，尤先科在此利用了宪法漏洞，有效地将程序性权力转变为实质性权力，因此有必要将总统的同意权界定得更清楚。在罢免总理方面，虽然总统不能再直接罢免总理，但根据2004年宪法第87条，总统具有建议议会出台对内阁不信任的决议的权力，从而解散内阁。第87条的英文版本为：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on the proposal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or no fewer People's Deputies of Ukraine than one-third of its constitutional composition, may consider the issue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of Ukraine and adopt a resolution of no confidence in 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of Ukraine by the major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mposition of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② 关于总统和总理在行政领域的分权，同样属于总理总统制的波兰和芬兰宪法比乌克兰宪法要明确得多。波兰宪法第10条第8款强调：行政权力应由总统和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共享；第146条第263款指出，部长会议负责实施（conduct）波兰内政和外交政策；第133条第246款指出，在外交政策领域，总统应与总理及相关部长合作。根据第10条第8款，总统可以和总理共享行政权，但根据第146条第263款和第133条第146款，总统应侧重于外交政策领域。芬兰宪法虽然规定，行政权力由总统和政府共享（第3条），但在其他条款中，基本是赋予总理以较大权力而总统只有十分有限的权力。总统的有限权力主要体现在外交领域，而即使在外交领域，芬兰宪法也规定（第93条）：“芬兰总统在与政府合作的情况下负责芬兰外交政策”。而2011年宪法经过一定修改后，芬兰的对欧盟政策，也明确规定由总理负责（第66条），总统权力进一步缩小。

③ Bondarenko. Конституция 2004 года ввергнет страну в хаос-политолог. <http://kr.ua/politics/435565-konstitutsiya-2004-hoda-vverhnet-stranu-v-khaos-polytolo>

五、乌克兰总统议会制与总理总统制的现实运作案例

乌克兰在1996年宪法下的政体，实际上是库德利（Serhiy Kudelia）所说的“超级总统制”（super presidential system）。^①或者是埃尔吉所说的“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highly “presidentialized” semipresidentialism）。^②其问题在于总统权力巨大，能够完全驾驭议会和内阁，从而单独决定国家的内政外交，演变为独裁。而在2004年宪法之下，则可以说是“总统化”的总理总统制。总统仍然拥有重大权力，它可能隐晦地实现“超级权力”，同时由于分权不清楚，总统、内阁和议会之间的争斗会变得更为激烈，从而导致国内政治危机。以下是两部宪法在运行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1）**亚努科维奇的“柔性独裁”**。2010年10月，亚努科维奇在成功废除2004宪法、恢复1996宪法后，权力大大增加。在他的敦促之下，议会不久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总统权力的法案，包括《地方政府选举法》、《选举法》、《全民公决法》等。这些法律进一步扩大了总统权力：总统可以任命部长、副部长、安全部队的各级职位；总统可以向政府和某个部门发布强制执行的命令，而政府必须严格按照总统计划去实施；议会解散政府的功能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总统可以决定是否接受政府辞职。《全民公决法》还给予总统就宪法修改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权力。如果获得公众多数支持，他可以单方面颁布对宪法的修正。该法律暗示着总统可能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修改宪法或者否决议会对宪法的修改。乌克兰再度回到“超级总统制”，而此时的总统权力甚至超过克拉夫丘克和库奇马。超级总统制导致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权力自我强化的制度，其他行为者除了追随之外，很难有其他选择。”^③

在改变宪法之后，亚努科维奇进一步将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进行无限扩张。最终使他几乎能完全左右整个国家，可以不顾议会、总理（内阁）、人民的意见。这种带有浓厚的“超级总统制”色彩的政体，是一种畸变的总统

① Serhiy Kudelia, “If Tomorrow Comes: Power Balance and Time Horizons in Ukrain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② Robert Elgie, “A Fresh Look at Semipresidentialism: Variations on a Theme”.

③ Serhiy Kudelia, “If Tomorrow Comes: Power Balance and Time Horizons in Ukraine’s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议会制，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总统能够随意修改法律，随意打击政治对手，压制媒体自由。亚努科维奇虽然强调“融入欧洲仍然是乌克兰内政外交的绝对优先事项”，^①实际上却不顾国内亲欧民众的诉求和“融入欧盟”的基本外交战略，^②屡屡做出令乌克兰人震惊的“壮举”，例如：签署“哈尔科夫协定”（Kharkiv Agreement）；宣布不与北约等形成结盟关系；承认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乌克兰的大批民众死亡事件为饥荒而不是民族屠杀；在2013年11月突然终止签订2012年3月就已经确定的欧盟与乌克兰联系国协定等。

乌克兰基辅莫吉拉学院（Kyiv-Mohyla Academy）教授奥勒克西·哈郎（Olexiy Haran）指出，在2010年以后，亚努科维奇实际上已使乌克兰走向了“柔性独裁”（soft authoritarianism）。^③他极大地利用并扩张了宪法赋予的权力，甚至超越宪法，其他机构也无法阻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是利用了宪法的不完善，在宪法框架下实现了柔性独裁，这使亚努科维奇的内外方针越来越脱离民众。他的做法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早在他执政初期，乌克兰就出现了由官方学者和民间专家组成的“宪法阵线”，他们要求对1996宪法进行改革，并力图在2014年出台新的宪法草案。^④2013年11月21日，亚努科维奇要求政府拒绝签署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定，引爆了乌克兰又一次大规模骚乱。

① “The transcript of the speech by V. Yanukovych on June 21, 2011, to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http://www.coe.int/lportal/web/coe-portal/speech-yanukovych>

② 20年来，尽管各个时期有所差异，但总的来看，乌克兰民众越来越呈现出“靠拢欧盟”的愿望。在亚努科维奇时期，尽管他执行亲俄远欧的对外政策，但调查显示，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认为欧盟是乌克兰外交的优先选择的比例，仍然逐年上升。在中部和西部，这个比例上涨的幅度更大。同时，有47%—50%的人支持加入欧盟。当然，西部和中部的支持率远比南部和东部高。但是，18—29岁的年轻人支持加入欧盟的比例高达60.1%，这在西部、中部和东部、南部之间没有明显差异。2009年11月，52%的乌克兰人认为，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乌克兰对外关系的优先事项；在2012年2月，下降为31%。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关系的人从2009年11月的78%下降为2012年2月的50%。参见 Armandon Emmanuelle, “Popular Assessments of Ukraine’s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European Union Under Yanukovych”,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3, Vol.21, Issue 2, pp.289-308.

③ Olexiy Haran, “From Viktor to Viktor: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1, Vol.19, No.2.

④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їни № 328/2012 Про Конституційну Асамблею, 17 травня 2012 року, <http://president.gov.ua/documents/14752.html#328skl>

(2) 尤先科与 2007 年乌克兰政治危机

2004 年宪法生效后，它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那样促进乌克兰的民主转轨，而是不断引发政治危机。2006 年 8 月，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就任总理后，立即与亲西方的尤先科发生了激烈冲突。2006 年 9 月 14 日，亚努科维奇在访问布鲁塞尔时宣布，乌克兰将推迟与北约签署“成员国行动计划”（membership action plan）。尤先科对此非常恼火，指责其背叛了 2006 年 8 月 3 日由尤先科、亚努科维奇及议会主要政党领导人签署的《国家统一宣言》。在总统和国内压力之下，亚努科维奇不久访问了欧盟，并希望欧盟考虑乌克兰的入盟问题。然而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Benita Ferrero-Waldner）告诉他，欧盟此时并没有继续扩大的打算，这给尤先科派以沉重的打击。^①亚努科维奇的远欧亲俄外交，在不经意中增加了合法性。

此后，亚努科维奇不断拒绝签署总统行政命令，^②同时越过总统和外长^③，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就成立共同经济区，以及俄罗斯参与乌克兰天然气运输体系等问题进行谈判。

随着双方矛盾的升级，2007 年 4 月 2 日，尤先科以总理亚努科维奇为首的议会多数派通过宪法途径吸收反对派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为借口，签署法令宣布解散议会，并初步定于 5 月 27 日举行新的议会选举。而议会多数派及亚努科维奇为首的政府却指责总统法令违宪。在双方争执不下时，决定将总统法令提交宪法法院进行违宪裁决。4 月 30 日，在宪法法院即将裁决之前，尤先科突然宣布撤换宪法法院的两个法官，但宪法法院认为总统决定无效而拒绝了总统的命令。5 月 16 日，尤先科再度发布法令撤换这两名法官，两名法官只好暂时离职。虽然后来两名法官都先后复职，但宪法法院在尤先科的干预下，宣布不再就总统行为是否违宪进行裁决。

2007 年 5 月 24 日，尤先科采取进一步行动，解除亲地区党的总检察长

^① Jeffrey Simon, “Ukraine needs to decide its strategic alignment”,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2009, Vol.9, No.3, pp.367-382.

^② 根据 1996 年宪法第 106 条，总统命令必须经过总统和总理“双签”才能生效，2004 年宪法保留了该条。

^③ 根据 2004 年宪法第 114 条，内阁中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由总统提名，议会任命；内阁的其他成员由总理提名，议会任命。因此，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倾向于支持总统而不是总理。

皮斯昆（Svyatoslav Piskun）的职务，由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检察长维克多·申姆虎克（Viktor Shemchuk）代替。此举遭到执政联盟的反对。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内务部长图申科（Vasyl Tsushko）派士兵包围了总检察院，阻止新总检察长上任。尤先科命令图申科召回其部队，但遭到拒绝，乌克兰再次陷入政治危机。^①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总统、总理和议长三方达成妥协，同意于2007年9月30日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在本案例中，尤先科认为议会执政联盟采取非法途径扩张势力范围，从而解散议会，这实际上超出了宪法规定的总统可以解散议会的三种情况。虽然其合法性遭到议会和内阁质疑，但一个民选总统决定解散议会，令议会的执政联盟和内阁处境尴尬，最后不得不提交宪法法院裁决。而宪法法院虽然有违宪审查权（第147条、第150条），但由于总统可以任命、罢免宪法法院18名法官中的6名（第85条），所以总统仍然能对宪法法院施加影响。尽管尤先科对宪法法院法官的罢免，由于时机和原因不妥而遭到质疑，但他却成功地避免了宪法法院对其解散议会的不利裁决。最终，作为总统的尤先科以其超出宪法的权力，达到了实际上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的结果。

（3）尤先科与2008年乌克兰政治危机

尤先科上台不久，“我们的乌克兰”和总理季莫申科领导的“季莫申科集团”，在橙色革命后组成的联合阵营也分崩离析。尤先科在议会的支持率不断走低，而新宪法的实施又使他的权力被严重削弱，他无法容忍总理再与其争夺行政权。2005年9月8日，在新宪法即将生效之际，尤先科以政府工作不力、缺乏团队精神为由，解散了季莫申科政府。

2007年议会选举，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地区党虽然仍然为议会第一大党，但议会席位从186席降为175席。它的盟友社会党则因为选票过少未能进入议会，因而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第一大党“地区党”，在议会内无法寻找政治盟友，亚努科维奇无奈离开总理位置。而季莫申科集团则从129席上升为156席。尤先科所在的“我们的乌克兰”获得72个席位，有所减少。^②

① Jeffrey Simon, “Ukraine needs to decide its strategic alignment”.

② 2007年议会选举结果，参见“Ukrain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2007”，http://en.wikipedia.org/wiki/Ukrainian_parliamentary_election,_2007；或 Jeffrey Simon, “Ukraine needs to decide its strategic alignment”.

季莫申科与尤先科再度联手，刚好勉强超过议会半数席位，达到法定组阁所需要的“联合多数”。季莫申科再度出任总理。

季莫申科在执政联盟中遥遥领先的优势，使其在议会的话语权远大于尤先科。靠着议会的支持，季莫申科势力不断坐大。而尤先科担心季莫申科将在2010年与自己争夺总统宝座，因而对其进行牵制和约束。行政系统再现“双头政治”，而且他们总是意见相左，这使国内民主政治改革变得更为艰难。^①在对外政策上，两人在俄格战争中持不同立场——尤先科主张积极支持格鲁吉亚，谴责俄罗斯，而季莫申科则希望保持中立。外交上的分歧加速了双方的分裂。两人的公开决裂是在2008年9月3日。季莫申科集团与地区党联合，企图通过一项缩小总统权力的法案，包括总统任命总检察长应经过总理同意，增加内阁任命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剥夺总统否定议会建议的总理的权力，剥夺总统任命国家情报机构领导人、罢免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权力。尤先科对此无法接受，指责议会企图发动政变，建立“总理专政”。因而宣布“我们的乌克兰”退出执政联盟，并威胁解散议会。^②季莫申科则指责尤先科此举是为了打压自己，清除2010年竞选总统的障碍。根据宪法，季莫申科必须在一个月內组织新的执政联盟，不然总统可以解散议会。结果，季莫申科集团未能组建新的执政联盟。2008年10月8日，尤先科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议会选举。选举初步定于12月7日举行，但后来被无限期推迟。全球金融危机使乌克兰经济受到巨大创伤，人民不断举行抗议。在此情况下，尤先科强调议会要先通过选举拨款和出台解决危机的法案，才能确定议会选举日期。季莫申科也指出，政府首先需要应对的是金融危机，议会选举无法在当年举行。2008年12月16日，尤先科所在的“我们的乌克兰”集团和季莫申科集团只得再度联手。与他们联合在一起的，还有利特温(Volodymr Lytvyn)集团。作为回报，利特温获得了议长职位，总统与议会一总理的危机勉强得到了化解。在本案例中，在尤先科与总理出现巨大分歧导

① Thomas O'Brien, "Problem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Ukraine: leadership failur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10, Vol.16, No.4, pp.355-367.

② Daryna Krasnolutska, "Yushchenko May Dissolve Ukraine Parliament, Call Vote", Bloomberg, 3 September 2008,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vVAaysbcd8I&refer=europe>

致难以共事的情况下，总统通过影响其在议会中的党团退出执政联盟的方式，导致执政联盟分裂。总理无法在一个月内组建新的执政联盟，这使总统以符合宪法的途径解散了议会。最后双方虽然握手言和，但分歧已公开化并难以挽回，总统和总理在剩下的执政时间里都没有太大作为。

六、乌克兰需要一个什么样的“2004+”宪法与政体

德安尼尔瑞（D’Anieri）认为，议会的弱小是乌克兰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①而议会孱弱的原因，则是议会总是难以形成稳定的执政多数以制衡总统。实际上，德安尼尔瑞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正是因为总统权力太大，议会才无法发挥作用。

尽管乌克兰的几部宪法普遍存在着总统权力过大、议会弱小、总统与总理职权不清等问题，但从1992年宪法草案到1996年宪法，再到2004年宪法，其发展方向是总统制、总统议会制、总理总统制。总趋势是总统权力逐渐削弱，议会和总理的权力逐扩大。但2004年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仍然远大于其他总理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权力。^②从二十多年来的乌克兰宪法及其

① Paul D’Anieri, *Understanding Ukrainian Politics: Power,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M. E. Sharpe, Armonk/ London, 2007.

② 舒戈特（Shugart）和卡雷（Carey）对总理总统制的10个国家——奥地利、芬兰、法国、冰岛、立陶宛、摩尔多瓦（2000年前为总理总统制）、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的总统权力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将总统权力分为立法性权力和非立法性权力两方面。立法性权力包括：否决权、发布命令权和发起全民公决权。非立法性权力包括：组建内阁权、解散内阁权和解散议会权。在此基础上，他们给每个权力因素打分，得出了10国总统的基本权力得分。在立法性权力方面，奥地利和芬兰总统总得分为0分；而摩尔多瓦总统获得最高的立法性权力得分5分，10国的平均立法性权力得分为2.2分。在非立法性权力方面，立陶宛总统得分为0分，而冰岛总统获得最高得分：12分，平均分为4.5分。笔者根据他们的评分标准，给乌克兰总统在1996年宪法框架内和2004年宪法框架内的立法性权力和非立法性权力打分。结果为，在1996年宪法框架下，乌克兰总统的立法性权力得分为7分，非立法性权力得分为8分；在2004年宪法框架下，总统立法性权力得分为8分，非立法性权力得分为5分，均超过10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在更为重要的立法性权力方面，遥遥领先。而且，在2004年宪法框架下，总统的立法性权力甚至超过了1996年宪法。参见 Matthew Soberg Shugart, John M.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实施来看，它的根本问题主要是总统权力太大，以及总统和总理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划分。^①

近年来，在乌克兰国内及国际上，出现了进一步改革 2004 年宪法的声音。这些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废除半总统制，将政体转变为议会制。如辛蒂（Cindy）认为，所有新兴民主国家，都不宜搞半总统制。因为在半总统制国家，总统超越于整个体制之外，他以自身的行政命令代替立法；即使要实行，也应该实行弱总统的半总统制。^②

另一种是在总理总统制框架之下进行改革，这是乌克兰国内外的主流意见。2009 年 3 月，尤先科向议会提交了一个宪法修改草案。^③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赋予民众更多权利；赋予内阁和地方政府更大权力；建立两院制；总统的权力应该限制为：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保证者；宪法、人权的自由的监督者。2014 年 2 月 21 日，在乌克兰经历三个月骚乱之后，亚努科维奇总统与各反对派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修改宪法。协议指出：应该在 48 小时内恢复 2004 年宪法；以保证总统、政府和议会权力平衡的宪法改革必须立即启动，并在 2014 年 9 月结束；新宪法出台后，最迟应于 2014 年 12 月举行总统大选。^④然而，乌克兰政治学院的邦德仁科（Bondarenko）却没有那么乐观。他认为，由于乌克兰宪法存在众多问题，修改宪法将是一件耗时巨大的工作，而在宪法正式修改之前，议员们在短期内需要做的，是制定一个临时性的基本法。^⑤

① 威尼斯委员会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2005 年，威尼斯委员会就出台过专门文件，对乌克兰 2004 年宪法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文件认为 2004 年宪法的主要问题是，给予总统以“突出地位”（prominent position）、总统总理权力重叠并成为未来冲突的源头。因此要改进 2004 年宪法必须从这两方面着力。“Opinion On The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Venice Commission, adopted on 8 Dec.2004 by the Commission at its 63rd plenary session (Venice, 10-11 June 2005), [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005\)015-e](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005)015-e)

② Cindy Skach, *Borrowing Constitutional Designs: Constitutional Law in Weimar Germany and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8-128.

③ “Ukraine needs constitutional change now”, *Kyiv Post*, May 7, 2009, <http://www.kyivpost.com/opinion/op-ed/ukraine-needs-constitutional-change-now-41069.html>

④ “Ukrainian president and opposition sign early poll deal”, 21 February 2014,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289318>

⑤ Bondarenko. Конституция 2004 года ввергнет страну в хаос-политолог.

欧盟、欧洲委员会等都对乌克兰2004年宪法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设想。2014年2月11日，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指出，目前乌克兰需要的不仅是2004年宪法，而是一个“2004+”（2004 plus）宪法。新宪法必须革除2004年宪法的不良因素，例如，应给予一些政府机构更多的权力。^①

随着乌克兰骚乱的发展，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出现了加入俄罗斯的呼声。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就是否加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投，绝大多数人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2014年3月20日，俄罗斯批准了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乌克兰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州及卢甘斯克州，也随之出现了独立的要求。事态的发展，使乌克兰宪法改革的内容有所扩展：从主要关注政体变革，转变为政体变革和国家结构变革兼顾，特别是国家结构问题，成为一个更为紧迫的事项。

根据1996年和2004年宪法，乌克兰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基辅除了垄断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基本垄断了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主要是总统和内阁——可以任命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决定和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策。唯一一个自治共和国克里米亚，虽然在人事、财政等方面有一定的特别权力，但中央政府仍能废除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定。自治共和国必须执行总统命令和内阁决议，自治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部长会议主席），虽然由自治共和国的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选举和罢免，但仍然需要获得乌克兰总统的同意。由此可见，在乌克兰，国家结构问题实际上和政体问题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俄罗斯非常关注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改革2004年宪法，而其关注的重点，就是国家结构问题。2014年4月4日，在独联体外交部长会议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指出，乌克兰必须进行“真正的”而非“装饰门面的”宪法变革。主要是要给予地方更多权力，给予人民更多权力，以使宪法改革能纳入包括乌克兰俄罗斯族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声音；同时宪法改革必须是公开透明的，保证乌克兰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进行变革，而非在

^① “Remarks by EU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at the AFET Committee”, European Parliament Brussels, 11 February 2014, http://eeas.europa.eu/statements/docs/2014/140211_02_en.pdf

西方的秘密控制下进行。^①

4月18日，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Arseniy Yatsenyuk）和代总统图尔奇诺夫（Oleksandr Turchynov）联合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即将进行全面的宪法变革，主要内容是权力下放和权力分散；加强地区、地方在人事和财政等方面的权力；给予和保障俄语以特殊地位。^②这是为了兑现此前一日乌克兰在日内瓦举行的欧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会议上的承诺之举。

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地区党的立场则更为尖锐。东部地区明确表示，希望将乌克兰的国家结构从中央集权制转变为联邦制。地区党领导人耶夫瑞莫夫（Oleksandr Yefremov）表示，应确保权力下放，同时给俄语官方语言地位。^③

6月26日，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向最高拉达正式提出了宪法修改草案。宪法草案的具体内容包括：（1）成立一种新的行政区域：居民区（hromada），包括村庄，居民点和城区，以直接选举的方式进行自治；（2）其他各行政地区由地区代表选举出地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领导当地行政机构；（3）总统有权向各地区派驻地区代表，以监督各地区宪法、法律执行的情况和人权、自由的保护情况；（4）地区政府有权给与少数民族语言以特殊地位，但乌克兰语应为乌克兰的唯一官方语言；（5）总统保持撤换总检察长、安全部门领导人和国家调查局最高领导人的权力；（6）总统在考虑到议会执政联盟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总理人选，议会不得拒绝；（7）总理任命的政府部长，议会不能拒绝；（8）议会根据总统提名任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9）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自治政府一定的行政权、税收权，并将部分国有资产转移给地方自治政府。^④目前，该宪法草案正处于征集民众意见阶段。

① “Ukraine must have real, not cosmetic, constitutional reform”, Reuters, April 4,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04/us-ukraine-crisis-russia-lavrov-idUSBREA330N720140404>

② “Ukraine’s Prime Minister Outlines Plans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s”, RFE/RL, April 18, 2014, <http://www.rferl.org/content/ukraine-yatsenyuk-turchynov-constitutional-reform/25354791.html>

③ “Ukraine’s Party of Regions Urges Constitutional Reform”, RIA Novosti, 24/04/2014, <http://en.ria.ru/world/20140424/189345559/Ukraines-Party-of-Regions-Urges-Constitutional-Reform.html>

④ “Rada puts Poroshenko-proposed bill amending constitution on plenary session’s agenda”, Ukraine News Agency, July 3, 2014, <http://en.interfax.com.ua/news/general/211972.html>

显然，该宪法草案拒绝了联邦制以及给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等激进意见。在国家结构上，仍然为单一制，但已不再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而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单一制。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类似，这是一种比较中庸但符合实际并能够为多数人接受的方案。但在政体变革方面，总统仍然保持众多权力，并且基本未涉及议会对总统的制衡问题。因此，这方面的缺陷仍然较多，在民众征集意见阶段很可能会出现较大的修改。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于2004年宪法，乌克兰应该思考的不是是否修改该宪法，而是如何修改该宪法。笔者认为，今后乌克兰宪法改革的方向最可能遵守以下两项基本原则：

首先，维持总理总统制。大多数学者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及其他一些政体更为民主。原因是，议会制代表性广，集体决策，议会内部政党竞争使其保持先进性，自由而充分的辩论容易产生正确决策。^①在欧盟6个东部伙伴关系国中，最接近欧盟国家强议会传统的是采取议会制的摩尔多瓦，而它也恰好是东部伙伴关系国中改革最为成功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但是，一个民选总统的存在，也有着一些特别的优势。例如上文提到的埃尔吉所指出的是“民主象征”、“治理需要”、“权力平衡”的需要等。也有学者特别强调，民选总统在平衡议会、^②作为政治冲突的仲裁者、^③超越“多数的狂热”（to transcend “whims of a majority”）^④中的特殊作用。由于上述原因，乌克兰需要一个民选总统的存在。另外，乌克兰保留一个民选总统，还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的延续性，具有强大集权惯性的乌克兰，如果贸然从“强

① 具体观点参见 J.Linz, “Democracy,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J.Linz, A.Valenzuela,(eds.),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A.Valenzuela, “Latin America: Presidentialism in Crisis”,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3, Vol.4, No.4, pp.3-16; Bill Scheuerman, “Is parliamentarism in crisis? A response to Carl Schmitt”, *Theory and Society*, 1995, Vol.24, No.1, pp.135-158.

② Max Weber,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a Reconstructed Germany”,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in 2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eds, 1978, p.1461.

③ John C. Reitz, “Political Economy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Transnational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6, Vol.15, pp.579, 603.

④ José Antonio Cheibub, “Making Presidential and semipresidential Constitutions Work”, *Texas Law Review*, 2009, Vol.87, pp.1374-1407.

总统”的半总统制过渡到议会制，可能会因为转变过大而导致整个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乌克兰不仅是一个民主转型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刚刚建国二十几年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维持一个民选的、有较高威望的总统，有维护国家统一、凝聚民心、提升国家形象的作用。

其次，维持一个“仪式性总统的总理总统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半总统制国家，“强势总理+仪式性总统”是最有利于民主，而“总理总统权力平衡”则容易发生争端。^①1992年乌克兰宪法草案规定的是总统制政体；1996年宪法是“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2004年宪法则是介于埃尔吉所说的“高度总统化”和“总统总理分权的半总统制”之间的政体。而一个“2004+”宪法，最可能实行的则是“总统总理分权的半总统制”或者是““强势总理+仪式性总统”，或者介于两者之间。这个发展趋势符合欧盟国家“强议会、弱总统”的整体风格——尽管各国政体各异。

埃尔吉曾经将奥地利、保加利亚、冰岛、爱尔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等国归类为这种模式，这些国家采取“弱总统、强总理”的半总统制模式；而将克罗地亚、芬兰、立陶宛、波兰等国归类为“总统总理分权的半总统制”。同时，他指出，实行“总统总理分权的半总统制度”国家，总统总理“两强”存在，仍然难以避免总统总理争权的情况发生。^②从波罗申科的宪法草案来看，仍然是“强势总统+弱势总理”的总理总统制模式，这个草案很难在民众及政治精英中很难获得多数支持，乌克兰宪法的转型仍然任重道远。

为了避免总统总理争权，避免总统总理发生冲突导致政治危机等因素，笔者认为乌克兰更应当采取“仪式性总统的总理总统制”。问题是，具体又

① 持这些观点的学者包括：埃尔吉（Robert Elgie）、莫斯特鲁普（Sophia Moestrup）、洛朴（Roper Steven）、舒戈特（Shugart）、卡雷（Carey）等。参见 Robert Elgie, Sophia Moestrup, “Semipresidentialism: a common regime type, but one that should be avoided?”, in Robert Elgie, Sophia Moestrup edited, *Semi-presidenti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13; Roper Steven D, “Are All Semi-presidentialism Regimes the Same? A comparison of 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2, Vol.34, pp.253-272; Matthew Shugart, John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Robert Elgie, “A Fresh Look at Semipresidentialism, Variations on a theme”. 笔者认为，埃尔吉的归类方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他认为“总理总统分权的半总统制”仍然难以避免总统总理争权，却是很贴切的。

该如何确定总统权力以及总统与总理分权呢？笔者认为，乌克兰最终有可能采取以下一些改革措施：（1）限制或者取消总统所有的立法性权力，例如取消总统发布法令的权力，或者总统法令必须经过议会批准才能发布；取消或者限制总统对议会法案的否决权；取消总统发起全民公决的权力，或者规定只有在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起全民公决。（2）大幅度削减总统的任免权。总统任免权应该仅仅限于任免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这几个职位，其他职位的任免，总统只能仪式性地行使同意权。（3）总统和总理划分权力。总统主要是国家元首，而总理则是政府首脑。正如乌克兰议会领导人莫罗兹（Moroz）所说，总统应该是国家的元首，而不是政府的元首，而政府应该对议会而不对总统负责。^①在行政权力内部，可以学习波兰和芬兰，由总理执掌主要的行政权，总统的行政权只限于国防和外交方面，而即使在这两个方面，总统在作出决策前，也需要与总理和相关部门协商。（4）总统可以保留的其他重要权力包括：国家最高对外代表、武装部队总司令，以及其他仪式性国家元首享有的权力。

总之，将乌克兰宪法中的权力差序结构，从目前的“总统一议会—总理”，转变为三者适当分权，实现权力均衡或权力平衡，或者达成“议会—总理—总统”的差序权力格局，是乌克兰政体的改革趋势，同时也符合欧洲政体的总体特点。不过，宪法的修改和通过，均应该得到尽可能更广泛民众的认同，以使宪法成为乌克兰民主、统一、稳定的根基和象征，从而使其成为消弭乌克兰东西方裂痕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而不是成为一个再度引爆冲突和分裂的内在根源。

【 Abstract 】 From its formal independence in 1991 till now, along with changes of the constitution, there have been reversals of Ukrainian regime. The reason lies in, on the one hand, the constitution could not reflect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President, the Prime Minister, the parliament and the lega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paration between pro-Russian forces and pro-European forces within Ukraine makes none of the constitutions have stable public foundation. It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 further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① “Aleksandr Moroz protiv”, Zerkalo Nedeli, March 15-22, 1995, http://gazeta.zn.ua/POLITICS/a_aleksandr_moroz_protiv.html

Ukrainian domestic conflicts and to have reasonable judgment regarding the future trends of Ukrainian constitution and regime changes if we analyze issues under different regimes within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especially thos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nes when Ukraine resumed its premier-presidential system under the 2004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February 2014.

【Key Words】 Ukraine Crisis,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Ukraine Regime

【Аннотация】 С момента обретения пол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1991 г. по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постоянным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форма правления в Украине такж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менялась. Причиной этому,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был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тразить баланс сил между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парламентом и судебной властью;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борьбой внутри Украины между пророссийски и проевропейски настро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отсутствию во всех Конституциях твёрдой основ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Анализ различных проблем формы правления в Украине в рамках различных Конституций,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анализ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ов возврата формы правления в Украине в феврале 2014 г. к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й форме 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амках Конституции 2004г., помогает понят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факторы внутр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в Украине, а также разумно спрогнозировать тенденцию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орме правления в стран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Украины, форма правления в Украине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分离的国际化及其演进：南奥塞梯 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情势之比较*

孙超**

【内容提要】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乌克兰东部地区是否可能发生分离成为当前学术探讨的焦点。将当前乌克兰东部与格鲁吉亚南奥塞梯的分离进行比照，发现两者都有分离国际化的风险。与乌克兰不同的是，南奥塞梯的分离风险更加难以控制。作为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南奥塞梯不仅牵涉到国内民族问题，更牵涉到国际伦理规范和国际关系理论等诸多问题。南奥塞梯分离国际化带来两大影响：1、大国势力介入，民族问题难以解决；2、建构式的分离策略以及系统分离情境的建立使得分离问题难以彻底解决，分离将作为南奥塞梯政治现实而长期存在。而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由于：1、大国势力介入有限，国际力量难以直接参与；2、建构式和系统式分离文化难以迅速形成，没有分离的历史经验和手段供分离势力参照，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风险可能得到乌克兰政府的有效控制。

【关键词】分离比较 国际化 乌克兰东部 南奥塞梯

【中图分类号】D81(367)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3-0106-(32)

引言

* 感谢《俄罗斯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杨成副教授、阎德学博士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章错漏之处，则由笔者自负其责。

** 孙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苏联解体已有 20 余年，然而欧亚地缘政治板块接合处却并不稳定。当前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三州以及克里米亚所带来的“分离”困扰，如梦魇般影响着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和未来。与乌克兰类似，南高加索格鲁吉亚的北方地区南奥塞梯，也一直企求独立。两地区的分离倾向显现出典型的“后苏联样式”——并入俄罗斯或自立。它们的分离诉求伴随着乌克兰、格鲁吉亚欲求统一的决心和努力、俄欧美三家博弈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变迁而越发强烈。

两地的分离情势伴随着大国的直接支持而越发复杂。2013 年 11 月俄乌协议的签订，将亚努科维奇（Viktor Fedorovych Yanukovych）塑造的“亲欧”立场击得粉碎。乌反对派趁机发动基辅“街头革命”。在乌议会占据优势后，迅速在媒体制造“国族主义”威胁气息，要求与“俄罗斯人血战到底”。西方为了帮助乌新政府坚持到底，不断派遣高官到乌表达支持。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在基辅现场亮相，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公开会见乌反对派领袖。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凯瑟琳·艾什顿（Catherine Margaret Ashton）和美国高官表示支持反对派行动。^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更是指责亚努科维奇应为基辅的暴力行为负责。欧盟还对乌克兰“过度使用武力和加剧暴力的责任人”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等措施。^②反对派在西方支持下夺取了国家权力，而乌克兰东部地区则相继发生了反对基辅新政权的抗议活动；俄罗斯族人占多数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分离活动也日益频繁，俄罗斯直接卷入这场危机之中。2014 年 2 月 28 日，俄黑海舰队占领辛菲罗波尔的军用机场等战略设施，随后俄议会上院授予普京对乌克兰动武的权力，俄军随后占领乌克兰边防军司令部。3 月 6 日，克里米亚共和国议会就“是否赞成克里米亚在享有俄罗斯联邦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与俄罗斯重新合并”，“是否赞成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 1992 年宪

① “乌克兰军警彻夜清场未奏效，遭欧美严厉指责”，环球网，2013 年 12 月 12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12/4655906.html>

② 赵鸣文：“乌克兰政局突变原因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73-74 页。

法并赞成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问题举行全民公投。^①结果，96.77%的投票者支持加入俄罗斯，普京迅速完成合并的法律程序，实现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诉求随着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干预而日益高涨。乌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三州爆发亲俄武装叛乱，并要求举行全民公投。4月17日，美欧俄与乌克兰在日内瓦举行四方会谈并签订协议，要求乌克兰非法武装组织解除武装，撤出占领地；乌实施宪法改革，特赦东部抗议者。但协议并未奏效。随着冲突升级，东部分离倾向愈益明显。5月11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举行公投，90%的投票者支持独立。5月12日，两州宣布脱离乌克兰独立。

而在6年前，格鲁吉亚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与乌克兰不同的是，格政府直接与俄罗斯武力冲突，酿成八月战争，改变了南奥塞梯的分离走向。美国学者斯托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认为，这场战争是格鲁吉亚、美国和欧洲失败的展现：1）南奥塞梯从事实上（de facto）发展到法理上（de jure）分离，与阿布哈兹一道差不多成了俄国的一部分；2）格鲁吉亚加入欧盟（European Union）和北约（NATO）的期望受阻；3）格总统萨卡什维利因为八月战争失利而威信大减，也在西方失去信誉，更难获得西方的支持。^②而美国对于俄格八月战争的不作为以及欧盟的短视，使得八月战争难以避免。这场战争在爱沙尼亚总统图玛斯·艾维斯（Toomas Ilves）眼中被认为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关于俄罗斯不会参与侵略（aggression）的假设被证无效，我们看到了欧洲安全结构范式的转变”。^③“四个世纪的抵抗”——参加八月战争的格鲁吉亚年轻活跃分子将俄国视为永久的敌人。^④斯万特（Svante E.Cornell）和斯塔尔（S.Frederick Starr）认为，八月战争的爆发是俄国对西

① 柳丰华：“乌克兰危机：内因、大国博弈因素与前景”，《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第15页。

② Ronald D. Asumus, *A Little War that shock the World. Georgia, Rus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NY: Palgrave, 2010, preface.

③ Alexander Astrov, *The Great Power (mis)management. The Russian-Georgian Wa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Political Order*,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1, p.1.

④ Thornike Gordadze, “Georgian-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1990s”, *The Guns of August 2008*, edited by Svante E.Cornell etc, NY: M.E. Sharpe, 2009, p.28.

方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政策以及北约东扩的反应。^①更有学者认为，八月战争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结果。^②2011年的《俄罗斯研究》杂志刊载一组文章，集中介绍了中国、西方、俄国和格鲁吉亚学者对八月战争的认识和理解，最终的落脚点是：“八月战争对俄、欧美关系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反映了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端倪”。^③

经过战争，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获得了俄罗斯的承认，意味着南奥塞梯分离问题国际化^④的开始，南奥塞梯的分离首次作为欧亚大陆国际关系议题而不是格鲁吉亚的内政问题被提上谈判日程。欧盟、俄罗斯、美国深入地介入了此议题，这也将深刻影响南奥塞梯分离的未来。有关南奥塞梯分离问题的解决，欧盟、美国和俄罗斯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的竞争则反映着各大国在南高加索政治斗争中的角力。与南奥塞梯相仿，如今俄美欧三家对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也颇具戏剧性。乌克兰从2014年3月的民主危机发酵成为分裂危机，再到内乱的出现，无一不掺杂着大国干涉的影子。欧美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更是相互角力，欲求占据道义制高点。但无论结果如何，乌克兰东部分离问题的国际化程度将不可逆转地提高。至于俄罗斯是否

① Svante E.Cornell & S.Frederick Starr(eds), *The Guns of August 2008. Russia's War in Georgia*, NY: M.E.Sharpe, 2009, p.4.

② [俄]谢尔盖·马尔科多诺夫：“大高加索的危机与俄罗斯——‘五日战争’之结果及影响”，《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47-67页。

③ 冯绍雷：“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危机政治经济学’——俄罗斯于大国关系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第68-79页。[俄]谢尔盖·马尔科多诺夫：“大高加索的危机与俄罗斯——‘五日战争’之结果及影响”，《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47-67页；[格]马尔哈兹·马茨阿别利泽：“俄罗斯地缘政治构想与异化的俄格关系”，《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68-79页；[英]罗伊·埃里森：“武力抑或外交政策工具？——评俄罗斯对格鲁吉亚战争的官方话语”，《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80-92页。

④ 关于国际化的集中论述，参见 Peter J.Kazenstein&Robert O.Keohan and Stephen D.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Autumn 1998, pp.645-685; Peter B.Evans, Hraold K.Jacobson and Robert D.Putnam(eds), *Double-Edges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Thomas Risse-Kappen(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美]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姜鹏等译：《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本文使用的“国际化”指的是国内议题被提升为国际议题，通过大国协调一致解决，而非市场经济自由化和国际贸易一体化。

会直接干涉参与解决叛乱问题，还有待观察。如果大国之间达成了妥协，且乌克兰政府在对俄关系上保持克制，乌克兰东部分离问题的“南奥塞梯化”将不太可能发生。

正如上文所说，乌克兰东部分离问题未来的可能路径是“格鲁吉亚化”，即出现被俄罗斯承认但却不被国际社会认同的分离实体。所以对格鲁吉亚问题的思考就成为首要议题。为什么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地区会被俄罗斯承认，这与分离的国际化息息相关，本文尝试从这个角度探讨南奥塞梯和乌克兰东部的分离问题。文章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分离与国际化的关系，阐述外部势力的介入是如何影响南奥塞梯的分离，并以此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国际化的情势进行评估；第二部分以美国和北约为分析对象，探讨大国势力的干预如何改变南奥塞梯的政治现实，从而促使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更为剧烈；第三部分以八月战争为核心，探讨战争对南奥塞梯分离所带来的影响；第四部分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入手，探讨克里米亚分离对欧亚地缘政治的意义；第五部分则探讨南奥塞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的情势和未来；最后一部分是总结。

一、分离：大国的介入与国际化

分离（secession）意味着“正式从主权国家退出”，不仅要从一个主权国家离开，同时要宣告对分离地区的领土、资源和人口的完全掌控。与内战、革命不同的是，分离的目标并不是要推翻政府建立一个新政权，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离开而不与现存政府有任何关联。^①分离的本质是公民重新建立国家和获得另一种社会契约的过程。实际上，分离的现实与分离的理论相脱节，明显的例证即是苏联解体。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有70%的公民支持“保留苏联”，但这个庞然大物很快便瓦解了，中央政府也不复存在。^②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是在各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的基础上建

① Allen Buchanan, *Secession: The Morality of Political Divorce from Fort, Sumter to Lithuania and Quebec*, Westview Press: San Francisco, 1991, p.9.

②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527页。

立的，^①与全民公决的结果相违背。这种从分离到建国的过程反映了分离（secession）的复杂性特点。罗伯特·卢克（Robert Luke）对分离进行了二分法：中心地区分离 vs 边缘地区分离、政治民族分离 vs 地方分离、多数人支持的分离 vs 少数人支持的分离、发达式分离 vs 不发达式分离。^②这种分类方法将分离的道德外衣剥开，吸收了更多的实质内容。但事实上，卢克的分析缺少另一个维度的思考，即分离的国际化问题。

分离不仅是一种宣告，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如果主权国将分离地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么分离会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对抗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政治活动和非法运动，甚至发生较多的犯罪活动。中央政权如果对分离地区，特别是主权国家的边缘地区，不能保持有效控制，那么分离活动往往会导致国际化，为分离活动增添更多的助力和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苏联解体、格鲁吉亚独立、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分离，交织在共同的时空，使得南奥塞梯具有更多的国际色彩。而乌克兰现政府无法控制克里米亚以及东部地区的分离活动，使得俄罗斯和欧洲势力极易介入，造成分离问题国际化，最终难以使用国内政治方法解决。与乌克兰东部分离不同的是，南奥塞梯的分离更具深刻的国际背景。

1、苏联解体，世界从两极世界转向单极世界，美国成为唯一的真正全球性大国，欧亚大陆中心形成了一个“黑洞”，美国的任务是“避免重新出现一个欧亚帝国”。^③而欧洲则在探讨欧盟东扩及其一体化政策，并处理欧盟周边悬而未决的民族分离主义的持久性解决方案。^④俄国的目标较为复杂。

① 1991年5月，叶利钦被选举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重归俄国法统，试图控制俄罗斯联邦整个地区，莫斯科出现了苏联政府与叶利钦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8·19”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俄罗斯联邦在争夺政权中取得胜利，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相继宣布独立，而格鲁吉亚则宣布断绝与苏联的一切关系。苏联作为国家的终结是1991年12月25日。

② Robert Luke, *Applied Secession Theory*, Master of Arts dissert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January, 2012, pp.2-9.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④ [比]布鲁诺·考彼尔特斯、宋新宁主编：《欧洲化与冲突解决：关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个案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导言。

面对苏联解体后急速的权力衰落，俄国并不想过分失去对高加索的控制，“俄罗斯意识到，没有国际组织或者国家集团可以取代我们在后苏联空间发挥维持和平的作用”。^①在西方人看来，俄国的目标是恢复在后苏联空间的霸权（hegemony）。^②

2、与此同时，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 Gamsakhurdia)为了实现格鲁吉亚的独立，对抗苏联中央政府，力求实现格鲁吉亚政治民族的创建。在族群同质化较低的格鲁吉亚，按照民族建设的思路如果不灵活，反而会带来更多困难。^③对苏联中央和族群分离势力的抵抗，使得格鲁吉亚在处理复杂的国家和民族事务中难以把握好平衡，两面作战的方式非常容易引发政治动荡。格鲁吉亚不仅与苏联中央矛盾重重，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也发生了持续的军事冲突。西方社会担心格鲁吉亚不稳定的局面会影响到解体后核大国的稳定，但最终，国家建设取代了激进诉求。谢瓦尔德纳泽上台后宣告对莫斯科效忠，同时格鲁吉亚同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停火，俄罗斯进行维和工作，整个局势得以缓和。^④格鲁吉亚结束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却将南奥塞梯的分离问题搁置起来。

3、南奥塞梯在争取独立伊始，就有两个目标可以选择：（1）与北部的北奥塞梯合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成员；（2）彻底独立，成立南奥塞梯共和国。这两个分离目标都与俄罗斯纠缠不清。1992年俄国对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的冲突进行干预，并联合南北奥塞梯成立联合控制委员会（Joint Control Commission），还成立了一支 1,500 人的联合维和部队（Joint Peacekeeping Force, JPF）以解决冲突。该委员会一直运作到 2008 年格俄战争为止。与此同时，联合国（United Nations）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与该联合委员会一道致力于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冲突的管理与解决。但是，在格总统

① Kevin Fedarko et al., “In Russia’s shadow”, *Time*, 11 October 1993, [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7936600.html](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7936600.html)

② Alexander Astrov, *The Great Power (mis)management. The Russian-Georgian Wa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Political Order*, p.34.

③ Michael Moses, *Should We Stay or Should we go? State-Building via Political Divor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3 January, p.4.

④ Alexander Astrov, *The Great Power (mis)management. The Russian-Georgian Wa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Political Order*, pp.28-30.

萨卡什维利看来，联合委员会（JCC）仅仅是俄国破坏格鲁吉亚主权的重要工具，是展现俄国在后苏联空间调解冲突的霸权的手段。^①松里公孝认为，JCC 代表着俄罗斯对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进行控制的重要方法：（1）只有少数领袖能决定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德涅斯特河左岸）的未来；（2）这些领袖互不买账，以至于最后都求助于俄国；（3）JCC 干预创建“中立区”，并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秩序。^②JCC 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分离问题的解决。在冲突管理的情境中，南奥塞梯的分离很难不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提出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可以较好地诠释南奥塞梯分离的特殊性。南奥塞梯寻求独立，影响了格鲁吉亚的国家建设和整合，体现了分离对于格鲁吉亚的敏感性，而脆弱性的特征在格鲁吉亚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南奥塞梯分离造成的冲突局面，使得大量难民从南奥塞梯迁出，走私盛行，不仅造成格鲁吉亚管理的困难，也更容易被外界将其定义为“失败国家”。^③此外，OSCE 与 JCC 的介入，使得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同情者，从而建立起对抗性而不是合作性的联盟。敏感性也同样在 OSCE 与 JCC 存在。JCC 的目的是想将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 OSCE 则着力于推动冲突双方进行谈判，支持当地的基础建设，发展 NGO 组织，监督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进程，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以及维持地区稳定并防止人道主义危机发生。^④这种做法则让俄国担心欧洲是否真心解决冲突问题，而欧盟也认为俄国在维和过程中表现出“敌意”。^⑤俄国与西方的均势与相互不信任，造成解决南奥塞梯冲突谈

① Kimitaka Matsuzato, “‘No Winner, No Loser’—The Joint Control Commission and Russia’s Policies Towards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1991-2008”, paper presented at ASEEES 43rd Annual Convention, Washington DC, November 17-20, 2011; Kimitaka Matsuzat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oint Control Commission System in the Conflict Regulation of South Osset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uth Ossetian Conflict and Secessionist States Seminar, Osaka, Japan, March 9, 2009.

② Kimitaka Matsuzat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oint Control Commission System in the Conflict Regulation of South Ossetia”, pp.1-2.

③ 关于相互依赖理论，可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 “OSCE Mission to Georgia”, *Survey of OSCE Field Operation*, SEC.GAL/84/137, May 2013, pp.79-83. <http://www.osce.org/cpc/74783>

⑤ “Overview”, OSCE Mission to Georgia(closed), <http://www.osce.org/georgia-closed/43383>

判的“僵局 (stalemate)”。僵局的出现以及俄国霸权平衡者的角色，使得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也认为它们同格鲁吉亚是相互平等的 (equal)，而不是从属者 (subordinate)。^①正是这种僵局的形成促使分离者相信，可以借助俄国的努力实现真正的“独立”；而格鲁吉亚在谈判中的弱势地位也让 JCC 与 OSCE 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冲淡了格鲁吉亚作为最高主权者的角色。

格鲁吉亚政府在有关解决南奥塞梯冲突谈判中的无能表现激起格鲁吉亚人的反对。2003 年玫瑰革命后，萨卡什维利上台发表对俄强硬演说，积极要求加入北约与欧盟，寄希望于西方力量夺得主动权。他答应对俄国开放，并参与谈判探索共同利益，但在南奥塞梯分离问题上力求独自解决。萨卡什维利一方面提出大量倡议，让南奥塞梯明白，第比利斯愿意以更好的条件让其重回格鲁吉亚，让其享受比“自治”地位更为优越的“区”的待遇；另一方面则打击南奥塞梯维持经济的黑市，对阿布哈兹采取游击作战。后者无疑刺激了南奥塞梯分离的神经。^②由于顺利取得了对亲俄的阿扎尔地区的主权，加上玫瑰革命的政治胜利，使得萨卡什维利相信俄国人不会动用武力支持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离势力。俄国谴责格在南奥塞梯进行小规模战争，禁止 OSCE 在南奥塞梯活动，都未能及时警醒萨卡什维利。萨卡什维利误判了俄罗斯的立场，导致其采取更为大胆的措施。2004 年，低烈度的冲突再次在南奥塞梯爆发。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明显可以看到南奥塞梯在尽一切努力抵制格鲁吉亚的进攻，约有 17 名格士兵死于奥塞梯狙击手的枪下。^③积极采用军事手段取得的成果以及对俄国立场的误判，使得萨卡什维利相信南奥塞梯问题可以通过武力解决。

与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后蓬勃发展不同，乌克兰从一开始就力求融入西方，并为此不遗余力。1991 年以后，乌克兰开始与俄罗斯划定明确的界限，在各方面强调与俄罗斯的异源性。乌克兰将自身与历史上紧密

① Cory Welt, “Balancing the Balancer: Russia, the Wes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Georgia, From a Special Issue on “The Volatile Caucasus”, *Global Dialogue* 7, No.3-4, Summer/Autumn 2005, p.2.

② Ibid, pp.5-7.

③ Ibid.

相连的俄罗斯切割开来，努力培育乌克兰认同。^①为此，融入欧洲或是加入欧盟成为乌克兰重要的外交方略。1994年，乌克兰总统库奇马（Kuchma）将加入欧盟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1998年，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了《伙伴与合作协议》，库奇马总统随后向欧盟提出进行“联系国协定”谈判的要求，谋求加入欧盟。“颜色革命”后，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在“向西方前进”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在其政纲“乌克兰的欧洲选择”中，他明确表明“乌克兰不满足于成为欧洲的邻国，而是要整合入欧，要与欧洲国家保持民主和经济上的强力联系。”^②随后的亚努科维奇总统执政初期，继续与北约合作，并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但乌政府高层长期的亲西方传统也面临困境，以至于任何对俄罗斯的转向都会被视为对“欧洲”的不忠，这层传统也阻碍了乌克兰政府采取灵活的对俄外交策略。

乌克兰的国家认同构造比起格鲁吉亚来更为困难。乌克兰社会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元素机械地整合起来的：苏联、欧洲、俄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鞑靼、匈牙利、犹太。^③多元社会的复杂性无疑增加了乌克兰国家认同塑造的困难。地方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远高于普遍的国家认同。民众相信，乌克兰是生活在当地的各族群长期历史互动的结果。虽然科技和经济实力在20世纪属于翘楚，但却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的伤害。惨痛的历史太过沉重，以至于影响到乌克兰积极的爱国热情的培养。这种悲伤情结和强烈的地方认同撕扯着乌政府建立的脆弱的国家认同。因此，乌克兰认同在这种张力下显得很模糊，甚至在政治上无法统合地方和族群认同。乌克兰认同被替换为“要求更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和命运需要”，一种接近发达的欧洲的生活方式，从而抽掉了乌克兰在历史大潮中沉浮的丰富内容。^④

正是这种认同取向，加上乌克兰接近欧盟和俄罗斯的地缘现实，造成乌克兰在认同发展中出现东西断裂的现象。乌克兰作为一个拥有4,500万人口的欧洲大国，当然会引起欧盟和俄罗斯的重视。而基辅一直在莫斯科和布魯

① Karina Korostelin, “Shaping unpredictable past: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y education in Ukraine”, *National Identity*, 2011, Vo.13, No.1, pp.4-6.

② <http://www.eerc.kiev.ua/docs/rybachuk/English/Policy%20Statement.doc>, 4 April 2005

③ K..V.Korostelina, “Mapping national identity narratives in Ukraine”,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3, Vol.41, No.2, pp.299-301.

④ *Ibid*, p.300.

塞尔之间寻求平衡，俄欧也由此在乌克兰获得了不同的支持者。^①对欧盟来说，乌克兰私有化改革的不成功以及2008年后俄罗斯周边恐俄思潮的泛起，是让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体化进程非常有利的因素。2009年5月，欧盟启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独联体西部六国^②实现与欧盟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创造条件。^③乌克兰西部居民由于在历史文化传统上与西方联系更为密切，因而更倾向于同欧洲合作，加入欧盟成为乌克兰西部居民较为热切的选择。但俄罗斯却不愿看到乌克兰成为西方的一员。由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在苏联时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乌克兰任何脱离俄罗斯势力范围的行动都会比其他独联体国家更加困难。^④从经济上看，尽管乌克兰极力培育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但乌克兰依旧嵌在独联体经济体系之中，俄罗斯依旧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乌克兰消耗的天然气半数以上从俄进口。^⑤从政治上看，乌克兰是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战略缓冲区，也是俄罗斯构建欧亚联盟的重要对象国，更是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乌克兰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逃离会增加“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2013年出版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非常重视俄乌关系，明确提出“构建与乌克兰的关系是独联体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俄罗斯将推动乌克兰参与不断深化的一体化进程。”^⑥从文化上看，基辅更是俄罗斯历史的母亲。这种亲缘性使得俄罗斯不可能放弃乌克兰。而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也有天然的亲近性。“颜色革命”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乌克兰人对俄白联盟和欧盟的倾向几乎是1:1，而加入俄白集团的倾向还比加入欧盟的倾向高出12%。^⑦

① Oleksandr Svyetlov, “Ukraine’s ‘Return to Europe’: Path Dependence as a source of Mutual Elite Misunderstanding”, *Perspective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07, Vol.8, No.4, p.529.

② 该计划涉及的6个欧亚国家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③ 柳丰华：“乌克兰危机：内因、大国博弈因素与前景”，《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第14页。

④ David Lane, “In or Out of Europe? What Prospects for Ukraine?”,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07, Vol.8, No.4, pp.496-498.

⑤ Ibid, p.497.

⑥ 沈莉华：“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走势分析”，《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第36页。

⑦ David Lane, “In or Out of Europe? What Prospects for Ukraine?”, p.497.

乌克兰出于自我发展的考虑,切割与俄罗斯的联系,谋求成为欧洲一员,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却十分强大。正是这种张力,使得乌克兰在2013年发生政治危机后,在地缘上亲欧的西部势力和亲俄的东部势力呈现出两种极端的政治状态。西部的反对派要求重建乌克兰政府,加紧与北约结盟,并加入欧盟;而东部的亲俄派则发动分离运动(公投)和武装叛乱,持续至今。乌克兰东部的分离运动难免不被大国介入,并随着局势的升温而日益复杂。与南奥塞梯不同的是,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来源于东部民众对新政府急切脱离俄国土壤的抵制,是一种自发的维护乌克兰与俄国联系正当性的行为。而俄国随后的介入和克里米亚的独立成为多米诺骨牌的起点,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势力随后立即加以效仿,也希望通过分离运动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以谋求更大的地方利益。但乌东部的分离运动实质上并不是早先的历史诉求和民族感情孕育的产物,而是乌克兰社会认同碎片化和国族构建失败的反映,是乌克兰政府在大国势力介入时无能的表现。

二、南奥塞梯分离的国际化：美国、北约与格鲁吉亚

欧洲安全一直是美国时刻关心的外交议题。苏联解体后,美国和欧洲对欧洲的地缘政治思考主体从东欧深入到俄罗斯周边地区,并重新界定了欧洲安全结构。美国十分清楚,一个敌视俄罗斯的欧洲安全系统是不可能使欧洲获得长期持久的和平与繁荣的。^①美国在欧亚的目标是将俄国放在一个有限的参与体系之中,既不让俄国成为欧洲的盟友(实际上也不可能),也不能让俄国对美国设计出来的安全结构过分焦虑与反对。其实质,是一种美国和北约同俄罗斯达成欧亚均势的格局。在美国看来,南奥塞梯分离现象是前苏联地缘断裂的自然现象,而这种自然现象需要一个有效合理的欧洲安全结构以及冲突解决路径才能得到解决。^②

但美国的利益远不止这些。自“9·11”以来,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

^① Graham Allison & Robert D.Blackwill, “Russia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 Task Force on Russia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 Report, October 2011, p.25.

^② Graham Allison & Robert D.Blackwill, “Russia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p.25-28.

克战争，将势力范围打入中亚和中东地区。欧亚地区的南高加索地带已成为欧洲战略利益的边缘地区。在美国看来，通过民主转型和推广市场经济，南高加索地区将会与西方结成有力的联盟，维系当地的稳定和安全。^①南高加索地区之所以让美国着迷，更多是因为：（1）紧密的贸易联系；（2）民主转型容易实现；（3）不经过俄国的能源管道。^②美国从未中断向南高加索国家进行政治渗透，培养尊奉民主价值观的政府官员和 NGO。2003—2005 年，独联体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可谓是“新保守主义”支持者布什总统“扩展民主”的战略功劳。正如布什所说，“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每个角落”。^③另外，美国还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训练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军队。^④从 2002 年 6 月到 2004 年 6 月，美国在格鲁吉亚实施“保持稳定行动计划”，计划在两年内训练超过 2,000 名格鲁吉亚军人，并为此提供 5,000 万美元援助。2004 年底，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外高加索 3 国，并派出 20 人的美国特种部队进驻格鲁吉亚，标志着美国正式介入格鲁吉亚的军事事务。^⑤美国相信，在解决南奥塞梯问题上，它可以比格鲁吉亚做得更好。而格鲁吉亚也需要一个庇护者（patron），以便在解决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上，在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行为体的博弈中取得更大的优势。美国的策略很简单：格鲁吉亚在诉诸武力上要谨慎，重新整合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在双轨路线上^⑥进行努力。^⑦与阿布哈兹不同的是，南奥塞梯独特的战略价值和

① Svante E. Cornell,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South Caucasus: The Role of NATO”, *Policy Paper*,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4, p.v.

② Charlotte Hille, *State Build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aucasus*, IDC Publishers: Leiden, 2010, p.324.

③ “President Bush's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05,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4460172>

④ Ibid.

⑤ 张科研：“独联体颜色革命的原因、实质及启示”，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2-15 页。

⑥ “双轨路线”是指格鲁吉亚一方面履行国家职能，打击走私犯罪，提高军队力量，解决腐败问题，完善应对南奥塞梯问题的力量；另一方面与南奥塞梯加大谈判力度，开出合理价码，使南奥塞梯愿意接受格鲁吉亚的整合建议，重新并入格鲁吉亚。

⑦ Cory Welt, “Balancing the Balancer: Russia, the Wes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Georgia”, From a Special Issue on “The Volatile Caucasus”, *Global Dialogue* 7, No. 3-4, Summer/Autumn 2005, p.12.

军事意义促使美欧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反事实推理可以解释，如果美欧帮助格鲁吉亚处理好南奥塞梯重新并入格鲁吉亚的问题，那么南高加索政治安排的主动权将会顺利地掌握在西方手中，并顺利地将楔子打入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发挥长期的影响力。

如果说美国在战略上作出安排并进行软实力输入的话，那么北约则采取了战术行动，与格鲁吉亚进行密切合作。苏联解体以后，北约面临的威胁消除了，它也由此加快了东扩的步伐。1994年，北约在布鲁塞尔首脑峰会上接受美国建议，通过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这个计划的一个目的，就是向“准北约”国家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使其最终成为北约成员国。南高加索三个国家都加入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但路径歧异。亚美尼亚希望俄罗斯提供保护，而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则更想通过成为北约的成员国而获得美欧的保护。萨卡什维利甚至希望在2009年就能顺利加入北约。^①与北约的想法不同，格鲁吉亚希望借助北约的力量达到牵制俄国的目的。格鲁吉亚对外政策制定者相信，只要约翰·麦卡恩（John McCain）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它就能在三年内加入北约；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取胜，那么就需要四年。^②格鲁吉亚相信北约会支持它将南奥塞梯的问题国际化，并同俄罗斯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谈判解决该问题。^③但是北约却不希望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更不希望北约成员国卷入与俄国的利益争端之中。因此，在 NATO 看来，如果格鲁吉亚没有认真解决好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北约是难以给予格鲁吉亚成员国待遇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北约的作用。斯瓦特在对比了 NATO, OSCE, UN, CIS 和集安组织（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and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后指出，只有北约才能向南高加索提供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并提供实际保证。由于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同属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

① Charlotte Hille, *State Build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aucasus*, IDC Publishers: Leiden, 2010, p.316.

② Alexander Rondeli, Kimitaka Matsuzato in discussion with Alexander Rondeli, president of the Georgian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February 8, 2008, in Tbilisi.

③ Kimitaka Mastuzato, “No winner, No loser”—The Joint Control Commission and Russia’s Policies Towards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1991-2008”, p.25.

员，北约认为，它能够切实提供合作的平台与提供具体建议的管道，将和平解决问题落到实处。^①北约将欧洲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构成格鲁吉亚所需要的平衡砝码，成为格鲁吉亚迫切需要的重要力量。

美国和北约咄咄逼人的战略使得不安全感很强的俄罗斯人更觉气愤。2007年夏季举行的俄国18—19岁青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有70%人相信“美国正试图使用其规范和生活方式影响世界”，也有70%人并不同意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较为正面。^②莫斯科认为，自己已经签署了上百份有关安全的协议，并且认同欧洲的安全规范和标准，承认欧洲其他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安全和联盟体系，但是这些纸面上的协议现在似乎并不起作用。在制定有关规则和游戏进行时，莫斯科看到，欧洲国家建立起来的体系不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实际利益。^③美国与北约在高加索的计划与俄国的不信任在高加索地区形成安全困境，与南高加索的安全赤字相对应。这种安全困境使得俄国认为自己受到了西方的威胁，并促使其重新思考南奥塞梯的战略价值，并采取有效的行动。^④

然而，格鲁吉亚似乎并没有看到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危险。在玫瑰革命之后，格鲁吉亚人热切期待萨卡什维利解决族群冲突。在美国的影响下，萨卡什维利也同时寄希望于俄国作出诸多努力。但美国并不这么看。查尔斯·费尔班克斯（Charles Fairbanks）称格鲁吉亚是一个“暴躁的矛盾体”（explosive paradox）：依托着革命上台的萨卡什维利不时使用革命的观念、象征和行动来为自己提供威望。但真实的情况是格鲁吉亚需要一个稳定、有序与合法的政府^⑤。费尔班克斯对格鲁吉亚的民主表示质疑，预测有爆发第二次革命的可能，并断定美国在未来的格俄冲突中对格鲁吉亚的支持定不尽力。^⑥美国

① Svante E. Cornell,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South Caucasus: The Role of NATO”.

② Sarah Mendelson and Theodore Gerber, “Glavnyi vrag rossiiskoi molodezhi”, InoPressa, August 23, 2007. <http://www.inopressa.ru/print/wp/2007/08/03/13:08:26/vrag>

③ Ronald D. Asmus, *A Little War that shook the world. Georgia, Rus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pp.218-219.

④ [美]罗伯特·杰维斯，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4-60页。

⑤ Charles Fairbanks,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8, Number 1, January 2007, p.46.

⑥ Ibid, pp.52-57.

对格鲁吉亚的介入的确不彻底，是可靠的伙伴但却不是坚定的盟友，没有为格鲁吉亚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使其能够及时应对与俄罗斯的冲突。格鲁吉亚与美国的微妙关系为格鲁吉亚在八月战争中失利埋下了伏笔。

与美国相比，欧洲在南奥塞梯问题上更多侧重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常使用“维和”(peacekeeping)概念。欧洲人小心翼翼地对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缓和冲突的环境，改变双方产生的敌人意象、族群斗争，并发展双方落后的公民社会。^①在欧洲人眼中，莫斯科应该积极保持中立，而联合国(UN)、欧安组织(OSCE)、联合控制委员会(JCC)和北约(NATO)应该同时发挥建设性作用。^②但这些措施实际上增加了南奥塞梯被包围的心理压力，并激怒了俄国，令俄国恶化了与格鲁吉亚的关系。2008年2月，在西方正式承认科索沃独立后，俄格关系立即恶化。莫斯科单方面从独联体(CIS)对阿布哈兹的制裁中退出，^③并立即与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建立起官方联系。同时，阿布哈兹宣称击落两架格鲁吉亚无人侦察机，但联合国调查团认定是被俄罗斯击落的。^④俄罗斯当即予以否认，并且增加了在阿布哈兹的维和部队的数量。

与此同时，萨卡什维利在国内改革中遇到了困难，民主转型也遇到了难题。2007年12月，政府用暴力镇压了社会反抗。2008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将格鲁吉亚定性为“部分自由”民主国家。^⑤2008年上半年，仓促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并没有使局面冷静下来，国家精英的极端趋向反而增强，

① Michael Merlingen & Rasa Ostrauskaitė, “EU Peacekeeping in Georgia: Limits and Achievements, *Working Paper* No. 35, Centre for the Law of EU External Relations, December 2009, p.3.

② Ibid, pp.5-8.

③ D. Smith, “The Saakashvili Administration’s Reaction to Russian Policies before the 2008 War”, in S. Cornell and S. Starr(eds.), *The Guns of August 2008: Russia’s War in Georgia*, p.128.

④ “Report of UNOMIG of 26 May 2008 on the incident of 20 April involving the downing of a Georgian UAV over the zone of conflict”,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BAC8C781448FDE0049257457000C9857-Full_Report.pdf

⑤ Freedom House Country Report: Georgia (2009),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2&country=7612&year=2009>

要求通过暴力解决南奥塞梯问题的呼声提高。^①格国内外局势恶化了格俄关系，而南奥塞梯的政治问题则成为两国冲突的导火索。

三、八月战争的影响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当天，格鲁吉亚境内发生战争。交战一方为格鲁吉亚政府，另一方为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南奥塞梯及其支持者阿布哈兹和俄罗斯。8日凌晨，格鲁吉亚展开全面军事行动，并很快控制2/3以上的南奥塞梯地区，包围其首府茨欣瓦利。俄军于8日下午进入南奥塞梯地区，9日展开军事行动并很快控制了茨欣瓦利，并在随后几天占领了南奥塞梯以外的格鲁吉亚领土和军事基地。在国际调停下，13日，格俄双方就停火原则达成一致。18日，俄军开始从南奥塞梯撤军，2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案，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28日，格鲁吉亚宣布与俄罗斯断交。9月10日，俄罗斯与南奥塞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八月战争的爆发震惊了国际社会，西方社会一致谴责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与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Jaap de Hoop Scheffer）飞到第比利斯支持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赖斯将俄罗斯比作布拉格之春时的苏联，而格鲁吉亚则将俄军行动比作纳粹入侵，是要挑起世界大战。^②这场战争被西方学者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不仅仅是分离冲突，而是俄国对西方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

在西方看来，这场战争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首次对独立主权国家进行的攻击。他们弱化南奥塞梯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而是将它这场战争视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兴起。更有学者撰文认为，八月战争是俄罗斯大战略的一部分，是俄罗斯想通过这次战争将莫斯科所识别的利益范围扩展到高加索地区。^③更有学者认为，这是新冷战的开始。^④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

① Michael Merlingen & Rasa Ostrauskaitė, “EU Peacekeeping in Georgia: Limits and Achievements”, pp.5-8.

② Mike Bower, “The War in Georgia and the West response”,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0, No.2, June 2011, p.197.

③ Brian J. Ellison, “Russi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South Ossetia War”, *Demokratizatsiya*, Vol. 19, Issue 4, September 22, 2011, pp.343-364.

夫 (Dmitri Medvedev) 签署法案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 “明显是嘲弄安理会的存在, 并回应西方在危机前三周希望维护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和维持国际秩序的要求。”^①这一举动激怒了西方, 结果在南高加索形成俄—西方战略前沿。一时间, 华盛顿、伦敦甚至北欧国家都将目光聚焦于南高加索的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 思考如何应对俄罗斯的下一步行动。对此, 梅德韦杰夫表示, “我们并不害怕任何东西, 包括新冷战 (the new cold war) 的前景。”^②这场战争带来了欧亚地区地缘局势的大转换, 使得南奥塞梯分离问题更加国际化。

八月战争表明, 南奥塞梯问题不仅是地区分离问题, 而且是俄国与西方在欧亚地域博弈较量的展现。从时间上看, 八月战争以后,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恶化到比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戈尔巴乔夫时期之前) 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糟糕。^③波波·罗认为, 新的冷战不太可能发生, 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竞争范式却出现了, 双方构建的“战略伙伴关系”丧失了其应有的信誉。^④从空间上看, 八月战争在南高加索爆发, 展现出欧亚博弈的对峙线正式形成, 欧洲“扩展式”的安全结构定格在南高加索的南奥塞梯, 同时这也昭示西方的扩展战略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俄罗斯公开使用武力进入格鲁吉亚, 并对国际社会宣布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表明俄国仍掌握着国际政治变更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而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次对抗中处于下风,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显疲软。从结构上看, 八月战争的本质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单极体系内在矛盾深化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缺乏制衡的美国霸权在进攻性扩张时遭遇俄罗斯武力对抗而出现的疲软结局。^⑤从

④ Housman A. Sadri & Nathan L. Burns, “The Georgia Crisis: A New Cold War on the Horizon?”,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2), Spring 2010, CRIA 2010, pp.126-144.

① Ian Traynor, “Russia: we are ready for a new cold war”, *The Guardian*, Wednesday 27, August 2008.

② Ibid.

③ [英]波波·罗: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过去、现在及未来”, 《俄罗斯研究》, 2009 年第 4 期, 第 3 页。

④ [英]波波·罗: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过去、现在及未来”, 第 3 页。

⑤ 朱锋: “俄格冲突的国际政治解读”, 《现代国际关系》, 2008 年 11 月, 第 6-12 页。

趋势上看，格鲁吉亚对南奥赛梯统合的失败，使萨卡什维利政权遭受巨大冲击，西方推广民主战略塑造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和平友善国家的事实，与“颜色革命”后恶化的国内社会关系，使各国感受到民主化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理论展现出来的“国族建设”与“民主化”工程，并不能保证后苏联空间的转型国家能够强盛起来，反而将他们的转型弄得一塌糊涂。正如萨卡什维利的反对派所说，“民主的质量仿佛回到‘颜色革命’前期的谢瓦尔德纳泽时代。”^①俄格战争以后，格鲁吉亚爆发大规模反对派运动，其民主评级也下降了一个层次，成了“部分民主”国家。而北约在格鲁吉亚的存在加剧了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政府多次指责反对派与俄罗斯合作，阻碍了北约在格鲁吉亚发挥作用。^②与此同时，暴力冲突和反政府斗争在格鲁吉亚展开，萨卡什维利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告诉他（萨卡什维利），只有他不在，格鲁吉亚才能保存下来。”^③在西方支持下通过“颜色革命”建立的“民主格鲁吉亚”在处理国际冲突时展现的颓势和危机，不仅反衬了欧亚威权政府的强大有力，也给西方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和西式民主的未来嫁接带来负面影响。

八月战争给欧亚的地缘政治结构、欧洲的安全结构、美国的霸权体系、民主化浪潮以及格鲁吉亚的政治统一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而巧合的是，这次战争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爆发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将西方的无力感展露无遗。同时，权力转移也在悄然进行。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带来的崛起势头以及俄罗斯政治大国的威权形象，也不断冲击着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结构。八月战争凸显了国际组织，或者说国际机制，在解决冲突方面的无力感。现实主义再次回归成为国际政治思考的主流范式，有关新冷

① *Caucasus Reporting Service*, No.466, October 30, 2008.

② Per Gaharton, “Georgia: Pawn in the New Great Game”, New York: Plutopress, 2010, pp.197-198.

③ *Caucasus Reporting Service*, No.492, May 8, 2009.

战、冷战思维方面的研究又成了学者们热衷探讨的话题。^①更为重要的是，八月战争在国际层次上转变了分离问题，分离的国际化程度再次提高。南奥塞梯分离成为典型的大国干预案例，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未来的分离理论和实践。

四、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另一场地缘政治地震

如果说八月战争改变了欧亚地缘政治结构，给欧洲安全和美国霸权带来冲击的话，那么乌克兰东部地区在分离形势下相继举行公投，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则是另一场地缘政治地震。克里米亚早在乌克兰独立之初就释放出强烈的分离信号。与南奥塞梯不同，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非常看重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域，长期以来受到俄罗斯帝国的控制。直至苏联成立后的1954年，为纪念乌俄合并300周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由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且都处于苏联版图之中，因此双方对此并无歧意。

尽管克里米亚位于乌克兰南部边界，但却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也是俄南方海路的战略要冲，与俄罗斯有着天然亲密的联系。此外，克里米亚260万人口中，60%以上是俄罗斯族，还有20%乌克兰人，7%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民族。对后苏联空间国家来说，地区的多样性往往隐藏着社会分裂和冲突。90年代中期，克里米亚就因为俄国人、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紧张关系，被称为“注定爆发冲突的半岛（a fateful peninsula）”，^②而乌克兰则被称作是“地区组成的国家”。乌克

① 关于新冷战与俄美关系，可参见2008年《俄罗斯研究》第5期的一组文章，即[英]萨克瓦：“是‘新冷战’，还是‘20年危机’”，《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第6-21页；潘兴明：“‘新冷战’问题探析”，《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第22-28页；[俄]卡拉加诺夫：“新冷战，怎么办”，《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第29-33页；王铁军：“‘新冷战’与中俄美三边关系——身份、国际权力结构与国内进程”，《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第34-42页。

② Gwendolyn Sasse,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200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

兰同格鲁吉亚一样，在处理地区和族群冲突问题上毫无经验。^①乌克兰政治精英意识到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和控制冲突的重要性，在“去宗主国化”的同时，也在尝试改变传统政治体系中“中央—边缘”的关系。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多次要求收回克里米亚。乌克兰当局拒绝俄罗斯要求，并在1992年将克里米亚升格为共和国，希望通过改变中央政府和克里米亚的政治关系来获得克里米亚人的支持。但这种政治设计并没有缓解克里米亚寻求独立和冲突频发的倾向。克里米亚半岛如同南奥塞梯一样桀骜不驯，难以将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同乌克兰融合，作出妥协。地方政府对自治化的要求很高，中央政府难以给予，加上乌克兰政府难以妥善处理克里米亚几近崩溃的经济与社会体系，这些因素促使克里米亚进行“分离”的尝试——希望通过独立来进行“自我救赎”。1993年8月，克里米亚议会通过总统法和总统选举法，并于1994年未经乌克兰中央政府同意就举行了总统选举。随后，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决议：支持境内实行双重国籍，加入卢布区，成立“克里米亚武装力量”，并修改宪法，规定“克里米亚要么独立，要么并入俄罗斯”。^②

在克里米亚精英的支持下，早期出现的分离倾向越走越远。1995年3月17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单方面宣布独立。^③但车臣战争的爆发使得俄罗斯难以西顾，加上乌克兰积极改善对俄关系，俄罗斯也认识到乌克兰在独联体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未对这种分离倾向予以强力支持。1997年，叶利钦出访乌克兰。5月，俄乌签订解决黑海舰队问题的三个协定，承认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是乌克兰领土，俄不再坚持领土要求。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德等欧洲国家也支持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分离问题采取强硬立场，并予以经济和军事支持，打压克里米亚俄罗斯民族主义力量。^④乌克兰的强硬态度，特别是俄罗斯的不支持态度，给了克里米亚分离力量以沉重的打击。

① Ibid.

② 金韬、何英：“克里米亚问题：探源与展望”，《今日东欧中亚》，1995年第5期，第44页。

③ 李占奎：“俄乌克里米亚争端及其原因浅析”，《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8月，第56-57页。

④ 赵效明：“试析克里米亚地方独立形势、原因、影响及走势”，《今日前苏联东欧》，1994年第4期，第27页。

尽管克里米亚政府一开始积极支持独立，但多层因素造成其分离运动难以取得成效。与南奥塞梯不同，克里米亚多族群的特征使得分离分子难以迅速有效地整合起反对力量，且克里米亚分离政府在经济变革方面的成绩并不突出，民众对分离倾向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减弱。亲俄派总统梅什科夫（Meshkov）任期内获得的支持率逐步下滑，不足 30%。而且，由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分离问题上表现消极，克里米亚议会的亲俄势力瓦解，议会再次进入真空状态。长期与基辅对抗的梅什科夫集团在经济上乏善可陈，在政治上也没有培养出一支强有力的分离势力，很快就被议会剥夺了政府首脑的权力。^①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重建了总理权威，任命安纳托利·弗兰丘克（Anatolii Franchuk）为总理。在随后举行的乌克兰大选中，89.7%的选民支持被克里米亚人视为亲俄代表的库奇马。库奇马总统成功地在克里米亚人心中树立起了同情者的形象，他“积极将乌克兰整合进独联体结构，支持克里米亚地方自治，将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实行经济改革等”，赢得了大批克里米亚的支持者。^②而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势力也因为基辅政府积极与俄罗斯亲善而逐步丧失了市场，在 1994 年底，仅有 5%的选民还在支持梅什科夫。克里米亚分离势力在国际国内的双重作用下逐步瓦解。

随着乌克兰“颜色革命”的爆发和尤先科上台，乌俄关系急剧恶化。尤先科将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政策的优先方向，引起克里米亚政府的不满。作为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盟友，克里米亚政府将自己打造成“不要北约的地区”，反对北约在半岛上进行军演。2006 年，北约军舰进驻克里米亚，招致强烈抗议，克里米亚人举行了为期 4 天的抗议游行，并组织力量抵制北约重型武器进入塞瓦斯托波尔港。亚努科维奇对外政策上的俄欧平衡也让克里米亚人感觉到不安。这种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交均势政策并没有讨得克里米亚人的欢心。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克里米亚分离力量再次抬头，沉寂一时的俄罗斯势力再度活跃起来。

苏联解体后国民认同的脆弱性造成地方认同和族群认同碎片化存在，乌政府 20 年来对克里米亚进行的乌克兰国家认同建构的失败是分离运动出现

① Gwendolyn Sasse,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p.170.

② *Crimean Truth*, 1994, June 18, p.1.

的最大因素。^①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在强有力的族群认同面前，感觉到被剥夺，不愿为亲欧的乌克兰政府战斗。对自我族群中心论的强调和克里米亚独立性的认同造成了他们的孤立感，他们愿为分离付出代价。而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与将其并入俄罗斯，更是对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一剂强心剂。在违反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条件下，克里米亚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加入”俄罗斯，甚至比南奥塞梯还要容易。这又导致了一次地缘政治地震。

俄罗斯支持克里米亚并入自己的版图，是俄罗斯再次挑战西方主导的欧亚地缘政治秩序和规则的体现。如同八月战争一样，对未来的独联体地缘版图和未来的欧盟与北约东扩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国家再次认识到，仅靠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扩张并不能够弱化俄罗斯的地缘势力范围，反而会引起它的激烈反抗。俄罗斯再次支持分离势力的经验表明，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掌控力。任何独联体国家都必须小心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绝不能使用西方价值观来揣测俄罗斯的行动意图，更不能尝试借助西方来对俄罗斯进行“围堵”，否则自身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在克里米亚分离这场西方与俄罗斯的博弈中，很显然俄罗斯占了上风。克里米亚的回归是俄罗斯在民族情感和地缘政治上的双赢，是“俄罗斯精神”在后苏联空间地缘上的体现。^②

克里米亚之并入俄罗斯，并不是由俄罗斯首先挑起的，却起到了敲打乌克兰政府的作用。它警告亲西方的乌政府不要跃跃欲试采取积极的脱离步骤，逃离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在八月战争和克里米亚分离危机中完全践行了“俄式逻辑”——雷厉风行、不计代价。虽然在这两场危机中俄罗斯的行为遭到西方的批评和制裁，但结果却以俄罗斯胜出而告终。俄罗斯在战术上不顾一切地敲打邻国，承认南奥塞梯独立和合并克里米亚，在战略上展现出谨慎克制，停战撤军并积极谈判的态度，降低了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恶劣影响。^③相对于欧盟和北约在东扩问题上的缓慢低效和小步围堵来说，俄罗斯

① Karina Koroselina, “The impact of National Identity on Conflict Behavio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Ethnic Minorities in Crim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04, Vo.45, No.1, pp.216-217.

② 张文茹：“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政策选择”，《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2期，第22页。

③ “俄罗斯撤军乌克兰，普京表示仍然不排除动武的可能”，环球网，<http://news.e23>。

的应变能力和进击能力更令人印象深刻。

五、 分离国际化之后南奥塞梯与乌克兰东部的选择

南奥塞梯分离政权是高加索地区 4 个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中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甚至其政府都难以完全控制全境。多数国家根据“占领地保有原则”支持格鲁吉亚的国家统一，认为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①但是，八月战争不仅让世界看到格鲁吉亚未能成功取得对茨欣瓦利的控制，却让南奥塞梯分离政权获得俄罗斯的承认。随后，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南太平洋岛国瑙鲁相继与南奥塞梯建立外交关系。2011 年，大洋洲的图瓦卢也与南奥塞梯建交，这被科科伊季称为“勇敢坚毅”的选择。^②截至目前，有 5 个国家承认南奥塞梯。俄罗斯对南奥塞梯的承认，使南奥塞梯的分离找到了良好的庇护。2009 年 1 月，俄在南奥塞梯建立“第四基地”并驻军。^③2010 年，南奥塞梯分离政府国防部长尤里·铁纳耶夫（Yury Tanayev）与俄国防部签署协议，规定俄罗斯拥有免费试用“第四基地”49 年的权利，并可在基地修建军用机场。2009 年 8 月，德孜瑞卡乌—茨欣瓦利（Dzaurikau-Tskhinvali）天然气管道建成，俄罗斯的天然气可直接进入南奥塞梯，这将结束南奥塞梯依赖格鲁吉亚天然气的历史。^④俄罗斯还更改措辞，将八月战争解释为格鲁吉亚企图对少数民族群的南奥塞梯进行“种族灭绝”（Genocide）。如今，防止“种族灭绝”成为南奥塞梯分离政权核心理念。这种理念被南奥塞梯总统科科伊季阐释发挥为“南奥塞梯独立建国的历史就是反对格鲁吉亚种族灭绝的历史”：

第一次种族灭绝是由 1918 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控制的民主共

cn/content/2014-03-05/2014030500835.html

① Gerard Toal & John O'Loughlin, “Inside South Ossetia: A Survey of Attitude in a De Facto State”, *Post-Soviet Affairs*, Vol.29, No.2, 2013, p.6.

② “Tuvalu ‘Recognizes Abkhazia, South Ossetia’”, RFE/RL, September 23, 2011, http://www.rferl.org/content/tuvalu_recognizes_abkhazia_south_ossetia/24338019.html

③ Rusiko Machaidze, “Five Years since the Russia-Georgia War”, *News of Democracy & Freedom*, August 8, 2013, <http://dfwatch.net/five-years-since-the-russia-georgia-war-35171>

④ “New Russian gas pipeline to South Ossetia”,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Vol.179, No.29, September, 2009, p.4.

和国发动的，最终失败于1921年，布尔什维克领导奥塞梯人占领了茨欣瓦利。第二次种族灭绝是1988-1992年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发动的，最终在1992年失败，南奥塞梯政府成立，选出第一任总统，并在俄罗斯的帮助下生存下来。第三次种族灭绝是萨卡什维利在西方的支持下发动了八月战争，最终失败，科科伊季在俄国帮助下取得了胜利。^①

梅德韦杰夫更是直接将种族灭绝与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强调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观念是格鲁吉亚民族特有的极端民族主义。^②在西方看来，梅德韦杰夫对分离政权的支持是对西方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报复”，但在南奥塞梯人看来则是一种体认，是大国对其“独立”斗争的支持，而这种精神联系会长期促进南奥塞梯与俄罗斯的友善关系。南奥塞梯对俄罗斯的依赖直接影响了南奥塞梯分离的选择。2011年夏季，科科伊季直接向俄罗斯表明：如果白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独立，那么南奥塞梯就有可能加入俄白联盟（Union State）。^③与此同时，科科伊季不断提出要“与俄罗斯创建一个联盟国家（Union State）”：南奥塞梯保持分离的同时，将俄罗斯视为核心战略伙伴与同盟。^④这种观念因为一度得到普京的支持而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随后梅德韦杰夫谈及此问题时表示，南奥塞梯暂时还不符合俄罗斯的要求。^⑤

八月战争给南奥塞梯带来巨大破坏，茨欣瓦利毁坏的建筑以及2000名平民的死亡让奥塞梯人反对格鲁吉亚的呼声更为高涨。科科伊季作为坚决反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领袖获得巨大声望，但战争之后科科伊季提出与俄罗斯合并的做法却让部分奥塞梯人失望。奥塞梯人发现他的政治目标开始从“族

① Gerard Toal & John O'Loughlin, "Inside South Ossetia: A Survey of Attitude in a De Facto State", pp.8-13.

② Gerard Toal & John O'Loughlin, "Inside South Ossetia: A Survey of Attitude in a De Facto State", p.12.

③ Grigory Susoev, "South Ossetia may join Russia-Belarus union state," *Russia Today*, August 2, 2011, <http://rt.com/politics/ossetia-union-russia-belarus/>

④ "Eduard Kokoity: South Ossetia to create union state with Russia", *Caucasian Knot*, July 30, 2011, <http://www.eng.kavkaz-uzel.ru/articles/17923/>

⑤ "Is South Ossetia's 'Independence' Under Threat?", RFE/RL, August 5, 2011, http://www.rferl.org/contentcaucasus_report_could_south_ossetia_join_russia/24287705.html

群民族主义”转变为成为俄联邦的一员。换句话说，他的分离要求实质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统一，这与南奥塞梯分离主义即南奥塞梯成为独立国家的政治观念有所区别。反对派由此指责科科伊季将南奥塞梯独立共和国变为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而不顾及其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科科伊季对权力的运作与巩固政权的做法，也遭到一些反对派的不满。在南奥塞梯政府，总理和各位部长的权力仅具有“装饰性”，财政、军事和外交等核心权力都掌控在总统科科伊季个人及其随从手中。^①

2009年5月，南奥塞梯议会选举向格鲁吉亚乃至世界宣示了南奥塞梯的独立地位。最终，南奥塞梯统一党（Unity Party）以46.38%的选票赢得了议会选举，而另一政党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获得了22.53%的选票，共产党获得22.25%的选票。南奥塞梯统一党是仿照俄联邦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命名的，其成立与发展也较多地借用了俄国政党运动的策略。^②美国与北约谴责这次议会选举的非法性，欧盟甚至否定这次选举的意义。^③但是，德国、波兰甚至意大利，都派出观察团监督此次选举，认为这次选举具有“符合一般民主的标准”。^④34位议员最终代表分离政权行使立法权。84岁的议长加西耶夫表示：“除了独立，我们别无所求。”^⑤议会中参与组阁的两个政党（统一党与共产党）均效忠于科科伊季，而反对派政党则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南奥塞梯反对派领袖阿兰·加西耶夫（Alan Gassiyev）声称这次选举不合法，因为这次选举加强了科科伊季的个人权威。^⑥

反对派对科科伊季的不满不仅在于其企图将南奥塞梯并入俄罗斯的思想

① Alexander Skakov, “South Ossetia: Aftermath and outlook”, Carnegie Moscow Centre, Russian Expert Group, Report No.2011/1, p.2.

② Brian Robert Marksberry,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 p.79.

③ “Russia ally strengthens grip on South Ossetia,” *Daily Telegraph*, June 1,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georgia/5421164/Russia-ally-strengthens-grip-on-South-Ossetia.html>

④ “The week in review - South Ossetia elections denounced by West”, *online independent newspaper the Moscow News*, June 4, 2009, <http://themoscownews.com/news/20090604/55379020.html>

⑤ “南奥塞梯‘统一党’赢得议会选举”，星岛环球网，http://www.stnn.cc/euro_asia/200906/t20090601_1037595.html

⑥ “Voting under way in South Ossetia”, 31 May 2009, <http://www.aljazeera.com/news/Europe/2009/05/20095316543146289.html>

法，反对的理由还有：科科伊季对权力的垄断并难以接受不同意见，茨欣瓦利的城市重建缓慢，俄国拒绝对已许诺项目予以财政支持，大量人道主义款项被侵吞以及德孜瑞卡乌—茨欣瓦利天然气管道工期的拖延。^①根据 2009 年末的调查，73%南奥塞梯人认为南奥塞梯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正在恶化，75.7%的南奥塞梯人对重建工作感到不满。^②前南奥塞梯议会发言人阿兰·加西耶夫、安全委员会秘书安纳托利·巴拉科维奇（Anatoly Barankevich）、前副发言人塔尔扎·科科伊季（Taran Kokoity）以及人民党领袖罗兰德·克拉斯萨耶夫（Roland Kelehsayev）、修建德孜瑞卡乌—茨欣瓦利天然气管道的 Stroiprogress 公司总经理阿尔伯特·杜左苏耶夫（Albert Dzhussoyev）、前共和国检察官威亚奇斯拉夫·格波佐夫（Vyacheslav Gobozov）、银行家列奥尼德·提比洛夫（Leonid Tibilov）、共和国前总理尤里·莫洛佐夫（Yury Morozov），甚至铁德耶夫家族的詹姆布拉特·铁德耶夫，也参与到反对科科伊季的政治运动中。2009 年 10 月 9 日，反对派在莫斯科举行论坛，将反对科科伊季的力量整合起来。反对派迫切希望在 2011 年的总统选举中换下科科伊季。俄国部分高级官员出于对南奥塞梯财政援助有效利用的关切也参加了莫斯科论坛，希望改变南奥塞梯腐败的政治局面。2011 年 11 月，南奥塞梯举行总统大选，科科伊季获得 99.1%选票当选总统，结果却被南奥塞梯最高议会宣布无效。^③议会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斯坦尼斯拉夫·科契耶夫（Stanislav Kochiev）更是反对科科伊季修改宪法的要求。出于无奈，科科伊季放弃竞选，并辞去总统职务，由莫斯科支持的南奥塞梯分离政府总理布洛夫切夫（Vadim Brovtsev）代理。2012 年，南奥塞梯再次举行总统选举，银行家列奥尼德·哈里托诺维奇·提比洛夫（Leonid Tibilov）在第二轮获得 54.12% 的多数票取胜，成为新一任南奥塞梯总统。^④这位前 KGB 官员，表达了与俄罗斯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的愿望，并表示希望“南北奥塞梯合并的梦想成真”。

① Alexander Skakov, “South Ossetia: Aftermath and outlook”, p.1

② Ibid, p.2.

③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uth_Ossetian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11

④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esident_of_South_Ossetia

① 普京通过电话向其表示祝贺。2012年普京总统与提比科夫举行会晤，商讨如何恢复南奥塞梯的经济。普京表示：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现代化最为困难的时刻给予了帮助，现在也一样。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南奥塞梯，支持其经济和社会的恢复。^②

2012年10月，提比洛夫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并会见普京总统，双方签署了双边协议。2013年5月，普京再次与提比洛夫会见，直呼南奥塞梯为国家（nation），对南奥塞梯“独立”5周年表示庆祝。^③提比洛夫与普京的频繁互动表达了南奥塞梯想借助莫斯科获得迅速发展的愿望，是提比洛夫的“融入战略”在外交上的演绎。提比洛夫表达了南奥塞梯的双重公民身份：不仅是南奥塞梯人，更是俄罗斯人。大多数南奥塞梯人参与了2012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92%的南奥塞梯选民支持普京总统。^④普京很早就表达过与南奥塞梯成立联合国家的认可，对南奥塞梯的融入要求是否如前任梅德韦杰夫总统那样予以模糊回绝，则取决于格鲁吉亚和西方在高加索的未来战略。

尽管南奥塞梯的威权政权并不能让其公民满意，但他们反对格鲁吉亚的决心使其坚定地走上了独立道路。目前南奥塞梯塑造出两种分离文化：（1）过渡分离文化，即分离是一种过渡状态，与北奥塞梯合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则是其最终目标。（2）分离独立文化，即业已成立的南奥塞梯共和国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独立状态，并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与支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目前来看，南奥塞梯总统显然支持第一种过渡分离文化。南奥塞梯人对普京总统的信赖与支持、对俄罗斯的依赖，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会随着南奥塞梯与俄罗斯双边合作的提升而不断加强。格鲁吉亚作为南奥塞梯的对立面，已经从敌人意象模糊为陌生人意象。南奥塞梯建构出来的“过渡分离”文化将自身作为俄罗斯特殊的一部分，这种观念

① “Ex-KGB man wins South Ossetia presidential election”, Tskhinvali, Georgia, April 9,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4/09/us-georgia-southossetia-election-idUSBRE83805O20120409>

② “Talks with President of South Ossetia Leonid Tibilov”, Sochi, May 12, 2012, <http://eng.kremlin.ru/news/3819>

③ “Meeting with President of South Ossetia Leonid Tibilov”, Sochi, May 12, 2013, <http://eng.kremlin.ru/news/5453>

④ “Talks with President of South Ossetia Leonid Tibilov”, Sochi, May 12, 2012.

虽然也遭到众多南奥塞梯人的反对，但却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架构保证这种反对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俄罗斯对南奥塞梯的持续影响已经使南奥塞梯成为俄罗斯在高加索的军事政治重镇。而这种相互建构不断塑造着南奥塞梯的分离文化。如果西方或者格鲁吉亚没有培育出有效的对话机制，同时没有改变对南奥塞梯的政治冷漠，这种僵局将长期存在，其独立倾向会愈加突出。

相较于南奥塞梯的分离现实，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情势则较为简单：（1）大国势力介入有限，国际力量难以直接参与。俄罗斯在合并了克里米亚以后从俄乌边界撤军，转为观察状态，而西方国家则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并小心谨慎地采取间接行动，避免激怒俄国；（2）建构式和系统式分离文化难以迅速形成，也没有分离的历史经验和技术手段。没有强大的政治精英和政治势力以及出众的政治人物来有效组织领导这场分离运动，分离出现混乱、无组织性、无目标性的特征。虽然乌克兰的国家构建在苏联解体后就提上日程，但乌克兰一直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民主国家类型之间摇摆。与走上集权的格鲁吉亚不同，当前的乌克兰在政治上并不稳定，地方势力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东部分离运动无法被迅速平定，可以看出乌克兰中央政府在解决冲突时较为弱势。与政治体系相联系的是认同，乌克兰危机的走向越来越成为各地方政府为自我利益而斗争的国家内乱。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的亲俄势力占领政府，宣布成为分离政府。他们几乎都是在效仿克里米亚模式，发动人民起义，希求俄国支持，完成地方诉求。与格鲁吉亚不同，乌克兰政府对于出兵非常克制和谨慎，并时刻观察着俄罗斯的举动，担心俄罗斯对乌东部的直接介入。而俄罗斯在合并克里米亚后，也在关注着亲俄势力的行动，防止乌克兰完全落入西方手中。总之，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在长期前景中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的，而分离问题能否处理得好，还要看乌克兰政府与俄罗斯和东部地方武装力量之间的互动。

结 论

南奥塞梯的分离演进符合认同政治学的路径：（1）精英分离倾向的形成，创造出小型的认同环境；（2）格鲁吉亚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塑造出反格

吉亚主义，这种反格鲁吉亚主义塑造出“他者”，促成分离倾向的“正义色彩”与积极色彩；（3）20世纪90年代格南冲突后，经历15年左右的停战期。这段时间是分离的传播与动员阶段。尽管在前期南奥塞梯政府难以为继，但是俄国的支持以及格鲁吉亚在“颜色革命”后关闭埃尔格涅提（Ergneti）市场^①和发生冲突的行为，增强了南奥塞梯民众的仇恨心理，并随着政治和经济因素渗入到民众意识当中；（4）新的分离思想成形并构成一种新的分离理念，强有力地维护着南奥塞梯的分离情势，并试图独立。八月战争之后，南奥塞梯不仅成功维护了准独立的现状，更是获得了俄罗斯的承认。分离成为具有认知与行动的信仰。分离的国际化使南奥塞梯更容易引起国际关注和介入，而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的僵局将难以解决。

南奥塞梯的分离在苏联末期由南奥塞梯地方最高苏维埃正式提出。当时还仅仅停留在书面上，但经过与格鲁吉亚的战争、JCC与OSCE的关注、大国势力的干预、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升级、最后八月战争的爆发和俄罗斯对南奥塞梯的承认等一系列过程，分离已经完全成为一种带有号召力与影响力的地方文化生态。这种生态不仅生存下来，并且以民族自决权为合法性，获得了俄罗斯的支持，而且阻止了格鲁吉亚的侵袭，成为一种独立的象征。分离已经成为南奥塞梯的标签符号，具有特殊意义。按照这种理论推演，分离由于获得了大多数南奥塞梯人的支持并且已经内化为独立的象征，难以改变。格鲁吉亚将长期面对这一现实。

当今乌克兰危机也在酝酿分离风险，乌克兰东部的分离运动和叛乱与南奥塞梯分离情境有相似之处。乌克兰东西部的分裂将使统一的主权国家面临生存危机，政府集团和反政府武装在“谁更适合乌克兰”和认同问题上纠缠相持，再加上俄罗斯和欧洲大国势力的介入，使得局势更为复杂。所幸的是，乌克兰反政府力量还没有形成分离文化，其简单要求“独立或加入俄罗斯”并不对所有民众具有吸引力。但从另一方面看，乌克兰地方分离势力与大国势力大量接触，分离的国际化倾向难以逆转。如今东部地区骚乱更是越演愈

^① 埃尔格涅提（Ergneti）小镇靠近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1996年作为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贸易的集市开放，交易各种商品。埃尔格涅提市场逐渐发展成为南奥塞梯地区最大的市场，并且为南奥塞梯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税收。2004年6月，萨卡什维利关闭了埃尔格涅提市场。

烈，冲突和战斗造成大量民众伤亡，国际势力更有机会介入乌克兰东部分离运动之中。如果乌克兰政府在应对分离势力问题上操之过急、处理不当，乌克兰有可能出现分裂。但无论是格鲁吉亚问题还是乌克兰问题，都只是苏联解体后一体化的地缘空间破碎过程的延续。弥漫于后苏联空间的分离局势将会随着复杂的国际情势、大国势力的介入和民众高涨的政治参与浪潮，呈现出更为激烈的情形。后苏联空间的国家政治稳定、统一和体制安全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 Abstract 】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risis in Ukraine, whether Eastern Ukraine will separat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urrent academic discussion. Comparing current separation issues in Eastern Ukraine and South Ossetia in Georgia, we will find both exist the risk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separation. Unlike in Ukraine, the risk of separation in South Ossetia is more difficult to control. As an unrecognized political entity, South Ossetia not only deals with domestic ethnic problems, but also relates to international ethical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eparation in South Ossetia, there are two effects. First, it is hard to solve ethnic problems because of involvement of great powers. Second, the constructivist strategies of sepa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ystematic scenarios of separation make it hard to solve separation issues completely. Separation will exist as longstanding political status quo. Meanwhile, the separation of Eastern Ukraine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 following two factors. First, there is limited intervention of great powers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international forces to be directly involved. Second, it is hard to quickly shape constructivist and systematic culture in separation, in addition to lack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echnical means in separation. Risk of separation in Eastern Ukraine may get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for a long term.

【 Key Words 】 Separ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Comparison, Eastern Ukraine, South Ossetia, Ukraine, Georgia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начала кризиса в Украине вопрос об отделении восточной Украины стал горячо обсуждаемым вопросом в среде учёных. Сравнивая проблему отделе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Украины и проблему отделения Южной Осетии от Грузии, можно заметить, что в обоих случаях существует риск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отделения. Отличием от Украины является то, что риск отделения Южной Осетии сложнее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Вопрос Южной Осетии, как непризнан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не только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е внутр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но и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касается вопрос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орального кодекса и множества других вопросов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отделения Южной Осетии повлекла за собой два аспекта: во-первых, вовлечение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трудность разреш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во-вторых, тактик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стской модели разделения, а также создание условий систем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привели к сложности полного раз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отделения, отделение превратится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татус-кво Южной Осетии, который сохранится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А отделение восточной Украины происходит, во-первых, из-за ограниченн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и сложностей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л; во-вторых, из-з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быстро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культуры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стской и системной моделей отделения, а также отсутств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и техн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отделения. В дл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риск отделе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Украины может быть ограничен эффективным контролем со стороны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равнение, восточная Украина, Южная Осетия, Украина, Груз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从欧洲化到苏维埃化的跨欧亚帝国治理： 关于欧亚主义的论述*

林精华**

【内容提要】1920-30年代，有一批俄侨知识分子务实面对苏维埃化了的俄罗斯，力图重建关于俄罗斯帝国——苏维埃国家之认知，因而出现了欧亚主义运动。以特鲁别茨柯依为代表的欧亚主义思想家们，并非在海外闭门造车，而是立足于复杂的历史经纬，具体论述了欧化治理方式的不合时宜性，包括俄罗斯文化和欧洲文化之差别、俄罗斯东正教与欧洲基督教之不同、俄国地理位置的跨欧亚性等。他们还以此来证明苏维埃制度的合法性，肯定其终止欧化进程的必要性和意义。俄侨知识分子的构成复杂，关于欧亚主义的相关论述也充满了矛盾。数十年间，欧亚主义思潮在苏俄境内默默无闻，可是在后苏联时代，随着白银时代和俄侨文化遗产的再发现，以及俄国融入欧洲的过程困难重重，它却在俄联邦各阶层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跨欧亚疆域 帝国治理 欧化 苏维埃政权

【中图分类号】D73/7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3-0138-(51)

众所周知，伴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白银时代大批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中的许多人难以接受布尔什维克党强行破坏各政党在。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7)的阶段性成果。

**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然而，许多著名知识分子被迫出走，出现 20 世纪第一波移民潮，以及不断发生的血腥事件和内战规模的扩大，都未能阻止苏俄社会的发展方向越来越有利于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甚至建立了疆域更为辽阔的苏联，还更有效地践行了反西方价值体系的传统，并在对抗西方中变得更为强大。

这样的结果及其生成过程，使得大批寓居在欧洲的俄侨不得不积极关注并思考现实的俄罗斯问题，由此促成了一系列思想成果的诞生：1922 年旅居西方的军事指挥家和战争史学家葛罗文（Николай Головин, 1875-1944）中将发表《参与过去和未来战争的空军》（1922）、《1914 年战争史中的俄罗斯前线：战争起始与对东普鲁士行动》（1926）、《坦克参加的过去和未来战争》（1925）等关于战争问题的著作。东正教神学家卡尔萨文（Лев Карсавин, 1882-1952）则从 1926 年开始主持欧亚主义研讨班，以“俄国与欧洲”为题讨论苏俄化了的俄罗斯问题，由此产生了卡尔萨文本人《欧亚主义即社会主义之重新审视》、什科廖罗夫（Т.Шкляров）《未来的俄罗斯国际关系》、法学家罗泽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Родзевич, 1895-1988）《俄国统治阶层之形成》、音乐学家苏福钦斯基（Пётр Сувчинский, 1892-1985）《论俄国新统治阶层的类型》等力作。在著名的 12 辑《欧亚主义纪年》（Евразийская хроника, 1924-1937）中，不少篇章肯定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俄国的变化，如第 5 辑（副标题为《手稿（На правах рукописи）》（1924）中就有犹太裔东方学家尼基金（Василий Никитин, 1885-1960）《中东问题中的波斯》和《红军战略的新态势》、利沃夫（С. Львов）《论当代俄国》、沃尔金（М. Волгин）《伏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的〈我们〉》、德莫夫斯基（Роман Дмовский）的《工人问题的昨日和今天》等。这些文章或论苏俄的内战、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或探讨苏俄的意识形态问题，多为即时问题。这不是特例，《欧亚主义纪年》第 10 辑（1928）亦然：这一辑发表了包括欧亚主义运动奠基人特鲁别茨柯依（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 1890-1938）公爵《国家意识形态与军队》、《论乌克兰问题》和《答多罗申科的信函》，苏福钦斯基《论新俄国的统治阶层》、尼古拉·季莫菲耶夫（Николай Тимофеев）《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和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 1879-1964）的《义务和权利》、卡尔梅克族著名学者和欧亚主义运动代表哈尔—达万（Эренджен Хар-Даван,

1883-1942) 博士《从蒙古观点看欧亚主义》、伊凡诺夫 (Владислав Иванов) 的《论一天的问题》、法学家伊里因 (Иван Ильин, 1883-1954) 的《论欧亚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亲近性》、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及文学家萨维茨基 (Пётр Савицкий, 1895-1968) 《论工业化问题》、热克林 (Н. Жеклин) 《工业需要去民族国家化吗?》等, 无不是讨论俄罗斯现实问题的。多年后出版的第 11 辑 (1935), 则发表了萨维茨基《论克服省籍》和《俄罗斯历史上的“上升”与“衰败”》、那位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欧亚主义文化的精神前提条件》和《世界革命与人的精神使命》、他和同仁合作的《世界会走向同一个意识形态吗?》, 以及特鲁别茨柯依《论理念——管理国家意识形态的人物》、著名的将领契赫泽 (Константин Чхеидзе, 1897-1974) 《经济意识形态内容》等文章, 都是关注苏维埃现实问题的力作。而这些侨民创办的其他丛刊, 同样热衷于讨论苏维埃化的俄罗斯问题, 如《欧亚洲》1928-1929 年就先后发表《共产主义的另一面》、《论对马克思主义之克服》、《俄罗斯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论共产主义一党统治》等。而许多重要的欧亚主义者, 始终是关注现实的俄罗斯问题, 如尼基金后来在《欧亚洲》丛刊发表《我们和东方》、《石油问题》、《俄国与波斯》等。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有意味的是, 在这些关注现实俄罗斯问题的文章中, “欧亚主义” (Евразийство) 或“欧亚洲” (Евразия) 之类新概念经常出现。而且, 在巴黎、柏林、布拉格等俄侨知识分子集中地, 1920-30 年代涌现的大量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出版物, 其宗旨多和这类概念有关:

1920 年, 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索菲亚出版《欧洲与人类》 (Европа 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开始提出欧亚主义设想, 即欧洲价值体系未必等同于全人类的文明方向。此说的旨意在于提醒苏俄知识分子: 反对欧洲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可能更适合于跨欧亚的俄国。

1921 年 8 月在索菲亚出版了论文集《面向东方: 预感及其实现——欧亚主义者之主张》, 作者包括萨维茨基、特鲁别茨柯依、东正教哲学家和东正教神学家弗洛罗夫斯基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1893-1972)、苏福钦斯基、东正教神学家和教会活动家卡尔塔舍夫 (Антон Карташёв, 1875-1960) 等。这部文集, 正式提出“欧亚主义”术语, 并成为此后欧亚主义思潮的纲领,

影响相当一批俄侨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这种从现代性角度解释俄国历史、预测未来俄国命运的论述，得到了维尔纳茨基（Георгий Вернадский, 1887-1973）、卡尔萨文、沙赫马托夫（М.М. Шахматов）、尼基京、弗兰克（Семён Франк, 1877-1950）、彼契里（Петр Бицилли, 1879-1953）等杰出史学家，以及伊利因（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н, 1891-1974）、阿列克谢耶夫等法学家呼应，却遭到史学家米柳科夫（П.Н.Милюков）、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1874-1948）和基泽维杰尔（А.Кизеветгер）等的激烈批评。

1922年在柏林出版了影响力巨大的文集《在途中：欧亚主义者之主张》（На путях），内含特鲁别茨柯依《印度宗教和基督教》与《俄罗斯问题》、弗洛罗夫斯基《论爱国主义的正义和罪恶》、彼奇利《旧世界历史中的“东方”与“西方”》等力作。

1923年在柏林和巴黎开始创办《欧亚主义期刊》（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1923-1927），由卡尔萨文、Н.阿列克谢耶夫主编，共出版三辑（接续《面向东方》和《在途中》编号，即欧亚主义文集五辑。此后，1929、1931年在布拉格和巴黎分别出版的《欧亚主义文集》、《而立之年》，则编号为欧亚主义文集第6、7辑）。

1924-1937年在巴黎出版了影响力持续不减的12辑《欧亚主义纪年》（Евразийская хроника），包括欧亚主义的理论探讨、苏联政治和经济生活述评等，作者群包括伊里因、契赫泽、卡尔萨文、门捷列夫（Павел Менделеев, 1863-1951）等著名俄侨知识分子。

1926年在巴黎出版《欧亚主义：系统解释之尝试》（Евразийство）。

1927年出版《欧亚主义：1927年表述》（Евразийство）。

1928-1929年在巴黎出版35期关于文化和政治周报《欧亚洲》（Евразия）。

1929-1934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双月刊《欧亚洲人》（Евразиец），共25期。

.....

这些著述成就了若干杰出的欧亚主义思想家，包括在欧亚主义问题认知上最具预见力的特鲁别茨柯依公爵、深刻批评欧亚主义运动缺点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也包括阿列克谢耶夫、彼契里、萨维茨基、维尔纳茨基等积极推动欧亚主义运动的人士。他们对苏俄时期的俄罗斯问题展开多番论述，从欧

洲—俄国、欧亚洲的历史文化结构中讨论已经布尔什维克化后的俄罗斯问题。正如标志着欧亚主义运动正式开始的论文集《出走东方》（1922）的序言所说：“在世俗事务方面，我们的情绪即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我们不想就局限于民族沙文主义的狭小范围内。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自发而具创造力的俄国民族主义，实质上已经艰难地解除和打破了西欧标准下的民族主义局限，甚至在民族意识方面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波及到了俄国的森林和草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再次切近的不仅是俄罗斯民族，还有斯拉夫民族的斯拉夫派。我们要面向民族主义的主体，不仅包括斯拉夫民族，还包括欧亚世界的各民族。在欧亚民族中俄国人占据了居中的位置。东欧和亚洲各民族参与到俄国的世界文化之思想氛围之中。我们认为，这种情形根源于共同而深沉的‘灵魂的亲和力’——所创建的俄罗斯文化概念和对其他民族的亲近，以及他们参与到俄罗斯事业中来所产生的特有的成效，还根源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各民族互动。俄罗斯人和‘俄国世界’的各民族，本质上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而是把固有的和我们周遭的文化与生活因素聚集起来了。我们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是欧亚洲人。”^①这样的文字，在论述基调和论题范围上确定了欧亚主义思潮的态势。

对于这笔规模庞大的俄罗斯思想史遗产，别尔嘉耶夫《欧亚主义者》（1925）如是评价道：“欧亚主义者捕捉到了俄罗斯青年的某种广泛流行的情绪，这是对内战和革命之体验。欧亚主义先是情感方面的，而非智性的，情感是对所发生灾难的民族本能和宗教意识之创造性反应。这种精神形成，可以转向俄罗斯法西斯主义”^②。在1920—1980年代，由于俄罗斯知识分子被区隔为苏联境内和境外，这一极具召唤力的社会思潮无法对苏联社会发生积极的影响。1980年代末以来，在还原历史原貌的浪潮不断冲击下，这一遗产被意外发现。由于冷战演化为后冷战，加上实行资本主义的俄联邦融入欧洲的努力屡遭挫折，这种情感性论述，迅速激发了知识界重新关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 1912-1992）在苏联时代独立探讨欧

①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Предчувствия и свершения.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 Книга 1. София: Российско-Болгарском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е, 1921, С.3-4.

②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Евразийцы// Журнал "Путь", №1, 1925.С.135.

亚主义的思想史遗产，重建欧亚图景，并形成了新“欧亚主义”思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俄联邦重视发展国家的亚洲区域、在原苏联空间建立欧亚联盟、与亚洲国家合作发展，以有效对抗欧洲一体化。

问题是，18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欧洲化的俄国，通过殖民主义方式发展成疆域连片的俄罗斯帝国，一直藐视境内亚洲民族的历史传统，孜孜以求地借助欧洲化了的俄罗斯文明去改造并入其版图的亚洲各族群，并以这样的姿态面对中国、印度、日本、朝鲜、阿拉伯世界等，为什么会在白银时代到来之前产生欧亚主义思想？欧亚主义思想又如何能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演变成欧亚主义思潮？这样的欧亚主义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应？

俄罗斯帝国及其治理的认同与危机：欧亚主义思潮的思想史根据

不可否认，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思想的重要流派和概念，并不是这批流亡知识分子在海外书斋里面壁玄思出来的，也不是这些俄侨知识分子智慧超常，面对苏俄变革就能自行构想出来。按别尔嘉耶夫《欧亚主义者》（1925）之说，“欧亚主义者热热闹闹登场，不可一世，自命不凡地致力于原创、发现新大陆……其实原创性理念甚少（只有特鲁别茨柯依公爵提出了俄罗斯历史上的里海沿岸—鞑靼概念），它们是对老一代斯拉夫派人士、丹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Данилевский, 1822-1885）、20世纪初某些思想家，如典型的欧亚主义者艾尔恩（Владимир Эрн, 1882-1917）思想的复制”^①。如此论述，并非是为侨民知识分子的义气之争，乃是有历史根据的指正：17世纪以来，沙俄就不断扩张，成为疆域越来越大的跨欧亚帝国。对这样辽阔的疆域，彼得大帝开始大规模采用西方的方式进行管理，促成帝国加速扩大、强大，但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治理问题。对此，18世纪末以后，就不断有知识分子探讨如何有效治理跨欧亚帝国的问题。但无济于事，用西化方式治理帝国所产生的矛盾，在激进的1861年改革之后，随着国力突飞猛进而更为尖锐，

^①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Евразийцы// Журнал "Путь", №1, 1925.С.134.

由此促成当时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列昂季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Леонтьев, 1831-1891）开始尝试提出欧亚主义概念、以及以此再造俄国的设想。

出身于卡卢加州一个贵族之家的列昂季耶夫，能提出这样的设想，与其独特的经历有关：1854年他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就主动去克里米亚参加俄土战争。负伤后退役，遂去彼得堡从事文学活动并小有成功。后来他又回到克里米亚，并在那里娶妻生子。克里米亚这种在他看来跨欧亚的地理位置，一定保持有独特的俄罗斯个性。1863年列昂季耶夫开始在外交部任职——在多个地方任（副）领事达15年之久。1880年，他又任职于莫斯科新闻报刊审查委员会。作为有过战场经历的外交官，他深切关心国家治理问题，先后发表了《教育与民族性》（1868）、《作为世界破坏手段的中欧》、《我们的自由主义有怎样的危害以及如何危害的》（1885）等重要论著，以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东正教角度讨论跨欧亚帝国的国民素质、俄欧关系、自由主义思潮等重大问题，认为俄国最大的威胁是一些人迷恋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改革带来的庸俗化潮流、不清楚欧洲的实质等。

1875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国立俄国历史和考古学会报告》第3期上发表长文《拜占庭思想和斯拉夫主义》（1875），这样论述道：俄国在与得到西方支持的土耳其争夺克里米亚的战争失败后，被迫加大了西化改革的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帝国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如何协调拜占庭传统和斯拉夫身份，从而有效地对抗与俄国价值体系矛盾重重的西方文化。拜占庭思想包括国家制度的王道、不同于罗马教会的东方基督教神学制度、对世俗生活的失望、追求道德完满等，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相关区域的艺术和审美，甚至生活方式，“拜占庭给了人类完满的宗教法律，给了基督教义完整和力量。拜占庭帝国的居民以其时代和社会而自豪”，其成就替代了君士坦丁堡及其势力所及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日耳曼之影响力，但在与西方的交锋中失败了，造成了在地中海沿岸已难觅正教的痕迹，只是斯拉夫和罗斯—俄国才延续了其辉煌，“俄罗斯的沙皇思想比拜占庭的凯撒思想更根深蒂固。拜占庭凯撒思想有专制性，也有民权特征”，“倘若我们找到了真正古老的、有坚实道德的大家族（不管其血统是德国的、希腊的、波兰的或小俄罗斯的），那么我们会看到它拥有最强烈的正教性、教会性、宗教性、忏悔、罪恶意

识，而不是超越宗教去体验宗教感情、责任原则、不承认罪恶和忏悔，同时不放弃自由的或追求幸福的愿望”，“我们的皇权主义对我们是卓有成效和弥足珍贵的，它是在正教影响下，在拜占庭理念和拜占庭文化影响下坚挺起来的。拜占庭理念和情感把近乎野蛮的罗斯联结成一个整体，拜占庭给了我们忍受鞑靼迫害和长期统治的力量”。但彼得大帝改革之后的俄国发展态势充满着矛盾，虽然俄罗斯早已成为独立牧首区（始于1598年），理论上俄罗斯东正教更应该成为强力阻止西方价值体系入侵的力量，而实际上俄国反而越来越受欧洲的影响，而且追求欧洲的自由-平等-进步是以东方正教精神之衰落为代价的，拜占庭原则和东方正教在俄国的作用不断受到挑战，俄国在地理位置上居于欧亚洲之事实也因此而更被忽视。而且，这种情形与土耳其以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斯拉夫世界，因宗教、地缘政治和军事-历史等原因而纷争不断、走向衰落相一致。但即便如此，俄国作为整个正教世界的最主要代表还是知晓，“斯拉夫人不应该谄媚欧洲，不要寄望于欧洲永远是微笑和客客气气的，绝不会！要研究欧洲，若可能，若研究成功，甚至可以向欧洲人学习，虽然他们智慧不足，哪怕表现出先进，甚至有某些学识。学识本身还是不能拯救他们，有时学识是愚蠢的抵押品”。而斯拉夫主义“并不是一个历史概念，可以理解为有独特的宗教、法律、日常生活习俗、艺术的族群，共同组成了以其文化而著称的完满且生动的历史图景。论及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终究是清楚的。论及欧洲主义，虽然西欧历史复杂，但相较于各时代和各国而言，具有历史分类所显示出的共同的特征”，诸如德国、盎格鲁-撒克逊、法国的文化，抑或但丁时代的老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等，都有一致的鲜明的历史图景、共同的历史命运，如信仰天主教或新教，尤其是在绘画、建筑风格、哲学潮流等方面表现出反对拜占庭和古希腊罗马的共同的欧洲主义特征^①。

这种关于在斯拉夫身份基础上容纳拜占庭思想，从而使俄国远离世俗化西方的论述，是有俄国根据的。尼古拉一世时代开始流行的官方民族性理论（Теор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народности）——“正教信仰”（Православие）、“王道”（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国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三位一体思想，“与法国大革命所

^① Константин Леонтьев. Восток, Россия и Славянство. М.: Республик, 1997. С.95-97.

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应”^①，此后演变为俄国知识界大多认同的思想。随着局势的发展，1878年柏林条约签订以后，知识界不再对泛斯拉夫主义痴迷，转而考虑容纳欧亚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问题，进而促成人们持续关注列昂季耶夫关于把斯拉夫主义改造成斯拉夫身份和来自拜占庭正教之信仰融为一体的论述。这使得该作常再版：1876年出版单行本，1885-1886年出版的论文集《东方、俄国和斯拉夫主义》（第1卷）、《列昂季耶夫文集》第5卷，皆收录此文。这些论著为19-20世纪之交俄国知识界思考这样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即帝国历经了30年快速改革后，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轨道，却没有为疆域不断扩大的跨欧亚帝国之稳定增加相应的力量。

而列昂季耶夫思想能成为后来欧亚主义运动之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直观上和这样的历史变化情势相关：1855年克里米亚战败后，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Александр Горчаков, 1798-1883）建议沙皇重新面向欧洲，进一步强化俄罗斯学习欧洲的力度，以此来改造帝国的亚洲部分，并向亚洲国家提供欧化经验。1861年改革具体实施，与其提议不无关系。改革进程是释放了生产力，却严重动摇了官方民族性理论的基础。改革十年后，那位著名思想家丹尼列夫斯基发表力作《俄国与欧洲》（1871），对此深表忧虑，尤其是提出重新认识俄国的理论，主张：应不再依据欧洲既有的关于世界认知理论，而是按跨欧亚的俄罗斯帝国及其与世界的复杂关系来重建世界图景，重新规划俄国的发展方向。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曾先后产生了埃及、中国、亚述—巴比伦、犹太、希腊、罗马、拉丁—日耳曼、斯拉夫等八种文化历史类型，有的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有的正处于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化过程中。在这些文明构成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不可能为其他文化的标准和规则所分解。就欧洲的文化历史类型而言，欧洲文明完全不能等同于人类文明，仅仅是八种文明类型之一。而从地缘政治和文化构成上看，“俄国不属于欧洲”，而且是欧洲文明扩张的障碍。欧洲文明一直敌视俄国，俄国不可能被欧洲接纳。“对待俄国，欧洲政界是不公正的，欧

^① Вортман Р. «Официальн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иф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нархии XIX века// РОССИЯ/RUSSIA. Вып. 3(11): 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актики 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М.: ОГИ, 1999. С.242.

洲全社会是不友好的。要充分解释这一现象，只能说欧洲认为俄国和斯拉夫是某种他者，并且不仅仅是他者（чуждым），还是敌对者（враждебным）”。无论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怎样追求欧洲化（Европейничанье），并且欧洲化历程经历了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等几个阶段，都不能降低欧洲对俄国的敌视，也没能阻止一些俄国人仍要戴着欧洲眼镜看世界，对欧洲摇尾乞怜，对俄罗斯自身则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丹尼列夫斯基能如此睿智地把欧洲文明和俄罗斯—斯拉夫文明置于平等的位置，并发现欧洲文明和作为斯拉夫文明一部分的俄罗斯文化之天然矛盾、俄国的欧洲化历程之灾难性后果，并非无稽之谈：一方面是基于从沙俄到帝俄而成为跨欧亚帝国的历史事实。从1462年东北罗斯开始征服大诺夫哥罗德而组成莫斯科大公国以降，经1533–1618年间伊凡四世和鲍里斯·戈东诺夫等先后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这两个金帐汗国后裔，沙俄就不断向欧洲、亚洲扩张。到1708年，已把乌克兰、西西伯利亚纳入其版图，并开始觊觎远东。此后，彼得大帝鉴于国土面积急剧扩大，终止了流行已久的军政长官负责的郡县管理，把全俄划分为八个州，实施皇帝任命的地方首长管理所在辖区的州县制。随着疆域持续扩大，彼得大帝确定的州县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宜，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便把帝俄划分为更加多的州，进行更紧凑的州县镇治理。正是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使得帝俄得以集中国力继续扩张，先后征服了格鲁吉亚、芬兰、外贝加尔、哈萨克斯坦、雅库特、中亚、阿穆尔河流域等，到1914年又增添了黑海州和萨哈林州。至此，疆域面积达1900万平方公里，成为仅次于大英帝国的庞大帝国。

另一方面，在疆域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相应地进行帝国治理方式的变革。彼得大帝改变了沙俄纯粹的封建帝国管理模式，尝试强制性地用现代欧洲文明方式改造俄罗斯人，再通过欧化的俄罗斯人去治理不断扩大的帝国。叶卡捷琳娜大帝加大了这种欧洲化的力度，推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治国方略，加快了国家治理的欧洲文明化程度。“欧洲化”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疆域持续扩大，帝俄“现代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国力大幅增强，1812年打败了所崇拜的“老师”——法兰西帝国，自此大举介入欧洲事务。势不可挡的“欧洲化”的目的，是为了强盛俄罗斯帝国，而不是要把俄国变成崇尚

个人主义的欧洲国家。这导致了原本是要彰显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财富累积、文学艺术创造力、生产力发展的欧洲博物馆制度，引入俄国后变成了建构和强化国家认同的直接手段：1823 年建立国立阿尔泰方志博物馆，1837 年建立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方志博物馆，1865 年为纪念俄罗斯作为国家诞生千年而在诺夫哥罗德建立国立联合博物馆—文化保护区、1876 年创建国立普斯科夫历史—建筑—艺术博物馆—文化保护区，1884 年建立梁赞州历史—建筑博物馆—文化保护区，1887 年建立国立雅库特州北方各民族文化和历史联合博物馆，1894 年哈巴罗夫斯克方志博物馆建立，1897 年在萨哈林建立亚历山大洛夫的契诃夫与萨哈林历史文学博物馆，1908 年在彼得堡建立国立戏剧和音乐艺术博物馆，1911 年创建国立科米共和国博物馆（融方志、民族志、北方考古等为一体）……这些博物馆对所在地区民众认同俄国的情感之熏陶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如经历了帝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俄联邦—时代转换，没有一个地区强烈要求分离出去。

如此情形，培养出欧化了的俄罗斯人或俄罗斯化了的其他族群，对俄罗斯成为跨欧亚帝国的骄傲情怀。体制内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罗蒙诺索夫理所当然地写下了大量歌颂沙皇建立跨欧亚帝国之伟大的诗篇。其他文学家和诗人也争相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这种情怀。著名诗人杰尔查文（Гаври́л Державин, 1743–1816）诗篇《纪念碑：致缪斯，仿贺拉斯》（1795）就显露出跨欧亚概念在 18 世纪末文学家的意识中已建立起来的迹象：

“我给自己竖立起一座神奇、永恒的纪念碑，
它是重金属建造的，比金字塔更高
无论是旋风还是雷电，都不能轻易摧毁之，
岁月不能荡涤之。
我会不朽，即使我
肉体已经消亡，
但我的声望会增长，而不是销蚀
斯拉夫人永远会尊敬我
关于我的名声会从白海传播到黑海，

那里有伏尔加河、顿河、涅瓦河，从利夫叶山（Рифей）传到乌拉尔……^①。

诗人的自信表达，与其对跨欧亚帝国之信仰完全一致。无独有偶，其学生普希金后来也写了类似的诗篇《我为自己建立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1836）：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
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
我将永远光荣不朽，直到只有一个诗人
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在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是芬兰人，
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这种对自己文学业绩的自信、对欧洲价值观——自由精神的赞扬与对俄罗斯帝国之信仰的有机融合，更是透出对跨欧亚的俄罗斯帝国的强烈认同。

而这种跨欧亚帝国情怀，在波兰试图挣脱帝俄统治而遭俄军镇压、引发欧洲舆论哗然之际创作的诗篇《致诽谤俄国的人》（1831）中就已有表露：

你们这些能言善辩者在嘀咕什么？你们为何要诅咒威胁俄国？
是什么使你们兴奋？立陶宛的风潮？
别再说了：那始终是斯拉夫人内部的争论，
一场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是命运所决定的古老家族纷争
……你们根本不懂家族世仇；
克里姆林宫和布拉格对你们无话可说……

^① Приятное и полезное препровождение времени. 1795.ч.7. С.147(под заглавием «Ж Музе. Подражание Горацио»).

...莫非俄国皇帝的谕旨已失灵？
难道我们同欧洲要重新争论？
莫非俄国人不再善于获胜？
难道我们人数少？难道从佩尔姆到塔夫利达，
从芬兰寒冷的山崖到火热的科尔希达，
从受到震惊的克里姆林宫
到屹立不倒的中国的万里长城脚下
俄罗斯大地再也不能崛起？.....

诗篇原本是要维护帝俄反对波兰独立，轻描淡写地把这一重大国际事件说成是“斯拉夫人内部的争端”，字里行间融注着对欧亚帝国的热爱之情。这种诗篇，在欧洲看来是自欺欺人，在俄国却获得广泛的呼应：俄军依然不顾欧洲谴责，1831年8月26日进军华沙、血腥镇压波兰人的反抗。这天正好与1812年俄军在战胜拿破仑的波罗金诺战役的纪念日重叠，普希金为此又写下诗篇《波罗金诺周年纪念》（1831）：

我们该把要塞安置何处？
推过布格河，推到沃尔斯克拉河、利曼？
沃雷恩河归属谁？
谁将占据博格丹的遗产？
立陶宛承认了反抗的权力，
是否会从俄国独立出去？.....^①

而赞赏把独立的乌克兰和波兰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把俄国泛化为跨欧亚帝国的审美表达，成了普希金成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基本依据。但这不是普希金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社会潮流使然！按那位著名的俄侨思想家伊里因《论黑暗和启示》（1929）所说，“普希金时代俄国就已使自己疆域上的各民族力量汇集在一起，产生了这样的使命——接纳在整个俄国历史和民族形成中所表现出来的俄罗斯灵魂”^②。

① 布格河分西、南布格河，分别流经俄国和波兰，经乌克兰入黑海；沃尔斯克拉河为今流经俄一乌的第聂伯河；利曼为今哈尔科夫州一城镇，沃雷恩即布格河流经基辅的支流，博格丹是17世纪乌克兰反抗波兰的起义领袖。

② Ильин И. О тьме и просветлении// Евразия. 1929. № 7. С. 1.

更有甚者，著名诗人丘特切夫（Федор Тютчев, 1803-1973）的《俄罗斯地理》（Рус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1848），塑造了更为宏大的跨欧亚帝国形象，以及表达了民众对这一帝国的强烈认同感：

莫斯科、彼得堡、君士坦丁堡——那是俄罗斯帝国的珍贵之都……
但哪里是俄国的尽头，哪里是它的边界？
在北方，在东方，在南方，在日落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命运将由未来决定……
这里有七大内海，七条大河……
从尼罗河到涅瓦河，从易北河到中国，
从伏尔加河到幼发拉底河，从恒河到多瑙河……
都属于俄罗斯帝国……而且将永世长存，
一如神灵和但以理的预言。

按这种欧亚帝国的构想，整个世界，至少整个亚欧大陆就只有一个名叫俄罗斯帝国的国家！

有意味的是，就连对俄罗斯帝国问题思考得最为深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这种帝国认同大潮所吞没。1850年代为争夺克里米亚而发生了俄土战争，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处于流放的艰难生活状态，但他却写下了长诗《1854 欧洲事件》（1855-1856）：

用不着你们考虑俄国的命运！
你们并不清楚其使命
东方——这就是它！双手高高举起它
千秋万代乐此不疲。
俄国在牢牢控制着亚洲，
同时给亚洲注入了青春活力
并且使古老的东方复活
（上帝就是这样要求的！）俄国要启程了。
或再度回到罗斯，或回到沙俄
这就是即将来临的光明灿烂的黎明……
对你们来说莫非是不要走向主的十字架

将引领我们前行之路!。和不要让肉身死亡?
看这一切——他永远要钉十字架
要再度流圣血!....
我们百万人等着谕旨....
1855年6月初
是俄罗斯人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十二年牺牲的荣光时代
许多母亲为皇帝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儿子
护佑他们去打击敌人
他们的鲜血浸染大地
激发对罗斯的英雄情怀和爱
那时传来你低沉而哀愁的呻吟声....
够了,上帝会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做出决定!
你,饱经沧桑者,会站立起来并强大起来!我们和伟大的儿子们
为了圣罗斯祷告,就如同天使,幸福地生活着。
....在我们面前的新时代
满怀希望的诱人的黎明
正在快速到来....
吾皇正在进行艰难的壮举
....在这个时候伟大复兴
将引领我们前行之路!
....吾皇,全能的守护者,
得到上帝护佑的君主!
....让我们百千万人等待着谕旨^①。

诗篇立足于基督教神学和斯拉夫文明,高度赞赏俄国对土耳其发动争夺克里米亚的战争,谴责欧洲大国支持土耳其。这种充满着对帝俄官方意识形态表示赞同的表达,在诗篇《1855年7月初》中也有显露。对此,白银时代著

^① Фё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5 томах. Т. 10.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91, С.339-341.

名诗人和批评家穆楚尔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Мочульский, 1892-1948）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欧洲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的论述和思想，与普希金对 1831 年华沙事件的态度非常相似^①。其实，自帝国意识确立伊始，从国家认同高度歌颂建立跨欧亚大国战略的诗篇就不断出现，如杰尔查文（Гаврила Державин, 1743-1816）《哀悼奥尔洛夫伯爵》（1796）、茹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Жуковский, 1783-1852）《哀悼维尔杰姆别尔斯卡娅》（1819）、格林卡（Фёдор Глинка, 1786-1880）《乌拉》（1854）、阿尔布佐夫（Николай Арбузов, ?-1868）《俄国的敌人》（1854）、列瓦绍夫（Н. Левашов）《天谴》（1854）等等。到 1850 年代再度发动克里米亚战事，斯拉夫派理论家霍米亚科夫（Алексей Хомяков, 1804-1860）、那位著名诗人丘特且夫等更是强烈主张：这是俄国再度复兴的机遇，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要把斯拉夫人民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代表基督教的正教与异教之间展开的圣战。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非俄罗斯知识分子认识跨欧亚帝国的唯一方式。众所周知，因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尼古拉一世大量增加军费和强化行政力量，导致俄国社会对战事的态度迅速转变，当局被迫于 1861 年开始进行改革，同时也促成了社会重新反思俄罗斯帝国的暗流。而此时（1860 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就投身于积极倡导废除农奴制、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潮之中。此前创作的那种和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诗篇，在他生前并未刊行（去世以后才被整理出来发表）。其实，伴随着俄罗斯帝国硬实力在欧化过程中不断壮大，帝俄内部治理的矛盾日益显露，因而不断有思想家质疑这种以损失俄罗斯自身斯拉夫特性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1789-1790 年，后来成为著名保守主义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在欧洲旅行，在巴黎恰遇法国大革命，感受到理性主义发展模式下的欧洲问题，及时写下了《一个俄罗斯旅行者的书信》，敏锐地指出西方发展道路，可能难以适应跨欧亚的俄罗斯帝国复杂结构。而这样的批评性书写，并没有妨碍卡拉姆津赢得知识分子的声望、当局对他的敬重，如很快就成为官方任命的史学家，著述了此后每个时代都奉为经典的《俄罗斯国家史》，奠定了俄罗斯国家史学流派。

^①Константин Мочульский,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Париж: УМС, 1947, С.137.

到 1830 年代，国力进一步壮大的帝俄持续推动欧洲化的治国方略，完全无视被强行纳入其版图的亚洲各族群所具有的东方文明的魅力，造成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没有任何思想创造力，引发了体制内知识分子恰达耶夫（Пётр Чаадаев, 1794–1856）极度不满：其《哲学书简》（1828–1836）就如是批评道：俄国从来就没有和其他民族相随而行，俄罗斯不属于人类中那些著名的大家族成员，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俄国没有任何传统，俄国人似乎是在站在时间之外，人类的全部文明教养没有扩展到俄国人世界。

这种破坏了帝国认同感的表述，其惊世骇俗的程度，不仅官方难以容忍（政府宣布他是疯子），连和帝俄官方矛盾重重的普希金也不苟同。1831 年 6 月 17 日诗人致信恰达耶夫说，“您的手稿（《哲学书简》）再放在我手里一段时间吧，我要再读一遍。我觉得开篇和先前的谈话、思想、过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对您来说是很清楚而不模糊的，但读者未必明白这些，因为前面几页不很明确。我想，您可以用简单的引言替代之，或者去掉它们，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会好些。我还想让您注意您这本书缺乏一个结构和体系，尽管这是书信集，这种形式可以有权利随意而不受拘束……于我而言，您对历史的理解完全是新鲜的，但我根本不能同意您的意见……”^①。普希金的这番言论，意外强化了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地位，但未能化解这样的矛盾——主要靠殖民主义手段强行建立起来的跨欧亚的帝国，采用丧失原本斯拉夫文化传统的欧化方式而强盛起来，使得俄罗斯族裔和被迫俄罗斯化的少数族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难以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相应的贡献。

恰达耶夫的论述引起了知识界的分裂，推动着知识分子或从斯拉夫派或从西欧派角度去关注跨欧亚帝国问题。其中，著名的饱学之士、至今仍被视为最规范的俄语工具书《鲜活的伟大俄语详解词典》之作者达理（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 1801–1872），在对当时属于边陲之城的奥伦堡的认知上就显露出欧亚洲思想。1833–1841 年，达理是在奥伦堡度过的。他目睹了位于欧亚洲交界处的这座边城的复杂风情，对俄国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中间性”状态深有体会，对俄国的多族群构成、首都和外省的差别之类问题也有积极的思考。由此，达理创作了描写奥伦堡边疆区地理、历史和民族的系列小说《灰色》

① Пётр Чаадаев: за и против. СПб.РХГИ, 1988. С.67-68.

(Серенькая),以图还原俄国的跨欧亚特性。作家十分珍视俄国拥有奥伦堡这种位于欧亚交界线上的城市。其中的短篇小说《水街上的小房子》就赞叹道:“您好(奥伦堡),开始建立三次,艰难诞生一次,俄罗斯之城:一个世纪来作为掩护和堡垒屹立在你眼前,展开强有力的羽翼”。尤其是,短篇小说《欧洲与亚洲》(Европа и Азия)如此描述道:“亚洲开始之处,即欧洲终结之地?难道真有人所说的这等事……德国地理学家说,伏尔加河可理解为欧亚的真正分界线,喀山被一份友好和约交给了亚洲;欧亚洲另一条界线是乌拉尔山脉、伏尔加河下游;第三条线是乌拉尔山脉与乌拉尔河。还有人解释说,奥伦堡州和彼尔姆州属于欧洲的俄国,进而属于欧洲”。短篇小说《放下》这样触及欧亚洲问题——欧洲城市乃亚洲世界的反题。作品用从欧洲立场叙述亚洲部落的习俗和道德的方法,巧妙地显示出欧洲“文明人”对亚洲“野蛮人”的优越感之荒谬:“这里的人无知(невежества)而粗鲁,灵魂欠缺和心灵不足。但按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标准,他们却没有失去人之本质,情感丰富,思想不缺”,“俄罗斯人绝对想不到去中亚做买卖:认为那里的贸易,属于根本没有脑子、极为吝啬贪财的穆斯林的事。俄罗斯人机灵、精明强干,有进取心,接受力强,有自己的家,不喜大篷车买卖和海洋贸易”。中篇小说《彼科伊和马乌尔扬娜》类似于《放下》,展示了用欧洲眼睛看亚洲之可笑,“吉尔吉斯每个男人都要给婴幼儿存钱,为新生儿准备钱……做摇篮则是主人自己的事情,在欧洲是女人和家庭主妇完成的”,有意贬低亚洲男性^①。对此,苏联杰出学者洛特曼(Ю.Лотман)认为,“俄国考虑的是作为第三方,居于老欧洲和老亚洲中间的位置。正因其文化位置(而不仅是地理位置)的中间性(срединность),使得俄国成为东西方文化合题的体现者,它应该聚合着毕巧林—奥涅金(欧洲)的幸福愿望和东方式的意愿‘安宁’。这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现象:暴风雨、雷电、雄伟壮观的山色,而不是安宁,但充满着‘家园’的‘中庸’景色及其完满而神秘的力量,‘我爱在此度过的时光’”^②。

① В.И.Даль, Оренбургский край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исателя(Сост. А.Г. Прокофьева, Г.П. Матвиевская, В.Ю. Прокофьева, И.К. Зубова). Т.2. Оренбург, 2001. С.105, 17, 294, 220, 226.

② Ю.Лотман,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В трех томах).Т. I. Таллинн, 1993. С.23.

达里用形象呈现的俄罗斯具体分裂的情形，既和恰达耶夫的思想相一致，又为后来知识分子思考俄罗斯问题提供了感性知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归来，正值俄土战争失败不久，于是其《作家日记》（1873）声称：在俄罗斯社会意识中，很少有人思考俄国的亚洲使命问题。“通常我们俄罗斯的亚洲，包括西伯利亚，对俄国而言这简直就似乎是某种不必要的画蛇添足，我们欧洲部分的俄国对其完全不感兴趣”。对此，作家小心翼翼地说，“俄国不单是欧洲的，也是亚洲的；因此俄罗斯人不仅是欧洲人，也是亚洲人。甚至，亚洲可能比欧洲更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而且，在我们目前的命运中，可能亚洲的某种东西正是我们的主要出路所在”。“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但在亚洲我们又是特别的欧洲人”^①。而这种论述，得到了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1841-1911）的积极回应，他在《俄国历史教程》（由86讲组成）中说：俄国地理上的东西方特性就使俄国处于既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又不同于亚洲的状态，俄罗斯人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俄国是一个独特的跨欧亚国家，而这正是沙皇（царь）替代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以后历代皇帝（император）孜孜以求的目标，跨欧亚也由此而逐渐变成了帝俄的现实。但自彼得大帝改革以后，国家治理无法正视原本就负荷的成吉思汗遗产，通过对周边国家殖民的方式而不断扩大成“多民族”（многонародность）的俄罗斯帝国之格局。帝俄持续采用欧化的方式治国，不仅使被征服的其他族群难以适应，也使作为帝国基础的俄罗斯—斯拉夫族群反弹。如此治国方略，造成那些受益于西化教育的贵族文人变成了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家西化将近百年之后，越来越怀疑这种发展模式。曾任帝俄科学院院长（1818-1855）的乌瓦罗夫（Сергей Уваров, 1786-1855）伯爵，在出任国民教育部长期间（1833-1849），向沙皇呈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可以作为国民教育部管理指南的若干通则》（1833年11月19日）的报告，提出“正教信仰（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王道（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国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三位一体的国民教育指导思想。他认为，俄罗斯人具有深厚的宗教情怀，东正教信仰和王道构成了俄国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国民性则可以理解为俄国传统的独特性和拒绝外来的影响，“倘若欠缺它们，

①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в 30 томах. Т.27. Л.: наука, 1984. С.33.

俄国就不可能繁荣、强盛和存在”。因此，必须和思想自由、个性自由、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等在正教看来会导致“混乱（смутьянство）”的西方理念斗争。这种否定西化的思想，很快就演变成尼古拉一世时期用于帝国治理的官方民族性理论^①。这种思想得到了斯拉夫派的积极呼应，如霍米亚科夫就根据不同族群的正教信徒，在共同信仰的召唤下聚集在一起共同祷告这一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现象，提出了“聚合性”（собранность）概念，以图在价值体系上使帝国所辖的各民族和谐相处。

然而，1861年改革以后，进一步用西化方式治理国家成为大势。随着帝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知识界和文学界对帝国的情感性认同日益加深，斯拉夫派那种立足于俄罗斯帝国结构、主张容纳各族群的聚合性思想，日趋边缘化，完全没有践行的机会。如此趋势，掩盖了先使俄罗斯人欧化、再用欧化了的俄罗斯人去同化其他族裔的帝国治理危机，以及西化治理的战略难以负荷帝俄跨欧亚结构之明显事实。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列昂季耶夫超然于知识界和文学界帝俄国家认同之强大传统，发表了《拜占庭思想和斯拉夫主义》，重提俄罗斯人的斯拉夫身份，还原与拜占庭精神息息相关的东方正教信仰在俄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以图使国民认识到西化潮流的不合时宜。他写道：“我强烈希望斯拉夫精神的认同；后来我明白了，所有的斯拉夫人，包括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对我而言文化原创性的思想弥足珍贵。对我们俄罗斯人而言，其实质不是某种类似于必然的政治之恶的他者，因为这些以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众，除了过去的和普通的资产阶级之外，他们是不会放弃世界的”，“这样的欧洲文明，即正加速渗透进欧洲历史中那些最好和最优雅之成就中的庸俗精神，大获全胜”。这种看似乌托邦的主张，在20世纪第一代俄侨知识分子、著有《俄罗斯思想家与欧洲：俄罗斯思想家对欧洲文化之批判》一书（1926）的著名哲学史家津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Зенковский, 1881-1962）看来，意义巨大。他指出，列昂季耶夫确信，“俄国的无意识使命，使其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是真正的斯拉夫国家。纯粹的斯拉夫内容，对于

① Вортман Р. «Официальн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иф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нархии XIX века// РОССИЯ/RUSSIA, Вып. 3(11): 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актики 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М.: ОГИ, 1999. С.233-244.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Paris: YMCA press, 1926. С.149-158.

整个俄国精神而言是很贫乏的”，“他不仅是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而且信仰俄国，和丹尼列夫斯基一样相信，俄国属于特殊文化历史类型，他只是在俄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斯拉夫看到了这种类型”。他认为“俄国不是一个普通国家，就整体而言，俄国连同其亚洲领土，这是一种特殊生活的独立世界、特殊国家的世界，此外世上还没找到这种特殊文化类型的国家”。国家自有其发展和衰落的规律，都要经历初始、繁荣和衰落三个阶段，欧洲国家概莫能外，“欧洲所谓民主化，即平等—自由—进步是发展的关键性反题，毫无疑问是欧洲衰落的征兆”，“俄国能成为某种新型东方国家之首，给予世界一种新文化，在替代东斯拉夫文明的同时，扩展日耳曼欧洲的文明；东正教泛斯拉夫主义乃俄国的出路所在，自由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则是俄国的覆灭”，“拒绝欧洲，在列昂季耶夫思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不仅仅是拒绝欧洲文化，而且是拒绝欧洲反对东方的政治和意识”^①。今天看来，津科夫斯基的评价，和列昂季耶夫本人的论述，可谓相得益彰，共同呈现了欧亚主义思想对知识界思考俄罗斯问题的魅力。

可以说，列昂季耶夫直面俄罗斯帝国的欧化治理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大胆超越大多数知识分子认同强大的俄罗斯帝国的深厚传统，重新强调拜占庭思想和斯拉夫主义对于帝俄的意义，是非常有价值的。改革到了 19-20 世纪之交，帝俄在综合国力、文化创造力和科技水平等，与欧洲大国不断接近甚至持平，俄国与欧洲在各领域的交融也日益深入，但都未能化解欧化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内外矛盾的加剧，知识界和文学界越来越强烈地质疑欧化之路。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最终成功夺取政权，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反西化的正当成果。然而，这一原本能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欧亚主义思想遗产，却因其表述和苏维埃政权的意识形态不吻合，致使其在苏俄境内销声匿迹，而为 1920-30 年代俄国侨民知识分子探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罗斯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成就了欧亚主义思潮。

苏维埃制度存在的合法性：欧亚主义关于苏俄问题的地理文化论述

^① Нарбаев Н. Россия и Евразия: пробле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М.: наука, 1997. С.156.

1861年改革之后30年，帝俄成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的强国：制造业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势不可挡，俄罗斯—斯拉夫族群的欧洲化程度提高，其他族群的俄罗斯化程度也迅速提升。这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尼古拉二世改革时期，完成了伊凡三世就已经开始的俄罗斯国家之地理、行政、法律、经济的欧亚一体化过程；作为欧亚中心区域，在全俄法律体系基础上实施国家的统一管理。如此情形意味着，在20世纪到来之前，已经真正形成了国土的、行政管理的、法律的欧亚国家——俄国”。而这是欧洲化的成果：建立了横贯欧亚大陆的大铁路，按欧化模式开发亚洲地区，西伯利亚—布拉维戈申斯克（海兰泡）—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等完完全全纳入俄罗斯帝国框架，这些地区的亚洲特色加速消失，但这些不妨碍俄国欧洲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则远远高于亚洲地区。如此一来，排斥西方的斯拉夫主义思想显然已不再是话题。但是，国家持续以欧化方式践行帝国战略，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十月革命、内战和敌视西方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建立等逆欧化发展便是其产物。面对如此境遇，本文开篇提及的那些人物，连同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5-1941)、司徒卢威(П.Б.Струве,1870-1944)、弗洛罗夫斯基(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1893-1970)等大批欧化知识分子，以及正教会的许多神学家，坚决不认同1918年1月以后的苏俄。然而，局势对布尔什维克及其苏维埃政权越来越有利。在这样的局势下，对布尔什维克以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强行终止关于苏俄构成的跨欧亚特性、国家的发展方向、如何平衡现代欧洲文明和俄国斯拉夫文明等重大问题的讨论，这批被迫流寓海外知识分子，无论是否加入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和官方正教会的海外俄罗斯正教会，也不顾自己的艰难境遇是布尔什维克所制造，却能正视苏维埃政权，重新审视特鲁别茨柯依的欧亚主义思想遗产，于1920-30年代兴起了欧亚主义运动。

欧亚主义务实地面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日趋稳固并建立了和西方对抗的庞大苏联的现实。对此，别尔嘉耶夫《欧亚主义》写道：“欧亚主义者不是粗俗的旧物品的修复者，他们考虑的不是那些没有发生的特殊事件，而是尽快回到其原初位置。欧亚主义者感受到正在发生严重的世界危机，正在开始

新的历史时代。他们完全不确信这种危机特征就是拉丁—日耳曼、欧洲文明之衰竭。其功绩在于，他们强烈感受到转折的幅度和转向战前和革命前之不可能。他们断然宣称文化在政治中的主导地位”^①。这种论述很有道理：欧亚主义运动是从关心苏维埃化了的俄罗斯问题开始的，这就是特鲁别茨柯依在《俄罗斯问题》（1922）中所说的，“在俄罗斯政治侨民知识分子所描述的图景中，‘俄国复兴’只不过是一个奇迹。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按我们的观念，我们一觉醒来就知道，现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噩梦，或按神奇的魔杖想法，一切会突然消失。俄国又再次证实它是大家既害怕又尊敬的伟大帝国，它在断裂中出现了一些最具吸引力的政治和经济联合，它继续只是要自由地选择最好的治理形式，敌人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自己人则过着有荣誉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奇迹？必须承认，奇迹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存在的。但在政治斗争的情形下奇迹有产生的可能吗？能否输入一个奇迹，把它作为现实政治结构的必要因素？……是真理，或多或少总是会得到承认的。战争、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实验给俄国带来了最大的经济破坏。俄国只能逐渐走出这种困境，要花很长时间，并且必须有外国人的积极帮助。首先想到自保的苏维埃政权，在饥饿和手无寸铁的居民中能创造这样的政体，充其量只会遇到小规模骚乱，而且一部分会遭到武力镇压，另一部分则会因巧妙的宣传和离间手段而被从内部彻底根除。没有外来势力相当程度的介入，大规模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是不可能的。苏维埃政权也得到了使其不受侵犯的某种其他方式的担保，如和外国签订稳固和充满希望的协议。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苏维埃制度才可能自愿弱化”^②。即便苏联解体了，我们今天再看这种论述，还是会为作者当初如此沉着冷静和观察的前瞻性而震撼。

其实，欧亚主义运动的思想史价值不在于讨论现实的布尔什维克政权问题，而是相当深刻地揭示出了布尔什维克以制度方式强行终止帝俄欧化治理方式的历史根源及其合理性，并且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辩护，而是把它当作俄罗斯文化的一种形态、一个发展阶段来探讨。这就是特鲁别茨柯依在

①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Евразийцы // Журнал "Путь", №1, 1925. С.136.

② 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 Рус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 На путях путей. Берлин : Геликон, 1922, С. 294-295.

《俄罗斯问题》中所说的，“倘若俄罗斯侨民确实想在俄国历史上扮演荣耀角色，那就需要放弃不体面的政治游戏，而从事精神文化的重建工作”^①。回首历史可以发现，欧亚主义探讨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建立的疆域更庞大的苏联的问题，是在更大的地理空间、更深广的历史维度进行的。由此，就能敏锐地把俄国的跨欧亚的自然地理状况，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何以能在有浓烈宗教氛围的国度推行无神论的政治问题关联起来。按萨维茨基《转向东方》（1921）所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目前的俄国，有某种真正特殊的相似性”，“在战争和革命的进程中，俄国的‘欧洲性’衰落了，仿佛卸下面具一样。当我们看到的不是用历史布景的布匹所遮蔽的俄国形象时，我们就触摸到了俄国的双面性。一副面孔是作为欧洲国家转向欧洲，如 1793 年的法国，它给欧洲带来了‘新话语’，这次的新概念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副面孔是拒绝欧洲，俄国转向东方。俄国本身莫非已是‘东方’？”，俄国有许多亚洲行政区和族群、东正教信仰盛行、东正教会和俄国的亚洲族群关系友好，俄国是真正的正教—穆斯林、正教—佛教之国；“布尔什维克排斥正教、虐待所有宗教信仰”，以使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大众转向全方位依赖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侮辱宗教信仰或冷漠对待宗教信仰，这对理解俄国来说，正如布尔什维克尝试践行马克思的预言那样，是很少有人预先估计到的。正因为如此，俄国就不仅仅是西方还是东方，不仅仅是欧洲还是亚洲，甚至完全不是欧洲，而是欧亚洲”，相较于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一个只有 2500 万人口和 54 万平方公里的欧洲国家，俄罗斯革命发生在 1.5 亿人口和国土面积 2000 万平方公里的跨欧亚洲大国里，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插曲，俄罗斯革命则不仅是欧洲历史的偶然事件^②。

必须承认，这样的认识极为睿智：十月革命期间，人民委员会就发布了实行政教分离的命令。这看似是布尔什维克的党派行为，实则是符合欧洲世俗化潮流的正当之举。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使国民只信仰苏俄共产主义理想，中断了历史悠久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尤其是无视俄罗斯正教会的善举——在布尔什维克攻占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等古老城市的过程中，刚恢复的

① Там же, С.295.

② Савицкий П. Поворот к Востоку//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С.3.

牧首公署扮演了重要的调停角色，尽最大努力使这些城市受损最小、布尔什维克获胜最快。另一方面，也不顾正教在俄国的庞大存在——近 90% 国民信仰宗教（东正教信徒近 80%），很快就终止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行推行无神论政策（关闭教堂和修道院、没收教产、严惩神职人员、禁止信徒举行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等）。这些在信徒眼中的暴民行为，却因为无神论是作为抵抗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加上临时政府时期、十月革命前以及内战初期独立出去的乌克兰等地区回归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疆域更大的跨欧亚苏俄，新政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留在境内的东正教会为了生存，被迫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对此，大多信仰正教的俄侨知识分子，不满苏维埃政权的无神论，更拒绝正教会的妥协行为，建立了海外俄罗斯正教会，教堂遍及俄侨所居住的欧、亚和北美。面对如此尖锐的矛盾，欧亚主义分子从俄国和欧洲的基督教发展的历史过程，独辟蹊径地解释布尔什维克的无神论问题：

接受正教的古罗斯，虽然进入了基督教世界，但因神学矛盾和基督教国际政治利益的冲突，以及正教和普世教会的分裂，正教国家很难和天主教及其分裂出来的新教国家相容。而俄罗斯之形成为国家，同不断壮大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之支持息息相关。1438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占领之后，俄罗斯正教会终于在 1598 年成为第五个牧首区，从而也就被赋予拯救东方正教的使命——“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由此深入人。这一伟大使命之实现，需要教会与（俄）罗斯国家相互支持。也正是在正教会帮助下，国家最终渡过了“十七年混乱”时期（1595-1613），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并按封建王朝方式发展成跨欧亚大国。彼得一世改革，不是简单地把国号由“沙俄”改为“俄罗斯帝国”，而是推动帝俄的欧洲化。例如，1713 年他把首都从已经定都四百年的莫斯科迁移到更靠近欧洲的人造城彼得堡；1721 年把正教会及牧首公署降格为至圣主教公会，附属于宗教事务部；他还建立了一整套欧洲式的教育体系、行政运行制度、社会管理方式等，强行让臣民尤其是贵族接受欧化教育，以图带动国家的欧化进程。这样的历史进程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推动，此后成为势不可挡的大潮，促成了俄罗斯帝国的飞跃式发展，反过来介入欧洲的内部事务。可是，东方正教会的地位并没有

随着国家的壮大而上升，而是持续受到国家政权和世俗化潮流的冲击，造成自 18 世纪末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在思考俄罗斯问题时都会纠结于欧化和正教之复杂关系。例如，著名的欧亚主义思想家津科夫斯基就这样评价列昂季耶夫：作为特别突出的宗教思想家，他直面社会上否定神参与俄罗斯帝国进程的历史，“为了人的理性和预见力，他必须把历史过程视为自然的，因为神的参与我们不能预先确定”。^①

在这样的形势下，最重要的欧亚主义思想家特鲁别茨柯依公爵的那篇论述基督教传播历史和神学实践之作《通天塔和语言混乱》（1923），深刻地揭示出了布尔什维克实行无神论政策背后的基督教会自身的原因：“任何民族文化没有等级高下之分，基督教不要求创立某种统一普遍的人类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教义从未改变过，只是被阐释而已。就实质而言，作为人类亲手创造的事业，文化亦然。文化必须适应历史变化、进化的规律，首先是不断细化的规律。统一的基督教文化是不可思议的。多元的基督教文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应该是多元的。所有基督教民族都应该形成自己的文化，包括不与基督教对抗、把基督教灵魂融入本土文化中。因此，基督教不是毁灭特有的民族文化创造，而是相反，激发民族文化的创造，并给予其新使命。所有基督教民族都被赋予调和民族文化与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会的真正伦理和范式之使命，建造教堂、祷告仪式及其特征，产生这个民族特有的基督教情感的神学代表人物。每个民族不仅可能，而且应该按自己的方式实现使命，以显示基督教原本就是和这个民族的精神有机融合的。当然，不排除一种基督教文化对另一个民族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限于对非基督教民族文化之影响；这种影响与文化发展的本质相关，且在发展的自然进程中，无论如何不可能导致不同民族趋同化、一致化。重要的是，为了使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不至于喧宾夺主，为了有机加工好文化的借用、从自己和他者的元素中创造出新的完整文化，必须与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紧密配合。基督教会是一体的，其一体性就是谋求各地方不同教会之间的切实交流”，“没有文化的一体化，这样的交流是不可能的。教会的一致性表现为圣经、圣经传统和教义的共同性，但不能没有具体的日常生活、艺术形式和法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Paris: YMCA press, 1926. С.151.

规形态，正是通过它们，圣经及其传统才能使每个民族都适应。尝试固化某种形态、消弭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使之属于单一教会，而完全不是归属于这种或另一种文化，着眼于迷信和仪式崇拜，这些是不会促成善的。我们俄罗斯人在这类尝试方面吃尽了苦头”，如尼康牧首就试图按统一的祷告仪式进行正教改革，结果导致教会分裂，引发教会对官方文化的抵抗，因为“基督教不是特定文化的元素，而是被带入各民族文化的酵母；既然每个基督教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神赐理由，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传教士传播的就不是基督教，而是特定的基督教文化。违背教规和东正教使命：在俄国内部传教，成为俄罗斯化的工具（орудием русификации），在俄国之外传教，成为扩展俄罗斯政治影响力的工具，这已不是秘密”。更重要的是，天主教传教士不是传播神的真理，而是成为殖民主义政治或某个强国的利益代表。“植根于罗马—日耳曼文化并与其关系密切的天主教、新教或英国圣公会，其传教士实际上不是在宣传基督教福音，而是在宣传各自的文化。他们的成功，自然使所在地民众获得并依赖欧洲文明，但在这种文明中基督教早已退居次要位置，那些加入了基督教的土著人就在欧洲文明的维度上理解基督教，结果证明这是很糟糕的，创造出了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基督教。这种形式上的传教，是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带入了基督教精神，而且有的信仰者割裂了与本土文化的联系，变成了殖民主义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图谋的代理人—合作者。基督教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驯化各民族的使命，仍未完成。之所以未完成，就是因为传教士借助欧洲文明手段，把基督教当作建立人类单一文化的手段，亵渎了神”，因此欧洲传教士文化实质上是反基督教的^①。如此奇特论述，在维护基督教、区分基督教和基督教会之区别的同时，说明了布尔什维克推行无神论政策的合理性——因为和西方各国普遍借助教会进行殖民主义活动一样，帝俄时代的俄罗斯东正教同样沾染了欧洲基督教会的殖民主义病症。

有意思的是，欧亚主义者关于基督教的论述不少，如特鲁别茨柯依《印度宗教和基督教》（1922）、卡尔塔舍夫《改革、宗教改革和教会履职》（1922）、1923年在柏林出版的《俄国与拉丁思想》、1925-1940年别尔嘉耶夫和维舍

^①Трубецкой Н. Вавилонская башня и смешение языко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Берлин. №.3. 1927. С.107-124.

斯拉夫采夫（Б.Вышеславцев）在巴黎编辑出版的丛刊《路：俄罗斯宗教思想机关报》等，涉及基督教的不同方面，包括欧洲国家的天主教会在启蒙运动之前是政教合一的、此后仍和国家政治进程纠缠不清，亚洲和欧洲在宗教存在方面应该是平等的，多神教和伊斯兰教各有其独立意义（虽然此问题未得到欧亚主义者的充分论述），信仰正教且跨欧亚的俄国如何直接延续拜占庭基督教等问题。这些论述促使人们同情 17 世纪以来俄罗斯东正教的分裂教派，积极理解和分裂教派关系密切的布尔什维克（不少人原本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分裂教派信徒）抵抗俄罗斯官方正教会的意义^①。但事情比这更复杂，“弗洛洛夫斯基、卡尔萨文、沙赫马托夫最先提出了欧亚主义的宗教道德原则。而高度评价宗教作用的特鲁别茨柯依、萨维茨基和维尔纳茨基，终究更倾向于用文化发展的地理民族学和地缘政治观点去分析”^②。

的确如此，欧亚主义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无神论，虽然有其理由，但须面对苏维埃政权对内制造阶级斗争、对外制造民族主义灾难的事实。这就是特鲁别茨柯依《泛欧亚的民族主义》（1927）所说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旧俄罗斯帝国的各个部分继续作为完整国家的组成部分，国家的基质(убстрат)必须是完整统一的。这个基质就是民族主义和阶级的观念。阶级基质联合过去俄罗斯帝国的各个部分只是暂时的。稳定而永久地联合的，只可能是民族的基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人就是这样。但现在不可能回到俄罗斯民族是国家真正主人的状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其他族裔，也不可能成为这片国土上的真正主人。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基质首先就是俄罗斯帝国……只能是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全部居民，作为统一国家的多民族所呈现出的民族主义。我们称这个民族为欧亚民族，其国土为欧亚洲，其民族主义为欧亚主义”^③。

其实，特鲁别茨柯依早在标志着欧亚主义思潮诞生的文集《出东方》（1921）中所发表的《论俄罗斯文化的高与低（俄罗斯文化的民族学基础）》（1921），就为澄清布尔什维克制造阶级斗争的合法性这一残酷事实建构了

①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изложения»// Пути Евразии – М., 1992. С.363.

② Людмира Паномарева. Вокруг верашиства. Споры в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Евраз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ов. М.:РАН, 1992. С.93.

③ Н.С.Трубецкой, Общеевраз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Вып.9. Париж, 1927. С.28.

理论：“任何文化差异都必须包括这两个必然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被称为这种文化建筑的上层和下层。下层指整个民族最广大的阶层，即所谓人民大众及其文化价值的累积。这些价值是从人民大众中创造出来的，这些相对初等的文化，其价值没有盖上明显的个人创造印记。它们中的某些是从上层渗透进下层的，它们这种迁移必然失去个性、趋于简单化、切近不包括下层的另一种价值的一般性语境，不同于文化建筑上层的若干特征。下层文化价值远不能满足这个民族的全体代表。而那些不满足某种社会普遍价值的人，则致力于完善之，使之切近自己的趣味。在这样的改进方式中，这种价值的最终结果，对大多数国民而言因某种原因不能接受，但部分国民在特殊境遇中会被吸引。如此情景，这种价值会成文化上层的能量。因此，上层能量是国家的主流阶层所创立的，他们一直负责更复杂的需求、更多需求性趣味。相较于下层文化的价值，上层文化则更复杂、更高级……这种文化内部的上下层相互影响，文化的每个部分被外来的文化滋养。由此，这种上层文化吸取外来资源，却不与那些由下层滋养的外国文化重叠。若借来的价值与这个民族的普遍心理不矛盾，并对其有机加工，由于众所周知的合成而使文化上下层产生自然的内部互动，就会再次被确立下来；只是在某种情况下才会出现上下层文化断裂、统一的民族文化才会被破坏。外来资源的影响，在特定民族的心理中一直是被视为格格不入的”^①。

在这样的情形下思考俄罗斯文化，特鲁别茨柯依继续论述道，“我们首先应对自己文化上下层的民族志特征进行准确解释，并且明确说明其和其他外来文化的联系。斯拉夫因素毫无疑问是形成俄罗斯民族的基本因素。古斯拉夫先祖是由讲特定语言的人组成的……斯拉夫家族语言和西欧语言相比有完全不同特征，比起印欧语言来更有一致性。西斯拉夫人紧邻拉丁日耳曼世界，这个世界则不把他们视为完全自己家族的正式成员。西斯拉夫人遭到了灭绝。他们曾生活在今天德国的东部地区，现在只有波兰、捷克等很少地区还有一些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曾受拜占庭影响，并和巴尔干半岛族群一道创建了特殊的巴尔干文化，信仰古希腊文明，但更广泛地吸收拜占庭

^①Н.С.Трубецкой, **Верхи** и низы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этн. основа рус. культуры //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 предчувствия и свершения. София : Рос.-Болг. книгоизд-во, 1921,С. 86-88.

文化精神”，“东斯拉夫不直接紧邻印欧文化核心，他们能在拉丁—日耳曼文化和拜占庭文化之间进行自由选择。选择拜占庭，给其带来了诸多好结果。在俄罗斯大地上，拜占庭文化得到了发展和丰富。得自拜占庭的一切被有机同化，为创造提供了范式。这些因素适合民族的心理要求，尤其是适合于精神文化领域、艺术和宗教生活。相反，所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并未被有机同化，没有激发民族的创造力。买卖西方商品，但没有再生产西方商品。大师著述，不是为了训教俄罗斯人，而是为了发布御令。有时候是翻译了一些书，但它们没有促成民族文学的相应成长……毫无疑问，在俄国，比起西方文化来，拜占庭文化被同化得更为轻松和有机。对拉丁—日耳曼精神，只是本能的感觉、迷信，并且这种精神无助于创造。就这方面情况而言，东斯拉夫人是其先祖的忠诚后裔——作为印欧语言的斯拉夫方言之代表，却不感觉到在精神上切近西部的印欧语言，而在精神上趋向于东方。西斯拉夫人的心理，因长期与德国直接联系而受压抑，在东斯拉夫人那里，则由于和突厥人等相邻的人类学原因而被部分同化了。这样的状况因彼得大帝改革而改变。自改革伊始，俄罗斯人就渗透了拉丁—日耳曼精神，并用这种精神创造。由于匆忙做这件事，俄罗斯人无法使之有机同化。实际上，如果说彼得一世之前的俄国在文化上能被视为几乎是最有天赋的，是反复继承了拜占庭遗产的，那末彼得大帝之后，走向拉丁—日耳曼之路，就处在了欧洲文化的尾部、文明的边缘。上层俄罗斯人消化得不好的若干欧洲精神文化及其驱动因素，在民众那里则完全没有消化”，欧洲文明不断被俄罗斯精英移植到俄国，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得到了践行，但俄国大众却不能接受。“要注意到，当某些俄罗斯精英试图在欧洲文化框架下给予某种民族独特性时，他主要是把与拉丁—日耳曼世界格格不入的拜占庭、‘俄罗斯’或‘东方’因素纳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中。由此，真正的拉丁—日耳曼人是把俄罗斯人的创作视为异己、他者，可以远远地对其好奇，但不能与其融为一体、再度体验……最后，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彼得大帝挖掘的两条鸿沟：一是在彼得一世之前的罗斯和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之间的分裂，二是民众和受教育阶层之间的分裂，这两条鸿沟至今仍然存在。俄罗斯文化大厦上层的情况现在仍无改变。俄罗斯文化上层始终是按文化传统生存的，开始用拜占庭文化装饰，继而用西方文化，

或多或少有机消化了这样的传统。上层改造过的他者文化渗透到下层和民间，强有力地影响了拜占庭、东斯拉夫的民间大众，赋予民间的精神生活以特定色调。西方文化渗透入民间是很弱的，没有深度影响民众的精神。因此，对拉丁—日耳曼文化之理解和借用所引发的俄罗斯文化大厦上下层如此之不相称，与当年上层借用拜占庭文化有很大差别。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发力量及其文化或民族志学形象，并未因拜占庭和拉丁—日耳曼传统而消失。在大俄国的民间文学中，有着丰富的原创力。俄罗斯童话的风格与拉丁—日耳曼民族完全不同，但与土耳其和高加索有相似性。东斯拉夫童话深受俄罗斯的影响。俄罗斯诗歌就其情节而言，和地中海沿岸的东方、拜占庭、拉丁—日耳曼世界的一部分地区有关联，但在形式上完全是原创的，无论如何，没有西方的特征。在形式上可以说，和巴尔干斯拉夫有微弱的联系，和草原部落诗歌有足够强大的联系”，“这样一来，俄罗斯民间物质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草原文化，和西斯拉夫、南斯拉夫文化有紧密联系，芬兰大部分物质文化和似乎统一的大俄国也是一致的”，“为了固化俄罗斯基础，俄罗斯文化上层终究不应该是典型的拉丁—日耳曼式的。回到拜占庭传统不可能。在俄罗斯文化大厦中，拜占庭传统不可能充分替代‘欧亚洲’——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遭到普遍破坏的岁月里还显示出生命力，不仅没有被击溃，还再度采纳自己原初的形式，又按其原有的来自拜占庭的方式重建。在后来的俄罗斯文化中，来自正教传统的拜占庭因素甚至得到了强化。在真正的旧拜占庭原则上充分地重建俄罗斯生活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有两个半世纪的充分欧洲化，而是因为17世纪尼康牧首决定强化俄罗斯生活中的拜占庭因素，让俄罗斯人的信仰切近拜占庭方式，却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后来正是这个分裂强烈反对欧洲化，追求文化独特性的俄罗斯民间力量的倾向在这一分裂中得到了实现。这是一条注定不会成功的错误之路，只是存在于下层的文化，不是上层文化。在分裂之路上，人们终究还是感受到了俄罗斯人自发表现出的健康向上的民族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反对为上层穿上异民族文化服饰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普加乔夫在旧礼仪派旗号下反对‘该诅咒的拉丁人和路德宗’，而不是谴责与巴什基尔人及其他非斯拉夫民族，哪怕是自称为里海沿岸的东方之联合”，“我们承认东方正教作为我们民族心理的独特性，东正教应该在

我们的文化中占有优先地位，因为它影响了俄罗斯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信仰相一致，我们从拜占庭接受了许多文化传统，它们进入古罗斯就得到了创造性发展，切近我们俄罗斯人。这种趋向未来还将持续。这一事业不会结束，但一切绝不是拜占庭框架下进行。我们不是拜占庭人，而是俄罗斯人，要使俄罗斯文化充分地内化为‘我们的’，就需要与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心理和民族意志联系在一起”。“大家都说，俄国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把我们斯拉夫民族统一起来。在这种情形下，通常会忘记我们的兄弟（不只是语言和信仰，而是血缘、特性和文化）不仅是斯拉夫人，还有土耳其人，实际上俄国已把里海东岸的很大一部分纳入国家疆域。基督教在这里的外族中信众甚少。为了使俄罗斯文化的上层和俄罗斯自身的民族地位相适应，就必须使俄罗斯文化不要被东方正教所销蚀，而是要展示民族自然的基本特征，它们能把在历史上和俄罗斯命运相关的不同族群连成文化上的一体……在完成文化大厦的意义上，俄罗斯文化应该是从俄罗斯基本要素中有机成长起来的”^①。

这种从沙俄—帝俄时代俄罗斯文化发生上下层分裂的历史角度进行的分析，巧妙地为苏俄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的合法性提供了根据——上层文化属于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精英阶层，因此，始终保持斯拉夫本色文化的草根阶层自然要与其对抗。声称是工农政权的苏维埃政权，就不仅是终止了文化分裂，而且是用俄罗斯本土文化替代了西方文化。从论述逻辑来说，特鲁别茨柯依是很睿智的，虽然事实上未必尽然。

实际上，更为睿智的是，特鲁别茨柯依的《论乌克兰问题》（1927）还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诠释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他指出，认为彼得改革构成了俄罗斯文化史两个时代的明显分界线，是错误的印象式判断，“一些俄罗斯文化史家经常指出彼得改革之后俄罗斯文化和彼得改革之前的一系列关联现象，并断言彼得改革之前文化的一些特殊潮流已经为彼得改革做了准备。倘若观察史学家们已经证实了的彼得改革前后文化的全部联系，那么就能形成可以这样描述的图景：如果说俄罗斯文化发生了剧烈而全面的传统断裂，那只是指大俄罗斯文本。彼得时期西俄罗斯（特别是乌克兰）的文化

^① Н.С.Трубецкой, *Верхи и низы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Этн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София, 1921. С.89-103.

并没有出现传统断裂，因为乌克兰文化在彼得之前已经开始渗透进莫斯科，在那里产生了某种对其同情的潮流。可以认为，彼得的文化改革在大俄罗斯已经有所准备”，15-17世纪西罗斯文化和莫斯科罗斯的文化发展之路如此区别已非常深刻，“乌克兰人认为，由于莫斯科人没有教养，俄罗斯文化的莫斯科版本被弄脏了，他们责备莫斯科人欠缺教育。而莫斯科人则认为，俄罗斯文化的乌克兰版本由于异教的拉丁一波兰影响而被玷污了。一些有智慧的人认为，在这种争论中，任何一方都既对又不对，大俄罗斯人必须开办教育，乌克兰人必须摆脱来自乌克兰的那些奇怪特征。但有智慧者甚少，大部分则是站在某个不可调和立场上的人。因此，实际上，问题要归结为应该整体上接受俄罗斯文化的两个版本，还是全部拒绝之……政府站在乌克兰立场上，从政治观点上看完全正确。而必然得不到满足的大俄罗斯人，只会进行纯粹只具有地方特征的反抗。此时乌克兰人的不满会强力阻碍乌克兰的统一，甚至不可能真正使乌克兰统一。但站在乌克兰人的立场看，莫斯科政府承认俄罗斯文化的乌克兰版本的正确性，仅仅是第一步。事实上，这是最负责任的第一步——礼拜仪式之书修改（即用乌克兰版本替代莫斯科版本）和尼康的整个改革。在这个领域进行的完全统一，在某种情形下，大俄罗斯就被乌克兰替代了。在彼得之前，文化和生活的其他领域还没有进行统一：在乌克兰，弥漫的是真正的西俄罗斯文化版本，它没有任何大俄罗斯的成分。而大俄罗斯—莫斯科文化则是和西俄罗斯文化的混合物。在这种情形下，参与到大俄罗斯文化中的西俄罗斯因素，作为一种高层次代表（当时的西欧派）走得太远。对方（当时的莫斯科民族主义者）则相反，试图保持大俄罗斯传统的纯洁性”。然而，事情在特鲁别茨柯依看来，远比这复杂：

“彼得大帝提出了使俄罗斯文化欧洲化目的。很明显，要完成这一任务，只能是俄罗斯文化的西俄罗斯、乌克兰版本，它已经吸收了欧洲文化（最近的波兰版本）的某些因素，并表现出了朝这一方向继续进化的态势。相反，俄罗斯文化的大俄罗斯版本，因为其强化恐惧西方、趋向于自足，不仅不符合彼得的目的，甚至直接妨碍这一目的之实现。因此，彼得要尽力消除俄罗斯文化的大俄罗斯版本，并为了使俄罗斯文化的仅有版本作为继续发展的起点，就得践行乌克兰版本。因此，在彼得时期，老旧的大俄罗斯—莫斯科文

化死亡了。随着彼得时代在俄国活跃和发展起来的文化，不是莫斯科的文化，而是基辅的、乌克兰的文化，它得到了有机而直接的延续。这在文化的所有领域都可见到。教会斯拉夫语曾是宗教、学术领域使用的优雅的标准语，这在莫斯科和西罗斯都一样。但在17世纪以前，基辅和莫斯科的这一语言却并不完全一致，无论是在词典编纂方面，还是在句法学和修辞学方面。在尼康时代，教会斯拉夫语的基辅版本，在祈祷书方面就已经排斥了莫斯科版本。正是这个排斥莫斯科版本的基辅版本，后来在其他文献中出现。就是基辅版本的教会斯拉夫语，在彼得时期和彼得之后，作为斯拉夫—俄国标准语之基础，成了教会斯拉夫语。在莫斯科罗斯存在着丰富的诗学（作诗）传统，但这一传统主要是口述的，书面的诗学作品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很多。关于这一诗学传统有哪些特点，我们便可以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其语言是地道的纯大俄罗斯语，稍微带有教会斯拉夫语的要素，语言也充盈着某种传统诗学的烙印；写诗不再注重音节单位和抑扬顿挫，而是立足于大俄罗斯民歌的传唱法所崇尚的那些原则。与此同时，在西罗斯形成了另一种纯书卷语诗学传统，以附着波兰诗学传统为荣，所以就恪守音节韵律和韵脚的使用。过去，在西罗斯写这种格律诗的时候，既使用西罗斯俄国社会上层作为口语和公务语言来使用的俄语（准确地说是白俄罗斯-波兰语的）的土话，也使用教会斯拉夫语。在彼得之前，这种西罗斯的作诗法（况且，使用的当然是教会斯拉夫语，也就是当时通用的俄罗斯标准规范语）已经渗透到大俄罗斯”，“从彼得开始，老旧的大俄罗斯类型的俄罗斯诗歌彻底地退回到了民间：对于（文化意义上的）社会上层而言，此后就只有用教会斯拉夫语书写的、起源于西罗斯的写作格律诗的诗学传统。散文叙事文学，既在莫斯科也在西罗斯存在着。但最后在波兰压倒性的影响之下，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创作，叙事文学几乎全部是翻译的。在莫斯科罗斯存在的则是独立的散文叙事传统，在17世纪正好变得特别坚强，并呈现出了进一步成功发展的希望（如《萨瓦格鲁德采恩故事》）。也就是在17世纪，西罗斯翻译的叙事作品极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莫斯科罗斯。彼得改革以后的俄罗斯叙事文学切近的正是西罗斯的翻译小说传统——原生的莫斯科传统消失了，没得到充分发展”。

特鲁别茨柯依强调，彼得之前莫斯科早就知道乌克兰传教士传统；彼得时期，费奥凡博罗科波维奇和斯杰凡雅沃尔斯基等著名的乌克兰演说家最终稳固了这一传统；彼得之后的任何俄罗斯演说者，无论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所沿袭的正是这种乌克兰传统，而不是莫斯科传统，“莫斯科传统最终还是逝去了，除了选自阿瓦库姆的分裂派作品的规程之外，没有留下其他证明。最后，戏剧文学是在彼得之前的时代进入西罗斯的。在莫斯科没有自己独特的戏剧文学传统，流行的是乌克兰作者的戏剧作品。彼得改革之后，与俄罗斯戏剧文学有着天然联系的正是乌克兰戏剧流派。因此，我们看到，在彼得改革之后的所有领域，俄罗斯文学都是直接延续了西俄罗斯、乌克兰的文学传统。我们在其他艺术种类中同样观察到了这样的图景——在音乐领域（既包括声乐也包括室内乐），在绘画领域（在大俄罗斯传统延续之处只有老信徒生活，而所有彼得改革之后的俄罗斯圣像画术和绘画术肇始于西俄罗斯传统），以及在教会建筑领域。与西俄罗斯传统相连接并且拒绝莫斯科传统的一切，不仅表现在艺术方面，也表现在彼得改革之后精神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对待宗教的态度、教会和神学思想的发展方向，自然亲近的正是西俄罗斯传统。还在尼康时代，俄罗斯神学的西俄罗斯版本就曾被承认是唯一正确的”。“彼得改革之后的俄罗斯教育、教育方法和教学之传统是西俄罗斯的。最后，彼得改革之后所吸收的古老大俄罗斯文化观点本身，究其起源，也是西俄罗斯的……在 17-18 世纪之交，出现了大俄罗斯精神文化的乌克兰化（украинизация）。俄罗斯文化的西俄罗斯版本和莫斯科版本之界限，以莫斯科版本被灭绝的方式而得以消除，俄罗斯文化进而变得统一起来。彼得之后这种统一的俄罗斯文化，就其来源而言，就是西俄罗斯、乌克兰的。而俄罗斯的国家特性在起源上是俄罗斯大俄罗斯的，而后，文化中心也从乌克兰转向了俄罗斯大俄罗斯。由此产生了这样结局，即这种文化成了既不是独特的大俄罗斯文化，也不是特殊的乌克兰文化，而是整个俄罗斯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从局部性和地方性向全局性和全民性的转化。此时，乌克兰是波兰的一个省，波兰则是拉丁-日耳曼欧洲的一个文化外省（且是一个偏僻的外省），俄罗斯文化的西俄罗斯版本就这样形成了。但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文化这一西俄罗斯版本，在成为统一的全俄文化的同时也

锻造了俄国的首都。这时，俄国自身也在致力于要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乌克兰文化似乎从偏僻的小城迁入了首都。相应地，它不得不改变自己以往明显的外省景观。它尽力挣脱自身特有的全部波兰特征，代之以本然的拉丁—日耳曼文化因素（德国的、法国的等）。据此，乌克兰化被证实是欧化的桥梁。”

不过，特鲁别茨柯依认为，“首先，在西罗斯，书面的教会斯拉夫标准语，与特殊的俄罗斯—波兰习惯语并存，成为上流社会的日常用语和商业用语。但此后俄罗斯文化的乌克兰版本成了统一的俄罗斯文化，作为特殊的波兰桎梏标志和外省特征的俄罗斯—波兰习惯语，自然不可能继续使用。占据大俄国主流位置、在莫斯科公文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大俄罗斯实用口语，对俄罗斯—波兰习惯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不但最终战胜它并排斥它，而且还成为上流社会的唯一实用口语。在大俄国是这样，在乌克兰亦然。在这些语言和不断发挥作用的教会斯拉夫语之间，建立了某种相互渗透的紧密关系：上流社会的俄罗斯口语强劲地教会斯拉夫语化，而标准教会斯拉夫语则强劲地全俄罗斯化（обрусел）。结果双方在同—个时代重合，俄语成了全体有教养的俄罗斯人的标准语、日常实用口语，这就是俄罗斯文化的语言基础。

因此，大俄国文化的乌克兰化和乌克兰文化变为全俄文化，就自然而然地导致这种文化失去了其独特的乌克兰外省特征。由于上文提到的，除了莫斯科官方公文用语之继承性被保持下来以外，独特的大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延续性被彻底而坚定地消除了，大俄罗斯的独特性未能得到继承和延续。由此，彼得之后全部彼得堡文化的全俄特征就不存在了。而全俄性之被抽离，导致在实际上排斥具体的俄罗斯性，也就造成了在实践上民族的自我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俄国的伟大，健康的民族情感自然会起来反对这种自我否定。因此，俄罗斯社会出现致力于证实俄罗斯民族独特性和呈现俄罗斯民族面貌的潮流，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但因这些潮流的趋向正是反对全俄文化的抽象性，力求代之以具体性，他们就必然会接受特定的地方特征——大俄罗斯、小俄罗斯或白俄罗斯，因为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而‘全体俄罗斯人’（общеруссы）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实际上，我们看到，支持具体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之潮流，是流经大俄罗

斯和小俄罗斯这两条并行河道。我们观察到的正是这两条一直平行的河道。这种平行现象在全部所提及过的潮流中一定能观察到。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在 18 世纪末以来的文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系列在语言和风格上有意识庸俗化作品；这些作品形成了两个绝对平行的演化线——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①必须承认，这种从文化的地理分裂角度，把俄国民族矛盾与阶级冲突融为一体的论述，从乌克兰-俄国之复杂的关系史来看，应该是很深刻的，至少是方便了我们理解苏维埃制度在共产主义名义下所展开的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在乌克兰地区是有民族主义根据的；乌克兰-俄罗斯之间的民族身份之撕裂、文化认同之分裂，为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危机及其与俄国关系，埋下了无法克服的祸根。

令人惊奇的是，特鲁别茨柯依作为欧亚主义运动最为杰出的思想家，其《论真假民族主义》（1922）已经为这样的论述铺垫了扎实的基础：“每个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就显示出可称之为自我中心主义的心理，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无意识地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万物之灵、所有生命中最优秀和最完美的”，热衷于和其他任何民族比较高低、优劣，把自己列为最完美的优等一族，“其家族、其阶层、其种族、其民族是比其他任何民族，哪怕是类似的民族，都要更优等。充满这种心理的德国人，正是这样把自己的文化纳入世界评价的。因而，他们对文化的态度有两种可能性：或承认德国、法国等属于世界上的高等文化，或承认这一特殊族群，甚至与其最切近的族群的文化，即和德国人协同创造的文化，是最完美的。第一种情形在欧洲被称之为狭义沙文主义（德国和法国最典型），第二种则可准确地说就是大德国沙文主义。但拉丁-日耳曼人过去通常天真地确信，他们就可自称代表人类，其文化就是人类普世文明，其沙文主义乃是世界主义。而非日耳曼人理解欧洲文化，则也是从拉丁-日耳曼人的角度来认知和评价的。由于屈从于‘人类普世文明’这个错误术语，因而遮蔽了相应概念所包含的族群内容。因这些民族对文化的评价不是立足于自我中心论，而是欧洲偏移的位置，即‘欧洲中心论（европоцентризме）’。这种欧洲中心论必然给所有欧洲化的非日耳曼民族带来某种灾难性的后果。

① Н. С.Трубецкой, К украинской проблеме//Евраз. временник. Париж,1927.С. 165-180..

追求欧洲化的非日耳曼民族，其知识分子要避免这种后果，只能在其意识和自己的文化评价方法论中进行转型，清楚地意识到欧洲文明并非人类普世文化，而只是特定族群的文化，只有拉丁—日耳曼文化须遵守的”。这种老欧洲价值观应被立足于另外基础上的新价值观所替代，“非拉丁—日耳曼民族的责任在于，首先克服自我中心论，其次是不要让自己被‘普世文明’、‘追求真正的欧洲文明’所欺骗。这种责任可定义为‘认识自己’（познай самого себя）和‘成为自己’（будь самим собой）。和自我中心论斗争只能在自我意识中进行。真正的自我意识是向人类或民族指出其在世界上的位置，展示其并非宇宙中心，也非地球核心”，“被视为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者，其民族就类似于‘真正的欧洲人’，努力使这个民族不仅不同于拉丁—日耳曼国家的精神、法律和经济生活，对拉丁—日耳曼的意识形态、艺术和物质生活也是陌生的”，“欧洲化，致力于精确再现拉丁—日耳曼生活各领域的标准，最终导致损失所有的民族认同、民族特性，很快就会只剩下声名狼藉的母语。在适应新而奇怪的概念和生活形式之同时，最终使许多小国的官方‘国语’走向民族主义之路。这不是大众的所能理解的，是失败的去民族化的、失去个性的某种教条的语言。很明显，这样的民族主义不可能促成民族认同，而只能是类似于大帝国的某种东西，绝不可能产生真理……应该承认文化保守主义这种虚假的民族主义之特殊形式，它人为地把民族主义认同和某种过去的文化价值或生活形式的创造物等同起来。当它们已不再能明显满足其民族精神心理的时候，保守主义还不许可它们变化，因而造成文化和民众分裂”。

“倘若我们这样来看始终存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就被迫承认真正的民族主义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是不存在的。大部分有教养的俄罗斯人完全不期望成为‘自我’，而是想成为‘真正的欧洲人’。虽然俄国有自己的愿望，但俄国终究不可能变成真正的欧洲国家。我们中的许多人看不上‘落后的’祖国，因此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至今回避任何民族主义。另一些人则自名为民族主义者，但实际上只是把民族主义理解为建立大帝国，对外用武和显示经济实力，俄国有显赫的国际地位，认为这些是俄罗斯文化最为切近西方的方式。在某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那里，‘俄罗斯化’的基础乃模仿西欧，悬置东正教和俄语基本规则，用很蹩脚的俄语拼写国外地理名称：所有这一

一切都是因为要切近德国人，‘德国人是有文化的民族’”。“显而易见，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按拉丁—日耳曼方式来建构的。由于这种特质，古老的斯拉夫应该是必然地衰退了。鉴于真正的民族主义完全立足于自我意识，在俄罗斯知识分子意识中需要某种彻底的革命”^①。而这样探讨俄国的欧化历史进程及其后果，与他同时期问世的《俄罗斯文化的上层与下层》相一致：“我们不是拜占庭人，而是俄罗斯人。对此，俄罗斯文化过去就是‘我们’的全部，以使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人自发的独特心理和族群面貌紧密相关……俄罗斯文化没有因为东方正教而耗尽，而是揭示出俄罗斯自发特性的基本特征，它们促成了文化统一的多元族群，各族群和俄罗斯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欧洲的德国文化追求‘系统智慧’，并把这作为永恒不变的标准。我们尊敬过去和现在的西欧文化，但我们看不到其未来。我们满怀极度喜悦、心怀恐惧地醉心于这一毁灭性的傲慢……对当下俄国命运的任何考虑，都应该按特定的方式，以已形成了的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或准确地说，就是俄罗斯问题提出本身作为目标。这不是某种理论结论或特定的历史估价，而是解决问题的主观—心理方法……俄罗斯人和‘俄国世界’的民众实质上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②。而且，特鲁别茨柯依后来在《论俄罗斯自我意识问题》（1927）中继续这样的主张。

有意思的是，特鲁别茨柯依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论述布尔什维克政权所隐含的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诉求的，是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且，正因为有这样的意识，欧亚主义者就为认识俄国作为跨欧亚国家，建构了更广大的文化地理空间。除了特鲁别茨柯依《论俄罗斯文化中的里海沿岸因素》之外，萨维茨基《大陆—海洋（俄国与世界市场）》、《欧亚大陆》、《两个世界》和《文化的迁徙》，彼契里《旧世界历史中的“东方”与“西方”》等欧亚主义思潮的杰作，从不同的地理空间论述了俄罗斯文化分裂的历史依据，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思想，如“与拜占庭文化格格不入的里海沿岸民族因素，深

① Трубецкой Н. Об истинном и ложно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е//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 Книги 1. София: Российско-Болгарском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е, 1921. С.71-85.

② Трубецкой Н. «Верхи и низы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этн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София, 1921.С.104.

深深地植根于古罗斯民族的特性之中”^①，“欧亚主义包含追求普遍哲学之真的种子。但在法律和概念上适用于欧亚主义的，则属于另一个问题：一个关于如何对待已经形成的快速而奔涌的现代性潮流之思想圈问题。在这个转折中，欧亚主义专注于努力认识和思考俄国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走出当代欧洲文化藩篱之方法。对于这种哲学而言，文化的产生、发展、死亡之实质是清楚明白而不可更改的事实……而要理解俄国走出当代欧洲文化藩篱之路，就需要转向俄罗斯的历史”。从历史深处可看到“俄国社会思想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来自古代且艰难克服环境困难而延续的宗教启悟，在果戈理和斯拉夫派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另一种是欧化的方向，但从历史哲学观点看，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历史生成物，是两种历史的世界”，即坚守正教的圣罗斯历史，源自启蒙时代且导致虚无主义—科学主义世界观盛行、缺乏诚信的欧化历史，这两者相互矛盾而奇异地组合在一起^②。这些思想，较之于同时期其他人对俄罗斯问题的思考，应该说显示出历史地理的纵深感。

可以说，欧亚主义思潮的价值不限于把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治理下的苏联当作讨论的话题，而是藉此从人类文化构成的大视野，探讨俄罗斯作为跨欧亚帝国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其形成和发展的特殊之路、支撑这种跨欧亚帝国的俄罗斯东正教弥赛亚使命、俄罗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俄罗斯历史在地理上区分欧亚洲的原因等。这就是别尔嘉耶夫在《欧亚主义者》（1925）和《欧亚主义者的乌托邦国家主义》（1927）中所说的，“这是侨民在革命后出现的唯一的思想流派，是积极活跃的流派。其余的任何流派，‘左的’或‘右的’，皆有革命前的性质，因此绝对地丧失了对未来的创造力和意义。欧亚主义者站在通常所说的‘左派’和‘右派’之外”，因而捕捉到了历经战争和革命之后的俄国的社会情绪^③。这些流寓国外的俄侨，在思想上与留在国内的绝大部分同胞同声相契，是对俄国发生大事变后所产生的民族本能反应，是感情化地、自发地、激情地在保护着俄国和俄国人民的自尊。而且，

① 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 О туранском элемент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Берлин, 1925.

② Континент-Океан (Россия и мировой рынок) //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София, 1921. С. 104.

③ Бердяев Н. Евразийцы//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ИФ РАН, 1993. С.292.

这种情感性表达有其思想史基础和社会实践依据。甚至在欧亚主义运动产生之前，例如著名神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就在影响力至今不减的《路标集》（1909）中所发表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之宗教实质的断想）》中声称，俄罗斯知识界只是表层且简化地理解了欧洲文化，截取其最激进思想的残骸，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偶像。“许多世纪以来，深深植根于自己历史的西方文明之树，我们俄罗斯知识分子只是选中了一个枝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其他的全部，还信心满满地以为我们正在把自己嫁接到真正的欧洲文明上”。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宗教哲学和马堡学派中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克柳切夫斯基、维别尔（Р. Виппер）、格列夫斯（И. Гревс）等历史学家，也为欧亚主义思潮的出现奠定了哲学和史学基础。尤其是，俄罗斯文化史显示出，普通大众没有吸取真正的欧洲文化，在心灵上没有变成欧洲人，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科学而不是对欧洲美学精神产生了盲目的信仰，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如《父与子》就呈现出西化的教育不仅毁灭了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追求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而且使得传统的贵族精英无所适从。由此，欧亚主义者很自然地确信俄罗斯—欧洲文化并未合体，认为俄国和欧洲文明彼此间不可能存在有机关联，十月革命实质上乃是民众反对西方化的上层，革命终结了俄罗斯—欧洲文化，布尔什维克销蚀了贵族文化，促使俄罗斯文化摆脱长期被欧洲基质所腐蚀的境遇，为俄罗斯文学哲学等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也给后来的俄国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史遗产。按亲身参与过欧亚主义运动的米留科夫的说法，“每个人都能在欧亚主义者那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人想要东正教，有人想要民族主义，有人想批评白色运动，有人想与布尔什维主义妥协和替它辩护，有人想要理解当前的现实主义，有人想要建构未来的民族主义乌托邦”^①。当然，因为要达到促使侨民知识分子正视苏俄、承认苏联及其共产主义存在的目的，这就很自然地导致俄侨知识分子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

关于欧亚主义的讨论或践行

^①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Доклад П.Н. Милюкова)// Последние новости. 8 Февраля 1927.

苏维埃政权诞生伊始，便伴随着合法性问题，由此也促成了在以强力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同时，也极力推行苏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行为，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有效地建构了疆域更大的跨欧亚苏俄，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抵抗和不信任。在这样的形势下，寓居欧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兴起了欧亚主义运动：1921-1925年主要集中在布拉格和柏林，1926-1929年以巴黎为中心，1930-1939年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在巴黎出版了与苏维埃政权思想接近的周报《欧亚洲》（“Евразия”）。欧亚主义运动的创始者们立即发表声明《关于〈欧亚洲〉报》（1929），批评欧亚主义“巴黎派”并宣布与之划清界限，彼契里、弗洛罗夫斯基等诸多著名思想家则脱离了欧亚主义运动。颇有声势的欧亚主义运动，就这样在同是被布尔什维克政权驱逐的俄侨知识分子的疑惑、批判声中走向终结。

其实，早在第一本欧亚主义文集《出走东方》（1921）出版以后，作为萨维茨基在彼得堡时期老师的П·司徒卢威，就立即表达了反对意见：1921年2月16日致函萨维茨基说，特鲁别茨科伊的《论真假民族主义》，“思想荒谬，有必要加以驳斥和推翻”，“特鲁别茨科伊的‘民粹运动’乃俄罗斯思想的梅毒……”，批评萨维茨基《回归东方》充满着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你们欧亚主义荒谬，站不住脚，且有害，因为它正转向民粹运动……是对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背叛。”^①自此，在欧亚主义运动进程中，对其争论、批评，就如影随形：

在欧亚主义思潮高峰时期，著名的俄侨知识分子A.A.基泽维杰尔发表《欧亚主义》（1925），批评欧亚主义把俄国和西方对立起来，认为“无论欧洲民族还是亚洲民族都曾经历氏族生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曾有过封建主义，君主专制也都存在过。通常被认为是亚洲特殊属性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欧洲来说也不陌生，只是以其当地独特的外貌出现罢了。那么何来理由证明：在欧洲国家个人自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立宪制，在亚洲国家的特定条件下就找不到立足点呢？”所以欧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们的“让欧洲文化灭亡”、“反对俄罗斯文化中的欧洲因素”之类的诉求与事实不符。俄国

^① Струве Г.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изгнании: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бзора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Париж: YMCA-PRESS, 1984. С.40,42.

缓慢而模糊的社会进程，在诸多方面仍显示出与欧洲的一致性，如基督教在社会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类似于欧洲的城市、市民阶层和城市自我管理机制等，“在具体的民族文化中没有全人类元素，人类在其文化生活中散落成相互陌生的文化世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拥有全人类意义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这就是作为独立学说的欧亚主义获得现实依据的思想基础。如果否定它，欧亚主义的整个世界观大厦也将随之崩塌”^①。他所撰写的《欧亚主义式的俄国史》（1927）更是从两方面深刻批评欧亚主义：1）批评其思想观点上的矛盾，如否定性地对待西方和西欧发展模式，肯定苏维埃体制及其抵抗西方的原则，这两者之间其实充满着矛盾，因苏维埃制度在很多方面是借助西欧经验的；2）在研究俄国历史的方法论方面，回避伊凡雷帝时期、莫斯科公国时代、“混乱时代”等古罗斯历史，对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及19世纪历史充满偏见，指责“彼得一世改革把俄国引进了死胡同”，说叶卡捷琳娜大帝是迫害东正教会、剥夺教产、虐杀神职人员的“极端西方派分子”。实际上她既信奉伏尔泰主义，又忠诚于东正教，“修道院地产国有化政策是在虔诚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执政末期就已决定下来的”，“欧亚主义者就是这样处置历史：需要处无限突出，不需要处则尽力遮掩”^②。不能说这样的批评没有道理，因这种只承认彼此陌生而互为特殊的民族文化，正如灵魂无法复制，文化也不能拷贝，无法建立全人类文化的主张，实际上促成这些知识分子始终是在俄侨圈中活动，增加了他们和侨居国的矛盾。

其实，批评欧亚主义思潮最为深刻者当属别尔嘉耶夫。其《欧亚主义者的乌托邦中央集权》指出，天然具有“危险性”的欧亚主义，考虑问题“多是立足于必然的范畴，而不是自由的范畴”，使个人服从集体，“不会把道德评价因素引进政治”，诱惑人们盲目地去反西方，不明白柏拉图《理想国》关于哪怕是再完善的国家，也是难以摆脱绝对暴政之嫌疑的，主张国家“应该是强大的，但必须清楚自己的权力界线”，真正的思想“只可能存在于上帝之国”，因为任何世俗国家都会干涉公民的个人生活，无论目的怎么高尚，

① Кизеветтер 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 Памят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7. С.336-337.

② Кизеветтер А.А.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о евразийски. С.342.

即便为了共同福祉也是罪恶。布尔什维主义所追求的完美国家的理想正是这样，即以无神论为代价，制造令人恐怖的无产阶级专政，侵袭了国民的所有生活方式；而且，苏维埃政权把民族主义和政权有效治理一体化，推崇理性主义，排斥启示录之类的神秘主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欧洲思想。“疏远欧洲和转向亚洲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欧化”，他们还掌握了“欧洲的组织建构方法”^①。他在《欧亚主义者》中进一步批评道：“欧亚主义者刚愎自用且虚假地对待西欧的态度，类似于亚洲主义，而不是欧亚主义态度。他们深信，欧洲不能再垄断文化，文化不再只是欧洲的，亚洲人要重新进入世界历史潮流”，实际上俄罗斯文化与欧洲各民族文化都是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础的，“我们不仅属于东方，而且通过承继古希腊文化遗产使我们也属于西方。假如我们放弃了古希腊神学……假如我们身上的里海沿岸因素占了上风，我们也许最终会成为亚洲人、东方人”。较之古希腊精神遗产，欧亚主义者更喜欢“里海沿岸的物质遗产”，对俄罗斯与成吉思汗遗产的关系更是津津乐道，因为欧亚主义者所接近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俄罗斯的亚洲、东方、鞑靼、蒙古的东西，“他们明显地认为成吉思汗比弗拉基米尔大公好。对于他们来说，莫斯科王国是受过洗礼的鞑靼王国，莫斯科沙皇是信仰东正教的鞑靼汗王”，相应的，他们否定彼得大帝的历史价值，就会导致对现代俄罗斯文化的虚无主义。“我们最需要的是确立我们精神文化的传统和继承性，以便对抗虚无主义和破坏天性，以便战胜我们的鞑靼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欧亚主义曲解基督教，对其进行地理和种族的划分，“对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的憎恨是罪恶和杀戮，是对西方各民族心灵的否定，是对他们生命源泉和救赎的排斥”。他们把东正教首先理解为一种民族、民族文化、民俗的主要事实，只限于形式的理解，把东正教的“静态造型”与伊斯兰精神的相似性，作为联结所有东方—亚洲非基督教信仰建立共同反对西方基督教的根据，这是对基督教本质精神的背叛，是脱离俄罗斯民族宗教思想的优秀传统、背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遗产的“分立主义行为”，是俄罗斯普世精神和陀

^① Бердяев Н. Утопический эстагизм евразийцев //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РАН, 1993. С.303-304.

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反对者^①。别尔嘉耶夫对欧亚主义的这些批评，在苏联解体后更显示出其深刻性。

上述的批评，连同批评欧亚主义是有意识反对西方经验的B.B.津科夫斯基（《俄罗斯思想家和欧洲》），认为“欧亚主义的命运是一部失败的精神史”的弗洛罗夫斯基（《欧亚主义的诱惑》），深刻批判“欧亚主义者即俄罗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的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第三种极端主义》和《俄国种族主义》），以及批评欧亚主义存在着名称与内容分裂的彼契里（《欧亚主义的两张面孔》），等等，都不同程度显示出论述的深刻性。他们或指出欧亚主义选择“中庸”（серединная）立场，认为“俄罗斯文化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不是这些因素及其总和的机械组合”，与欧洲文化或亚洲文化相对立，不希望把俄国视为欧洲事务的一个省，“在指责‘新西方派’对欧洲奴颜婢膝时，欧亚主义者与盲目崇拜俄罗斯民族生活的斯拉夫之根的老斯拉夫派不同，前者更重视东方的里海沿岸因素以及成吉思汗遗产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实质影响”^②；或指出欧亚主义忽视了彼得大帝之后的俄国历史，因为正是欧化的改革，“促成了俄罗斯文化惊人的繁荣：从罗蒙诺索夫和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好比在罗马一日耳曼桎梏的‘痛苦’中浴火重生”^③，欧亚主义把世界文化划分成东方和西方、拒绝承认各民族文化分别隐含着共通的、主张国家有权对公民进行道德监护、对天主教的情感性批判等，很显然“包含着一些必须加以反对的有害的有毒成分”^④。

苏联解体了，相应的，维护布尔什维克及其制度的任何论述，虽然不一定如苏维埃意识形态那样被批判，但被质疑是无可幸免的。这就是国立特维尔大学教授古曼在《俄罗斯哲学史上的俄国和欧洲》（1997）中所批评的：“欧亚主义是俄罗斯思想中激烈反欧洲主义的一种潮流。那些欧亚主义思想家从远处眺望俄国，如何避免极权主义与立足于要被西方文化价值所同化而

①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Евразийцы//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Кн.4. Берлин, 1925. С.292-294.

② Новикова Л, Сиземская И. Дваликаевразийства//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2. №.7.

③ Степун Ф.А.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Антология Сост. Л. И. Новикова, И. Н. Сиземская. М.: Наука, 1993. С.307.

④ Пономарева Л.В. Вокруг евразийства: споры в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де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2002. С.28.

切近欧洲之伤害，宣布另一种世界观和政治观的方案，其实质在于为国家的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模式辩护，从中锻造出理解俄国文化历史传统中的欧亚合并原则，反对本土哲学史上的欧洲自由主义倾向”。“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经历了经典的欧亚主义，但未在根本上从生活历史中消失。改革之后给欧亚主义情绪之爆发提供了新机遇，虽然有别于欧亚主义创立时期那样”^①。然而，欧亚主义作为侨民思想遗产，因为在论题和论述方式上延续了白银时代，随着白银时代再发现，这些遗产也就得以重建天日。俄国知识界从思想史角度对其展开热烈讨论，短短几年间出现了许多重要文献，包括《欧亚主义：俄罗斯侨民的历史视点》（1992）、诺维科娃（Л.Новикова）和西泽穆斯卡娅（И.Сиземская）主编《居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的俄国：欧亚主义的诱惑力。文选》（1993）和《俄国世界与欧洲文选》（1995）、科柳奇尼克夫（Сергей Ключников）《欧亚主义的俄罗斯交接点：俄罗斯思想中的东方》（1997）、万达尔科夫斯卡娅（М.Вандалковская）《俄国侨民的历史学：欧亚主义的诱惑》（1997）、沃尔克格诺娃（О.Волкогонова）《国外俄罗斯哲学中的俄国形象》（1998）、奥尔洛娃（И.Орлова）《欧亚主义文明：社会历史之重新回顾与前景》（1998）、谢尔盖·普希金（Сергей Пушкин）《欧亚主义学说》（1999）、潘申科（В.Пашенко）《欧亚主义意识形态》（2000）等，以及乌尔哈诺娃（Рима Урханова）在科学院哲学所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中作为思想哲学潮流的欧亚主义》（1992）、沙基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Шатилов）在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政治文化现象的欧亚主义：1920年代》（1999）、日丹诺娃（Галина Жданова）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当代研究中的欧亚主义：哲学视角》（2002）等。

然而，俄联邦试图再度融入欧洲不断遭遇挫折，不断遭遇西方的挤压，导致知识界主要不是批评性地继续探讨欧亚主义思想遗产，而是痴迷于欧亚主义运动提出的诸多概念，如“地方发展”、“国家”、“交响乐式的个性”等，关注作为地缘政治方案的欧亚主义、欧亚主义历史发展动力、俄罗斯帝国—苏

^① ГубманБ.Л.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 философии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верь:ТГУ, 1997. С.53, 65.

联的欧亚文明特征、欧亚居民互动和对话的可能性及方式、欧亚的陆地贸易和海洋贸易路径、纳扎尔巴耶夫对欧亚理论的实践、欧亚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可行性、关税同盟在欧亚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从人文视角能否解释欧亚一体化问题、欧亚认同形成要素、欧亚语境中的国家特征等现实问题，出现了新欧亚主义思潮。他们“主张欧洲并非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先进国家，只是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而不可复制的模式。俄国必须清除西方的积习（unlearn the West），并且要拒绝欧洲认同中的帝国主义。这类欧亚主义理论已深深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政客，因为它能帮助他们去明确解释苏联解体，并从俄国与其说是受时间限制，毋宁说是受空间左右而导致历史混乱中，还原其发展的连续性感觉”^①。

欧亚主义思想遗产及其在当代被激活，孕育出莫斯科法学院教授伊萨耶夫（И. Исаев）、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1962）、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帕纳林（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арин, 1940-2003）等新欧亚主义思想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1）有意屏蔽俄罗斯帝国参与欧洲文明进程，并凭借其坚船利炮和基督教征服亚洲和世界，从而使亚洲各古老文明普遍在和现代文明的抗争中衰落之类众所周知的事实；2）他们因自身强烈的祖国情怀，无法正视欧亚主义思潮的殖民主义诉求（欧亚主义运动务实地承认苏维埃政权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帝国疆域之事实，同时赞赏布尔什维克政权停止西方化过程，有可能避免类似于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之风险，以共产主义修辞成功阻止了非殖民主义化潮流。苏俄终止帝俄的欧洲化趋势，就使其重新调整对东方的外交：把中国、印度和朝鲜等纳入其东方阵营，以图建立安全的东方屏障）；3）更不去反思欧亚主义文化遗产的去亚洲化实质：俄罗斯化是欧洲化的俄罗斯改造亚洲的过程，是欧洲化的俄罗斯人以所谓现代文明建立俄罗斯帝国，根本就不承认亚洲地区有独立的东方身份。到1914年，俄罗斯帝国版图的欧洲部分才425万平方公里、芬兰及北欧地区达28.6万平方公里，而在亚洲的国土面积超过1450万平方公里，但包括彼得堡、华沙、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等在内20个最大的城市，没有一个位于乌拉

^① Marlene Laruelle (translated by Mischa Gabowitsch), *Russian Eurasianism: an Ideology of Empire*,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1.

尔以东。这意味着，帝国的亚洲部分从未获得过与欧洲部分平等的地位。对于这样的事实，俄侨知识分子延续屏蔽帝俄东方战略的俄罗斯思想史传统，出现了特鲁别茨柯依在《俄罗斯文化的上层和下层》中所说的情形：“俄罗斯知识界普遍确信，俄罗斯人独特的气质就是‘斯拉夫性’”，这种文化有其独特区域，除了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之外，还有伏尔加河流域、芬兰湾沿岸、和俄罗斯在文化上有关联的亚洲（土耳其—蒙古），“在西部还有经白俄罗斯和小俄国（乌克兰）而逐渐过渡到与拉丁—日耳曼接壤、毗邻巴尔干文化的西斯拉夫人的文化。但和斯拉夫文化的这种关系已经不深，和东方的联系也不平衡。由于一系列原因，俄罗斯民间文化毗邻的正是东方，东西方界限有时正好画在俄罗斯和斯拉夫之间，有时候南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没有交集，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其他的斯拉夫人，而是由于其他的斯拉夫人曾遭遇到土耳其的深刻影响”^①。而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得到学术界积极呼应，出现了为俄联邦的欧亚联盟战略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学术氛围。

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和部分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家也将新欧亚主义作为自己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普京担任总统后不久便发表了题为《俄国：新东方前景》（2000）一文，指出：“俄国始终感到自己是欧亚国家，我们从未忘记俄国领土基本部分是位于亚洲的……俄国要真正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互动过程——这是自然而然、无可回避的。要知道，俄国是连接亚洲、欧洲和美洲之一体化的独特交接点”^②。

普京的主张得到了俄国和独联体部分国家的积极呼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声言，“欧亚一体化不是目的本身。它是实现更高目的——提高我们人民生活质量和福祉的手段”^③；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欧亚联盟：理念、实践和前景》（1997）主张：“哈萨克斯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北部和俄国、东南部和中國接壤，这样的地理位置不能不在对外关系中有着多元化定位。在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中，我们国家是欧洲成员和亚洲地区成员。

① Трубецкой Н.С. Верхи и низы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Этн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София, 1921. С.86-103.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овые восточ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4.11.2000. С.1.

③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ашенко. О судьбах наше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инск, 2011.

毫无疑问，我们明白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之实质就是要成为强化亚欧大陆安全的中心”，“我国是亚洲唯一被编入欧亚之根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使我们能享用欧亚文化成就”，“哈萨克斯坦是欧亚洲之中心，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俄国和穆斯林世界中扮演着联系彼此经济和文化的重要角色”^①，并在欧亚框架内发展哈萨克斯坦，按欧亚洲对话方式治理国家和发展与俄国的关系，“相互影响的不同语言、宗教、文化，许多民族共同生活于此，每种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应该有自己的贡献。此外欧亚地区的国家应该在彼此相互谦让和对话中发展”^②。

这种得到政界支持的后苏联新欧亚主义思潮，强化了俄国人对俄联邦的认知，并使新欧亚主义的政治实践在俄国和部分独联体国家成为合法的潮流：独联体成立了欧亚中心和委员会，2001年在莫斯科举行了“‘欧亚洲’全俄政治社会运动”成立大会，有51名俄联邦地方领导人出席。普京在出任总理和第三次担任总统后，积极致力于发展远东和南俄并推动欧亚联盟的建立。2014年5月29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实施的决议。此前五天（24日），普京在第18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就曾说道，“俄国一直致力于和邻国共同努力实现欧亚一体化。对关税同盟国家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来说，今年最重要事件将是5月29日在阿斯塔纳签署的欧亚经济同盟条约。该条约将于2015年1月1日生效，将形成三个国家（俄国、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超过1亿7千万人口的统一市场，以及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将从本质上扩大商务、共同投资和合作项目的机会，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提供条件，并方便与国外市场的合作”。克里米亚入俄之后，俄联邦所致力欧亚联盟，更是清楚地显示出：不是复兴俄国亚洲地区的独立文化价值，承认亚洲国家的精神文化价值和欧洲化的俄国文化价值是对等的，而是随着俄联邦重新崛起，加大重视发展地理上的俄国亚洲地区，把俄国亚洲地区纳入俄联邦统一发展战略，为此需要重建有实体意义的原苏联空间，以便在新的国际环境中

① Назарбаев Н.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иде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 1997. С.27-28, 404.

② Галина Сачко. Евразия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ный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й дискурсы// Вестник челяб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1., С.14.

实现复兴与发展。

【Abstract】 From 1920s till 1930s, facing the sovietized Russia, a group of Russian overseas intellectuals strived to reconstruct the perception of Russian empire and the Soviet state. Under this background, Eurasian movement appeared. Eurasianists, represented by Trubetskoi, were not behind closed doors, but instead discussed specifically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Europeanized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omplex history,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ussian and European cul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Russian Orthodox and European Christianity, as well as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Russia. Meanwhile, they also tried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the Soviet system, and affirmed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in terminating the Europeanization process. The structure of overseas Russian intellectuals is complex and accordingly the related discourses on Eurasianism are also quite contradictory.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Eurasian ideologies have been unknow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Nevertheless, during the post-Soviet era, with the Silver Age and the rediscovery of Russian emigrants' cultural heritages, in addition to various difficulties of Russia when integrating into Europe, it has again had wide influences.

【 Key Words 】 Territory across Eurasia, Empire Governance, Europeanization, Soviet Regime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20-30 гг. XX в. часть диаспоры русских 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 прагматично относилась к советизированной России, пыталась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поним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это привело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движения евразийства. Трубецкой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течения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не был заперт границей, а будучи в слож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детально описал отсталость европеизированной фор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ами, русски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м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 католицизмо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сположении России в Европе и Азии и т.д. Русские интелленты с помощью этого также подтверждали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 значения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процесса европеизации. Состав диаспо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был сложен, мне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евразийства также был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ыми. В течение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ков лет в пределах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оставалось безызвестны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Однако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вслед за Серебряным веком и повторным открытием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рус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а также трудностями вх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Европу, оно снова стало оказывать си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Транс-евразийск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 импер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европеизац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режим

(责任编辑 阎德学)

20世纪20年代俄国侨民界 对欧亚主义的批评*

张海鹰**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欧亚主义在其诞生的俄国侨民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各个流派都从各自立场出发对其展开批评。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家把欧亚主义视为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是感情化的、非理智的运动；以米留可夫和基泽韦捷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极端主义和俄国种族主义；以弗洛罗夫斯基为代表的斯拉夫主义者视其为斯拉夫主义失败的、倒退的继承者。各派都承认欧亚主义是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他们在毫不留情地批评欧亚主义主张的同时，亦指出其富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这些反响从另一层面凸现了欧亚主义的特点。

【关键词】欧亚主义 批评 别尔嘉耶夫 米留可夫 弗洛罗夫斯基

【中图分类号】D09(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3-0189-(23)

欧亚主义学说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俄国侨民界。提出这一学说的初衷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目的是解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导致的文化、政治冲突的原因和性质。后经欧亚主义者的集体努力，欧亚主义学说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充实，其独特的世界观曾在俄侨中引起强烈反响，到20年代中期具有了运动的性质。但由于20年代末流派内部发生分裂等原因，到了30年代，只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存在，至1939年二战前夕归于沉寂。50

* 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章的错漏之处由笔者承担。

** 张海鹰，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

年代初，苏联历史学家古米廖夫在集中营流放时逐步接受了欧亚主义。经其薪火相传，欧亚主义又在苏联解体前复兴。90年代中期，俄罗斯社会掀起了一场“欧亚主义热潮”，涌现出了大量现代欧亚主义流派。

可以说，欧亚主义继承了俄国历史哲学的传统，在俄国思想发展史中得到了合乎规律的体现。它传承了斯拉夫主义的部分思想，有意识地对抗西化，目的是确立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人民的俄罗斯和真正的俄罗斯文化；它从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中得到启示，俄国因此被诠释为一个独特而完整的文化地理世界（俄国—欧亚洲）；它赞同列昂季耶夫的拜占庭主义，认为拜占庭传统和东正教是俄国独立的精神支柱。

还可以说，欧亚主义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具代表性、最独特的思想流派。

在宗教方面，欧亚主义运动首先是精神运动，它拒绝社会主义而崇尚宗教。欧亚主义者确立东正教作为俄国—欧亚洲存在的基础，通过这一纽带，将其思想体系和理论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

在文化方面，欧亚主义者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世界是多极的，反对罗马—日耳曼文明对其他民族文明、文化的压制和侵略，强调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们把俄国—欧亚洲作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文明、一个独立的精神家园和民族文化空间，即独特的“欧亚文化域”。

在地缘政治方面，为俄国学术界最先引进“地缘政治”这个新观念的是欧亚主义者。他们提出，俄国是欧洲和亚洲之外的第三块大陆——欧亚洲，是一个具有特殊地缘政治意义的独立空间。他们以“发展地”（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概念作为俄国—欧亚洲空间决定论的基础。

在民族观方面，欧亚主义者认为，俄国—欧亚洲的民族基础是斯拉夫民族与图兰民族^①的共生，他们反对把欧亚民族分为俄罗斯民族与非俄罗斯民族，强调只有“全欧亚民族主义”观念才能推翻民族主义的种族基础，指出必须用以宗教为核心的欧亚主义团结思想来代替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希望把苏联—欧亚洲的民族主义与全欧亚民族主义结合起来。

① 图兰民族包括以下五个民族：乌戈尔—芬兰语系民族（包括匈牙利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等）、萨莫耶德人（涅涅茨人、恩加纳桑人和埃涅茨人）、突厥人、蒙古人和满族人。欧亚主义者认为，最初把欧亚洲联合成一个国家的就是图兰—蒙古人。

在国家观方面，欧亚主义的国家理想是建立“真理之国”和“民生之国”，政治制度是“思想制”（идеократия），国家组织形式是“国民制”（демогтия），管理模式是所谓的“欧亚主义执政选举”。“真理之国”遵从宗教价值观，致力于东正教理念的具体化，即将其转化为尘世的、政治性的理念。“民生之国”保证推行积极的社会保障原则，实现稳定的社会政治纲领，使国家成为能够保证民生的国家。“思想制”就是用统一人民思想的方式进行国家统治，具体说，就是以欧亚主义作为俄国—欧亚洲统一且唯一的意识形态。“国民制”指未来的政权应关心自己的民众，广泛满足人民的需要，依靠人民的充分支持。“欧亚主义执政选举”也就是民主选举制，即坚持欧亚主义思想，对执政层坚持人民民主选举。

在经济观方面，欧亚主义者为了实现家长制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策略，提出了“国家—私有”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结合，其实质是尝试建立国家所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最佳的相互关系。

在历史观方面，欧亚主义者首先把俄国历史置于欧亚洲的历史框架之下进行审视，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活动不仅与欧亚洲一体化进程在时间上吻合，而且推动了这一进程。1917年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是俄罗斯帝国国家传统的延续，同样具有“军事帝国”的特点。

欧亚主义者对蒙古统治的评价有别于其他思想流派。他们肯定蒙古统治的重要意义和东方在俄国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影响，认为蒙古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同时“铸就了俄国精神的独特性”。因为蒙古与天主教的西方不同，没有带来奴役“俄国精神”的危险，东正教因此得以保全。

在评价十月革命的问题上，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的政治灾难，是俄国社会对西化造成的文化断裂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也是俄罗斯国家危亡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民族复活方式。与其他侨民流派不同，他们正视现实，看到了革命积极的一面，认为共产主义只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选择，可以借助共产主义旗帜走文化复兴之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以被接受的，也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它能够使俄国欧亚文化在西方主义势力压迫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上述远不是欧亚主义学说的全部。因为欧亚主义产生于远离俄罗斯社会现实的流亡知识分子之中，无论其思想，还是由思想而产生的运动，都不同于职业革命家或政治家组建政党、制定纲领、规划国家政策以及执政等相对有序化的政治活动。欧亚主义有其自成体系的历史观、文化观、执政观等，但不可避免地具有分散性，即创始人自身所造成的难以控制性与缺乏组织性；欧亚主义缺乏一致性，具有主张上的飘忽性，而且有伴随政治需要变动的摇摆性。因此，对欧亚主义进行准确评述具有一定难度。

欧亚主义在产生之初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其产生在侨民界，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同时代的俄侨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俄侨被这一新思想所吸引，但大多数俄侨对欧亚主义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形式主要是发表批评性的评论、论战性的文章等。侨民出版界，特别是《最新消息》、《路标》、《复兴》以及欧亚主义自己的刊物，都刊有大量讨论欧亚主义的文章。在巴黎、布拉格、贝尔格莱德等地，参加讨论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侨民界的精英分子，如别尔嘉耶夫、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弗洛罗夫斯基等等。一方面，从其对手的“重量级”，间接反映了欧亚主义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从当时反对欧亚主义的观点出发，往往可以看清其本质，更为清晰地读出其主张。综观欧亚主义同时代的各类批评性评论，可以根据对其思想内容和历史意义研究方法的不同进行以下归类。

一、宗教哲学的视角：俄国国家主义乌托邦

持这一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俄罗斯伟大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他在《欧亚主义者》（1925年）和《欧亚主义者的乌托邦国家主义》（1927年）两篇文章中都是从索洛维约夫奠定的俄罗斯基督教普济主义立场出发，既肯定欧亚主义的积极方面，也指出它的消极方面。

别尔嘉耶夫认为，对欧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评价，与其按照它的本质，不如按照它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他认为欧亚主义本身虽不是独创的，但其中不乏新的思想倾向、年轻的激情、革命后的振奋和公认的天赋。令别尔嘉耶夫感到欣慰的是，欧亚主义者不是君主主义者，他们在理论研究中宣布了

文化高于政治的首要意义，并承认十月革命是既成事实，因此别尔嘉耶夫把欧亚主义阐述为俄国侨民界最现实的流派。“这是侨民界唯一出现在革命后的思想流派，而且是一个很积极的流派。其余所有流派，‘左的’和‘右的’，都带有革命前的性质，并因此无望地丧失了对未来的创造力和意义。欧亚主义者站在通常所说的‘左派’和‘右派’之外”。^①

别尔嘉耶夫认为欧亚主义者捕捉到了历经战争和革命之后的俄国青年的情绪，他们的思想体系与革命后青年的精神特征相符。这种社会思想倾向是俄国发生灾难后所产生的民族本能反应，是一种重压下的反弹。但他视这种倾向是感情化的，是一种非理智的运动。欧亚主义者自发地、激情地保护着俄国和俄国人民的自尊，他们当时作为俄国社会被革命击溃、侨居国外脱离人民的一个阶层，能做到这样是值得称赞的。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欧亚主义者的优点是他们理解“复辟革命前和革命年代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他们能感觉到严重的世界危机和新历史时代的来临，能意识到欧洲不再是世界文化的垄断者，世界文化进程同样包括亚洲各民族。欧亚主义者认识到的最重要的时代结论之一，是他们能够从整体上认识俄国革命，而不是把它界定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但别尔嘉耶夫更侧重于批判欧亚主义，因为“欧亚主义中还包含着一些必须加以反对的有害的有毒成分”。^②这些有毒成分中，譬如，首先是欧亚主义者的历史哲学（把世界文化划分成东方和西方），其次是他们的政治观点（认为国家有权对公民进行道德监护），最后是对天主教的批判。

第一，别尔嘉耶夫不同意欧亚主义者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西欧罗马—日耳曼文化不是万能的，而是有局限性的。别尔嘉耶夫提出了一些共同的、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看法。他论证文化永远是民族的，从来不是国际的；但同时文化成果又是超民族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也可以说是万能的。但人类文化万能的基础不是罗马—日耳曼文化，而是古希腊罗马文化。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Евразийцы//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РАН, 1993. С. 292.

② Пономарева Л.В. Вокруг евразийства: споры в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де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2002. С.28

俄罗斯文化与欧洲各民族的文化一样，是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础的。别尔嘉耶夫写道：“我们不仅属于东方，而且通过承继古希腊文化遗产使我们也属于西方。假如我们放弃了古希腊神学……假如我们身上的图兰因素占了上风，我们也许最终会成为亚洲人、东方人”。^①他认为，较之古希腊精神遗产，欧亚主义者更喜欢“图兰的肉体遗产”；较之柏拉图和希腊宗教导师，他们对自己与成吉思汗的联系更感骄傲。别尔嘉耶夫谴责欧亚主义者对罗马—日耳曼文化不调和的、对立的态度，昭示他们的非基督教观点。他“有时觉得”，欧亚主义者所接近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俄罗斯中亚洲、东方、鞑靼、蒙古的东西。“他们明显地认为成吉思汗比弗拉基米尔大公要好。对他们来说，莫斯科王国是受过洗礼的鞑靼王国，莫斯科沙皇是信仰东正教的鞑靼汗王”。^②

别尔嘉耶夫认为，欧亚主义者对彼得大帝历史价值的轻视，会导致文化虚无主义。他在《欧亚主义者》一文的结论中写道：“也许，我们最需要的是确立我们精神文化的传统和继承性，以便对抗虚无主义和破坏天性，以便战胜我们的鞑靼主义、布尔什维主义”。^③ 别尔嘉耶夫认为欧亚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具有局限性，他们不理解日耳曼文明危机的性质，他们对待西欧的态度是错误的、虚伪的。

第二，别尔嘉耶夫在第二篇文章《欧亚主义者的乌托邦国家主义》中，公开称欧亚主义是一种“诱惑”，并从根本上批评他们的“思想制”国家观念。“从思想史的角度讲，在思想制中你们将了解柏拉图在《共和国》中阐述的老乌托邦，柏拉图的完美之国是绝对的暴政”。^④按照他的观点，国家“应该是强大的，但必须清楚自己的权力界线”。^⑤真正的思想制“只可能存在于上帝之国”，任何国家都是罪恶的，国家干涉公民个人生活，即便为了共同福祉，也都是不能允许的。

而在欧亚主义者那里，国家是世俗真理的体现，是真正思想体系的绝对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Евразийцы. С. 294.

② Там же. С. 294.

③ Там же. С. 294.

④ Бердяев Н.А. Утопический этатизм евразийцев//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РАН, 1993. С.303

⑤ Там же. С.303.

化，国家吞噬了所有生活方式，不给自由社会和自由个体留有任何余地。尽管欧亚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国家称作神权国家，而称作思想制国家，但就其本质来讲是一回事。思想制使别尔嘉耶夫想到共产主义，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就是思想制，即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别尔嘉耶夫来说，俄国共产主义及其追求完美国家的理想都是渎神的、无神的追求。所谓完美之国，是虚伪的乌托邦，是对基督教寻求的神之国概念的偷换。别尔嘉耶夫本人幻想过“非完美”之国，用以战胜和替代完美之国。

别尔嘉耶夫认为欧亚主义者的政治体制纲领——执政层专政是复制共产党的。执政层专政，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党的专政。他写道：“党的专政比一个人的专政更不幸。墨索里尼的专政比法西斯分子的专政少些沉重，列宁的专政好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政”。^①别尔嘉耶夫认为君主制因素具有其“永不消逝的真理”，尽管是相对的。他把一切专政都视为“过渡状态”，而非理想的“政治体制”。

欧亚主义者是国家强力政权的拥护者，他们对政权有意愿和兴趣，他们是唯理论者、立宪主义者，他们与末世论情绪格格不入。按照别尔嘉耶夫的看法，西欧素有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有热爱政权、组织和建构政权的本能、以及纯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害怕神秘主义，特别是启示录，这些对于欧亚主义者都不陌生，“疏远欧洲和转向亚洲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欧化”。^②

别尔嘉耶夫在其批驳中显得更接近于一个自由—西方主义者。他是个人自由的拥护者，他把欧洲个人主义的作用等同于希腊人文主义的作用，他认为欧亚主义者并不理解个人主义对于人的精神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虽然他们掌握了“欧洲的组织建构方法”。^③他为欧洲精神价值观念而呐喊，反对欧亚主义者建立专制国家、哪怕是关心民族文化的专制国家的企图。他认为文化与政治是两种不相容的东西。

第三，别尔嘉耶夫认为欧亚主义者曲解了“俄罗斯的问题”。作为一个“俄罗斯思想”的追随者，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问题的本质在于精神文化，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Утопический элитизм евразийцев. С.303.

② Там же. С.304.

③ Там же. С.304.

而非政治。根据别尔嘉耶夫的看法，欧亚主义者丢弃了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思想、俄罗斯基督教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因为它被非基督教的东方蒙蔽了眼睛。因此，别尔嘉耶夫批评欧亚主义的宗教基础。他写道，欧亚主义者创立了自己的宗教体系，把宗教理解为某种脱离精神的社会组织，他们的宗教体系没有自身足够的基础和适合的载体，因此只好冒用东正教。

别尔嘉耶夫还无法接受欧亚主义者对西方基督教不容忍的态度。基督教不允许把“善与恶”、“明与暗”进行地理和种族的划分，以及把它们进行东方、西方、欧洲、亚洲的划分，正是基督教给世界带来一种认识：没有希腊人和犹太人。“对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的憎恨是罪恶和杀戮，是对西方各民族心灵的否定，是对他们生命源泉和救赎的排斥”。^①

别尔嘉耶夫也不同意欧亚主义者关于基督教和东正教的阐释，他指出，欧亚主义者没有发现俄罗斯东正教区别于西方基督教的最主要的特征——它的末世论和对终极的追求。他们把东正教首先理解为一种民族事实，民俗和民族文化的主要事实，他们从形式上、从历史上理解东正教，没有从本质上把它作为全世界意义的精神生活的事实来理解。他们首先重视的是日常东正教，它的“静态造型”，与伊斯兰精神相似，他们准备与所有东方—亚洲非基督教信仰建立反对西方基督教信仰的统一战线。别尔嘉耶夫认为这是对宗教心理的歪曲，是对基督教本质精神的背叛。

别尔嘉耶夫认为欧亚主义对宗教与国家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是对真正基督教的背离。实际上，基督教在精神上约束国家，不允许其政权高于精神生活、高于人的心灵和创造，人应该高于国家。但欧亚主义者本质上没有捍卫人的精神自由。别尔嘉耶夫认为他们是集体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一样。

另外，别尔嘉耶夫批驳欧亚主义者关于他们的思想与斯拉夫主义者的思想接近的论点。他认为，在欧亚主义者的思考中缺少精神自由的范畴，这却是斯拉夫主义者，特别是他们的奠基者霍米亚科夫所素有的。他谴责欧亚主义者脱离了俄罗斯民族宗教思想的优秀传统，脱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的遗产。他称欧亚主义者是“分立主义者”，是俄罗斯普世精神和陀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Евразийцы. С. 293.

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反对者。

总之，别尔嘉耶夫认为欧亚主义带有“无可置疑的危险性”，能够产生“欧亚主义诱惑”，他们的世界观的主要危险是“自然主义的一元论和乐观主义”。别尔嘉耶夫认为，他们的思考“更多地立足于必然的范畴，而不是自由的范畴”，他们使个人服从集体，“不会把道德评价因素引进政治”。^①

另一位宗教哲学家津科夫斯基的批评与别尔嘉耶夫的批评相似。他在《俄罗斯思想家和欧洲》（1926年）一文中指出，欧亚主义者为了建立东正教文化而忽视了西方经验。“欧亚主义尽管诚挚、甚至炽热地捍卫东正教文化思想，但根本不以这一思想为生，因为它的热情都消耗在与西方的斗争中”。^②他还补充说：“欧亚主义中完全缺乏对西方基督教经验的关注，西方基督教在历史上因斗争而树立了宗教文化，而欧亚主义者却好像站在历史的荒漠中”。^③

津科夫斯基完全否定欧亚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在《欧洲与人类》（1920年）一文中有关欧洲中心论的阐述。他谴责特鲁别茨科伊用欧洲时局偷换了欧洲文化的基督教本质。他甚至把欧洲文化自负为世界主义的炫耀解释为“这些炫耀的本质就是基督教理想的普济主义”。^④津科夫斯基的结论就是：“欧亚主义对欧洲的敌对态度比它的思想更深刻……”^⑤

还有一位批评者比齐里，最初曾在欧亚主义文集中发表过文章，之后脱离了欧亚主义，他的批评对于欧亚主义研究也具有一定价值。在《欧亚主义的两张面孔》^⑥（1927年）一文中他指出，欧亚主义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立场并具有两张“面孔”。

比齐里认为，“第一张面孔”是“名称本身”。联合欧亚各民族的思想是欧亚主义的积极方面。但与此同时，这种思想是革命前俄罗斯帝国地缘政治取向的必然成果。他驳斥欧亚主义者将整个欧亚洲变成统一的、聚合的文化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Утопический этатизм евразийцев. С.304.

②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С.83.

③ Там же.С.83.

④ Там же.С.84.

⑤ Там же.С.86.

⑥ Бицилли П.М. Два лика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РАН, 1993.

个体的“神话”，驳斥他们关于东方多神教教徒更接近“唯一正确的”基督教——东正教的“幻想”。

“第二张面孔”“不仅诱人，而且令人厌恶”，因为欧亚主义者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党派，不仅仅是一个党派，而且是“绝对正确、真正的东正教教义”的思想载体。比齐里在批评“第二张面孔”时，对其“国家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欧亚主义者对民主的批评是荒谬的。国家，根据比齐里的看法，源于“共同意志”思想，它可能具有从君主制到议会制政党完全不同的体现。批评这种共同意志的具体体现，他认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在这点上，他已经完全过渡到了自由主义批评的立场。

“东正教”自由主义民主派阵营的哲学家斯捷蓬对欧亚主义的批评大体与别尔嘉耶夫、比齐里的立场一致，主要批评欧亚主义拒绝欧洲经验、法制国家思想和议会制是十分错误的。他非常反感欧亚主义者的“思想制”观念，按照他的看法，这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撒旦主义”。他认为欧亚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对俄国欧洲部分的现实状况评价不准。另外，欧亚主义对彼得时代的理解带有明显谬误，因为彼得时代“产生了俄罗斯文化惊人的繁荣：从罗蒙诺索夫和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好比在罗马一日耳曼桎梏的‘痛苦’中浴火重生”。^①

二、自由主义视角：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流派对欧亚主义的批判是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20世纪初，以米留可夫和基泽韦捷尔为代表，还有司徒卢威等人，都对欧亚主义最基础的东西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站在捍卫欧洲文化、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称欧亚主义是“自说自话”的一种情绪。

历史学家米留可夫，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在其详尽的批判中主要针对欧亚主义者把俄罗斯定义为独特文明的问题和欧亚主义的俄国历史观。他在《第三种极端主义》（1925年）一文中指出，欧洲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比

^① Степун Ф.А.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Антология Сост. Л. И. Новикова, И. Н. Сиземская. М.: Наука, 1993. С. 307.

欧洲与俄国之间的差别更大。“如果说俄国跟法国不像，那么本质上德国与法国也不像。而在德国与俄国之间还可以……找到一个以旧俄西部省份形态存在的欧亚洲”。^①俄罗斯文化独特性的概念，对他来说，并不意味俄罗斯文化进程是一个自我封闭、不可分、不变的文化历史类型，不能把它看成是在欧洲发展框架之外的独立发展。

米留可夫驳斥欧亚主义者引进的基于否定普遍进步的“文化共同观”。他认为不存在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的民族，文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是文化“从上向下”的逐步过渡，由此也产生了文化在高级阶段不可避免地世俗化、知识分子参与其创造的必要性、以及“下层”的纯“部族”生活作为民族形成基础的“本性”和不稳固性。

米留可夫认为欧亚主义者把俄罗斯文化奠定在宗教基础上，又用“欧亚”文化偷换它，这是“徒劳无果”的尝试，这意味着蜕变到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不可分、无法归并、突然被发现的事实存在。米留可夫批评欧亚主义的“文化”理论，“按‘文化’范畴‘分解’和忽视发展阶段，它们的历史直接分散成彼此毫不相干的碎片”。^②他直截了当地嘲笑欧亚主义把经验实践与宗教理论结合在一起，以此作为“历史传统的感觉”。他认为这是为确保宗教暴政存在的合理性而杜撰出来的妥协，早在“16世纪人们就称它为‘神学的诡计’”。^③

1926年米留可夫写了另一篇文章《俄国种族主义》，再次激烈地批评了欧亚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接称其为种族主义，“当代欧亚主义者——俄罗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欧亚主义者利用其结论的那种科学（斯拉夫主义）是“专门为学说的既定目的挑选的，它在学术界早已不被承认”。^④米留可夫认为，不能说欧亚主义起源于斯拉夫主义，只能说欧亚主义者与斯拉夫主义的追随者相似。这些追随者当中首推达尼列夫斯基及其“不变的”、“先天静止的文化历史类型”和西方文明灭亡理论。米留可夫把欧亚主义者

① Милуков П.Н. Третий максимал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 Памят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7. С.327.

② Там же. С.329.

③ Там же. С.330.

④ Там же. С.332.

对这些思想的复辟称作“真正的种族主义”。

他认为，欧亚主义学说彻底否定导致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否定”指的是欧亚主义者批判彼得大帝的西化面孔并认定正是俄国在18世纪初的西化导致了自身的解体。米留可夫是从进步理论的角度研究历史的，根据这一理论，作为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是不可以被完全否定地看待的。他指责道，“十月革命”对于欧亚主义者来说是积极的，列宁堪比成吉思汗，欧亚主义者颂扬亚洲式的专政。

1927年，米留可夫在一次报告中把欧亚主义在20年代初的迅速普及解释为：欧亚主义与许多科学和社会政治流派拥有共同特征。“每个人都能在欧亚主义者那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人想要东正教，有人想要民族主义，有人想批评白色运动，有人想与布尔什维主义妥协和替它辩护，有人想要理解当前的现实主义，有人想要建构未来的民族主义乌托邦”。^①他认为欧亚主义思想的危险在于，欧亚主义者试图把他们关于欧亚主义神权国家的“宗教哲学幻想”建立在人民的信仰之上。

米留可夫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认为欧亚主义者的政治纲领站不住脚。他虽然赞同把解放俄罗斯的斗争转移到俄罗斯国内的观点，但不认同他们把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认定为西方理想的破灭以及人民群众为贯彻欧亚主义思想的解放。

米留可夫与欧亚主义者辩论时指出，他们领导的共和一民主主义者承认在过渡时期保留苏维埃国家组织具有某些合理性，因为可以防止俄国在消灭苏维埃专政过程中陷入无政府状态、领土分裂和军事专政的恐怖，同时能向群众提供直接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但是，米留可夫断定欧亚主义者会走得更远，因为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创造的“不错”只需要“发展”和“纠正”；布尔什维主义改造对于他们来说是深刻的、无意识的、“人民智慧”的结果，可是“欧亚主义选举”却以“有意识的少数人的意志”巩固这些成果。米留可夫也指出欧亚主义思想迎合人民夙愿的一些特征，但提出有必要弄清楚人民的愿景与欧亚主义煽动之间的差别，并作出现实评价。米留可夫认为欧亚主义者用“执政层”统治代替党派专政是具有蛊惑性的。

^①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Доклад П.Н. Милюкова)// Последние новости. 1927. 8 Февраля.

另外，米留可夫专门就彼得改革史来驳斥欧亚主义者。他认为彼得一世及其改革就其本质来看是具有深刻民族意义的。彼得一世本人，尽管通过改革让俄国走上了欧洲道路，但其民族性是毋庸置疑的。“彼得能让俄国走这条道路，难道对那些缺乏信心、认为欧洲道路跟俄国格格不入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实际反驳吗？难道彼得之后的整个俄国历史不也最终证明，俄国不是亚洲，而是欧洲的一部分吗？”^①

另一位自由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人基泽韦捷尔在其文章《欧亚主义》（1925年）中写道，尽管欧亚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存在很大分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呼声——“让欧洲文化灭亡”。基泽韦捷尔认为，欧亚主义所主张的欧洲与亚洲的结合，是在“号召人们反对俄罗斯文化中的欧洲因素”。在他看来，把俄国纳入欧亚主义与俄国发展的现实进程风马牛不相及。俄国演变的所有过程都与西方属于同一个类型，但因俄国的特殊条件而使这一过程显得“极其缓慢和模糊”。俄国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与欧洲同样的阶段：氏族社会、独特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与西方相同，宗教在俄国的作用也很重要；在俄国也有欧洲类型的城市、与之相同的城市阶层团体和自我管理机制等。基泽韦捷尔认为，这些共同的发展特点就是欧亚主义者所坚持否定而现实中却存在的“直线进步”的证据。

基泽韦捷尔认为，欧亚主义的主要思想“意味着在民族文化中没有全人类元素，人类在其文化生活中分散成相互陌生的文化世界，而且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具有全人类意义那样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这就是作为独立学说的欧亚主义获得现实依据的思想基础。如果否定它，欧亚主义的整个世界观大厦也将随之崩塌”。^②基泽韦捷尔批驳欧亚主义中关于否定全人类文化，却承认彼此陌生的、特殊的、分散的民族文化的观点。关于灵魂无法复制，文化也相应无法复制的观点，基泽韦捷尔认为它的哲学依据是“不可靠的”。尽管每个人无法复制，但人们具有共同特征，所有种族都具有共同特征。如果说灵魂无法复制，而导致共同特征的缺失，从而无法建立全人类的文化，

①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Доклад П.Н. Миллюкова)

② Кизеветтер А.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 Памят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7. С.336.

那么民族文化按同样的推理也是无法建立、无从建立的。

基泽韦捷尔认为，民族文化的存在开启了全人类文化的可能性，民族特点属于全人类，正如个人特点属于民族一样，现实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欧亚主义者否定欧洲文化、把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隔离开来是不对的，在基泽韦捷尔看来，两种文化具有很多亲缘特征并在各自发展中经历了相同阶段。他列举了几个有关全人类价值观问题的论据：“无论欧洲民族还是亚洲民族，都曾经历氏族生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曾有过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两地也都存在过。如果说通常被认为是亚洲特殊属性的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对欧洲来说也不陌生，那只是以其当地独特的外貌出现罢了，那么何来理由证明，在欧洲国家个人自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立宪制，在亚洲文化国家的特定条件下就找不到立足点了呢？”^①

总之，基泽韦捷尔认为，欧洲文化涵义不一，斯拉夫—俄罗斯文化属于欧洲文化。“俄国对欧洲文化的归属没有使它丧失民族独特性，正如英国、法国、德国没有丧失其民族独特性一样”。^②独特性的存在与全人类的根本特征并不矛盾。斯拉夫—俄罗斯文化受珍视，就是因为它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此外，他认为欧亚主义者有关欧亚文化是各种文化融合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如何理解融合，他写道：“亚洲因素开始与欧洲因素竞争并大获全胜，这不是融合，是打架”。^③

欧亚主义的反对者都非常关注欧亚主义历史根源的研究。基泽韦捷尔认为，欧亚主义者与斯拉夫主义者的联系是“想象的”、“臆造的”，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之间是存在严格界线的。“与欧亚主义者不同，斯拉夫主义者坚定地站在全世界文化历史过程统一的基础之上。如果说他们把斯拉夫—俄罗斯文化本质与罗马—日尔曼文化本质相对立的话，那么斯拉夫—俄罗斯文化本质一定是作为全人类的根本特征而存在的”。^④

基泽韦捷尔指出，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两个流派的共同观点，是把人类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全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是曲折地、辩证地

① Кизевеґтер А.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С.337.

② Там же. С.337.

③ Там же. С.337.

④ Кизевеґтер А.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С.339.

前进的，以期达到一个共同目标——世界的绝对理性。理性会在不同层面——文化中逐步得到揭示。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依次被推上历史舞台，以期理解世界的理性。无论斯拉夫主义者还是西方主义者都已接受这种模式，并希望未来有一个民族能吸取全部的理性。而这一未来民族对西方主义者来说将是黑格尔指出的日尔曼民族，对斯拉夫主义者来说则首推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俄国必须与欧洲分离，而在于俄国必须走在欧洲和全人类的前面。

基泽韦捷尔在另一篇文章《欧亚主义式的俄国史》（1927年）中指出，欧亚主义者对待西方和西欧发展的态度实质上是矛盾的，他们对苏维埃的体制及其国家机关，尤其对苏维埃委员会原则上的赞同，都是承认西欧经验。所有“各种各样的主义”，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假如欧亚主义者的观点正确，假如对此不曾有内部需求的话，那么如何解释它们被俄国所接受？

基泽韦捷尔在文章中还批驳了欧亚主义有关地理论的一些观点。他把欧亚主义学说与“地缘政治的神秘主义信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受人尊重的地缘政治学科”。欧亚主义者为每个民族预设了一个疆域空间——“发展地”，而每个民族似乎自发地、无意识地追寻这个发展地。对于基泽韦捷尔来说，维尔纳茨基（欧亚主义者中重要的历史学家）把欧亚洲地理位置与人民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是莫名其妙的。彼得一世之前的俄国，尽管不是欧亚洲，却被“完整的欧亚世界观”所支配；19世纪末，当俄国囊括了几乎整个欧亚洲时，却开始丧失欧亚世界观。于是，基泽韦捷尔质疑：“你们，读者们，是否能理解这种模式？坦白地说，我什么也无法理解，尽管早已习惯阅读学术书籍。俄罗斯人民多么奇怪呀，当俄国不是欧亚洲时，它按欧亚方式思考和感知，当俄国成为欧亚洲时，欧亚世界观却从它身上消失了！如果这是‘发展地的逻辑’，那么不得不承认，这是完全另类的逻辑”。^①

令基泽韦捷尔更为气愤的是，欧亚主义者竟然对“俄罗斯—鞑靼文化一体化进行颂扬”，他们把成吉思汗作为俄罗斯的民族偶像，把俄国历史说成

^① Кизеветтер А.А.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о евразийс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 Памят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7. С.342.

“完全被金帐汗国的历史所掩盖”。基泽韦捷尔认为这是对东正教的背叛，是漠视普通俄罗斯人民对鞑靼人的仇恨。他对维尔纳茨基的著作《俄国史概述》进行了尖锐批评。

基泽韦捷尔认为，维尔纳茨基关于罗斯接受两个遗产——蒙古遗产和拜占庭遗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话，“俄罗斯民族就没有自己独创的东西：制度是蒙古人给的，思想是拜占庭给的，俄罗斯民族本身没有创造任何东西”。^①此外，欧亚主义者忽略了俄国与西欧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前彼得时期就很密切；西欧思想也是拜占庭遗产的组成部分，但维尔纳茨基对此却缄默不语。

欧亚主义者认为鞑靼统治成就了罗斯，森林与草原之争的问题好像被鞑靼统治解决了，因为蒙古统治，“俄罗斯大地似乎不再需要防御游牧民族”。“在这里……维尔纳茨基指摘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破坏了前辈们的传统’，发动了库利科沃战役并因此又把与草原之战的重负压在了俄罗斯人民的肩上”。^②基泽韦捷尔批评维尔纳茨基的这种论点。他认为，鞑靼游牧民族对俄罗斯的侵扰和统治，造成了定居人民长期而深重的灾难，而欧亚主义的所有著述都掩盖了鞑靼侵略的沉重方面，完全忽视了历史事实。

基泽韦捷尔认为，欧亚主义对鞑靼统治之后的俄国历史的阐述都是“一些零散的点缀”：对伊凡雷帝执政、整个莫斯科公国、混乱时代的阐述都存在空白；对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活动以及19世纪的历史都存在偏见。按照欧亚主义者的看法，彼得一世改革把俄国引进了死胡同，使其丧失了民族遗产；而叶卡捷琳娜二世，一个“极端西方派分子”则迫害东正教会，剥夺修道院的土地，虐杀高级僧侣。

基泽韦捷尔认为，欧亚主义者对俄国历史进行了有目的的取舍，失去了客观公正的态度。“一个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叶卡捷琳娜尽管信奉伏尔泰主义，但宣扬自己对东正教的忠诚，而修道院地产国有化还在虔诚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执政末期就已决定了”。^③基泽韦捷尔指出，维尔纳茨基虽然无情

① Кизевеггер А.А.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о евразийски. С.342.

② Там же.С.342.

③ Там же.С.342.

地揭露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但为了不损害欧亚主义的观点，对“欧亚”沙皇伊凡雷帝迫害菲利普都主教的史实却沉默不语，此事只在《俄国史概述》的附注中提及。因此基泽韦捷尔得出结论：“欧亚主义者就是这样裁剪历史，需要处就无限突出，不需要处则尽力遮掩”。^①

对 19 世纪的俄国历史，基泽韦捷尔认为维尔纳茨基的阐述也是有偏见的。他写道：维尔纳茨基“严厉指责”俄国外交家过分关注西方事务而有损于“东方”事务，但这一观点极其天真幼稚，因为在亚洲事务上的“进展”不可能无关欧洲政治。

另外，基泽韦捷尔认为，一个所谓追求真理的党派消灭了其他政党之后的终极目的，就是“一定群体凌驾于其他居民之上的寡头专制统治”。而“欧亚主义选举”的思想，尽管不清楚由谁来进行这个选举，但这“仍旧是布尔什维主义，也许加上了其他幌子，也许这就是其真面孔”。基泽韦捷尔认为，思想制与人民代表相结合，实际上就是稍加完善的布尔什维主义苏维埃。而某些欧亚主义者赞同在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之间取消界线，其实质仍是寡头统治的体现。

尽管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司徒卢威是欧亚主义者萨维茨基在彼得堡时期的老师，但是他在 1921 年第一本欧亚主义文集《面向东方》出版之后还是立即表达了对欧亚主义的反对意见。司徒卢威在 1921 年 2 月 16 日写给萨维茨基的信中抨击特鲁别茨科伊的《论真假民族主义》一文。他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的根本思想客观上是荒谬的，有必要加以驳斥和推翻。我毕生的很大精力都浪费在与荒唐思想的斗争上……特鲁别茨科伊的‘民粹运动’，我认为是俄罗斯思想的梅毒……”^②司徒卢威对自己的学生萨维茨基的文章《回归东方》予以强烈谴责。他说“你们欧亚主义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正转向民粹运动……是针对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背叛”。^③司徒卢威与欧亚主义一直势不两立，他对欧亚主义经常用这样的词汇描述：“病态地迷恋霉烂”、“政治中的颓废主义”、“特鲁别茨科伊

① Кизеветтер А.А.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о евразийски. С.342.

② Струве Г. П.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изгнании: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бзора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Париж: YMCA-PRESS, 1984. С. 40.

③ Там же.С.42.

的黑帮神秘主义”等等。

上述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司徒卢威三位对欧亚主义的批判，代表了自由主义的西方派。他们认为历史过程是直线发展的，并支持欧洲文明中心论。这一类型的政治活动家最不接受的就是基泽韦捷尔提出的欧亚主义中的“亚洲主义”问题。他们认为欧亚主义的出现是由于典型的亚洲起因，是落后的、宗法的封建主义的胜利。在欧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政治观点泾渭分明，欧亚主义者是国家强权的拥护者，要求从文化到经济各个方面都要加强国家权力；而自由主义者却把强硬的国家政权视为俄国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视俄国自身的国家政权是永远的敌人，因为这一政权在俄国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具有专制特征。自由主义者如此激烈地反对欧亚主义并不奇怪，因为自由主义是欧洲中心论文化方针的践行者，而欧亚主义则是作为反西方和反欧洲的政治思想流派诞生的，两者的矛盾原本就是对立且无法调和的。

三、斯拉夫主义视角：不成功的继承者

这一观点是由著名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弗洛罗夫斯基提出的。他最初曾参加过欧亚主义运动，但很快就退出了。可以说，他是斯拉夫派在欧亚主义中的最后一个代表。弗洛罗夫斯基认为欧亚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流派，他们试图把俄罗斯人民从布尔什维主义的控制下带到欧亚主义思想的“统治”下。他作为一个宗教思想家，是从欧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角度批判欧亚主义，认为任何思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信仰并列。

他的文章《欧亚主义诱惑》（1928年）一开头就指出，“欧亚主义的命运是一段思想失败史”。^①弗洛罗夫斯基首先批判的是欧亚主义者对历史的盲目崇拜，指出“欧亚主义者把发生的事情和既成的事情当成不可避免的事实来接受，而不是当成对人类自由尊严的呼唤”。^②他批评欧亚主义者把革命评价为“自然发展”的结果，批评欧亚主义承认革命并试图把革命力量纳入正

^① 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Из прошлого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М: АГРАФ, 1998. С.311.

^② Там же. С.315.

轨的观点。他感到恐怖的是：“欧亚主义者所谓的真正的、创造性的俄国，不在该在之所，不在东正教精神的堡垒中，而是在‘小偷’（指布尔什维克）身上”。^①

很多侨民也都认为欧亚主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妥协态度是危险的，说“布尔什维主义激情”催眠了他们，使他们“巴结逢迎”苏维埃现实，并歌颂“新的执政层是国家自然力的体现”。按照弗洛罗夫斯基的看法，欧亚主义者把国家组织和强权“神话”了，把布尔什维克当成了俄国的拯救者，他们甚至号召人们学习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和典型，但他们没有看到，在“布尔什维克极端主义的形式中，反映和表达着无神论的、惨无人道的、魔鬼的本质”。^②

弗洛罗夫斯基在研究欧亚主义把俄国与欧洲对立的观念时，对欧亚主义者对于不同文化历史类型的划分感到不满。他写道：“要永远记住，基督的名字联结着俄国与欧洲……俄国，作为拜占庭忠实的继承者，对于非东正教而是基督教的西方来说，东正教的东方是同在一个统一的文化历史循环内部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③

弗洛罗夫斯基指出，欧亚主义者教条地理解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他认为，这一理论是为了“认知和证明民族独特性，保护与人类共同文明思想不同的历史特性”，但是人类共同文明思想最终确立了人类是一个统一体。“在大量正在发掘的发展类型集合中体现和实现着人类的思想，每一个类型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表现其独特性，都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④但在欧亚主义的“历史类型形态学”中，丢失了基督教哲学历史问题，用模式和类型遮蔽了各民族具体的、悲剧性的命运。

弗洛罗夫斯基认为，欧亚主义者片面而教条地解读了达尼列夫斯基为何以俄国与欧洲对立的形式提出俄罗斯独特性的问题。“俄国与欧洲相遇”的意义，不仅因为俄国被“历史变化无常的力量”抛进了“欧洲郁闷的怀抱”，俄罗斯历史的面貌因而双重化了，主要还因为俄国与欧洲作为统一的“基督

① 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С.317.

② 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С318-319.

③ Там же. С.333.

④ Там же. С.331.

大陆”的两部分，“宗教使命和起源是一致的”、相互关联的。根据弗洛罗夫斯基的看法，欧亚主义者不理解东正教俄国与非东正教欧洲之间的真正界线，不理解“西方的悲剧”及其“原罪的世界意义”，丧失了斯拉夫主义者素有的俄国对西方宗教文化的责任感。

弗洛罗夫斯基还驳斥了欧亚主义者关于俄国就是欧亚洲的论断。他写道：欧亚主义者在这一论断的两种不同含义之间“摇摆”——“欧亚洲，这意味着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是第三个世界。欧亚洲，这还意味着既是欧洲，也是亚洲，是两者的混合或结合。显然后一种含义占了上风”。^①弗洛罗夫斯基认为这一切都是“向亚洲倾斜”，欧亚主义者太热衷于与东方的同源，对于他们来说，俄国的东正教没有任何意义，它会受到与欧亚洲其他民族宗教统一的愿望的压制。

弗洛罗夫斯基赞同欧亚主义者关于“俄国与亚洲在历史上相互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观点以及“我们至今对亚洲知之甚少”的观点。但他指责欧亚主义者使用“发展地”概念故弄玄虚。他认为俄国与亚洲的联系具有国家和经济意义，但没有宗教文化意义。“欧亚主义者太迷恋自然的、地理的和种族的特征。他们忘记了，俄国—欧亚洲作为历史上的‘第三个世界’（不仅是一个‘洲’、一块大陆或‘大陆—海洋’），决定了它现实的、唯一清晰的文化自然界线，无可争议地在于东正教”。弗洛罗夫斯基认为，欧亚主义者关于“欧亚洲无需清除信仰界线就能达到某种宗教统一”的论点是错误的。^②

弗洛罗夫斯基还批评欧亚主义者另一个立场，即他们的“国家极端主义”。他认为，欧亚主义在文化中没有划清教会与国家间的界线。无论教会，还是国家，欧亚主义者都是在随意、不成熟的状态中进行理解。根据弗洛罗夫斯基的看法，这种随意理解没有任何统一的原理或这种原理只可能是“大写党派的”，因此，党派转变成“教会之上的某种自封的‘教会’”。教会对于弗洛罗夫斯基，就像对于大多数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一样，是整个人类在基督身上的潜在统一，是“生命的全部”。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欧亚主义者的事业是徒劳的，因为教会是世俗外的统一，不是可以服从于国家的体制。

① 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С.333.

② Там же. С.335-338.

弗洛罗夫斯基还对欧亚主义者的其他很多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欧亚主义者虽然“提出了当今最具现实意义的、尖锐的问题”，但他们无法“胜任它们”，无法清楚地回答它们。“他们以诱惑幻境的模糊花边进行回答，但幻境永远是诱惑的、危险的，特别是当它们被当作现实时，在欧亚主义的幻境中，真理就与伟大的自我欺骗结合在一起了”。^①

总体来说，斯拉夫主义者把欧亚主义评价为一个有利于俄罗斯政治思想继续发展并为民族自我意识提升作出重要贡献的思想流派。他们虽然把欧亚主义视为斯拉夫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但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倒退的继承者。

结 论

综观针对欧亚主义的种种批评，可以看出，大多数批评者旨在确定欧亚主义在世界政治思想中的地位，而很少有人具体考虑欧亚主义创建时的复杂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因素。在这些批评中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来批判欧亚主义。宗教哲学家视其为乌托邦，自由主义者视其为极权主义和“俄罗斯的种族主义”，斯拉夫主义者视其为不成功的斯拉夫主义……各有各的看法，犹如盲人摸象。所有批评者都认为欧亚主义缺乏系统性，缺乏逻辑性，它是一种折中主义学说。

但要指出，对欧亚主义的评论不全是否定的，甚至最不妥协的反对者也力求在解释这一流派产生的原因、特点、多层次性的同时，指出其积极的方面。比如别尔嘉耶夫、司徒卢威、米留可夫等人都不止一次地指出，欧亚主义者是新思维（今天称之为地缘政治学）的代表。“在欧亚主义者思考的出发点中有很多正确的东西，尽管这不完全属于这个流派。这些正确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新的东西，它相对于极端主义的旧类型来说是新的”。^②又比如，弗洛罗夫斯基的结论是：欧亚主义学说提出了“真实的问题”。

另外，欧亚主义的批评者都没能也不可能预见到欧亚主义在下一场俄罗斯大变革中重获生机，也没能预见到欧亚主义者的很多历史预言都不是空

① 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С.312.

② Милюков П.Н. Третий максимализм. С.327.

话,例如,他们设计的个体市场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经济方案就是一例。尽管欧亚主义思想中存在着片面性和极端性,但对其合理成分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欧亚主义者提出了当时的一些创新观念,历史也证明了这些观念并不是凭空想象所得出的结论。

在当今的俄罗斯,关于欧亚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学术界对其评述千差万别,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无论如何,欧亚主义能像磁铁一样吸引如此众多的学者、政治家和政论家,这也说明了欧亚主义世界观和学说对于理解俄罗斯文明本质所具有的高度潜力。

【 Abstract 】 Eurasianism has attracted heated debates within Russian emigrants in the 1920s. Many elites have taken part in the debates from their different standpoints. Religious philosophers, represented by Berdyaev, regard Eurasianism as utopia, kind of emotional and unreasonable movement. Liberalists, represented by Miliukoff, take it as extremism and Russian racialism. Slavophiles, represented by Florovsky, view it as unsuccessful and retrogressive successor of Slavism. All schools admit that Eurasianism is a strong thought with positive aspects while criticizing it. This has also reflected the features of Eurasianism from another aspect.

【Key Words】 Eurasianism, Criticism, Berdyaev, Miliukoff, Florovsk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20 г. XX в.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с самого своего рождения вызвало яркую полемику в русской диаспоре, каждое из течений только со свое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авало оценку этому явлению. Бердяев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философов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в качеств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осуществимой утопии, являющейся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м, нерациональным движением; Милуков и Кизеветтер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либералов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и его как экстремизм и русский расизм; Флоровский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 его как проигравшего, регрессирующего преемника славянства. Вс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различных школ признавали, что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мощны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м течением,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нещадной критикой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они также указывали на ег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ую сторону. Такие реакции с и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ыявил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евразий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критика, Бердяев, Миллюков, Флоровский

(责任编辑 李 恪)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4 年第 3 期

(总第 187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20.00 元